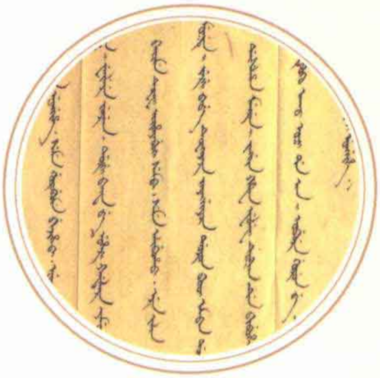
MANWEN DANGAN YANJIU

满文档案研究

赵彦昌 编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满文档案研究

MANWEN DANGAN YANJIU

赵彦昌　编著

安徽大学图书馆
* 藏　书 *
www.lib.ahu.edu.cn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文档案研究 / 赵彦昌编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12
ISBN 978-7-5100-5429-7

Ⅰ.①满… Ⅱ.①赵… Ⅲ.①满语—档案研究 Ⅳ.①G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97418 号

责任编辑：应长天
装帧设计：车皓楠
责任校对：石佳达

满文档案研究
赵彦昌　编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00083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021-5911072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0.25　字数：250 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429-7/G·346
定价：45.00 元
http://www.wpcsh.com.cn
http://www.wpcsh.com

序

多年前，我与彦昌在京偶然碰过一面，因当时天色已晚，且老眼昏花，差点没能认出来。后来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他创办的落拓寒儒博客“中国档案学研究”上略知一二。因为我也从事中外档案事业史的本科教学，所以时常关注他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据我所知，他从 2004 年至今已在各种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出版专著 3 部，主持国家和省校级科研项目 10 多项，获省部级奖励 20 多次，作为一个只有 34 岁，工作仅 8 年的后起之秀，能取得如此令人惊讶的成就，完全可以用“后生可畏”一词来形容，这与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养成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拼搏精神是分不开的。客观地说，在当前档案界越来越不重视中国档案史教学与科研的处境下，彦昌凭着对中国档案史的热爱，执著地坚守住这块阵地，更是难能可贵，用胡鸿杰老师的话说，就是“不能不让人称奇和敬佩”。

彦昌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和致力于中国古代档案史研究的同时，也对满文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多次表示要涉足少数民族档案研究领域。几年前，他在首部个人专著《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一书中已撰写了《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研究及出版情况综述》、《满

文档案与清代民族史研究》、《清代玉牒研究》等章节，并先后发表了《满文档案与清代满族史研究》、《八十年来满文档案出版书录》、《满文档案开发利用研究》、《中国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及其追索》、《论满文档案的价值》、《论建国后满文档案的管理》、《近代以来满文档案编译研究》等多篇专题研究论文，对近、现代满文档案的管理和研究工作进行了梳理，并在分析论证和收集资料方面显示出较强的功力。在前期大量积累和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22万字的《满文档案研究》这部新作，这是他的首部民族档案研究专著，也是他提出的“中国档案史研究大系”中的系列丛书之一，今后还将陆续完成《明清档案研究》、《东北档案史研究》、《东北文献学》等书的写作。

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努尔哈赤命满洲文士额尔德尼、噶盖创制老满文并正式颁行起，直到清朝覆灭的300余年间，满族用老满文和新满文书写形成了大量满文档案。时至今日，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保存有200万件，分别属于宫中、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机构。东北三省的存量也相当可观，内蒙古、西藏、台湾等地也有数量不等的收藏。这些满文档案主要是清朝的官方文书，是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衙门在各项政务活动中形成的，是清王朝巩固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产物，其数量浩繁、种类多样、内容丰富、保存完整，涉及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艺术、宗教、民族、风俗、天文、地理、水利、气象、地震、灾异等方面的历史，具有原始记录性、真实可靠性、全面系统性和载体、内容价值，对于促进清史、民族史、边疆史、地方史的研究，发掘满族的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近百年来，中外学者对满文档案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也使满学成为一门世界性显学，其研究范围广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语言、文字、地理、建筑、民族、法律、外交、人物等多方面，涌现出中国内地的安双成、佟永功、关嘉

禄、关孝廉、吴元丰、赵志强、吴雪娟、阎崇年、屈六生，台湾的李学智、陈捷先、庄吉发以及日本的鸳渊一、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神田信夫、松村润等一大批专家学者。

彦昌在充分借鉴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中国档案学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概述了满文档案的概况、管理、编纂、开发利用和数字化诸问题。通过对满文档案和档案工作全景式地扫描，取得了如下几点突破和进展：

一是对满文档案的产生与形成、研究现状和成果、性质和特点、种类和载体、价值和作用、内容和分布等问题作了概述；二是阐述了满文档案的管理，包括征集、整理、分类、鉴定、保护等几个环节；三是阐述了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机构及人员、类型、体例与加工方法等，其中还对编纂特点和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提出了编纂工作参与力量的社会性和国际性，成果类型的广泛性，编纂方法的多样性，编纂的最终目的是信息共享、编纂的核心因素是参与力量等看法；四是对开发利用和数字化作了探讨。前者分析了利用方式、存在问题和具体措施，后者阐述了数字化的含义、意义、主要原则、措施方法等问题；五是对满文档案研究前景的展望和提出建议，认为研究范围将进一步扩展、研究内容将逐步深入、研究趋势将走向国际化，提出了加强保护工作、重视专业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国际合作等建议。

该书的写作注意体例的连贯性和内在的逻辑性，一气呵成，注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力求全方位、多视角、前瞻性地揭示满文档案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和规律，探索满文档案管理工作的理论、原则和方法，使之能更好地指导满文档案管理和满文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实际。因此，该书的问世，在学术上可促进档案工作者对满文档案的深入探讨和研究，在实践上对档案部门更好地开展满文档案管理工作也能

起到理论和业务上的参考作用。

近百年来，在海内外几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成绩，但对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作为一个多年从事民族档案史料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老兵，我在衷心祝贺《满文档案研究》一书问世的同时，也希望少数民族档案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能更多一些，研究水平再提高一些，青年学子的成长更快一些。热切期盼在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档案人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档案学研究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子丹

2012年8月6日

目　录

第一章　满文档案概况 ………………………………… 1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和改革 ………………………………… 1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产生与形成 ……………………………… 8
　第三节　满文档案研究概述 ………………………………… 11
　第四节　满文档案研究的成果 ……………………………… 21

第二章　满文档案的性质及特点 ……………………………… 39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性质 ………………………………… 39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特点 ………………………………… 42

第三章　满文档案的种类 ………………………………… 47
　第一节　现存典型的满文档案 ……………………………… 47
　第二节　特殊载体满文档案 ………………………………… 65

第四章　满文档案的价值及作用 ……………………………… 95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价值 ………………………………… 95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作用 ………………………………… 105

第五章　满文档案的内容及其分布 …… 109
第一节　国内保存的满文档案的内容及其分布 …… 110
第二节　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的内容及其分布 …… 158

第六章　满文档案的管理 …… 168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征集 …… 168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整理 …… 170
第三节　满文档案的鉴定 …… 180
第四节　满文档案的保护 …… 181

第七章　满文档案的编纂 …… 184
第一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 …… 184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编纂机构及编纂人员 …… 204
第三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类型 …… 210
第四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体例与加工方法 …… 229
第五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特点和规律 …… 244

第八章　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 …… 254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利用方式 …… 254
第二节　满文档案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 258
第三节　加强满文档案开发与利用的措施 …… 262

第九章　满文档案的数字化 …… 267
第一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含义 …… 267
第二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意义 …… 270
第三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主要原则 …… 272
第四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措施及其方法 …… 277

第十章　满文档案研究的前景展望和建议 …… 288
第一节　满文档案研究的前景展望 …… 288
第二节　加强满文档案研究的建议 …… 290

参考文献 …… 295

后记 …… 313

第一章　满文档案概况

第一节　满文的创制和改革

一、满文创制的历史背景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满族是17世纪初在辽东地区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最早的先人是先秦时期的肃慎人,汉和三国时期称“挹娄”,北朝时期称“勿吉”,隋唐时期称“靺鞨”,辽、宋、金、元时期称做“女真”。

在辽代女真人被分为“生女真”和“熟女真”两大部分。其中“熟女真”较为先进,分布于松花江以南及渤海国南部等地;而“生女真”较为落后,分布于黑龙江下游、松花江以北、东临大海的地区。在女真的30多个部落中,“生女真”中的完颜部逐渐强大。12世纪初,以完颜部为主体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于1115年建立金国,定都会宁。统治者先是联合北宋灭辽,继而又推翻北宋,迁都燕京,控制了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

当时的女真人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女真人在与契丹人和汉人长期接触的过程中,逐渐地汉化,许多的女真人学会了使用辽国的契丹字和汉字。至金太祖阿骨打时,命令曾经学习过契丹字和汉字的臣僚

完颜希尹,仿契丹大字和汉字为基础试制女真文字,并于 1119 年(金天辅三年)诏令颁行,后人称其为“女真大字”。20 年后的 1138 年(金天眷元年)熙宗完颜亶参照契丹字创制颁布另一种女真文字,即后世所称“女真小字”。无论是女真大字还是女真小字都是以汉字和契丹字的字形作基字,再增减笔画而成的记录女真语语音的文字。

金于天兴三年(1234 年)被蒙古所灭,女真文却并没有立即消亡,而是在女真人中继续使用着,但是作为统治民族的蒙古通行使用的是蒙古文字,因此在女真人地区,其实是女真文和蒙古文并行使用的。并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真文的使用范围不断地缩小,而蒙古文的使用范围不断地扩大。特别是在女真人上层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学会并使用蒙古文,甚至有的女真部落则已完全放弃女真文,而专用蒙古文。到了明朝时期,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 年),玄城卫指挥撒升哈、脱脱木答鲁等奏:“臣等四十卫无识女直字者,乞自后敕文之类,第用达达字。”女直字即为女真文,达达字即为蒙古文。从此以后,女真人改用了蒙古文字。蒙古文字在女真人中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金迁都北京之后,大量女真人进入中原,他们在和汉人的长期杂居生活中逐渐地汉化。元朝和明朝时期,女真人的主体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和黑龙江中游一代。他们逐水草而居,生产力水平一直不高,农业不发达,生产以渔猎为主。到了明朝正统初年,即 15 世纪 30 至 40 年代,这部分女真人进一步划分为三大部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

建州女真,包括建州五部(苏克苏护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和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讷殷部、珠舍里部)等。主要分布在抚顺以东浑河流域到长白山麓、鸭绿江边之间的区域。

海西女真,包括哈达、乌喇、叶赫、辉发四部,自称为扈伦四部。主要分布在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及松花江自西向东北转折处。

东海女真,也称“野人女真”,包括瓦尔喀、虎尔哈、使犬、使鹿等众

多部落。分布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中西游及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16 世纪末，建州女真不断的壮大。明万历十一年(1583 年)苏克苏护部首领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统一大业。至 1593 年统一了建州女真，至 1616 年灭扈伦四部，收海西女真，1626 年统一野人女真，基本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建州女真的迅速崛起，女真部落的逐渐统一，为满文的创制提供了条件。

二、满文的创制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与汉、蒙、朝鲜等民族的来往也日益频繁，奴隶制经济和文化获得迅速的发展。1616 年(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大金"。在建立政权并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的过程中，仍借用蒙古文或者汉文在大金内部发布政令、传达信息或对外交涉，但是这已经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需要。满洲初期，犹用蒙古文字，但是努尔哈赤在意识到"文移往来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的时候，就命令建州女真部巴克什·额尔德尼及札尔固齐·噶盖，创制本民族文字。

额尔德尼(1580—1623 年)，姓那喇氏，满洲正黄旗人。《八旗通志》里记载："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高皇帝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随大兵所至汉人及蒙古地，俱能以其本地语言文字传宣诏旨，招降纳款，著有劳绩，授副将世职。"①

噶盖，关于噶盖的生平事迹史籍记载较少。《清史稿》记载说："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洲镶黄旗，太祖以为札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俣癸巳闰十一月，命与额亦都、费扬古将千人，攻纳殷佛多和山寨，斩其酋，搜稳寨克什。岁戊戌正月，命与台吉褚英、巴雅喇及费英东将千人，伐安褚拉库路，降屯寨二十余。岁已亥受命制国书。

① 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第 478—479 页。

是年九月,命与飞英东将二千人,戍哈达。哈达贝勒孟格布禄贰于明,将执二将,二将以告太祖,遂灭哈达,以孟格布禄归,孟格布禄有逆谋。噶盖坐不觉察,并诛。”①

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详细地记录了满文创制的历史背景:

“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二月,太祖欲以蒙古字编成国语。榜识厄尔得溺、刚盖对曰:‘我等习蒙古字,始知蒙古语,若以我国语编创译书,我等实以不能。’太祖曰:‘汉人念汉字,学与不学者皆知,蒙古之人念蒙古字,学与不学者亦皆知,我国之言写蒙古之字,则不习蒙古语者不能知矣。何汝等以本国言语编字为难,以习他国之言为易耶?’刚盖、厄尔得溺对曰:‘以我国之言编成文字最善,但因翻编成句,吾等不能,故难耳。’太祖曰:‘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厄字下合一脉字,此非厄脉乎(厄脉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于是自将蒙古字编成国语颁行。创制满洲文字,自太祖始。”②

这种草创的满文被称为“老满文”或“无圈点满文”,并于1599年颁行。从此,女真人有了自己的文字。努尔哈赤传达政令、制定法律、传播知识、日常文书往来等,皆用满文书写。这对女真社会的发展和女真政权的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且从此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满族人,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更加方便和顺畅了,他们可以直接用满文书写信函,而不用再像老满文创制前那样请人翻译成蒙古文或者汉文了。

但是由于老满文在女真社会中是由上而下推广使用的,并且这种初创的文字自身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它的推广和使用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因此,在满族建国之初,满族社会上仍然是蒙古文与满文并行。

---

① 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479页。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节选自潘喆、孙方明、李鸿彬《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19—320页。

三、老满文的改革

满文作为一种交流和传播思想的工具和手段，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发展和完善的。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老满文的缺陷也逐渐地体现出来。如“不仅无圈点，且又有假借者，若不将上下字相合会意详究，则不易辨认”，①“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致错误”②等等。具体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字母书写形式极不统一，同一个字母往往有几种书写形式。如此必然会造成不同音节书写形式不一样的现象。如-ka、-ga、-ha 不分，-ko、-go、-ho 不分，-ta、-te、-da、-de 不分等。

第二，存在一字多音的现象，即元音和辅音音位极为混乱，造成字母之间互相假借。

第三，音位不足，特别是在拼写汉语介借词，人名、地名、官名时，明显感到原有的语音不够用。”③

老满文创制之初，因为实难辨识，不易被女真人掌握，所以只通行三十余年。皇太极即位之后，不仅大力加强政权建设，并且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问题。他曾说过：“朕闻国家承天创业，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事不忘初，是以能垂久之远，永世弗替也。”于是为了适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皇太极命令达海对老满文进行改革。

达海(1594—1632 年)的生平事迹，据《八旗通志》记载说：“大海巴克什，满洲正蓝旗人。世局觉尔察地方，以地为姓。……生而聪颖，九

①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7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第 1196 页。

③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7 页。

岁即通满汉文。初事太祖高皇帝,置在内廷机密重地,专司文翰。与明朝蒙古、朝鲜词命,悉出其手。宣谕诏旨,应兼汉音者,亦委命传宣,无不称旨。”①达海一生在太祖、太宗身边做文职,他精通满汉语言文字,不仅改革了老满文,还翻译了《刑部会典》、《素书》、《三略》等经典书籍。

《清史稿·达海传》记载:“初太祖指授文臣额尔德尼及噶盖创立国书,形声规模,本体略具。达海继之,增为十二字头,至是上谕达海曰:‘国书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自学更有裨益矣。’达海遵旨寻绎,酌加圈点。又以国书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

可见达海改革满文的几个方面:②

第一,规范满文字母写法,在原有的字母旁酌加圈和点,使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位。

老满文的最大缺点就是字母写法不一。一个音位用好几个字母表示,给辨识造成很大困难。皇太极指示达海说,满文十二字头,过去没有圈、点,上下字相同,年幼的人学习时,书中一般语句,看其上下文义还能明白,如果是人名、地名必定搞错。这就是针对老满文字母写法不一而说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原字母旁酌加圈和点,这是一种方法,皇太极就是这样指示达海的。此外,还要统一字母的写法。满文字母都有单独、词头、词中、词尾四种不同的形式,均分别予以统一成一种固定格式。这样就克服了老满文中一个字母代表几个音位或不同字母代表一个音位的混乱,形成一个字母只代表一个音位的情况,使人识别起来更容易。

---

① 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民族出版社 1997 年,第 480 页。
② 佟永功《功在史册——满语满文及文献》,辽海出版社 1997 年,第 23—24 页。

第二，在音译汉语借词时，为准确地表示汉语发音，增加10个特定字母，也就是达海所说的“新补外字”。

由于满语交流的扩大和深入，满文中出现大量汉语借词，满语的原有音位已经不够用了，用老满文拼写的汉语借词读音与汉语读音相差很大，容易发生误解。为此，达海在满文十二字头之外增设了十个特定字母，以更好地解决汉语借词的问题。分析这十个特定字母的辅音，实际上只增加了三个满语中没有的辅音音位。但就是因为增加了三个满语中没有的辅音音位，在拼写汉语借词时就能比较准确地表达汉语发音了。

第三，归纳音节连读，统一其书写形式。

老满文中已有两个音节连读现象，但是书写形式比较混乱，达海予以归纳和统一。例如dian（宫殿之殿），不能读作di-yan，，而只能连读成一个音节。用这样音节连读的方法就可以更为准确地拼写汉语借词了。达海把这种音节连读叫做“切音”。请注意，这绝不是汉语中的“切音”。汉语的“切音”，是用前一个汉字的辅音同后一个汉字的元音相拼。

经过达海改革的满文被称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新满文较之老满文更加的成熟和完善。“改进后的满文即加圈点满文，有6个元音字母，22个辅音字母，另有10个专用拼写外来语（主要是汉语）的特定字母，共38个字母。满文的书写，从上至下，从左至右。其时，东北亚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民族，如中国的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俄罗斯国的埃文、涅吉达尔、那乃、乌德等，都没有文字。因此，满文的创制，是满族发展史上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是中华文化史上，也是东北亚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世界上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民族中，只有满族留下了大量本民族文字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①

① 李云霞《满文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满语研究》2003年第1期。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产生与形成

广义的满文档案是指以满文或者满文与其他语言合璧的形式书写的，反映满族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历法、文艺、宗教、民俗等方面内容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狭义的满文档案主要是指满文文书档案，其实广义上的满文档案不仅包括以上的文书档案，还包括满文石刻、印章、木牌和信牌、钱币等各种载体的满文档案，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统治时间长达 268 年。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在中央设立了内阁、六部、宗人府、都察院、大理寺、军机处、内务府和理藩院等机构；在地方则采用行省制度，设立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县等官员治理；边疆地区则创设将军、参赞大臣、办事大臣、总管等官员外；还在一些民族居住地区设立盟长、扎萨克、伯克、土司等官员治理。“在职官的设置方面，充分体现了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中央各机构中一般都分设满汉额缺。起初，同一官职的满汉额缺的品级、职权都有判别，后虽然有改变，但满洲官员仍保持着一定的地位和特权。”①

早在清入关前，为了适应满族社会的发展，清太祖努尔哈赤于明万历二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以蒙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满文，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这种满文通行 30 余年后，因存在着一些缺点，在天聪六年正月，清太宗皇太极命达海改进老满文。经过达海改进的满文，后人称之为“有圈点满文”或“新满文”。有清一代，定满语为国语，满文为国书，所以满语又称清语，满文又称清文。在清代前期，发

①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第 169 页。

布重要的文书如诏诰之类，以及对外国的行文等，均用满文。例如，著名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以满、俄、拉丁三种文字书写的。在中央，统治者规定国家正式公文必须有满文，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官文书，比如从上行文书的题、奏、表、笺，到下行文书的制、诏、诰、敕、咨、移、关文、札文等等，文种多样，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地方，“各驻边将军、都统与办事大臣与中央政府往来行文，也以满文为主，也有少量的蒙文和藏文等。清代对蒙古地区颁谕，通常是满蒙合璧。对西藏地区颁诏，通常是满蒙藏合璧。”①

在清代经内阁办理的题本大都是满汉文合璧。内阁设有满本房和汉本房，满票签处和汉票签处，中央各部所上部本原本几乎都是满汉合璧，而地方各级所上的通本，因没有满文，必须先将其内容由汉、满本房翻译、校对之后贴在一起，满文在左，汉文在右，才能呈内阁审阅。另外从军机处满汉大臣的职责分工也能明显看得出来清统治者对于满文的重视。据《枢垣记略》卷十四记载：“凡满汉章京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核查奏议，系清字者，皆由满洲章京办理；系汉字者，皆归汉章京办理。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西北两路补放应进单者，内外蒙古、藩部及喇嘛并哈萨克、霍罕、廓尔喀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满洲章京。在京部院及各省文员、绿营武员补放应进单者，王公内外大臣应拟赏者，及朝鲜、琉球、越南、暹罗、缅甸、南掌灯各外国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汉章京。”以上无不体现了统治者对于满文的重视。

除了以上满汉机构和职官的设立之外，统治者还要求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乾隆十一年，西宁办事大臣莽古赉、驻藏办事大臣傅清二人因用汉字缮折奏事，乾隆帝降旨曰：“驻扎西宁办理青海番子事务之副都统莽

① 满文部《满文档案工作十年回顾》，《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1417 页。

古赉、驻藏办事之副都统傅清，尔等陈奏事件，莽古赉每次俱用汉折，傅清亦间用汉折，各省督抚提镇内，有满洲大臣用汉折奏事者，原因办理地方民情及绿营事务。今莽古赉、傅清系满洲大臣，且系办理蒙古、唐古忒事务，所有事件，理应用清字奏折。伊等竟仿效外省大臣，用汉字奏折，殊属非是，著饬行。嗣后奏事，俱著缮写清字奏折，并寄谕众佛保知之”。① 另外，管理宫廷和陵寝事务官员也不能随意用汉文缮折奏事。乾隆二十六年二月，管理东陵事务贝子允祺用汉折奏事，乾隆帝降谕给军机大臣曰：“顷贝子允祺为修葺陵墙事，用汉字缮折具奏。此事应清字缮折具奏，而允祺用汉字折，殊属非是。倘奏销时清字繁多，欲用汉字尚可，用清字奏销亦可。著饬行允祺等，嗣后凡关系陵寝事宜，皆令缮写清字折具奏，不准用汉字缮字。此次所奏汉字折，著即销毁，以清字注册”。② 因此清代中央和地方各级机构都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但是，清代是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满洲官员总数毕竟只占少数，官文书很难普遍使用满文，于是形成了一种满汉文兼用的方法。嘉庆朝以前先后制定在官文书方面使用满文的若干规定，归纳起来，大致如下：(1) 奉清字上谕，不准用汉字复奏；(2) 满洲大员补署各部院尚书及各省督、抚等缺，在京谢恩用清字折，但抵任奏报到任日期，用汉字折；(3) 旗员补放提镇奏谢，具用清文；(4) 满洲提镇于公事折用清字；(5) 西北两路将军、各陵守护大臣及泰宁、马兰两镇总兵，除地方公事用汉字奏折外，其余谢恩、奏报雨雪等事，均用清字折。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满员上奏，基本上要用满文，这是为了使满文流传久远，以利于清政府统治所采取的措施。”③因此现存的满文档案不仅仅是单纯的用满

①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第 170 页。
② 同上书。
③ 屈六生《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年，第 31—32 页。

文书写，还有满文和汉文合璧，以及满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形式形成的满文档案。

由于历史上的战争、侵略、灾害等诸多原因，清代的满文档案几经厄运，受到了一定量的损失，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1921 年发生的“八千麻袋事件”，又使大量的“大内档案”散失到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但是，保存至今的清代满文档案种类仍然十分丰富，数量也十分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就有约 200 万件，分别属于宫中、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和宗人府等机构。东北三省的满文档案存量也相当可观，辽宁省有满文档案 20 万件，吉林省 1.5 万件，黑龙江主要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达一万多卷。内蒙古满文档案 1.6 万余件。西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也收藏有一定量的满文档案。

第三节　满文档案研究概述

在我国现存的历史档案中，清代档案以其数量众多、系统完整而受到广泛关注，其中的满文档案更是因其文字的特殊而吸引人们的眼球，日益得到重视。满文档案是指清代以满文或者满文与其他语言合璧的形式书写的各种载体的档案。清朝产生了数量浩繁、种类丰富的满文档案，它集满文的历史意义和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于一身，是清王朝为巩固和维护统治地位的产物。研究满文档案，对于促进清代历史的研究，挖掘满族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1905 年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虎次郎在沈阳崇谟阁发现《满文老档》，自此，对满文档案的翻译研究工作便陆续展开。由于对满文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地区，所以我们主要对这几个地区进行探讨。满文档案的研究大略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20世纪初—1948年：起步阶段

这个阶段是满文档案研究的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日本对《满文老档》的研究和中国文献馆满文档案研究工作。日本人内藤虎次郎1905年在沈阳崇谟阁发现《满文老档》，并于1912年将《满文老档》有圈点本在日本影印发行，从此日本便开始对满文档案的翻译研究工作，其中主要是立足于《满文老档》。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内藤虎次郎《清朝开国期的史料》(《艺文》第3年12号，1912年)；鸳渊一《舒尔哈奇之死》(《史林》第17卷第3号，1932年)、《褚英之死》(《史林》第18卷第2号，1933年)、《关于清朝旗地的满文老档的记事》(《史林》第23卷第1、2号，1938年)、《清初旗地满文老档记事》(《史林》第23卷第1、2号，1938年)；鸳渊一、户田茂喜《清太祖的七宗恼恨论》(《史学研究》第6卷第3号，1935年)，户田茂喜《清太祖的迁都问题》(《史学研究》第8卷第3号，第9卷第2号，第10卷第1、2号，1937—1938年)；三田村泰助《天命建元的年次——太祖满文老档的考察》(《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2号，1935年)、《天命建元的年次——太祖满文老档的考察(续)》(《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3号，1936年)、《满珠国成立过程的考察》(《东洋史研究》第1卷第2号，1935年)；今西春秋《满文老档重抄年次补说》(《东洋史研究》，第3卷第6号，1938年9月)、《满日对译满文老档》(《书香》，第15卷11、12号，第16卷第1—5号，1943年11月—1944年12月)；山本谦语《有圈点满文老档中满语文言的研究——中间报告之一》(《TYGKK》，第3卷，1947年8月)等。

中国辛亥革命后在北京故宫成立故宫博物院，档案类的搜集和整理设于图书馆文献部，1929年进行改组，文献部独立出来成立文献馆。由于满文档案首次走出深宫，所以这个阶段的工作大多是对满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公布。李德启《满文老档之文字及史料》(《文献论

丛》,1936 年 10 月)、张玉全《述满文老档》(《文献丛刊》,1936 年)开创了中国对满文档案研究的先河。还有金毓黼《〈满文老档〉考》(《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会刊》1947 年第 1 期),1935 年李德启编译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印行,1935 年)一书则是对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发现的 26 支满文木牌照片进行刊登翻译公布,并对满文木牌内容及时代进行考释。

这个阶段的论著对满文档案的研究大都只是初步的翻译和考证,且主要是日本学者利用《满文老档》所取得的成果。当时中国由于政局的动乱,影响了学术界的正常运作和发展,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始终无法大规模展开,再加上当时通满文者,只有"鲍奉宽(蒙古族人,北大教授,文献馆专门委员)、齐增桂(满族人,曾任镶黄旗满洲印务参领)、张玉全(汉军旗人,满蒙筹边学校毕业)、李德启、鲍育万"①五人,人才的欠缺使满文档案研究工作更是举步维艰。

二、1949—1977 年:持续发展阶段

这个阶段是满文档案研究的持续发展阶段。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国内地的满文档案的研究工作暂且得到了搁浅,但是 1959 年中央档案馆的成立,尤其是其下设的明清档案部中的满文小组的成立,为满文档案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人力和组织保证。欣喜的是,中国台湾的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1969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旧满洲档》影印出版,为满文档案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和极大的便利。其他成果还有黄健彰《努尔哈赤所建国号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37 本,1966 年)、《论张儒绅赍夷文至明年月井论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及〈满文老档〉讳称

① 屈六生《六十年来的满文档案工作概述》,《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60 页。

建州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7本,1966年);杨和缙《根据〈满洲实录〉评注〈满文老档〉1607—1611年间着政事》(《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1975年第6期)、《根据满洲实录译注满文老档一六〇七～一六一一年间之政事》(《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1975年第6期);李学智《东洋文库日译本〈满文老档〉未收的几件老满文》(《大陆杂志》第22卷第3期,1961年2月)、《清太宗无圈点满文大钱考》(《大陆杂志》第23卷第4期,1961年8月)、《清世祖之满文即位大赦诏书》(《大陆杂志》第29卷第10、11期,1964年12月)、《老满文原档中所载清代八旗制度创立史料之检讨》(《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研究所年报》第5期,1974年7月)、《清太宗崇德三年向朝鲜强索向化女真事的一件满文档案》(《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田村博士退官纪念事业会,1968年)、《从清代满文翻译俄文档案探讨对俄外交之错误观念》(《边政研究所年报》,1977年5月)、《乾隆重钞清太宗满文老档中附签注释老满文之证误》(《国科会补助研究报告》,1971年)、《满文本清世祖实录稿的译注与研究》(国科会报告,1973年);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印发行,1969年8月)、《满文起居注略考》(《华冈学报》第8期,1974年7月)、《清朝皇帝的起居注满文本》(《华冈学报》第8期,1974年7月)、《台湾的满文碑》(《台湾人文》创刊号,1977年10月);广禄、李学智《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1965年第4期)等。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中叶成立了"满文老档研究会",其成员包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冈本敬二、松村润等,这个学会为《满文老档》的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此阶段日本对满文档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满文老档》上,但还涉及满文实录、满文文书等文献材料。主要研究成果有鸳渊一《满文老档盛京舆图历史地理的研究》(《游牧社会史探求》第25、28卷,1964年,1965年)、《〈满文满洲实录〉记载满族对天、地的崇拜——以abka,na,ba词为例》(《东方学》第31卷,1965年11月)、《从〈满文老档〉太祖纪所见满族对天地的思想——以abka. Na. ba三语

为对象》(《东方学》1967 年第 33 期)、《清初满洲天地崇拜与祭祀——以满文老档为例》(《神山短打纪要》第 8 卷,1966 年 12 月)、《从〈满文老档〉太宗纪所见满族崇拜天地问题——通过 abka na. ba 三语》(《东方学》1968 年第 35 期);三田村泰助《满文太祖老档考》(《羽田颂寿论丛》,1950 年 11 月)、《满洲正红旗的满文档案》(《岩井古稀论集》,1963 年 6 月),神田信夫《满洲(Manju)国号考》(《山本博士还暦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2 年)、《读〈满文老档〉毛文龙等书简》(《朝鲜学报》第 37 卷第 38 号,1961 年 1 月)、《〈旧满洲档〉与〈天聪九年档〉》(《东洋文库书报》1972 年第 3 期)、《满文太祖老档与满洲实录对校井译》(《AAsia Gengo Kenkyu》第 7 号,1955 年);今西春秋《崇德三年满文原档》(《东方学纪要》第 1 卷,1959 年 7 月)、《满文老档乾隆附注译解》(《东方学纪要》1959 年第 1 期)、《〈满文老档〉的重抄年代》(《东方学纪要》1959 年第 1 期);松村润《清朝始祖传说研究》(《故宫文献季刊》,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1 年 12 月,第 3 卷第 1 期)、《关于崇德三年的满文木牌》(《和田古稀论丛》,1961 年 2 月);上原久《论满语接续词及句子——以"满洲实录"为资料》(《埼玉大学纪要》第 6 卷,1958 年 3 月);野见山温《满文尼布楚条约之研究》(《福大二五论集》,1959 年 10 月)、《恰克图条约——以满文条约为中心的文献批判研究》(《福冈大学法学论丛》第 4、5 卷,1960 年)、《咸丰年间伊犁问题俄清关系满文资料与其研究》(《福冈大学研究所报》第 8 卷,1966 年 11 月);松村润《关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编撰》(《史学杂志》83 卷 12 号,1974 年)等。

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中,中国台湾随着《旧满洲档》等的公布,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日本的满文档案研究则是在原先的基础上,并参考台湾《旧满洲档》的公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但中国内地主要是满文档案的接收、整理、翻译和满文人才的培养,为满文档案研究工作的开展积蓄力量。所以,总体来说,此时的满文档案研究工作持续发展。

三、1978—1999 年：渐进完善阶段

这个阶段是满文档案研究的渐进完善阶段。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满文档案研究工作也逐渐走向正轨，开始全面系统的展开。《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中华书局，1984 年)、《郑成功满文档案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年)、《清代锡伯族满文档案史料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 年)、《满文老档》(中华书局，1990 年)等的陆续编译出版，更是为满文档案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以中国知网上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基础，通过题名、关键词、主题路径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978—1999 年的相关文献 175 篇，剔除重复和与主题无关的文章，计 121 篇，我们从时间分布、著者情况及期刊分布等方面进行计量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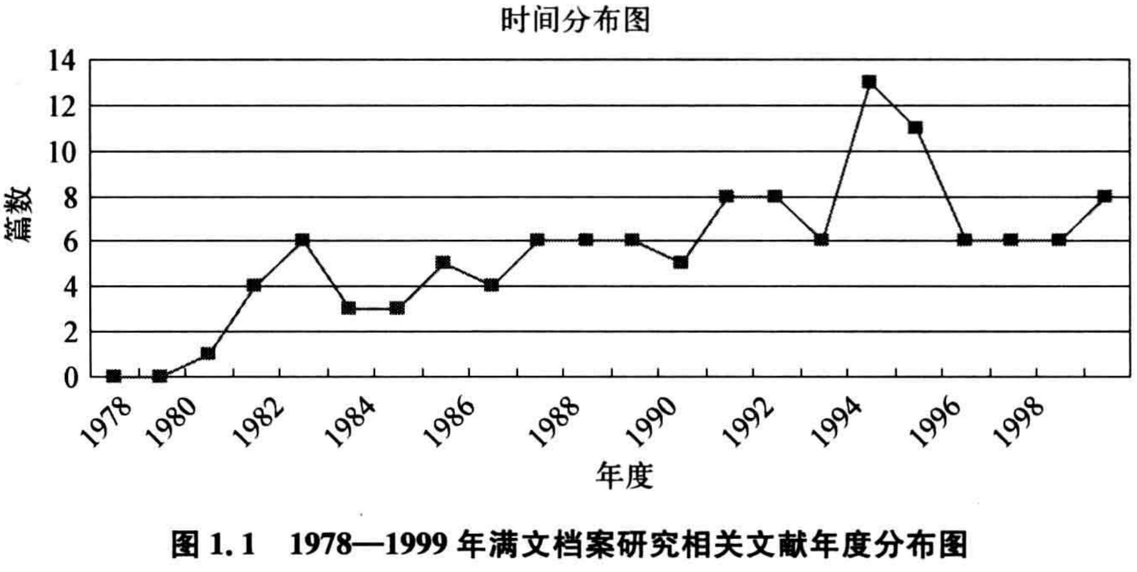


图 1.1　1978—1999 年满文档案研究相关文献年度分布图

从图 1.1 我们可以看出 1978—1999 年有关满文档案的文章分布情况呈增长趋势，并于 1994—1995 年出现一个小高潮。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以来，满文档案的编译工作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同时也说明了满文

档案研究工作日益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中国台湾地区在此阶段取得的成就有庄吉发《从朝鲜史籍的记载看清初满洲文书的翻译》(《韩国学报》1991 年第 10 期)、《清代康熙雍正两朝满文奏折的史料价值》(《书目季刊》第 16 卷第 4 期,1983 年 3 月)、《清代雍正十三年条奏档的史料价值》(《清代史料论述》(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 年 8 月)、《满文奏折的史料价值》(《故宫档案述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 年 12 月)、《清代满汉文起居注册的史料价值》(《满族文化》第 7 期,1984 年 9 月)、《帝王言动国家庶政的当时记载》(《故宫档案述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 年 12 月)、《谈满洲人以数目命名的习俗》(《满族文化》第 2 期,1982 年 4 月)、《清代满文族谱的史料价值》(《第六届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会议记录》,台北: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1993 年)、《旧满洲档的由来及其史料价值》(《故宫档案述要》,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 年 12 月)、《从朝鲜史籍的记载看清初满洲文书的翻译》(《韩国学报》第 10 期,1991 年 5 月)、《文献足征——〈满文原档〉与清史研究》(《满学研究》第 4 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年)、《从数目名字的演变看清代满族的汉化》(《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1994 年)、《清代起居注册与满学研究》(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1999 年),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 年 7 月)、《满文清本纪研究》(明文书局,1981 年 12 月)、《清朝皇帝实录的满文本》(《满洲档案资料》,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清朝皇帝本纪的满文本》(《满洲档案资料》,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清朝皇帝的起居注满文本》(《满洲档案资料》,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满洲实录的起源与价值》(《满洲档案资料》,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李学智《从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洪字穆昆档"看乾隆重抄满文老档之讹误》(《满洲档案资料》,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等。

日本在 1986 年以满学研究为中心,成立了"满族史研究会",会员们充分利用满文档案对满族史进行研究。满族史研究会还向日本文部

省申请科学研究经费,进行国际学术研究海外考察活动,1990 年后到中国大陆和台湾等地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进行考察研究,与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其中研究成果有加藤直人《清朝的民族统治与罗布藏丹津的叛乱》(《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6 期)、《关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逃人档〉》(《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4 年);松浦章《满文档案和清代日中贸易》(《日本研究》1985 年第 1 期);松村润《关于无圈点老档》(《满学研究》第 3 辑,民族出版社,1996 年);楠木贤道《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看康熙二十三年的俄清关系》(《历史人类》24 卷,1996 年)、《科尔沁蒙古统治时期的锡伯族》(《东洋学报》第 70 卷,第 3、4 号,1989 年 9 月)、《天聪年间爱新国对蒙古诸部的法律支配进程》(《社会文化史学》第 40 号,1999 年)、《清初入关前的汗・皇帝与科尔沁部首长层的婚姻关系》(《内陆亚细亚史研究》14 号,1999 年);池上二良《满洲语文语正书法的变迁——特别关于 o、u、ū》(《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4 年);神田信夫《清朝兴起史的研究——序说从〈满文老档〉到〈旧满洲档〉》(《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年报》第 20 号,1980 年)、《东洋文库收藏的满文档案》(《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日本学者利用满文史料进行的清史研究》(《亚洲研究》1988 年第 53 期);三田村泰助《满文太祖老档的编纂》(《满语研究》1990 年第 2 期);石桥崇雄《顺治初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满文本》(《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清代史论丛》,汲古书院,1994 年)、《围绕清初入关前的无圈点档案先汗贤行典制》(《东洋史研究》第 58 卷第 3 号,1999 年 12 月)、《关于满文文书》(《中国土地文书目录・解说》(下),日本东京大学东洋学文献中心丛刊第 48 辑,1986 年版);松浦茂《十八世纪末黑龙江下游地方的边民组织》(《人文学科论集》,鹿儿岛大学,1991 年);石桥重雄《东洋文库所藏的满文〈正黄旗满洲已买得人口银两数目详档〉》(《日本所藏清代档案史料的诸相》,东洋文库清史研究室,1993 年);细谷良夫《清朝八旗制度的"gūsa"和"旗"》(《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4 年);杉山清彦《清初正蓝旗

考——由姻亲关系所见旗王权力的基础构造》(《史学杂志》107 编 7 号，1999 年)、《关于天命、天聪朝的正蓝旗》(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1999 年 8 月)等。

由上可知,这个阶段的满文档案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其形式复杂多样。这不仅体现在研究文章数量的增加,也体现在研究的不断细致深入,国内外满文档案研究工作都得到全方面的完善和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阶段国内外满文档案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1992 年“北京满学会”举办的“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是满学研究的一次盛会,它吸引了来自日本、俄罗斯、意大利、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七十多位专家和学者与会,提交的论文有很多是关于满文档案研究的。这也是满文档案研究第一次在国际上进行学术的交流,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四、2000—2010 年: 全面繁荣阶段

这个阶段是满文档案研究的全面繁荣阶段。越来越多满文档案的公布及社会对满文档案的重视和关注度的增加促使满文档案的研究工作呈现全面开花、全面繁荣的景象。

以中国知网上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基础,通过题名、关键词、主题路径进行检索,将时间设定在 2000—2010 年,共检索到 210 篇,剔除重复和与主题无关文章 82 篇,计 128 篇,其时间分布、著者情况及期刊分布如下。

图 1. 2 可见,对满文档案的研究总体上呈现缓慢增长趋势,文章年发表量较 1978—1999 年阶段有了显著的增长。这充分体现满文档案研究的必要的软、硬件日益完备,满文档案研究的大环境日渐成熟。

由于资料有限,2000—2010 年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满文档案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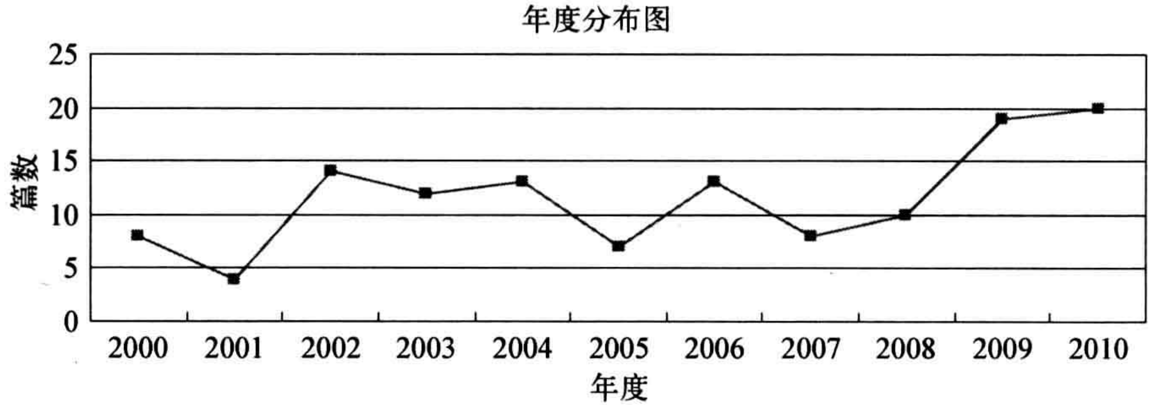


图 1.2　2000—2010 年满文档案研究相关文献年度分布图

究可见成果较少。台湾的主要有陈捷先《论〈满文老档〉用字看满族汉化》(《满学研究》第 6 辑,北京: 民族出版社,2000 年)、《略论皇太极的哭》(满学和北京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04 年);李学智《〈老满文原档〉和〈满文老档〉的再研究》(《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叶高树《各抒所见——雍正十三年满、汉文“条陈奏折”的分析》(“文献足征——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5 年 11 月)等。日本的研究成果有楠木贤道《从天聪五年大凌河攻城战看金国政权的构造》(《东洋史研究》第 59 卷 3 号,2000 年)、《天聪八年远征察哈尔部与满珠国(manju gurun)的结构》(“文献足征——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5 年)、《清太宗皇太极的册封蒙古王公》(《第三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2 年);柳泽明《从档案史料窥见清代中俄关系——以十八世纪为主》(“文献足征——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5 年);铃木真《关于镶白旗和硕雍亲王胤禛与藩邸旧人》(《第三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北京,2002 年);华立《新疆移民群体研究与满文档案》(“满学: 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0 年 8 月)等。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的满文档案研究仍以中国大陆为主要阵地,中国台湾与日本亦在持续发展。由于满文档案的不断公布,这个阶段的满文档案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满文老档》等档案资料,对满文文书、满文舆图等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满文档案

研究的国际交流形式更加多样,不仅举办学术研讨会,还互派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合作开发项目,交换学术刊物和文献资料等。总之,满文档案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更多的满文档案资料得到发掘和利用,满文档案研究逐步走向繁荣。

第四节　满文档案研究的成果

1905 年日本大阪《朝日新闻》记者内藤虎次郎在沈阳崇谟阁发现《满文老档》,并于 1912 年将《满文老档》有圈点本在日本影印发行,自此日本便开始了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其代表人物有鸳渊一、三田村泰助、今西春秋、神田信夫、松村润等。中国辛亥革命后成立故宫博物院,档案类的搜集和整理设于图书馆文献部。1929 年进行改组,文献部独立出来成立文献馆,文献馆在满文档案进行整理、编目、翻译和公布方面做了很多工作。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中国大陆的满文档案的研究工作暂且搁置,但是 1959 年中央档案局的成立,尤其是其下设的明清档案部中的满文小组的成立,为满文档案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人力和组织保证。1978 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各项工作逐步恢复,满文档案研究工作也逐渐走向正轨,开始全面系统地展开。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安双成、关嘉禄、佟永功、吴元丰、赵志强、吴雪娟等。中国台湾地区的满文档案研究工作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代表人物有李学智、陈捷先、庄吉发等。随着《旧满洲档》、《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满文老档》等陆续编译出版,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呈现出全面开花、全面繁荣的景象。此外,俄罗斯、美国、德国、意大利、韩国等国家也有部分学者在满文档案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总之,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总论

包括对满文档案自身的研究,满文档案专著研究成果,满文档案编译研究,与满文档案研究有关的会议,对满文档案的内容、价值、研究现状的论述等几个方面。

对满文档案自身的研究。对满文档案自身的研究较多的有《满文老档》、满文实录、满文玉牒等。《满文老档》是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兼以加圈点新满文并间杂蒙古文和个别汉文书写的记载满洲兴起和清朝开国的史事册档。对《满文老档》研究的文章很多,阎崇年《论〈满洲老档〉》(《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98 年)已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满文实录是用满文记载的清王朝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政,其主要研究文章有徐丹俍《"努尔哈赤实录"考源》(《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程大鲲《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洲实录〉探析》(《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1 辑)、松村润《清太祖实录研究》(《蒙古学信息》2002 年第 1—3 期)等。

满文档案专著研究成果。满文档案研究专著主要有佟永功《功在史册——满语满文及文献》(辽海出版社,1997 年)、《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阎崇年主编的《满学研究》(共七辑)(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第二辑至第七辑:民族出版社,1994 年—2002 年)、《20 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民族出版社,2003 年)、《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 年);刘厚生《旧满洲档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 年);上原久《满文满洲实录研究》(不昧堂书店,1960 年);李学智《老满文原档论辑》(文友印刷纸业公司印行,1971 年);陈捷先《满洲档案资料——〈旧满洲档〉的价值》(Mancuh Archival Materials)(联经出版公司,1988 年)、《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 年)、《满文清本纪研究》(明文书局,1981 年)。另外,日本神田信夫主编《日本所藏清代档案史料的诸相》(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1993

年)、《满学五十年》(刀水书房,1992 年);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 年);金基浩、葛荫山主编《满族研究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王钟翰《满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年)等书中有很多是关于满文档案研究的文章。

对满文档案的内容、价值、研究现状等的论述。屈六生《六十年来的满文档案工作概述》(《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 年)对 1929 年后六十年来的满文档案工作分文献馆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爆发和“文革”后到 1989 年三个阶段进行梳理。赵彦昌《近八十年来满文档案出版书录》(《辽金历史与考古》2009 年第 1 辑)收录了 1929—2005 年国内外公布出版的 66 部满文档案的书籍,是近年来对满文档案公布出版总结工作最全的一次。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分析了清代满文档案的由来、现存状况、整理编目和翻译出版及价值等几个方面,对满文档案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清代新疆历史满文档案概述》(《西域研究》2010 年第 3 期)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清代边疆历史满文档案的由来、特点、种类、内容、整理出版及价值进行解读。吴春娟、刘淑珍《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研究》(《满语研究》2008 年第 2 期)从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的构成、整理翻译和研究利用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任丽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及其价值》(《松辽学刊》1991 年第 3 期)详细介绍了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宗人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还对种类繁多的全宗档案进行分类归纳,并指出满文档案的重要价值。屈六生《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历史档案》1989 年第 1 期)对军机处满文档案的形成、特点、种类数量、主要内容、保管整理和利用进行简要叙述,分析了军机处满文档案的现状并提出了展望。吴元丰《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满语研究》2007 年第 1 期)、《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整理编目》(《清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对军机处满文月折包

的形成、基本特点、主要内容、整理编目及其史料价值进行分析，对我们全面把握其价值具有重要作用。《满文月折包内漠南蒙古地区史料及其价值》(《蒙古史研究》第六辑，2000 年)通过对满文月折包内漠南蒙古地区史料的由来、内容及其价值进行研究，指出这些满文史料将会促进清代漠南蒙古地区历史研究工作深入系统的发展。

任世铎《满文与满文档案》(《档案学通讯》1982 年第 5 期)简要介绍了内阁、军机处、宫中、内务府和宗人府及其他全宗满文档案。王小虹《清代珲春衙门档案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 年第 3 期)和郭春芳《清代珲春副都统衙门及其档案》(《历史档案》2004 年第 3 期)对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的概况、内容及价值进行勾勒，其中包括 40%的满文档案。佟永功、关嘉禄《辽宁的满文档案及其他》(《辽宁档案》1989 年第 4 期)介绍了辽宁满文档案的现状及整理概况。韩娜《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满文档案研究》(《文化学刊》2009 年第 3 期)从内容、数量及满文档案的出版情况进行挖掘，进而揭示其价值。李健民、李洪伟、张丽娜、刘天琦《清代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满文题奏研究》(《满语研究》2008 年第 2 期)介绍了黑龙江省档案馆藏萨布素满文题奏概况和内容，并阐述它对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吴元丰《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满语研究》2011 年第 2 期)对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情况进行了回顾与思考。张惠萍《试论散存于民间的满文档案文献的抢救和保护》(《档案管理》2012 年第 1 期)，分析了散存于民间的满文档案文献亟待抢救的原因，提出必须增强科学抢救和保护意识。

赵阿平《满文档案的重要价值与翻译人才的培养》(《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 年第 3 期)、肖克《培养满文档案翻译人材之管见》(《满语研究》1989 年第 2 期)均指出了满文档案的重要价值及满文档案翻译人才的现状，并对满文档案翻译人才的培养提出期望。赵志强《入关前满文档案利用之得失》(“满学：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0 年)分析了研究者在利用入关前满文档案的得与失。此外，赵彦昌、王红娟《中国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及其追索》(《山西档案》2010 年第 6 期)

对流失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的满文档案文献进行简单的介绍，并对追索流失国外满文档案文献的档案学理论基础、追索途径和重要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赵彦昌、王红娟《满文档案开发利用研究》(《满族研究》2010 年第 4 期)探讨了满文档案开发利用的方式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加强满文档案开发与利用的措施。赵彦昌《论满文档案的价值》(《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 年第 3 期)从载体和内容两个方面探讨了满文档案的价值。赵彦昌、黄娜《论建国后满文档案的管理》(《满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对建国后满文档案的收集、整理、保护、鉴定等管理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

二、政治研究

佟永功、关嘉禄《乾隆朝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地区管辖一例》(《历史档案》1984 年第 1 期)、《从一件命案的处理看乾隆朝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管辖》(《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都是对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所记载的一件命案的处理，说明了乾隆朝对黑龙江下游及库页岛的有效管辖；《清朝发遣三姓等地赏奴述略》(《社会科学辑刊》1983 年第 6 期)亦是从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对清朝发遣三姓等地赏奴制度的社会历史背景及赏奴的来源、处境、反抗斗争等方面进行分析；《“内阁大库残档”乾隆朝大学士傅恒奏折鉴析》(《满族研究》2000 年第 1 期)通过对大学士傅恒奏折的鉴析，论证了贡貂及赏乌林制度是清朝对居住在东北边疆少数民族居民进行管理的一项重要措施，黑龙江中下游及库页岛等地曾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从〈镶红旗档〉看雍正帝整饬旗务》(《社会科学辑刊》1986 年第 1 期)对雍正帝整饬八旗旗务的举措进行了研究。关克笑《清代三姓地区的设治与城阙》(《佳木斯史志》1986 年第 2 期)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藏《三姓副都统衙门档》对清代吉林将军辖下的三姓的设治、沿革、衙署、城阙进行论述。关嘉禄、王桂良、张锦堂《清代库页费雅喀人的户籍与赏乌

林制》(《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1 期)以辽宁省档案馆藏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所见对库页费雅喀人的户籍及清政府对其收贡和赏乌林的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并对赏乌林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关嘉禄、佟永功《清朝贡貂赏乌林制度的确立及演变》(《历史档案》1986 年第 3 期)以清朝满文档案及有关文献为依据,对贡貂、赏乌林制度的确立及演变作一论述。赵玉梅《从清代满文档案看“乌什事件”始末》(《历史档案》2001 年第 4 期)对“乌什事件”进行了详尽的梳理。赵志强《户部军需房述论》(《清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利用满文档案及有关文献对户部军需房的设立时间、机构名称、执掌及其同军机处的关系诸问题进行探讨。

程大鲲《皇太极时期禁烟政策探析》(《满语研究》2009 年第 1 期)探究了皇太极时期对烟草政策从禁止到允许民间自种的变化,但是严禁走私进口。吴雪娟《康熙满文本〈九路图〉与清代巡边制度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年)利用满文舆图《九路图》及同时期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梳理了清代历史上的第一次巡边活动,并探讨清代巡边制度的创建问题;《康熙年间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创建》(《满语研究》2004 年第 2 期)利用满文档案史料分析清代康熙年间黑龙江驻防八旗的机构、官员的设置、八旗兵丁的调整等问题,重点论述了黑龙江驻防八旗的创建。刘厚生《评皇太极在明清决战前夕的重大举措——从满文〈天聪九年档〉所见》(《社会科学战线》1995 年第 3 期)利用《天聪九年档》满文档案对天聪九年左右皇太极所采取的重大举措作一简略评述。佟永功、关嘉禄《乾隆朝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 年第 2 期)根据《黑图档》满文档案及有关文献对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立加以考证;而佟永功《清代盛京总管内务府设置沿革考》(《满族研究》2002 年第 1 期)则是对清代盛京总管内务府设置时间、职能、裁撤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孟宪振《清初吉林至瑷珲驿站考》(《历史档案》1982 年第 4 期)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有关满文档案进行分析,对驿站的设置经过、管理等进行了探讨。吴元丰

《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第三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2 年)据有关满文档案及相关文献对乌鲁木齐满营设置的背景、建制、装备和防务、官兵的来源、官兵的挑补等方面进行分析;《清代伊犁察哈尔营述论》(《西域研究》2006 年第 3 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对清代伊犁察哈尔营兵丁的来源、组建的背景、时间、建制、生计和承担的任务进行了阐述;《清代伊犁将军衙门内设机构浅析》(《历史档案》2009 年第 2 期)据满文档案对伊犁将军衙门内部机构的设置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和分析。

罗丽达《清代在察哈尔部设置宗室"苏鲁克"制的满文史料及关于"苏鲁克"制论述》(《满族研究》1991 年第 3 期)根据呼和浩特内蒙古档案馆有关察哈尔部设置宗室"苏鲁克"制的满文档案进行研究。刘小萌《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 年第 2 期)运用满文资料和史籍探讨了满族从氏族部落时代向国家过渡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性质及其演变情况;《清前期东北边疆"徙民编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年)利用满文档案对清朝对东北边疆"徙民编旗"措施进行了考察,包括瓦尔喀徙民、虎尔哈徙民、索伦部徙民等,并对"徙民编旗"措施给予了高度评价;《库图勒考》(《满语研究》1987 年第 2 期)利用满文档案及有关文献考究了库图勒的历史渊源、它在八旗中的作用以及内部成分的变化等问题。郭美兰《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4 期)依据有关恪靖公主的清宫藏满文档案对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张书才《新发现的曹頫获罪档案史料浅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 年第 4 期)根据新发现的有关曹頫获罪的满文档案对曹頫因骚扰驿站获罪、曹頫被枷号、曹頫的居官行事等进行论述,并指出这些满文档案对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神田信夫《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社会科学辑刊》1987 年第 1 期)利用满文档案收录的有关史料叙述了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史实,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

的证据。白新良《康熙擒鳌拜时间考》(《满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利用有关满文档案对康熙帝擒拿鳌拜的具体时间及相关问题进行考证。关孝廉《缴回朱批起源考》(《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上)》,民族出版社,2000 年)根据满文档案及有关文献对清代缴回朱批奏折制度创行的时间进行考证。赵志强、吴元丰《吉林乌拉锡伯世管佐领源流考》(《历史档案》1983 年第 4 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及有关史书记载对吉林锡伯佐领的来历及其变化情况进行考证。

三、社会经济

关嘉禄、佟永功《从〈三姓档〉看清代吉林官庄》(《历史档案》1991 年第 2 期)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三姓档》对吉林官庄的设立、管理、生产发展状况及瓦解进行分析。安双成、关嘉禄《清代的两起中日民间贸易活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 年第 1 期)通过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两件满文题本的考释,从侧面反映了中日民间贸易往来,对研究清代中日关系史具有重要作用。松浦章《满文档案和清代日中贸易》(《日本研究》1985 年第 1 期)也利用满文档案从侧面对中日贸易作了考证,具有重要意义。郭美兰《清代“塔里雅沁回子”东迁呼伦贝尔开垦种田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 年第 4 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档案对“塔里雅沁回子”迁至呼伦贝尔地方开垦种田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吴雪娟、刘淑珍《清代黑龙江人口资料评介》(《满语研究》2000 年第 2 期)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中的满文户口簿及户口统计报告揭示其内容及价值,为黑龙江历史人口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阿鲁贵·萨如拉《清代呼伦贝尔的地方财政及其特征》(《清史研究》2009 年第 4 期)利用清末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的满文档案记其他相关资料对呼伦贝尔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特点进行了研究。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民族研究》2001 年第 4 期)刊布了十件满文房契档案,对清前期北京旗人房产交易的形

式、内容、特点进行了初步考察，并指出最晚到乾隆前期，八旗内部已经存在典、抵押、活卖、绝卖等多种不动产转让形式，还对满文契书中所蕴涵的有关北京旗人语言应用情况的信息作了分析。

吴元丰《清乾隆年间新疆新普尔钱的铸造流通及其作用》(《西域研究》1997 年第 1 期)根据满文档案材料对新浦尔钱的铸造、发行、价值和作用等诸问题一一论述，对清代货币史、区域经济史、边疆开发史和民族史的研究有很大帮助；《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西域研究》1998 年第 3 期)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中有关乌鲁木齐铁厂档案及其他汉文文献为依据，就乌鲁木齐铁厂的设置、生产、管理和作用等方面进行探究；《清乾隆年间伊犁遣犯为民后的屯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 年第 4 期)根据有关满汉文档案对乾隆年间伊犁为民遣犯屯田情况加以论述。沈微《盛京内务府粮庄概述》(《满族研究》1986 年第 3 期)根据盛京内务府档案——其中多为满文档案，对盛京内务府粮庄的设置、额丁构成、纳粮及差徭负担等情况进行探讨。阿珞贵·萨如拉《满文档案〈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6 年第 3 期)以内蒙古档案馆藏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的人口状况、妇女地位进行讨论。江桥《清代归化城地区的煤炭开采及其特点》(《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 年)根据清代满文档案记其他文献资料对清代归化城地方煤炭业的生产发展情况、组织管理方法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对认识清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及其特点有所帮助。

王钟翰《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商榷》(《民族史论丛》1987 年第 1 期)通过对《满文老档》中计丁授田方面的有关原文的翻译分析，认为“计丁授田”谕是对辽东广大乡村包括汉人在内的满汉军民人等而颁布的，其性质是国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庄园制，即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北方民族》1988 年创刊号)对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张进行研究和考释。王佩环《清入关前

官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册,中华书局,1992 年)利用满文档案及清初有关文献对清入关前官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原因加以论述;《清代东北采参业的兴衰》(《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82 年第 4 期)根据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三姓副都统衙门档》及其他有关文献,对清代东北地区采参业的勃兴、发展、衰落过程进行梳理;《略谈清代东北采参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史研究》第 1 辑,1983 年)依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文档案《黑图档》和《三姓副都统衙门档》等有关史料,对清代人参采集业中采参专利的归属问题、清初采参活动的经营管理问题、采参制度的演变以及后期官办采参的性质是否改变等问题提出见解。王熹《乾隆时期喀什噶尔的官方丝绸贸易》(《清史研究通讯》1990 年第 1 期)在发掘满汉文档案及有关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对乾隆时期南疆地区喀什噶尔的官方丝绸贸易的肇始、发展与兴盛、历史作用及影响等问题进行探究;《论乾隆时期伊犁哈萨克贸易的几个问题》(《新疆大学学报》1992 年第 1 期)依据清代满文档案资料,对清代新疆官方垄断的民族贸易——伊犁哈萨克贸易的起因、经过、发展、特点及每年实际的贸易成交额等问题作了分析研讨。

四、文化研究

陈捷先《从〈满文老档〉用字看满族汉化》(《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下),民族出版社,2000 年》)列举了《满文老档》中器物类用字和制度类用字来说明满族的汉化现象;《三田渡满文清太宗功德碑研究》(《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通过对清太宗时期建立的三田渡石碑的满文碑文的研究,对中外学者的翻译进行考证,并对满文文字撰写、假借汉字汉词音译、反映汉化等情况进行分析。庄吉发《从数目名字的演变看清代满族的汉化》(《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 年)列举《起居注册》所载数目名字来分析满族的汉化问题。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

年第2期)从《盛京满文逃人档》、《内国史院档》、《满文老档》等满文档案研讨了入关前满族抱见礼俗,包括其形式、动作方式、表达的礼意及妇女也可参加礼仪活动。陈小强《后金(清)政权辖区的藏传佛教僧人活动及僧人管理述略》(《西藏研究》1994年第3期)利用有关满文档案对清入关前藏传佛教僧人的一般活动、后金政权对僧人的管理等情况进行研究。吴雪娟《满文档案与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求是学刊》2010年第2期)介绍了满文的创制与发展、满文档案文献的现状,并阐述了满文档案对黑龙江地方史研究与文化资源开发的重要作用。王钟翰《再释阿其那与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1期)依据满文档案探讨了"阿其那"、"塞思黑"和满族传统文化的关系。

郭孟秀《满文玉宝、玉册研究》(《满语研究》2004年第2期)对不同的满文玉宝、玉册进行研究,指出其规律和特点。王丽《满族座次尊卑辨——入关前满族宾礼研究》(《满族研究》2007年第2期)利用满文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通过不同时期座次礼仪的变化来了解满族礼仪文化形成过程,从而对清入关前满族宾礼进行研究。程大鲲《清代宗室郡王封谥考》(《满语研究》2000年第1期)根据清代皇族玉牒的记载,介绍清代关于宗室郡王的封谥情况和予谥时所用的满字与汉字等问题。佟悦《清入关前满族宫廷音乐概说》(《满族研究》1994年第4期)依据《满文老档》及其他有关文献对清太祖、太宗年间满族宫廷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探讨。奇车山《一份珍贵的满文诗稿》(《满族研究》1991年第2期)收录了光绪年间手抄本满文诗稿中17首珍贵的满文诗歌,并一一进行翻译与评析,这份诗稿是我们研究晚期满文诗歌的珍贵材料。罗丽达《一篇有关康熙朝耶稣会士礼仪之争的满文文献——兼及耶稣会士的宣言书〈Brevis Relatio〉》(《历史档案》1994年第1期)对一篇有关礼仪之争的满文史料进行翻译研究,它是当时西方宗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见证。郭美兰《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利用满文档案对康熙帝敕建汇宗寺、钦定陈设布置

及其意义和影响进行分析;《二世哲布尊丹巴与多伦诺尔善因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 年第 5 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对雍正帝敕建善因寺并派员迎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入住善因寺的经过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五、民族研究

赵志强、吴元丰《锡伯家庙碑文考》(《社会科学辑刊》1984 年第 4 期)通过对沈阳锡伯家庙满文碑文的研究,详细说明了锡伯族原住地、锡伯族被编入八旗设佐领及安置、锡伯族南迁盛京等地及安置等诸多问题。王钟翰《沈阳太平市锡伯碑文浅释》(《清史论丛》1982 年第 2 期)亦是对沈阳太平市锡伯满文碑文的翻译和考释。吴元丰《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考实》(《黑龙江民族丛刊》2001 年第 1 期)利用满文档案对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的来源、迁徙原因、迁徙过程和分地安置进行考实;《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满语研究》2004 年第 1 期)列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有关柯尔克孜族满文档案的情况,并指出其对研究黑龙江柯尔克孜族历史的价值。赵彦昌《满文档案与清代满族史研究》(《从兴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 年)通过满文档案对满族史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研究。丁海斌、赵彦昌《满文档案与清代民族史研究》(《东北史地》2006 年第 6 期)举例论证了满文档案在研究满、蒙、锡伯族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了利用满文档案进行民族史研究时存在的问题。

吴元丰、赵志强《满文档案与清代民族史研究》(《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 年)利用满文档案中的民族史材料指出其对民族史研究的作用和价值。王钟翰《满文档案与民族史研究》(《清史补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 年)举例说明满文档案对研究满族史、蒙古史、锡伯族史、达斡尔族史、

藏族史等的重要价值。吴元丰《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清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通过满文档案对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的经过、安置、担负的主要任务等方面进行探讨,指出了察哈尔蒙古官兵为巩固和繁荣祖国西北边疆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刘淑珍《清代黑龙江满文档案与蒙古史研究》(《满语研究》2003 年第 1 期)介绍了清代黑龙江满文档案中的蒙古族史料及对蒙古族历史研究的作用。佟克力《清代满文档案在锡伯族研究中的作用》(《新疆社会科学信息》2000 年第 6 期)论述了锡伯族满文档案史料公布对锡伯族史研究的划时代意义。马大正《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民族研究》1994 年第 4 期)指出满文档案对研究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研究的重要作用及可供解决的几个历史断面。

六、地理研究

吴雪娟《"五大连池"名称源考》(《黑龙江档案》1996 年第 1 期)利用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有关满文档案考证出"五大连池"名称的准确来源;《五大连池满语地名考释》(《满语研究》2008 年第 1 期)利用满文档案对五大连池火山名称、"和尔冬吉"词源、"五大连池"湖名的演变等进行考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满语地名特征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吴雪娟《有关五大连池火山爆发历史的满文档案》(《北方文物》1998 年第 2 期)和《从满文档案看五大连池火山》(《满语研究》1998 年第 2 期)介绍了五大连池火山爆发史料的主要内容及其价值,指出这些档案是研究五大连池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吴雪娟、陈洪洲《满文档案与五大连池火山研究》(《满语研究》2002 年第 2 期)从满文档案论述清代对火山喷发现象的详细记录,并指出这些材料有助于提升五大连池旅游的文化底蕴,能够创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陈洪洲、吴雪娟《五大连池火山 1720—1721 年喷发观测记录》(《地震地质》2003 年第 3 期)详细列出 1720—1721 年黑龙江将军、布特哈总管派遣官兵观测火山喷发活

动记录情况，明确了五大连池老黑山、火烧山火山喷发时间为公元1720—1721年，而非以往认为的1719—1721年。杨继波《从档案记载看澳门地名的演变》(《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2期)和《从明清档案看澳门地名的演变》(《紫禁城》1999年第3期)依据满文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考证澳门地名从香山澳、濠镜澳到澳门的演变过程。

刘远图《根河又名和伦河考——兼及满文档案中一个地名的翻译》(《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6期)利用满文档案考证了“和伦河”即“根河”，在一些史料中被误译为“呼伦河”。吴雪娟《康熙〈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考释》(《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11期)根据有关清代黑龙江满文档案史料，认为《黑龙江流域图》是《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分省资料的附图，应著录为《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图》;《新发现的满文本〈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东北史地》2007年第3期)通过对民间保存的《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的介绍与研究，揭示清代东北地理、语言等方面的历史信息;《康熙年间〈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分省资料》(《东北史地》2005年第5期)介绍了康熙年间黑龙江将军编报的三份满文《大清一统志》黑龙江分省资料内容及价值，对研究清初黑龙江历史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季永海《一件关于北京城的满文档案》(《满语研究》2010年第1期)根据一件奏报太和殿至永定门之间长度以及内城四周的长度的满文奏折，指出其对研究北京城的价值。杨庆镇《满文老档太祖朝村屯地名考》(《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6期)考证了《满文老档》中记载的74个地名，对东北地名研究具有重大帮助。

七、语言文字

吴雪娟《谈清代满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满语研究》1992年第1期)就满文档案中出现的公文套语分类叙述，包括称谓语、首由语、引用语、承转语、到达语、除外语、受事语、结束语等;《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满语研究》2003年第2期)用满文档案举例说明语法的可译性

限度、修辞的可译性,并重点探讨了满文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成百仁《〈旧满洲档〉中的 jisami 与〈满文老档〉中的 kijimi》(《满语研究》1998 年第 2 期)列出《旧满洲档》和《满文老档》中的 jisami 和 kijimi,分析这两个词不可能是同源词,并指出 jisami 有可能是韩国语的借用词。佟永功、季永海《从满文文献看满语的形动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5 年第 3 期)从满文档案文献中挑出一些实例来分析满语形动词的构成和特征。雅路《满文档案翻译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满语研究》1991 年第 2 期)就满文档案翻译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有利于促进满文档案翻译工作的发展。王小虹《满文档案汉译浅说》(《满语研究》1998 年第 2 期)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总结出翻译技巧——即准确理解满文原文、明白畅通的汉文译文,具有广博的知识,并以满文档案一一举例说明。季永海《满文档案句子解析拾零》(《满语研究》2009 年第 2 期)利用摘录满文档案 10 例句子说明翻译结构复杂句子的方法及满语的管界。

屈六生《试析清代满文档案汉译中的管界问题》(《满语研究》1990 年第 2 期)利用满文档案的有关句子说明满语动词、定语、否定式的管界。池上二良《满洲语文语正书法的变迁——特别关于 o、u、ū》(《北京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 年)用满文档案的有关词语来论证 o、u、ū 等文法的变迁。丁海斌、王爱华《再谈"档案"词源问题》(《中国档案》2005 年第 3 期)利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对"档案"词源问题提出质疑,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影响。王佩环《从沈阳清故宫满文门额的演变看满语文的发展》(《满族研究》1987 年第 2 期)从沈阳故宫建筑满文门额的书写方式和译法的演变分析了满文的发展。玉麟《"阿其那"、"塞斯黑"二词释义》(《红楼梦学刊》1981 年第 1 辑)、富丽《"阿其那"、"塞斯黑"新解》(《文史》第 10 辑,1980 年)、王钟翰《释阿其那与塞斯黑》(《海峡两岸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与教学研讨论文集》,中国边政协会编印,1996 年)、《三释阿其那与塞斯黑》(《历史档案》1998 年第 4 期)、沈原《"阿其那"、"塞斯黑"考释》(《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张书

才《关于"阿其那"与"塞思黑"的满文原意》(《红楼梦学刊》2004 年第 4 期)、王佩环《从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再释阿其那与塞斯黑》(《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 年第 2 期)等文章都通过相关满文档案及文献分析解释"阿其那"与"塞斯黑"的意思。

八、外交、法律、人物与建筑

柳泽明《从档案史料窥见清代中俄关系——以十八世纪为主》(文献足征——第二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台北,2005 年)依据中俄有关档案,研究十八世纪中俄关系史中的几个局面,并指出利用档案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何星亮《清代勘分中俄边界大臣的一件满文文书研究》(《民族研究》1998 年第 5 期)就清代勘分中俄科塔边界大臣所写的一件满文文书进行译释和研究,对清代中俄外交研究和边疆民族研究政策研究具有一定价值。阿拉腾奥其尔、吴元丰《清廷册封瓦里苏勒坦为哈萨克中帐汗始末——兼述瓦里汗睦俄及其缘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 3 期)利用满文档案及其他有关文献详细考述了清廷册封瓦里为哈萨克中帐汗的经过,并分析当时哈萨卡与大清及俄国的关系。吴元丰《清初册封琉球国王尚质始末》(《历史档案》1996 年第 4 期)根据清宫满汉文档案对清初册封琉球国王尚质的全过程作论述;《新近发现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文档案及其价值》(《清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对顺治、康熙两朝的满汉文档案作介绍并加以评述。楠木贤道《从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看康熙二十三年的俄清关系》(《历史人类》24,1996 年)选择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中 1684 年与俄清关系有关的内容译成日文,阐述了当时的俄清关系。

武航宇《后金习惯法中的野蛮与文明——以〈满文老档〉中天命六年的案例和谕令为基础》(《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8 年第 2 期)通过对《满文老档》中记载的天命六年案例的分析,来了解后金社会法制发展的脉络,有利于我们探究清朝法律特色的源流;《努尔哈赤时期的司法

制度考析——以〈满文老档〉为中心展开的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利用《满文老档》对努尔哈赤时期的司法制度进行研究。楠木贤道《天聪年间爱新国对蒙古诸部的法律支配进程》(《蒙古史研究》第七辑,2003 年)根据满文档案探讨天聪年间爱新国对以科尔沁部为首的漠南蒙古的法律支配。

唐英凯《从几件题本看孝庄文皇后的晚年生活》(《满族研究》2000 年第 3 期)根据几件宫中满文题本来分析孝庄文皇后晚年生活的几个侧面。黄一农《满汉档案中的曹雪芹高祖曹振彦生平研究》("满学: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10 年)利用满汉文档案对曹雪芹祖父曹振彦的生平进行研究,从而对《红楼梦》的研究具有重大帮助。吴雪娟、李海军、夏春红《萨布素生卒年限考》(《黑龙江档案》1999 年第 6 期)利用有关满文档案确认萨布素的生卒年。吴雪娟、杨静华《寿山家族世系研究》(《北方文物》2002 年第 2 期)通过对黑龙江满文档案分析研究了寿山家族的人口演变过程,重绘其家族世系图表,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清代黑龙江的历史。杨珍《苏麻喇姑与康熙帝》(《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 年第 1 期)依据满文档案对苏麻喇姑与康熙帝的关系作进一步的剖析。齐木德道尔吉《昭莫多之战以后的噶尔丹》(《蒙古史研究》第 4 辑,1993 年)利用满文原始档案材料对昭莫多战后噶尔丹继续同清朝抗争直至病死的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和考证;《首次亲征噶尔丹时的康熙皇帝》(《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利用一些康熙皇帝的亲笔满文信件,参考《方略》等有关史籍,叙述康熙皇帝亲征时的一些情节,并观察和分析康熙皇帝在亲征噶尔丹途中的言行和心理状态。杜家骥《正蓝旗主德格类又名费扬古及其史事考》(《满族研究》2000 年第 4 期)用满文档案考证德格类和费扬古是同一人。

刘凡《〈黑图档〉与沈阳故宫建筑》(《兰台世界》2005 年第 5 期)利用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对沈阳故宫早期建筑"凤凰楼"、"翔凤楼"、"飞龙阁"进行再研究。王佩环《沈阳故宫凤凰楼建筑年代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 年第 4 期)依据满文档案对沈阳故宫凤凰楼的建筑时间

进行考证;《从一幅满文〈盛京城阙图〉看沈阳一代都城的创建》(《一个登上龙廷的民族：满族社会与宫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年)根据满文《盛京城阙图》对沈阳一代帝都的兴建加以论述。郭美兰《康熙修建畅春园冰窖工程清单》(《北京档案》2003年第8期)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关于清代修建冰窖方面的满文档案进行研究,为现今古冰窖的修缮和开发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档案依据。铁玉钦、王佩环《沈阳天命"汗宫"与王府初探》(《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根据满文《盛京城阙图》,并参考历史档案和文献对天命"汗宫"、清初诸王与王府府第、皇宫大内与官廨衙署等方位与布局进行探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满文档案散落在世界各地,这种分布的分散性给满文档案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而国外和台湾地区的满文档案研究工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思路和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对此,我们应该加强交流,增强合作,相互学习,共同促进满文档案研究工作的繁荣发展。过去的一百多年来,在海内外几代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满文档案研究工作薪火相传,成绩斐然,相信在未来的日子,满文档案研究工作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第二章　满文档案的性质及特点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性质

一、满文档案的原始记录性

原始记录性是档案的本质属性，满文档案也不例外。满文档案是指以满文或者满文与其他语言合璧的形式书写的，反映清入关前和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历法、文艺、宗教、民俗等方面内容，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这些满文档案都是当事人在其社会活动中“为阐明思想意图、传播信息、记录历史情况和处理各种事务而形成的，是历史的真实记录”①。

1. 满文档案形式的原始记录性

档案是历史的真实记录，满文档案原件大多有形成者的笔迹，行文和受文者的职名，行文者的官印或私印，文件的书写格式、公文用语、文末落款、签署日期以及当时的文件载体材料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很高的真实性，是可靠的第一手原始材料。

---

① 王兰《论少数民族档案的特点》，《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2. 满文档案内容的原始记录性

由于满文档案都是当时活动的原始记录，档案内容如实地记录了形成者的思想、立场、主要活动业绩和历史客观事实，比较可靠地反映了清入关前和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历法、文艺、宗教、民俗等社会历史活动的真实面貌，因此具有较强的原始性。

二、满文档案的真实可靠性

由于满文档案主要是官方在处理具体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公务活动中自然形成的，本身就带有原始性、真实性。因此，无论记录者在文笔上表现出何等的感情色彩和政治倾向性，档案所涉及的内容还是表现出真实的客观效果。尽管后来受到汉族思想意识、立场观点的限制，在记事的选择和材料的取舍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被如实地记录下来，并具有记时记事全面准确的特点。

1. 满文档案真实地记录了清朝统治的历史过程

清代满语为国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与此相适应，有关诰敕、谕旨、寄信及各部院的行文，也都用满文书写。”①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满文朱批奏折，“满文档案有 300 万件(册)，其中与汉文档案不相重复的即有 150 万件(册)左右”②。而在这些满文奏折中，史料价值高、世人鲜见的重要档案，“据估算约有 17 万余件”③。它记录了清代自康熙前期以至清光绪朝 200 余年间的军政机密要务，因满文奏折文书上有皇帝亲笔朱批，这就使它在当时具有法律依据和

① 郭美兰《沈阳故宫满汉文档案综析》，《满语研究》2009 年第 2 期，第 60 页。
② 关孝廉《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历史档案》1994 年第 1 期。
③ 同上书。

行政效用，真实记录了清代统治历史过程。

2. 满文档案真实记载了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满文朱批奏折，其内容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族、外交乃至风俗人情、宫廷生活、天文、地理、气象等，可以说是清代社会生活的再现。再如，大连市图书馆保存的总管内务府题本，包括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各朝题本，“内容涉及广泛，包括职司铃选类(职司、铨选、科举)、奖惩抚恤诉讼类(奖惩、抚恤、诉讼)、皇庄类(粮庄、果园、打牲、畜牧)、宫廷用度类(宫廷用度、月折、武备、皇商)、营建类(陵寝、建筑、官房)、宫苑类、进贡类(外藩进贡、官员进献)”①，这些满文档案时间跨度大，内容涉及面广，真实记录了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

三、满文档案的全面系统性

满文档案主要是“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衙门形成的各种官文书和各项政务活动的文书记录”②，其内容涉及了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宗教、艺术、民族、语言、风俗、天文、地理、水利、气象、地震、灾异等方面的历史。而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在文书档案的管理方面，“特别注意为行政管理和编修历史提供便利条件，按年代时序排列和收藏，或者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分别汇抄(或记录)成档册”③，这就使满文档案比较有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单份文件内容的广泛性。满文档案中的一些单份文件，如家谱文书、政务文书等内容涉及面广，几乎涵盖了清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各个领域。

---

① 辛欣、薛莲《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图书馆学刊》2008 年第 4 期。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论文选》，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第 281 页。

③ 同上书，第 281 页。

二是系统文件内容的全面性。满文档案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某一事件、某一问题为中心，形成了一系列全面反映该事件、问题的系统档案。这些档案从不同角度对问题和事件作了详尽的阐述①。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特点

一、数量种类多

满文作为清代的官方文字，因而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

在数量上，由于“清朝各级机构都十分重视公文的归档和保管工作，不仅将原件按一定的顺序排列保存，而且将其重要的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件抄录成册”②，虽然满文档案历经战乱和灾害并没有完全保存下来，然而“保存至今的满文档案仍为数量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200余万件(册)”③。一史馆之外，“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满文档案文书亦有数以几十万计的件(册)，其次沈阳辽宁省档案馆尚有数以万计的满文档册，三者合计，满文档册可达二百万件(册)以上”④。另外，“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和阿拉善旗档案馆，以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都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⑤。

从种类上，根据吴元丰在《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⑥中的观点，

---

① 王兰《论少数民族档案的特点》，《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第102页。
③ 同上。
④ 王锺翰《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3期。
⑤ 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
⑥ 同上。

满文档案包括：满文公文原件、满文编年体汇抄的档簿、满文纪事本末体汇抄的档簿、满文日行公事档簿、修书馆满文档案、满文舆图、满文碑刻、满文家谱等。

这几个类别下面又分为多种文种。如满文公文原件，包括三类：

一是以皇帝名义下达的诏令文书，如制、诏、诰、敕、谕、旨、寄信等。

二是臣僚上奏文书，如题本、奏折、揭贴、表、启等。

三是官府衙门行移来往文书，如咨文、移会、照会、札付、交片、版文、咨呈、呈文、申文、关文、祥文等。

二、分布广

满文档案在全世界的分布非常广泛。

就国内而言，满文档案主要分布的地方有北京地区、台湾地区、辽宁地区、吉林省、内蒙古地区和西藏地区等。

北京地区现存的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他单位如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雍和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也收藏有少量的满文档案。

台湾地区现存的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藏有若干的老满文散页。

辽宁地区现存的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图书馆和大连市图书馆三个机构。

吉林省现存的满文档案分散保存在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省博物馆和吉林市图书馆等机构。另外，在民间还存有部分满文谱书。

黑龙江省现存的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另外齐齐

哈尔、双城地区也保存有一定量的满文档案，如齐齐哈尔市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此外，“在齐齐哈尔较早形成聚落的少数民族村屯，散落着一些满文碑刻和档案，内容大体为家谱、药方和奏折等”①。

内蒙古地区现存的满文档案主要集中保存在呼和浩特市，“在市内的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呼和浩特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驻以一些大学图书馆，甚至一些私人手中，保留着大量满文档案”②。

西藏地区现存的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现在的西藏自治区档案馆和图书馆中。

从国外来看，满文档案主要分布于日本、俄罗斯、美国、英国、韩国以及法国等国家，其中以日本的收藏量为最大。

三、价值大

据初步统计，满文档案“在全国约有 200 多万件。其内容之广，无所不包，涉及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宗教、民俗、天文、地理等诸方面”③。如此珍贵的史料，对于古今社会诸学科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1. 满文档案是研究清史、民族史、边疆史与地方史的重要资料

满文档案主要是在清朝国家各级机关处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较清楚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研究历史的最原始、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④。

满文档案包含了无数件皇帝的谕旨和诏敕、臣子的题本奏本，几十万件历代大案要案的卷宗，各种官修档案等。如《清实录》、《清圣训》等

① 徐小慧《齐齐哈尔满文文献、档案调查报告》，《满语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② 佟鸿举《呼和浩特满文古籍文献述略》，《满语研究》1995 年第 2 期。
③ 赵阿平《满文档案的重要价值与翻译人才的培养》，《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 年第 3 期。
④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6 年。

满文档案内容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民族、宗教以及清代最高统治者用人行政、治国安邦的各个方面，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少数民族边疆作为国家安全统治的重点，更为清朝统治者所重视，在东北、内外蒙古、西北、西藏等边疆地区，分别设立将军、办事大臣、参赞大臣、都统、副都统等，“一般任用满族或蒙古族官员。他们的奏折和皇帝的谕旨，一般用满文书写，内容多与各个地区的边疆民族事务有关”①，是进行民族史、边疆史与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2. 满文档案可以对同时期汉文档案进行补充和考证

满文档案是清代历史文献资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可以弥补汉文档案记录之不足，同时还能对汉文档案中记述不准确的地方予以更正。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大量满文档案。“仅有目可查的与汉文档案不相重复的就达一百五十万件左右。这些满文档案它反映了清代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外交等各方面的部分史实，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②

此外，大量的满汉合璧的档案，两种文字也可以进行补充和考证，“以满汉两种文字各朝《实录》作对照，两者不仅内容相异，而且史实方面满文往往详于汉文。”③

3. 满文档案是研究满语、满文的基础

“有清一代，由于满族有其自创文字，所以自努尔哈赤创建龙兴大业之时，就以满文记录其政事；入关以后，清代中央明令国家重要档案，必须以满汉等文字分别写制，此项制度，终清之世，未尝稍改，因而目前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444 页。

② 任世铎《满文与满文档案》，《档案学通讯》1982 年第 5 期。

③ 贺灵《清代满文文献概论》，《西域研究》2004 年第 4 期。

世界各地都有满文书档资料存藏。”①这些资料不仅记录了自满文创始到清亡的三百多年的史实，同时也记录了满文自身的发展史，为我们研究满文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学术界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满文、满语，集中表现在利用《满文老档》和《旧满洲档》上”。《满文老档》所记史事起于清太祖建元天命之前九年(1607 年)，止于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 年)，这期间经历了老满文的改革，从文字上来看，“既有无圈点老满文字，又有加圈点新满文字，还有新老满文之间的过渡型满文字”②。这对研究满文改进、推广、学习的历史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此外，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盛京总管内务府档案”全宗中有一些由内阁或军机处发出的“钦定新清语”上谕有 100 余条，也对研究乾隆皇帝规范满语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总之，浩繁的满文档案是中国文化积存中最珍贵的部分，为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清前和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对研究清史、满族史、中国边疆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清代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

① 陈捷先《三田渡满文清太宗功德碑研究》，《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第 139 页。
② 佟永功《功在史册——满语满文及文献》，辽海出版社 1997 年，第 106 页。

第三章　满文档案的种类

第一节　现存典型的满文档案

一、满文文书

满文文书,即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各机关所形成的各类用满文书写的文书档案。清朝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文书成为皇帝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用满文书写的文书自然首当其冲,且清代国家机关的设置较为完善,公文运行也有较完善的制度,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大量的文书档案。再加上清代的文书档案制度比较齐全,“各代均十分重视公文档案的运转、收藏和管理,建立了一套完善的档案收藏管理制度,不仅将原件按规定的顺序归档保存,而且将重要文书按编年体或纪事本末体逐渐抄录成册,妥善保存,以备案查和修史之用,并设有专门的机构、人员进行保管”①。因此现存的满文文书档案不仅数量巨大,保存较为完好,而且自成一个系统,在满文档案中占有重大比例,是满文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① 路保安、马明霞《清朝档案文献史料收藏述略》,《图书与情报》2010 年第 1 期。

满文文书可以分为皇帝下达的满文文书、臣工呈进的满文文书、各官府衙门形成的满文文书和满文外交文书四种。

1. 皇帝下达的满文文书

清朝的公文制度在封建社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下达的文书种类繁杂，文书功能越来越细化，随之文种也相应增加，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功能。皇帝制发的文书主要有制辞、诏书、诰命、敕谕、朱谕、上谕、旨述、朱批、寄信等。如“道光皇帝立储朱谕”(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敕谕天下朝觐官员”(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硕亲王人等之诰命(崇德五年)”(现藏于吉林省图书馆)等。

2. 臣工呈进的满文文书

由于清代中央集权制度达到封建社会的顶峰，封建等级制度森严，臣工呈进的文书种类愈加细致，功能细化。清朝各级臣工呈进的满文文书按不同内容、不同意图用不同的文种书写，包括题本、奏本、密本、奏折、揭帖、黄册、表、笺、启、呈、禀等，这部分的满文文书档案数量最多，散落在各府衙机构，如“军机处副录奏折”，“宫中档满文奏折”，“内阁满文题本”等。

3. 各官府衙门形成的满文文书

清朝自上而下设置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政权机构。中央的有内阁、宗人府、六部、国史院、军机处、内务府、大理寺、都察院等；在地方采用行省制度，边疆地区则派将军、参赞大臣、都统、协领、办事大臣等各设衙门管理，如黑龙江将军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双协堡协领衙门，形成满文文书的地方官府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衙门各官府衙门形成的满文文书包括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文书和各官府衙门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档案。

(1) 各官府衙门移行来往的文书

包括咨文、札文、咨呈、呈文、移会、照会、牌文、申文、详文、关文、交片、验文等，如归化城副都统衙门现存满文档案有一部分是“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与中央各部院、绥远将军、邻近各扎萨克族之间

的来往文书"①。

(2) 各官府衙门在日常工作中形成的文书

即以该官府机构为文书档案形成者,围绕该机关政务工作所形成的文书档案。如内务府的奏销档、红本档,宗人府的俸饷册。

4. 满文外交文书

满文作为清朝的"国书",在对外关系中是国家正式的文字。清前中期,清政府给邻近国家的重要文书均用满文,后来,外交文书实行满汉合璧形式。总之,满文是清对外行文、签订条约的主体文字,因此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外交文书。

清前期,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清政府以天朝大国自居,在对外往来过程中,以天朝对臣邦来行文。此时与清朝来往的外国主要有两类:一是有朝贡义务的"属国",主要是在中国周边的亚洲小国,如朝鲜,琉球;二是与清有通商往来关系的"外国",主要是欧洲国家,如荷兰、英国等。对这两类国家的外交行文都属于皇帝下达的下行文书,如对属国行文,用敕、谕、敕命,对欧洲国家往来行文用敕谕、谕旨。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是条约,以中俄《尼布楚条约》为代表,属于清初康熙年间与俄国勘定领土边界的外交条约。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势力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软弱,中国的社会地位在世界上急剧下降,这直接体现在外交文书上:往来文移俱用平行,外交文书名称也变为照会和国书。照会主要用于两国官员之间,国书用于两国政府之间。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也均用满汉合璧书写。

二、官修的满文档案汇编和满文档案编研

中国历代帝王都有官修史书的习惯,清王朝也不例外。清入关前

①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节选自《满学研究》(第六辑),民族出版社 2000年,第 170 页。

就设立了修史机构,有文馆和内三院。自满洲入关后,随着政权机构的巩固和逐渐受汉人影响,修史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善和齐全。有例开之馆,如实录馆、玉牒馆;有长开之馆,如国史馆、方略馆、起居注馆;有特开之馆,如会典馆、明史馆等。由于清字在清王朝的显著地位,其编修的史书档案必定采用满汉两种文字,还有的是满汉蒙三种文字。根据纂修时采用档案文献的不同,可分为档案汇编和档案编研两种。

1. 官修的满文档案汇编

档案汇编是指利用原始档案编纂而成的文献汇编,其资料来源属于第一手文献,是对文献的一次加工,其价值较大。清政府组织编修的档案汇编主要有以下几种。

(1)《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亦称为《无圈点老档》、《旧满洲档》、《满文原档》、《满洲老档》、《老满文原档》等)是记载清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满洲兴起和清朝开国的史事档册,其记载日期始于明万历三十五年(天命建元前九年,公元 1607 年),止于明崇祯元年(崇德元年,公元 1636 年),内容包括"满族的社会组织、八旗制度、法律规章、对外交涉、族内纷争、官员任命、生产和经济状况乃至宫廷生活、民情、风俗、宗教、天文地理、气象、东北民族等内容"①,是"现存最为原始、最为系统、最为详尽、最为珍贵的清太祖、太宗时期"②的史料档案。

《满文老档》有原本和抄本之分。原本③形成于清入关之前,藏于盛

---

① 季永海《〈满文老档〉的形成、内容和版本》,《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 年第 1 期。

② 阎崇年《论〈满洲老档〉》,《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第 2 页。

③ 对于《满文老档》原本的称呼,历来学界有各种叫法。台湾的广禄、李学智在台发现《满文老档》原本后将其命名为《老满文原档》;台湾的陈捷先在《〈旧满洲档〉述略》中将其命名为《旧满洲档》;台湾的庄吉发在《文献足征——〈满文原档〉与清史研究》一文中认为命名为《满洲原档》较妥;阎崇年在《〈无圈点老档〉及乾隆抄本名称诠释》一文中主张称之为《无圈点老档》。

京，满清入关后，将其移至北京，由内阁掌管。其用纸多为明代旧公文纸和高丽笺，其形式极不一致，“最厚者达 555 页 13.5 厘米，最薄者 2 页 0.3 厘米；最宽者为 48 厘米，窄者为 22.5 厘米；最长者为 61 厘米，最短者为 26.5 厘米”①。《满文老档》原本文字“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兼以加圈点新满文并间杂蒙古文和个别汉文”②书写。从文字来看，“可以帮助我们钩考出满文字形与语音由旧变新的若干过程与原始”③；从内容来看，《满文老档》是研究清朝兴起史、满族史、东北地方史、民族史最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乾隆六年（1741 年），清政府对当时所见的 37 册《满文老档》进行托裱装订，并编以《千字文》字号④。乾隆四十年（1775 年）到四十三年（1778 年），清高宗下令对其重抄贮藏，分为音写本和照写本。音写本即将原本中的无圈点满文、蒙古文转为加圈点满文；照写本则是用无圈点满文照原档书写并删其重复处。先是各草写了一部音写本和照写本，后正写了一部音写本和照写本，草写本和正写本均藏于内阁大库，再抄写一部音写本藏于阿哥上书房，后又抄一副本，音写本和照写本各一部送盛京尊藏，共抄写七部，各 26 函 180 册，其中“太祖朝 81 册，太宗朝天聪年间 36 册，崇德年间 38 册”⑤。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年间的重抄本与原本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一是蒙古文段落没有保留，而是译成满文，并贴黄签于书眉；二是对原文中的名词和人名进行修改，如皇太极及诸福晋的名字，均行避讳，用其他方式表现；三是对于前代因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清太宗实录》等所作的删削增补，只保留其增补者；四

① 庄吉发《文献足征——〈满文原档〉与清史研究》，节选自《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第 92 页。

② 阎崇年《论〈满洲老档〉》，《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版，第2 页。

③ 陈捷先《〈旧满洲档〉前言（节录）》，《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第 190 页。

④ 实际上对 36 册进行编号，其余一册，因为都是些断烂的残页，合编为一册，无编号。

⑤ 李燕光《〈重译满文老档〉前言》，《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第 200 页。

是因为重抄时出现的漏抄笔误现象。

重抄本即可分为内阁草写本(底本)、内阁正写本、盛京副本及上书房本四种。草写本是“将原档详加整理,重新分段,分册,统一按年月日顺序编排”①;正写本是以草写本为蓝本,式略大;副本是正写本的仿抄本,尺寸略小。现将《满文老档》重抄各版本形制外观区别见表2.1。

表2.1 《满文老档》重抄各版本形制外观之比较

版本 性质		草写本		正写本	副本	上书房本
		照写本	音写本	(照写本、音写本)	(照写本、音写本)	(音写本)
尺寸	长	30.4 cm	29.6 cm	39.8 cm	33.8 cm	现原本未得见,下落不明,但据推算,应为白鹿纸,也应为大黄绫本
	宽	20.2 cm	22.4 cm	23.8 cm	20 cm	
	上白	6.2 cm	5.5 cm	8 cm	6.8 cm	
	下白	3.5 cm	3.5 cm	3.2 cm	2.8 cm	
书页	纸张	台连纸,无内衬纸		白鹿纸,页夹衬纸	白鹿纸,页夹衬纸	
	页内	未画乌丝栏		画朱丝栏:28 cm×17.6 cm	画朱丝栏:24 cm×15.5 cm	
函套		纸板,内裱台连纸,外敷黄绢		木质,外敷黄绫	薄木板,外敷黄绫	
备注				称为“大黄绫本”	称为“小黄绫本”	

注:表中数据来自于阎崇年:《论〈满洲老档〉》,《满学研究》,第四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

盛京副本和内阁正本除上表所列不同外,还有以下区别:内阁正本《满文老档》记事档册中一些地方有签注,“一是对老满文费解之处,用新满文,加以标注;二是对档内个别蒙古文译成新满文,书写签上,以做

① 关孝廉《〈旧满洲档〉谕删秘要全译》,《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38—339页。

标识"①,据有人统计,共有406条,而盛京副本则没有签注。

现存《满文老档》原本40册,重抄本6部,各26函180册。1931年在原清朝内阁大库发现37册,即乾隆年间重抄的底本,1935年9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又发现3册(一为清太祖天命九年及十一年合订的记事册;一为清太宗天聪六年的记事档;一为天聪九年全年分的记事档),合40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除"两册因受潮产生污损外,其他都保持了乾隆六年装裱时的原状"②。乾隆年间的草写本和正写本现在均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阿哥上书房本现下落不明,盛京副本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

(2) 满文本纪

本纪是我国传统史书中记载帝王大事的专书,是按年月次序编写的帝王简史,记述内容包括"皇帝登极、祭祀、朝贺、筵宴、谒陵、巡幸、行围等"③。清代本纪由国史馆编修,隶属翰林院。

清代本纪较《实录》、《圣训》、《起居注》等纂修较晚。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国史馆总裁大学士鄂尔泰等恭进太祖高皇帝本纪","据奏四朝本纪,正在编纂",④由此可见清代本纪纂修始于雍乾年间,乾隆十四(1749年)年,五朝本纪纂修完成,后继任皇帝纂修前一朝皇帝的本纪,成为定例。有清一代,国史馆纂修的满文本纪从太祖到穆宗十朝,其中《太祖高皇帝本纪》二卷,《太宗文皇帝本纪》四卷,《世祖章皇帝本纪》八卷,《圣祖仁皇帝本纪》二十四卷,《世宗宪皇帝本纪》八卷,《高宗纯皇帝本纪》六十二卷,《仁宗睿皇帝本纪》二十五卷,《宣宗成皇帝本纪》三十一卷,《文宗显皇帝本纪》二十四卷,《穆宗毅皇帝本纪》五十四卷。纂修本纪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实录》及各部院、衙门提供的原始档

---

① 阎崇年《论〈满洲老档〉》,《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② 松村润《关于无圈点老档》,《满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283页。

③ 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史学集刊》2002年第4期。

④ 《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二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599页。

案。每修本纪必誊缮满、汉两种文本,由于纂修时间较晚,其纂修过程都是先汉后满,各本装潢成帙,分藏于乾清宫和皇史宬。

现存满文本纪从太祖到穆宗十朝(德宗朝只有汉文本纪),保存较为完整,有正本和稿本之分,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海外的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等也藏有少量满文本纪。

(3) 满文圣训

圣训是历代王朝官修的专辑某个皇帝诏令谕旨及其言论的语录类档案史料编纂物。顺治十二年(1655 年),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上疏,请"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辑成治典,颁行天下。","上谕之,诏辑太祖、太宗圣训"①。清代圣训由实录馆编修,每修两套,每套满汉蒙各一部,藏于皇史宬及内阁,又修满汉本一套送盛京庋藏。

圣训内容大多来源于实录,与实录上谕所载大致相同。其编纂体例仿效《贞观政要》,按内容分类,类下按谕旨的时间先后逐条记述,每个皇帝圣训的类别并不完全相同。清代十朝圣训分类如下表:

表 2.2　清代十朝圣训门类个数

圣 训 名 称	门类个数	圣 训 名 称	门类个数
《太祖高皇帝圣训》	26	《高宗纯皇帝圣训》	40
《太宗文皇帝圣训》	23	《仁宗睿皇帝圣训》	36
《世祖显皇帝圣训》	30	《宣宗成皇帝圣训》	40
《圣祖仁皇帝圣训》	32	《文宗显皇帝圣训》	36
《世宗宪皇帝圣训》	32	《穆宗毅皇帝圣训》	36

十朝皇帝圣训,虽然门类数量各异,但基本门类大致相同。如清高宗在位六十年,其《圣训》300 卷,所分 40 个门类为:圣德、圣孝、圣学、圣治、敬天、法祖、文教、武功、睦族、用人、爱民、勤政、求言、察吏、理财、

① 《清史稿·黄机传》,卷二百五十,中华书局 1977 年,第 9697 页。

慎刑、省方、治水、蠲赈、积贮、赏赉、恤兵、牧政、训臣工、严法制、重农桑、兴礼乐、广幅员、正制度、笃勋旧、褒忠节、崇祀典、礼耆年、靖奸宄、厚风俗、饬宦寺、绥藩服、饬边疆、恤臣下、励将士。①

现存圣训从太祖到穆宗十朝，大都保存完整，分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及辽宁省档案馆。

2. 官修的满文档案编研

清代官修的档案编研是根据档案内容，利用档案文献和汇编等文献编纂而成的史料档案，是对档案文献和汇编的二次加工，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满文实录

实录是我国传统的编年体官修史书，专门用来记载每一位皇帝在位期间的言行以及全国性的重大事件。《清实录》作为我国封建王朝传统实录中的最后一部，同时也是篇幅最大最系统的一部，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和肯定。

清代实录的资料来源主要有“皇家所藏图书和档案文献，包括《起居注》、外记注、内记注等原始档案和军机档、六科史书等二次文献”、“散藏在中央及各级政府衙门档案库中的档案文册，包括皇帝诏令、政府公文、大臣奏疏等原始档案”②两种。故《清实录》是一部档案文献编研，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对外关系以及天象变异等各个方面，详细记载了清代近 300 年的用人行政和朝章国政。

① 太祖实录

太祖实录由于成书较早，后因政治斗争、体例统一等原因经过了几次修改和校订，最终都在雍乾年间烟尘落定。

太祖实录初纂于天聪七年(1633 年)，成书于天聪九年(1635 年)，

---

① 《清高宗纯皇帝圣训》，文海出版社 2005 年。
② 王立萍《〈清实录〉的编纂理论与实践》，南昌大学 2009 年硕士毕业论文，第 57 页。

是由张俭、张应魁两位画工完成的一部图册，共八卷，称为《太祖实录图》。“这一著作可以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一部实录”①，此书现已不存。

崇德元年(1636 年)，太宗皇帝命大学士希福、刚林等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承天育圣武皇后实录》(简称为《太祖太后实录》)，共有八卷八册，满汉蒙三种本子，贮乾清宫。此实录是历代实录中唯一一部以帝后为名的实录，只可惜现也不存。

顺治年间，太祖实录又经过两次修改，“一次在多尔衮摄政期间，另一次则在世祖亲政之后”②。多尔衮摄政期间删除了对其生母的不利记载，多尔衮死后，顺治亲政后下令重修，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成书，称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简称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共四卷四册，现存三部，完整的正本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均存有一部抄本，此抄本三卷三册，均缺第一卷第一册。

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满清为了“符合实录格式”，再次重修清太祖实录，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成书，称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简称为《太祖高皇帝实录》)，十卷，并增加序、进实录表、凡例、目录等首卷两卷，共十二卷，现存其汉文本。满文本“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接近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正本，且卷帙完整的，当属方甦生三十年代所见之一满文小写本”③，但此本如今下落不明。

雍正十二年(1734 年)，因三朝实录人名、地名等译音用字与《圣祖仁皇帝实录》不符，清世宗命令再次进行校订，差不多花了五年的时间，

---

① 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 1978 年，第 7 页。
② 同上书，第 37 页。
③ 徐丹俍《“努尔哈赤实录”考源》，节选自《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第 155 页。

于乾隆四年(1739 年)十二月才竣工。这是清太祖实录的最后一次校订,称为《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实录》,增加乾隆皇帝序、上进表及校对表员名单一卷,合十三卷,有满汉蒙三种本子,各修两套,藏于内阁库和盛京崇谟阁,今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

综上,太祖实录在清代共修了五个版本,加上《太祖实录图》,有六个版本,现存的满文本只有顺治十二年的重修本和雍乾年间的校订本。

② 太宗至穆宗九朝实录

《太宗文皇帝实录》始修于顺治六年多尔衮摄政时,顺治皇帝亲政后,顺治九年(1652 年)下令重修,顺治十二年(1655 年)成书,共六十五卷。康熙十二年(1673 年)圣祖下令重修,二十一年(1682 年)成书,卷数不变。雍正十二年(1734 年)重新校订,直到乾隆四年(1739 年)完工,形成定本六十五卷。以上实录现存只有雍乾年间的校订本。

《世祖章皇帝实录》始纂于康熙六年(1667 年),康熙十一年(1672 年)完工,共一百四十四卷,和凡例、目录共一百四十六卷。雍正十二年,进行校订,成书于乾隆四年,加上序、目、表、凡例共一百四十七卷。以上实录现存的只有雍乾年间的校订本。

《圣祖仁皇帝实录》,始修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雍正九年十二月成书,共三百卷,另首卷三卷。这是清代首次于皇帝嗣位之初即开馆纂修前朝皇帝实录,以后形成定制。《世宗宪皇帝》实录,始修于雍正十三年十月,乾隆六年十二月成书,一百五十九卷,另首卷三卷。《高宗纯皇帝》实录,始修于嘉庆四年二月,嘉庆十二年三月成书,一千五百卷,另首卷五卷。《仁宗睿皇帝》实录,始修于嘉庆二十五年九月,道光四年正月成书,三百七十四卷,另首卷四卷。《宣宗成皇帝》实录,始修于道光三十年二月,咸丰六年十一月成书,四百七十六卷,另首卷五卷。《文宗显皇帝》实录,始修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同治五年十一月成书,三百五十六卷,另首卷四卷。《穆宗毅皇帝》实录,始修于光绪元年二月,光绪五年十一月成书,三百七十四卷,另首卷四卷。

雍乾之后，每修实录，先是纂修实录稿本，再将稿本誊录成小黄绫本，呈交皇帝御览，后抄写 4 份红绫本，分为大红绫本、小红绫本，其中大红绫本两套，一套为满、汉、蒙三种本子，一套为满、汉两种本子，分藏于皇史宬和盛京崇谟阁；小红绫本两套，均为满、汉、蒙三种本子，分藏于乾清宫和内阁实录库。小黄绫本也是满、汉、蒙三种本子，藏于内阁实录库，故共修缮五套。这五套实录现大都保存下来，据"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后清点实录，所见太祖、太宗、世祖（以上三朝为雍正、乾隆间校订本）、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穆宗十朝实录满、汉、蒙文本各有四部。另外，盛京崇谟阁藏有十朝实录满、汉文本各一部"①，计满文本五部。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和辽宁省档案馆。

清初实录形成都是先形成满文本，然后译成汉文本，再将汉文本译成蒙文本，但随着汉化的加深，"康熙以后的史料大都来自汉档及汉籍，史臣亦日渐丧失精通满文和蒙古文的能力，因此从雍正所修《清太祖实录》始，满、汉文本间的纂修顺序颠倒过来，即先据汉文档案纂成汉文本实录，然后再分别译成满文本实录和蒙古文本实录"②，且德宗光绪汉文本到民国时期才完成，当时由于政局动乱及经费短缺，满蒙文本没能成书，之后的《宣统政纪》亦是如此。

③《满洲实录》

在清代众多实录中，《满洲实录》是最为特殊的一种，因为它是唯一一种不以皇帝命名且图文并茂的实录。《满洲实录》全书内容是专门记载清太祖一生事迹的，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太祖实录的一种。

《满洲实录》的底本是上述太宗朝绘制的《太祖实录图》。乾隆四十

① 赛娜《〈清实录〉版本比较概括》，《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 年第 6 期。

② 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 年第 2 期。

四年(1779年),高宗"为了怕尊藏在乾清宫的《太祖实录图》子孙不能尽见"①,于是派人重绘并缮写满汉蒙三种文字,两函八册,共两部,分藏于上书房和盛京(今沈阳)。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高宗又命人绘制一套尊藏于承德避暑山庄。

乾隆年间重修的《满洲实录》是"满、汉、蒙古三种文字合璧,每页分上、中、下三栏,满文居上、汉文居中、蒙古文居下,文字直排,行款自左而右,与汉文书写习惯相左"②,此外还带多幅插画。每册黄绫敷面,装帧华美。"每图的篇幅因描绘的场景及事件而大小不等,有一幅一页,一幅多页等情形,多为一幅两页"③。

除此之外,辽宁省档案馆还藏有一部满汉两体文合璧的《满洲实录》,该本每个页面分上下两格,上格书写满文,下格书写汉文,且书中有个别字体尚保留着老满文的某些痕迹,文中没有绘图,但目录中有插画。史料中没有记载其缮写时期,但据有学者分析,"此本同满、汉、蒙三体文合璧附插图本在册数、开本、装帧、纸质、新旧程度等方面完全一致","此本满文字体和满、汉、蒙三体文合璧附插图本的满文字体如出一辙,均属乾隆时期档案文献的标准字体"④,应该亦属于乾隆年间重缮完成的。

现存有三部满文《满洲实录》,上书房本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有83组插图。辽宁省档案馆藏两部,一部是满汉两体文合璧,另一部是满汉蒙三体文合璧,有插图83组。承德避暑山庄本《满洲实录》现下落不明。

(2) 满文起居注

起居注册,简称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载帝王言行的档册,由历代

---

① 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大化书局1978年,第37页。

② 徐丹俍《"努尔哈赤实录"考源》,节选自《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③ 程大鲲《辽宁省档案馆藏〈满洲实录〉版本探析》,《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1辑,第142页。

④ 何荣伟、佟永功《图文并茂的〈满洲实录〉——从崇谟阁本〈满洲实录〉说起》,《沈阳故宫博物馆院刊》2007年第4辑,第83页。

帝王的近侍臣工负责记录编撰，是编年体官修记注性史籍，专门用于记载皇帝的起居言行及朝政要事。据清会典记载，康熙九年(1670 年)始置起居注馆于太和门西廊，但据实录、《清史稿》等相关史料的记载，清代正式设置起居注官是始于康熙十年(1671 年)八月，隶属于翰林院。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裁撤，雍正元年(1723 年)恢复直至清末。

清代历朝起居注册，包含满文本和汉文本两种文本，又有正本和稿本之分。正本送内阁储藏，稿本留存藏翰林院以备考之资。起居注册记注内容广泛，“所记内容主要包括朝会、祭祀、典礼、日讲，以及谕旨、题、奏、官员引见、觐见、召见、请训、陛辞，官员的升迁、降革、休致、死亡，皇帝与大臣们的奏对问题等项。”①起居注是经过编纂而成的，编纂时要参考查阅各处有关档案，据现存起居注稿本的标注，可以知道起居注的资料来源包括“军机处档、上谕档、部档、部院档、吏部档、户部档、礼部档、工部档、刑部档、理藩院档、太仆寺档、宗人府档、内务府档、翰林院档、都察院档、太常寺档、大理寺档、鸿胪寺档、钦天监档、提督衙门档、武备院档、前锋档、御门档、护军档、京察档、步军统领档、銮仪卫档、国子监档、外纪档、折本档、内阁别记档、内阁别样档、驾行记注档、起居注档、内起居注档、八旗档、旗档、正红旗档、正白旗档、正蓝旗档、正黄旗档、镶红旗档、镶白旗档、镶蓝旗档、镶黄旗档、内阁上谕簿、清字上谕簿、内阁丝纶簿、勾决簿、外纪簿、秋审册、红本、译档”②。

现存满文起居注，自康熙十年九月至宣统二年二月(除中间撤销起居注官的康熙五十七年三月到康熙六十一年)保存较为完整。康熙十年九、十月合为一册，其余每月各一册，闰月增一册，雍正以后每月分装两册，全年共二十四册，闰月另增两册。现主要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等地也有少量收藏)，其中中国第一

① 庄吉发《清代起居注册与满学研究》，《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论文集(下)》1999 年，第 145 页。

② 吕坚《〈乾隆帝起居注〉出版》，《清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历史档案馆藏满文起居注 713 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4 108 册。

三、满文舆图

舆图档案在中国历史上被广泛应用于政治、经济、行政管理乃至宅院、墓葬等方面，是一个国家领土主权的象征和凭证，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重视，因此清代绘制了不少的满文舆图。满文舆图是指清朝时期由官方收集、绘制并以满文或满汉合璧或满汉文标注地理要素的舆图。

1. 现存满文舆图

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见于著录的收藏于机构的满文舆图主要有：《黑龙江流域图》、《九路图》(《吉林九路图》)、《宁古塔地图》(满汉)、《乌拉等处地图》、《盛京五路总图》(满汉)、《口外各路图》(包含《宁古塔图》、《口外九大人图》、《鄂尔多斯苏图》、《独石口图》、《张家口图》等)、《口外五路总图》(满汉)、《口外五路总图》(满)、《盛京舆图记事》、《盛京舆图标注》、《北洋海岸图》、《盛京五路总图》(满)、《内外蒙古地图》、《五省边口图》、《山西边垣图》、《居庸关图》、《大同镇图》、《盛京城简图》、《宁古塔地图》、《法库门科尔沁图》、《喜峰口外图》、《古北口科尔沁图》、《杀虎口外图》、《张家口外图》、《独石口外图》、《喀尔喀图》、《哈密图》、《台湾图》、《黔东新抚苗疆图》、《甘肃秦州图》、《甘肃全省道里总图》、《皇舆山河地名考》、《康熙皇舆全览图》、《十排皇舆全图》、《清乾隆内府舆图》(俗称乾隆十三排地图)、福克司《康熙皇舆全览图》、《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全球坤舆图》、《世界坤舆全图》、《东半球图》、《西半球图》、《云南军管图》、《甘肃地图》、《盛京城阙图》、《木兰围场地图》等。另还有民间个人手中收藏的满文舆图，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满族老人葛经信先生、蒋淳女士保存的家谱档案中发现三幅清代满文舆图”①，其中

① 吴雪娟《新发现的满文本〈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东北史地》2007 年第 3 期。

有一幅被吴雪娟副研究员命名为《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

还有一些满文舆图比较特殊,因为它们本为明朝舆图,满清入关后,通过从民间征集或从皇宫中接收过来明代舆图后,为体现满族贵族的统治地位,“对其中重要的图,汉文标注改成了满文浮签,方法是用该签遮盖在原图的汉字标识上”①。如《大明混一图》、《陕西全省边腹图》、《陕西延绥全图》、《直隶省边垣图》、《两仪玄览图》等。

2. 现存满文舆图收藏场所

满文舆图原大多贮藏于皇宫,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分散于各地。除了民间私人手中收藏的满文舆图,现存满文舆图主要收藏在以下几个机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黑龙江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辽宁省档案馆、沈阳故宫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海外的日本东洋书库、俄罗斯研究院东方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等科研院所。

3. 满文舆图特点

注记文字形式多样。满文舆图注记文字具有满文、满汉合璧、满汉文等多种语言记注形式,“如《九路图》、《黑龙江流域图》为满文本;同一地名既有汉文标记,又有满文标记的《宁古塔图》为满汉合璧本;康雍乾三朝绘制的系列《皇览全舆图》等,边疆地区用满文或记音汉字标注,内地各省则用汉文标注,属于满汉文兼用舆图”②。

载体及记录形式丰富。满文舆图具有纸本彩绘形式、纸本墨描、绢本彩绘等多种形式,如《云南军管图》、《九路图》、《黑龙江流域图》等为纸本彩绘;《内外蒙古地图》、《乌拉等处地图》、《法库门科尔沁图》等为纸本墨描;而《口外各路图》则是绢本彩绘。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满文

① 邹爱莲《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宫舆图》,《清代档案整理与馆际合作——第三届清代档案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 年,第 2 页。

② 吴雪娟《康熙满文本〈九路图〉与清代巡边制度研究》,黑龙江大学 2007 年硕士毕业论文,第 3 页。

舆图也有印刷出版的形式，如康熙朝的《皇览全舆图》采用的就是铜板雕刻凹版印刷，共八排，每排分成几个图幅，全图共四十一幅。

记载图廓范围主要集中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从上述满文舆图名称，我们不难看出这点，这也体现了清王朝对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重视。对于整个清代舆图来说，满文舆图所占比例较少，且大多绘制于清代早期，是研究清代边疆地区的宝贵史料。

四、满文谱牒

满文谱牒，是指用满文编写的家谱及世系图谱，包括皇家家谱——玉牒和普通满文家谱。满文谱牒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满族人口、生产、经济、习俗及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满文玉牒

清朝皇家家谱，简称玉牒，“是专门登记满洲皇族各个支派、世系、辈分、行次、男女及亲族关系的总族谱”①。清代玉牒记载翔实，装帧华丽，是我国唯一一部系统保存至今的皇族“家谱”。

顺治九年(1652 年)，清朝设宗人府，专门负责掌管皇族的属籍，并于顺治十二年(1655 年)议定每十年纂修一次，每逢玉牒编修之年分，便设玉牒馆，由皇帝钦派大臣组织人力进行编修。清代皇帝按照血缘的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以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本支，称为宗室，以腰束黄带为志，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世的叔伯兄弟为旁支，称为觉罗，定以腰束红带为志，俗称红带子。宗室和觉罗人口材料分别注入黄册和红册。顺治、康熙两朝的玉牒均用满文撰写，雍正元年(1723 年)才规定必须兼用满汉两种文字。编修玉牒的当时，已死者用墨笔书写，在

① 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节选自《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408 页。

世者用红笔书写。

从顺治十八年(1661 年)至民国十年(1921 年),清廷共纂修玉牒 28 次。清初编纂的玉牒,有三部,分藏于皇史宬、宗人府和礼部,乾隆年间改为缮写两部,藏于皇史宬①和盛京故宫。“据宣统朝修《宗人府则例》记载:‘凡玉牒,大内尊藏小档一分,寿皇殿东西室尊藏大档一分,盛京尊藏小档一分,府署(宗人府)尊藏大小副本并备查直档各一分。’”②故玉牒分为大小玉牒,皇史宬(后为寿皇殿)藏大玉牒,为玉牒正本,内阁及盛京藏小玉牒,皇史宬、内阁及宗人府副本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恭藏的玉牒现藏于辽宁省档案馆。另外,国外也有一些科研机构有所收藏,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藏满文小玉牒 1 册。

2. 满文家谱

这里所指的“满文家谱”是指除皇室玉牒之外的用满文书写的家谱,包括王公大臣及普通旗民百姓家谱。满族人纂修满文家谱,有满文和满汉文对照两种形式。清初以满文为主,后来随着使用汉文的增多,清中期出现满、汉对照家谱。清代满洲人盛行修家谱,“一来满族同汉人一样,有着敬天畏神、敬祖睦宗的传统;二来在清朝八旗制度中,宗谱既是八旗官职承袭的重要凭证,也是旗粮制中旗民人丁、地位的依据;三是统治者的倡导,尤其是从清雍正皇帝起大力提倡”③。

满族家谱分谱单和谱书两种。“谱单的格式较为单一,仅是一张大纸,上面用树状图排列出世系的发展情况,从中能看出家族世系的繁衍情况”④。满族谱单,载体为宣纸、高丽纸、黄绸或白细布,也有写在牛皮

---

① 嘉庆十二年(1807 年)以后,皇史宬藏玉牒被移至景山寿皇殿收藏,各次续修之玉牒亦收藏于此,直至清末。

② 鞠德源《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 1988 年,第 412—413 页。

③ 见李婷《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古籍满族家谱综述》,《满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

④ 杨英军《满族家谱及其价值》,《中国文物报》2010 年 6 月 2 日,第 3 版。

纸上的，多为平民或较贫困家庭所纂修。谱书为叙述式家谱，条目完备，记录详尽，装订成册，一般包括谱序、族源、谱图、谱注、谱表、家训、祭祀、移驻、墓图、恩荣（朝廷敕书等）、祠宇、先世考辨等内容，如《吉林他塔喇氏家谱》正文共分九篇，分别是序例篇、渊源篇、图谱、谱表篇、家训篇、移驻篇、祠宇篇、墓图、恩荣篇。修谱书的一般为名门望族或富贵兴旺的家族。

现存满文家谱主要保存在官方机构及民间个人手中。国内的机构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国外的如日本东洋书库、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地也藏有数量不少的满文家谱。此外，民间个人收藏的满文家谱也为数不少，主要集中在东北三省。

除皇家玉牒和官家机构、民间收藏的满文家谱外，清代档案中的诰命、敕命、敕书、执照、履历册单、比丁簿册、户口簿册、金兰谱均被视为家谱系列档案文献，其中以满文书写的档案也可视为满文家谱。

第二节　特殊载体满文档案

一、满文石刻档案

石刻，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它取材于地面之石，镌刻文字图像，记言叙事，以昭示各方，是档案的一个重要种类。石刻档案在我国档案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内容涉及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满文石刻档案是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以满文或满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形式形成的，反映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风俗等情况的，刻在石质载体上的原始铭文。

满族的崛起特别是入关之后，在积极吸收汉族先进的文化的同时，也接受了汉民族先进的石刻技术，并且把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应用于石

刻之上，为我们保留了数量可观的满文和满文与其他文字合璧的石刻档案。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北京地区的满文石刻拓片即有六百多种，这些满文及满汉合璧的石刻档案以墓碑为主，与此相关的还有诰封碑、谕祭碑、寺庙碑、纪念碑、建置碑等，种类十分丰富。满文石刻档案因其载体的特殊性，不仅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字、书法艺术价值。有清一代保存下来的满文石刻和满文石刻拓片数量很大，下面仅举几例作以说明：

1. 墓碑

(1) 沈阳恩格德里墓碑

立于清顺治八年(1651 年)，此碑高 3.83 米，宽 1.10 米，厚 36 厘米。碑首二龙交盘，碑座龟趺，高 82 厘米，汉白玉所制。碑额阳面阴刻汉满两种文字，汉文为“奉敕”2 个篆字，碑额阴面阴刻汉满两种文字，汉文为“奉天诰命”4 个篆字。碑身正反两面均刻有汉字楷书。此碑立于是沈阳市于洪区平罗乡上蒲河村西北恩格德里墓前。

此碑是清顺治十四年(1657 年)，内大臣一等公额尔克代青奏请旨准，为其父三等精奇尼哈番，额驸恩格德里追谥而立的墓碑。恩格德里是蒙古与后金进行友好往来的开创者之一，其墓碑是研究东北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资料。①

(2) 额亦都墓碑

额亦都墓位于辽宁沈阳市东陵区应达乡山犁村北部山丘上，墓已被毁。1981 年文物普查时发现额亦都残碑。该碑原为魑首龟趺，碑的阳面和阴面四周雕有云龙纹饰，碑文为对书，汉文在右，满文在左。碑文共 9 行、267 字，可辨 217 字。记载了额亦都奋迹戎行、战功久著及在历次征战中忠勇忘身之佳绩。此碑是顺治十一年(1654 年)刻立。②

---

①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 · 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291 页。

② 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第 960 页。

(3) 永陵肇祖原皇帝墓碑

立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碑通高 6.12 米。碑首汉白玉,高 1.50 米,宽 1.48 米,厚 48 厘米,双龙盘结,碑额篆书“大清”2 字,满、蒙、汉三体文字;碑身大理石,高 3.40 米,宽 1.35 米,厚 38 厘米,镌刻满、蒙、汉三体合璧;碑座花岗岩,龟趺,高 1.22 米,长 2.85 米,宽 1.48 厘米。碑身阳面刻有“肇祖原皇帝碑文”,碑阴无字。碑现立于新宾永陵“肇、兴、景、显”碑亭中,这四座碑,碑文皆为歌颂其祖宗的圣德。①

(4) 永陵兴祖直皇帝墓碑

立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 年)。碑通高 6.12 米。碑首汉白玉,高 1.50 米,宽 1.48 米,厚 48 厘米,双龙盘结,碑额篆书“大清”2 字,满、汉、蒙三体文字;背身大理石,高 3.40 米,宽 1.35 厘米,厚 38 厘米。镌刻满、蒙、汉三体合璧;碑座花岗岩,龟趺,高 1.22 米,长 2.85 米,宽 1.48 米。碑身阳面刻有“兴祖直皇帝碑文”,碑阴无字,现碑立于新宾永陵碑亭中。

(5) 沈阳达海墓碑

碑两通分别立于清康熙四年、九年(1665 年、1670 年)。达海墓位于沈阳城东南 5 里。其墓葬早已荡然无存,墓碑藏于辽宁省博物馆。两碑形制相同,碑首为二龙戏珠,碑座龟趺,碑身两侧边缘亦刻有龙珠纹。碑阳镌刻汉、满、蒙三体文字。碑一,立于康熙四年,高 3.11 米,宽 92.5 厘米,厚 30 厘米。碑二,立于康熙九年,高 4.62 米,宽 1.11 米,厚 40 厘米。达海是新满文的创始者,又通达经史,明理典章,为清初两代帝王立下辅佐奇功。康熙帝先后特为此树碑立传,此碑对研究清史有着重要意义。②

(6) 永陵景祖翼皇帝墓碑

立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 年)。碑通高 6.12 米。碑首汉白玉,高

---

①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 · 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292 页。

② 同上书,第 294 页。

1.50米,宽1.48米,厚48厘米,双龙盘结,碑额篆书"大清"2字,满、蒙、汉三体文字;碑身大理石,高3.40米,宽1.35米,厚38厘米,镌刻满、蒙、汉三体合璧;碑座花岗岩,龟趺,高1.22米,长2.85米,宽1.48米。碑身正面刻有"景祖翼皇帝"碑文,碑阴无字,立于新兵永陵碑亭中。①

(7) 永陵显祖宣皇帝墓碑

立于清皇帝十八年(1661年)。碑通高6.12米,碑首汉白玉,高1.50米,宽1.48米,厚48厘米,双龙盘结,碑额篆书"大清"2字,满、蒙、汉三体文字;碑身大理石,高3.40米,宽1.35米,厚38厘米,镌刻满、蒙、汉三体合璧;碑座花岗岩,龟趺,高1.22米,长2.85米,宽1.48米。碑身正面刻有"显祖宣皇帝"碑文,碑阴无字,立于新宾永陵碑亭中。显祖宣皇帝是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顺治五年追尊为"显祖宣皇帝"。②

(8) 法库僧格林沁墓碑

立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碑全高5.67米,宽1.30米,厚58厘米。碑首四龙盘饰,用满汉两种文字镌刻"圣旨"2字,座龟趺。碑位于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陵村北山坡上。僧格林沁是科尔沁左旗后旗人,世袭郡王。咸丰十年(1860年),率军抗击英法联军,失守大沽、天津。咸丰十一年后镇压捻军起义。同治四年,在山东曹州一带被捻军击毙。清廷为表彰他的功绩,诏封其为忠亲王,建陵立碑。③

(9) 太监公墓碑

北京海淀区红山口。满汉文,康熙乙巳年(康熙四年,1665年)。④

(10) 虽哈纳墓碑

位于渤海镇西南1公里兴隆寺前院。原在牙河西岸牡图线铁路东侧,1975年5月迁此。清康熙二十年(1684年)黑龙江将军布素为其父

①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3页。
② 同上书,第293页。
③ 同上书,第298页。
④ 见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所立。碑首刻“康熙诰命”四字，满汉文对照。碑身正面阳刻“皇清诰命赠光禄大夫黑龙江将军虽公之墓”。其前后四边均刻有游龙戏珠纹饰。碑座已损坏。①

(11) 沈阳福陵神功圣德碑

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此碑位于沈阳市东郊福陵隆恩门前的碑楼中，龙首龟趺，碑座长4.8米，宽1.96米，高1.17米，花岗岩制。碑身为大理石制，高5.5米，宽1.8米，厚0.72米。正面右侧阴刻汉文，左侧阴刻满文，清圣祖玄烨亲撰，共计2 000余字，是研究清前史的重要资料。②

(12) 沈阳昭陵神功圣德碑

立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大理石制，此碑位于沈阳城北在昭陵隆恩门前的碑楼中，龙首龟趺，碑通高6.67米，背身宽1.76米，厚0.71米，碑身正面右侧阴刻楷书汉字21行，左侧阴刻满文26行，清圣祖玄烨亲撰碑文，共计2 000余字。③

(13) 恩济庄内监公茔

北京阜成门外恩济庄。齐达色泽。满文“乾隆五年十月”。恩济庄茔地是清代“御赐”恩济庄太监。茔地建成于乾隆三年，开始于雍正十二年八月，雍正十二年，世宗宪皇帝赐内监等茔地一区，名恩济庄。清代太监死后，大都葬于恩济庄，并享有皇帝赏赐之地亩，收取租银，作为“香火等项”之用。传说此地葬二千七百多人，清末太监李莲英即葬于此。④

2. 庙宇碑、寺庙寺、祠堂碑、塔碑

(1) 沈阳城隍庙

刻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碑志青灰沙岩。此碑高1.86米，宽

①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②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③ 同上书，第297页。

④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0页。

0.68 米。碑圆首四龙交盘,碑座龟趺。碑阳额题四字为"城隍庙碑",碑阴额题 6 字"沈阳路城隍碑",碑身刻"沈阳路城隍庙功德官员题名志"和庙院地四至。此碑年款是元至正十二年,是记载有关"沈阳"这个建置名称的最早物证,此碑先藏于沈阳故宫。

全碑刻千余字,记载了元代重建沈阳城隍庙的起源、时间、具体方位,以及功德官员题名,为研究元代沈阳城址及当时社会历史情况,提供了珍贵史料。①

(2) 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刻于后金天聪四年(1630 年)。碑半圆形,碑首与碑身连体,通高 95 厘米,宽 66 厘米。碑额阳面阴刻楷书汉文"勅建"2 字,碑阳首题"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其下阴刻满汉楷书合璧,右汉文、左老满文各 12 行。碑阴刻楷书汉文 20 行,为官员、僧众、工匠题名。大海、杨于渭撰文。原立于辽阳老城小南门外喇嘛塔前,1996 年塔毁,碑遗存于辽阳博物馆。法师名囊素,西藏喇嘛,原在蒙古科尔沁部卓锡,后金天命六年来辽阳,死后遵清太祖努尔哈赤遗命,为其建塔立碑,碑阴题名 67 人。②

(3) 文德坊

位于沈阳故宫大清门东侧(俗称东华门)。清太宗皇太极统治东北时期,为标榜其文治武功,遂于崇德二年(1637 年)在宫阙门外建文德、武功二坊。均为非冲天式木牌坊,三间,分明间(明楼)、南次间(又名南次楼)、北次间(又称北次楼)。明楼横书满、汉、蒙三体文字坊名,两侧亦用三体文字竖书建坊日期,汉文为"崇德二年孟春吉日"字样。③

(4) 重修无垢净光舍利佛塔碑

该碑立于沈阳市皇姑区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正南,清崇德六年(1641 年)刻立。现碑首残,碑身高 168 厘米,宽 87 厘米,厚 20 厘米,碑

①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260 页。
② 同上书,第 248 页。
③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204 页。

座龟趺。碑身一面刻汉文,约150余字,一面刻满文和蒙古文。主要记载重修无垢净光舍利塔的缘由和年代及施工单位等。其中记载:“工部奉命重修无垢净光舍利佛塔……此塔于重熙十三年四月告成,迄今六百余年,我大清宽温仁圣皇帝见此颓坏,详察建塔来历,于崇德六年命该部重修,建佛殿三间,令僧玄等五名看守。督工甲喇嘛将军藏国祚。”①

(5) 沈阳莲花净土实胜寺碑

刻于清崇德三年(1638年)。该碑位于实胜寺(皇寺)院内天王殿的碑亭内,原有碑亭两座,置碑两通,一通刻满、汉两种文字;一通刻蒙、西域两种文字,统称四体文字碑,于清崇德三年刻立。满汉文字碑于1966年碑砸毁,今只存碑身,高2.33米,宽1.01米,厚23厘米,粉色花岗岩,碑四周边缘刻有卷云纹,碑阳为汉文,碑阴为满文,约700余字,主要记载兴建实胜寺的缘由、地址、规模、竣工年代等。实胜寺是清初敕建的皇家喇嘛庙,碑文最早见于《清太宗实录》。②

(6) 沈阳敕建护国法轮寺碑

刻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碑身为花岗岩,碑头与碑座为火山岩。该碑立于北塔法轮寺院内。清初在沈阳城外东西南北四面五里处建造四塔四寺,在四寺中均建碑亭两座,立碑两通,其内容基本相同。碑身高3.63米,宽1.08米,厚25厘米。龟座高56厘米,长2.3米,宽1.23米。碑头圆形饰卷云纹,额题“敕建”2字,碑身四周边缘可有云纹。两通碑共四面分刻满、汉、蒙、西域四种文字,说明建立四寺的缘由、方位、名称、主建、施工人员、起竣年代,为研究盛京古城风貌和宗教信仰等提供了重要资料。③

(7) 钟楼碑

位于北京钟楼后,清高宗(弘历)撰文,梁诗正书,满汉文,乾隆十

①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3—204页。

②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4页。

③ 同上书,第276页。

二年(1747年)九月。首题:御制重修建钟楼碑文;额撰书题:御制碑文。①

(8) 沈阳太平寺碑

刻于清嘉庆八年(1803年)。此碑高144厘米,宽57.5厘米,厚20厘米,碑身四周刻有花纹。碑座为须弥座,长78厘米,宽、高各50厘米。碑身阴刻满文,共253字。太平寺碑立于沈阳市和平区黄寺路太平寺内。1959年,新疆查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肖夫和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王钟翰、安文溥等为收藏锡伯族历史资料,到太平寺考察,发现了这款碑刻,并做了抄录,由满文译为汉文。碑文记载了锡伯族原住地和顺治、康熙年间锡伯族的迁徙并建立太平寺的情况,是研究锡伯族历史的珍贵文物。同时,对研究锡伯族的语言文字也提供了实物依据。该碑现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馆。②

(9) 太平寺锡伯碑

该碑是记述锡伯族归属清王朝和在关东地区发展史的唯一存世遗物。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原于沈阳旧城地载门外(今沈阳市和平区黄寺路一段)建寺,俗称在"锡伯家庙"。嘉庆八年(1803年)立,满、汉文石碑各一,今仅存满文碑一。碑高144厘米、宽57.5厘米、厚20厘米。碑身四周镌刻花纹,底为须弥纹。碑阴阳两面均镌满文,额首各有四字,汉译"万世永传"。碑阳铭文为立碑时间,上有"嘉庆八年七月十六日恭立"字样及立碑人名衔。碑阴铭文则叙述锡伯部落始居黑龙江海拉尔地区,后迁移至齐齐哈尔、墨尔根、伯都纳等地编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进入辽沈地区,并派在盛京各城驻防。至四十六年,这一地区之锡伯族人遂集资建寺,厚勒石立碑纪其事。1962年收入沈阳故宫,1982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③

---

①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②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81页。
③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3. 建筑碑

(1) 永安桥碑

此碑刻于清崇德六年(1641 年)。碑首为红色麻岩,浮雕 4 条蛟龙。碑额篆刻“敕建”。碑座为花岗岩,束腰须弥座,浮雕连花纹。碑身为绿泥板岩,高 1.63 厘米,宽 0.80 厘米,厚 0.19 厘米,阴刻满、汉、蒙三种文字。碑阳刻:“宽温仁圣皇帝敕建永安桥　大清崇德六年岁次辛巳季秋吉旦　碑阴刻有:‘催工牛录章京周元勋督工甲喇章京藏国祚石匠任朝贵’。”①

(2) 通州石道碑

北京京通公路。清世宗(胤禛)撰,满汉文,雍正一年(1733 年)十二月初九日。首题: 御制通州石道碑文。②

(3) 皇都篇: 北京先农坛

清高宗(弘历)撰,满文,乾隆十八年(1753 年)四月。③

(4) 雍和宫碑

北京雍和宫,清高宗(弘历)撰,满汉蒙藏文,乾隆九年(1744 年)十月。额撰书题: 陟降庭之。④

(5) 文源阁碑

原在圆明园,现移北京图书馆。清高宗(弘历)撰,满汉文,乾隆三十九(1774 年)孟冬(十月)。首题: 文源阁记。⑤

(6) 马驹桥碑

北京通县马驹桥。清高宗(弘历)撰并正书,满汉文,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中澣,首题: 重修马驹桥牌记。⑥

---

① 详参关东昇《中国民族古文字与书法宝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年,第 30 页。
②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205—206 页。
③ 同上书,第 206 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 205 页。

(7) 沈阳文溯阁碑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刻。碑质为汉白玉,此碑通高 5.35 米,碑首高 1.2 米,宽 1.64 米,厚 0.75 米。碑身高 2.9 米,宽 1.37 米,厚 0.57 米。碑座高 1.25 米,宽 1.73 米,厚 0.72 米。其首、身、座两侧边缘均刻几何云纹饰。碑阳额撰阴刻"御制"2 字。碑身阴刻满汉文对书的"御制文溯阁记",汉文 10 行;碑身阴刻汉文对书的"宋孝宗论"各 10 行。此碑现藏于沈阳故宫文溯阁东侧碑亭之中。

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为庋藏编纂的《四库全书》,仿杭州天一阁形式,在北京皇宫大内、北京圆明园、承德离宫、盛京宫殿建了四座大型书库,分别命为文渊、文源、文津、文溯等四阁。乾隆帝为四阁做记、镌碑。文溯阁记是乾隆帝亲自撰文,阐述文溯阁命名之立意。背阴附刻乾隆四十八年他所作的宋孝宗论,此文以宋孝宗之孝为戒,警示其子孙牢记"天子之孝,当以不失祖业为重",并指明其东巡、南巡之志"不在游山玩景之小节"。①

(8) 国学新建辟雍园水工成碑记

北京国子监首都图书馆。清高宗(弘历)撰。满文,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十月上澣。②

4. 战事碑

(1) 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

存于北京国子监。清圣祖(玄烨)撰,汉文,康熙四十三年(1704 年)三月二十一日。额篆书题: 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额篆书题: 御制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③

(2) 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

存于北京国子监。清世宗(胤禛)撰,满汉文,雍正三年(1725 年)五

①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 · 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377 页。
②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206 页。
③ 同上书,第 205 页。

月十七日。额撰书题：御制平定青海告成太学碑。①

(3) 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

存于北京国子监。清高宗(弘历)撰，梁师正书。满汉文“乾隆十四年四月”。首题：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②

(4) 抚顺萨尔浒之战书事碑

清乾隆帝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刻，碑为青石质，碑通高 2.4 米，宽 2.15 米，厚 32 厘米。碑阳刻有萨尔浒山之战书事，为乾隆帝御笔。汉文碑文 94 行，共 6 000 余字，碑阴刻满文 93 行，内容与碑阳相同，碑的右侧镌刻有嘉庆皇帝御笔七言诗 1 首，共 16 句。该碑原位于抚顺市萨尔浒山腰，1978 年移至沈阳故宫博物馆内收藏。

萨尔浒之战发生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是明与后金之间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役，在明清战争史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次战争。努尔哈赤在四天内，以六万八旗兵突破九万明师的围剿，为后金进取辽东奠定了基础。此碑对研究明清史具有重要价值。③

5. 诰封、谕祭碑

(1) 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

位于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新丰乡库里屯南，俗称“库里碑”。碑文为满、蒙两种文字，又称“满蒙文碑”。此碑全称为“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1981 年，吉林省人民政府公布此碑为吉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定名为“满蒙文石碑”。

碑通高 5.82 米，碑额呈长方体，高 1.45 米，宽 1.30 米，厚 0.4 米，其正背面均刻有二龙戏珠图案。中间双线阴刻竖写的 5 个满蒙文大字。左侧两字为新满文，右侧 3 字为蒙古文，汉译为“敕立”之意。下方精雕云水图案。碑身高 2.92 米，宽 1.25 米，厚 0.34 米。正面四周为

①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205 页。
② 同上书，第 205 页。
③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 · 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374 页。

12.5厘米宽的精刻云龙图案。内刻12条小龙，上、下为二龙戏珠图。左右各有4龙，头上尾下，龙身向内，各逐一球。碑文为15行竖写阴刻满蒙文字383个。右侧8行为蒙文，共201字；左侧7行为满文，共182字。每种文字第一行皆为“追封忠亲王暨忠亲王贤妃碑”。末行皆为“大清国顺治十二年五月初七日立”。字迹清楚，刀法纯熟。碑阴四周图案与正面相同，中间无文字。碑身下是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龟趺，首尾长3.10米，高1.45米，最宽处为1.32米。碑质为火成岩。碑额、座呈浅褐色，碑身深灰色，整个石碑庄重匀称，刻工精细。①

(2) 巴哈塔诰封碑

北京海淀区五道口西王庄。满汉文，顺治十五年(1658年)七月。首题：追封通议大夫拜他拉布勒哈番摆牙喇章京巴哈塔碑。额篆书题：诰命。②

(3) 辽阳彭春诰命碑

立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碑质为汉白玉，螭首，龟趺座。碑全高3.30米，碑身高2.15米，宽95厘米。碑阳阴刻满汉合璧，右为汉文8行，满行47字，左为满文7行。额题阴刻篆书“诰命”2字。此碑原立于辽阳市灯塔县公安堡东阿氏墓园，1978年，移存辽阳市博物馆。彭春是著名军事将领，曾参加指挥抗击沙俄侵略雅克萨战役，功勋卓著。③

6. 进士题名碑

① 顺治九年(1652年)满洲进士题名记：北京国子监。满汉文，顺治九年三月三十日。首列制诰一道，额撰书题：壬辰科进士题名碑。④

② 顺治十二年(1655年)满洲进士题名碑：北京国子监。满汉文，

---

① 详参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志·文物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页。

②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③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4页。

④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首列制诰一道，额撰书题：乙未科进士题名碑。①

7. 上谕碑

谕习国语骑射碑。北京图书馆，清高宗(弘历)撰，满汉文，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二十日。②

8. 地产碑

(1) 资福院产碑

北京朝阳区得胜门外黄寺。满蒙文，康熙三年(1644年)七月。额题：为供养千方的喇嘛置天地四至碑。③

(2) 资福院施地碑

北京得胜门外黄寺。满汉蒙藏文，乾隆十七年(1752年)。④

9. 忧恤碑

忧恤土尔扈特部众碑。河北承德。酣梦藏文，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仲秋八月中澣。首题：忧恤土尔扈特部众记，额篆书题，御制。⑤

10. 山水诗文碑

白塔山总记。北京北海公园琼岛。清高宗(弘历)撰并正书，满文蒙藏文，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中澣。首题：白塔山总记。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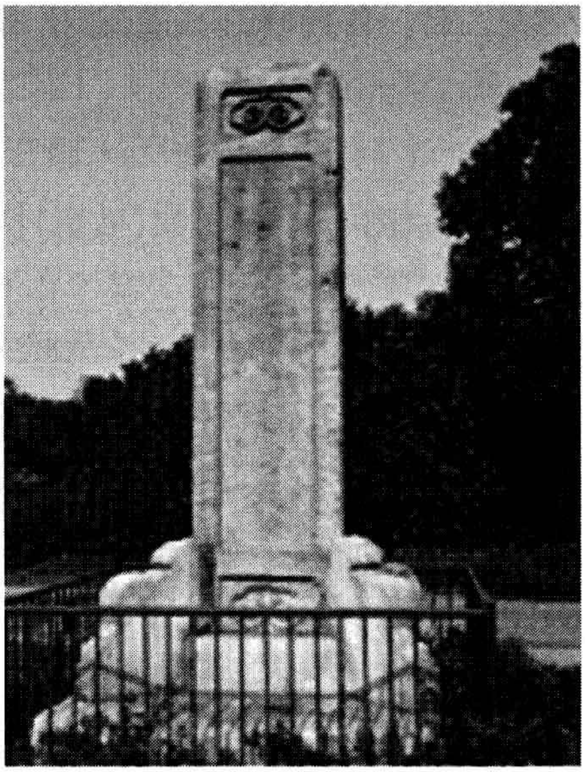
11. 下马碑

(1) 下马碑

沈阳北陵有满、蒙、汉三体文字刻写的下马碑，用以提示官员人等到此下马。⑦

---

①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
② 同上书，第206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205页。
⑦ 满语满文，http://www.lndangan.gov.cn/mwmy1/mwmytp1.htm(检索日期2010年5月4日)。



(2) 下马碑

北陵前有用满、蒙、汉、回、藏五体文字刻成的下马碑。

12. 其他

虎神枪记碑。坐落于木兰围场中的越乐围场，在金今围场满族蒙古自治县新拨乡骆驼头村的月亮沟西山坡上。乾隆十七年(1752年)建立。碑高5.3厘米，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写。碑阳为满文，碑阴为汉文，左侧为藏文，右侧为蒙古文有碑顶、碑额、碑身、碑座。碑顶四角各伏雕龙一条，碑额撰有“御制”二字。碑文为乾隆帝撰写并书，记述了乾隆在此碑对面东山坡山洞中一虎神枪击毙猛虎的过程。在击毙猛虎的洞旁石壁上用满、汉、蒙、藏4种文字，刻“乾隆十七年秋狝上用虎神枪殪伏虎于此洞”。①

二、满文印章

满文官印作为档案的重要一种，不仅具有很高的雕饰艺术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为从满文官印上的文字我们可以间接了解满文及其满语的发展和演变过程。

清代的满文官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玉宝、百官印信和钤记。玉宝是清代官印的最高等级，清朝各皇帝使用，是最高权力的象征。本书将在下一节玉宝和玉册一起进行介绍，本节主要介绍百官印信和钤记。

(一) 百官印信

在清代实际使用的印信中的最高等级官印为朝廷一、二品要员的用印，也包括个别三品印。“印文初用满文楷字、汉文篆字，乾隆十二年(1747年)后，官印上满文亦改用篆字。”②现就现存的典型的满文官印介绍如下：

① 关东昇《中国民族古文字与书法宝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② 郭孟秀《东北三省满文官印研究》，《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1. 清满蒙文哲里木盟长印

边长10.9厘米见方、厚3厘米，柄高6.5厘米，重4.06千克。银质铸造，方形体，虎钮，印背左右均刻满文蒙文，印的边侧亦刻有文字，左侧“乾字壹佰拾叁号”，右侧“乾隆拾叁年肆月”，前侧“礼部造”，后侧满文。印面凿刻满蒙文“哲里木长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①

2. 清满汉文平凉城守营游击关防印

边长9.8厘米，宽6.4厘米，厚1.9厘米、厚1.9厘米、通高12.15厘米，重1.44千克。铜铸，长方体，印背有柱状柄，柄的两侧刻“平凉城守营游击关防礼部造”满汉文对读。印边侧刻“乾字八千九百六十号”、“乾隆十六年□□□”，印面凿刻虫篆阳文“平凉城守营游击关防”满汉文四行。1977年铁岭地区熔炼厂拣选，现藏辽宁省博物馆。②

3. 清满汉文乌拉满洲索多氏印

边长4.1厘米见方、厚1.2厘米、通高6.1厘米，重210克。黄铜铸，方形体，椭圆形长柄，印背刻“乌拉满洲索尔多氏”四行。1977年铁岭地区熔炼厂拣选，现藏辽宁省博物馆。③

4. 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印

清代官印，仅存印文。方形，边长10.5厘米，虎钮。印文为满文和汉文柳叶篆书。1683年清朝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管辖西起车臣汗，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1681年设瑷珲城(今苏联阿穆尔州维笑勒依村)，后称瑷珲旧城。1685年治所迁到新瑷珲城(黑河市爱辉镇)。1690年迁至墨尔根(嫩江县)，1699年移驻齐齐哈尔。萨布素作为第一任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他指挥了抗击沙俄入侵的雅克萨战争，并参加了尼布楚谈判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此印代表清政府加盖在《尼布

①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1页。

② 同上书，第672页。

③ 同上。

楚条约》的拉丁文本上，成为清朝管辖黑龙江流域的重要物证。①

5. 管辖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印

清代官印，现仅见印文。清代雍正十五年(1732 年) 设副都统，官职为正二品，“掌八旗政令，宣布教养，厘诘戎兵，以赞旗务”，隶吉林将军统领。管辖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包括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居住的赫哲、费雅喀，鄂伦春等民族。三姓副都统曾两度派遣官兵巡查黑龙江下游，并上报朝廷，还定期收纳人参、鲸鱼等土特产。治所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因该地住努雅喇、葛依克勒、祐什哈哩三个姓氏之人而名三姓。②

6. 吉林儒学印：清代官印

1985 年 8 月黑龙江省双城镇出土。铜质，方形，圆柱钮，边长 6 厘米、厚 1.5 厘米、高 10 厘米。印面满、汉文竖书“吉林府儒学印”，侧刻“光绪九年五月□日光字八百二十号”，背刻满、汉文“吉林府儒学印礼部造”。“吉林府”清代行政设置，管长春至哈尔滨之间，及其东部地区。儒学即学校，清代 1742 年设吉林府儒学府，颁印，取代“吉林厅学政条记”印。朝廷派学政官，执掌吉林府学、长春厅学、伯都纳厅学(吉林榆树县)、宾州厅学(黑龙江宾县)、双城厅学(黑龙江省双城县)、宁古塔学(黑龙江宁安县)、伯都纳旧城子(吉林省扶余县)、三姓学(黑龙江省依兰县)、阿勒楚喀学(阿城市)、伊通州学(吉林省伊通县)、敦化县学、农安县学、五常厅学 13 所学校。统管学员身份审定、授课、考核、教育官员的升迁、罢废及学员肄业。此印是清代地方教育官印，用至 1901 年。吉林儒学后被新设的吉林大学堂取代。③

7. 管辖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扎萨课印

管辖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扎萨课印系 1686 年(清康熙二十五

① 详参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第 956 页。
② 同上书，第 941 页。
③ 同上书，第 316 页。

年)颁发的官印。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印为银质,正方形。边长 10.5 厘米、通高 11 厘米、印厚 3 厘米。印背有一蹲坐姿虎形大钮。印文铸满、蒙两种文字。右 3 行为满文楷书;左 3 行为蒙文楷书,汉译均为“管辖科尔沁左翼郭尔罗斯后旗扎萨课印”。印本文字右刻满文,左刻蒙文,汉译皆同印文。印右侧刻满文,左侧刻蒙文,汉译均为“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前、后两侧各刻满、蒙楷书,汉译皆为“礼部造”。此印经长期使用,印背、侧的文字仅能识别,不能传拓。①

(二) 图记

“图记”源于明代私印中的称谓,一般用于收藏章上,清代把“图记”也用之于官印,清代对八旗佐领、宗室、觉罗族长及官学、造办处等印称“图记”。②

1. 宁古塔正黄旗满洲第二佐领图记

1954 年吉林化工厂出土,现藏吉林省博物馆。清代官印,铜制,方形,边长 5.5 厘米,厚 1.8 厘米,通高 10 厘米。圆柱形钮,印文为朱文满文,悬针篆。汉译“宁古塔正黄旗满洲第二佐领图记”。印背刻满楷书,汉译同印文。印右侧刻“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左侧刻“乾字一万三千五百九十五号”楷书汉字。上侧面刻满文,汉译“礼部造”。下侧面刻“礼部造”汉字。③

2. 黑龙江镶白旗满洲第一佐领图记

黑龙江满洲佐领图记 1968 年在哈尔滨市征集,省博物馆藏。

印为铜制,正方形。边长 5.8 厘米、通高 10 厘米、厚 1.9 厘米。椭

① 详参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黑龙江省志 · 文物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324 页。

② 任万平《清代官印制度综论》,节选自《满学研究》(第 5 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第 446—447 页。

③ 详参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志 · 文物志》,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76 页。

圆形柱状钮。印文为阳刻满文悬针篆,汉译为:“黑龙江镶白旗满洲第一佐领图记。”印背阴刻满文楷书,汉译与印文相同。右侧阴刻汉字楷书:“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日”;左刻阴刻汉文楷书:“乾字一万三千七百五号”;前后侧分刻满文、汉字楷书:“礼部造”。①

3. 黑龙江镶白旗满洲第二佐领图记

黑龙江满洲佐领图记1968年在哈尔滨市征集,省博物馆藏。

印的质地、形状和大小均与上方相同。印文为阳刻满文悬针篆,汉译为:“黑龙江镶白旗满洲第二佐领图记。”印背阴刻满文楷书,汉译与印文相同。右侧阴刻汉字楷书:“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日”;左刻阴刻汉文楷书:“乾字一万三千六百九十六号”;前后侧分刻满文、汉字楷书:“礼部造”。②

4. 黑龙江正黄旗索伦第三佐领图记

1968年在哈尔滨市征集。省博物馆藏。印为铜制,正方形。边长5.8厘米、通高10厘米、厚1.9厘米。椭圆形柱形钮。印文为阳刻满文悬针篆,汉译为:“黑龙江正黄旗索伦第三佐领图记。”印背阴刻满文楷书,汉译与印文相同。右侧阴刻汉字楷书:“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日”;左侧阴刻汉字楷书:“乾字一万三千六百九十七号”;前后侧分刻满文、汉字楷书:“礼部造”。③

5. 鄂伦春正白旗第一佐领图记

1966年8月于黑河市郊区出土,藏省民族博物馆。铜制,正方形。边长5.6厘米、厚1.25厘米、通高9.75厘米,重545.5克。椭圆形柱状钮。印文为满文篆书,汉译:“鄂伦春正白旗索伦第一佐领图记。”印背刻满、汉两种楷书文字:“鄂伦春正白旗索伦第一佐领图记”、“礼部造”。印侧刻汉文楷书“光绪十年五月日”、“光字九百二号”。④

---

①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黑龙江省志·文物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25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326页。

④ 同上书,第412页。

6. 鄂伦春正黄旗第二佐领图记

1968 年 9 月黑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拨交给是省博物馆,藏省民族博物馆。印亦为铜制,正方形。边长 5.6 厘米、厚 1.35 厘米、通高 9.7 厘米,重 565 克,椭圆形柱状钮,印文为满文篆书,汉译"鄂伦春正黄旗第二佐领图记"。印背亦刻满、汉两种文字"鄂伦春正黄旗第二佐领图记"、"礼部造"。印侧刻汉文楷书:"光绪十年八月 日"、"光字九百二十二号。"①

7. 鄂伦春镶白旗第一佐领图记

铜质,方形,边长 5.5 厘米,椭圆形柱状钮。印面满文篆书"鄂伦春镶白旗第一佐领图记",侧刻汉字"光绪十年四月","光字八百七十三号"。印背刻满汉文"礼部造"。是清朝管理鄂伦春民族的地方官印。②

8. 鄂伦春正红旗第一佐领图记

1972 年在黑龙江省嘉荫县发现。铜质,方形,边长 5.5 厘米,椭圆形柱钮。印面满文篆书"鄂伦春正红旗第一佐领图记";侧刻"光绪十年四月日","光字八百七十号"。印背刻满、汉文"鄂伦春正红旗第一佐领图记","礼部造"。清初,鄂伦春部归布特哈总管衙门,由黑龙江将军统领。同治十年(1871 年) 在鄂伦春族狩猎区(大兴安岭一带) 以河流分五路: 库玛尔路、阿力路、多布库路、托河路、毕拉尔路,下设或合设佐领,管理区内牲丁,并负责巡查外兴安岭、贡纳貂皮等事。此印铸于光绪十年(1884 年),为光绪年间 870 号。③

9. 吉林巴彦鄂佛罗边门防御钤记

1960 年于吉林地区征集,现藏吉林省博物馆.清代官印.铜制,印长 7.8 厘米,宽 4.8 厘米,厚 1.8 厘米.椭圆形柱状钮。高 8.2 厘米。印面为朱文,汉文、满文各占一半。印背面右刻汉文楷书"吉林巴彦鄂佛罗

①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黑龙江省志 · 文物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412 页。
② 详参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第 782 页。
③ 同上。

边门防御钤记”、“礼部造”；左刻满文，汉译同右。右侧刻“乾隆三十三年七月 日”，左侧刻“乾字一万三千九百八十号”。①

10. 清满汉文正红旗满洲五甲喇四佐领图记

边长5.7厘米见方，厚1.45厘米、柄高8厘米，重600克。黄铜铸，方形体，圆柱形柄，印背左右侧各刻满文四字，印边左侧刻“乾隆五年正月 日”，右边侧刻“乾字二千九百十六号”，正侧边刻“礼部造”，印面铸造篆书阳文“正红旗满洲五甲喇四佐领图记”满汉文六行。原藏东北博物馆。现藏辽宁省博物馆。②

11. 满汉文正红旗满洲五甲喇六佐领图记。清代官印。现藏辽宁省博物馆。印为铜质，方板状，背有椭圆形柱状长钮。印面为满汉文对译；右汉文篆书“正红旗满洲五甲喇六佐领图记”；左满文三行。背款为“乾隆十五年正月日礼部造”。这是清乾隆年间颁制的满洲正红旗佐领图记。按清代官制，八旗中各旗最高官职为“固山额真”，汉译为都统。都统之下为“甲喇额真(章京)”，汉译为参领。参领之下为“牛录额真”，汉译为佐领。“正红旗满洲五甲喇六佐领图记”，应为满洲八旗之一的正红旗下五甲喇六佐领的官印，官秩相当于五品。③

三、满文木牌、信牌

(一) 满文木牌

满文木牌是清代以木牌为载体书写的满文文书档案，为中国古代简牍文书之延续。清入关前，禀报事宜，常将文字书写于薄木之上，往来传递，曰牌子。木牌形式各异，大小不一，为随时削制而成。每支木

①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志·文物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78页。

②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71页。

③ 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926页。

牌上端有一小孔,用牛皮条将多枚木牌穿在一起,以便于传递与保存。根据杨宾《柳边纪略》记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曰牌子,以削木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之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由此我们不难知道满文木牌就是原始的档案。

1934 年 11 月,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工作人员在清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了用高丽纸包着的 26 支满文木牌,上面的满文翻译成汉语为“苏开前往武英郡王在昌平州军中带来之文书”。(满文木牌,笔者并未亲眼所见,所获信息均来自李德启先生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和佟永功先生的《功在史册—满语满文及文献》中对满文木牌的介绍)。

根据以上两位先生的介绍,这 26 支木牌有成捆的 4 捆和散开的 5 支;4 捆中有 2 捆各 4 支,1 捆 5 支,1 捆 8 支。其中,1 捆 4 支是石廷柱旗的,1 捆 4 支是噶布什贤超哈(即前锋兵)的,1 捆 5 支是白奇超哈(即步兵)的,1 捆 8 支是满洲、蒙古旗的,零散 5 支可能是武英郡王行营的。这些木牌记载的是阿济格于明崇祯九年(1636 年)率满、蒙、汉八旗进入关内,在京畿周围与明兵作战,攻克城堡和俘获什物数目以及统兵之王、贝勒下达的命令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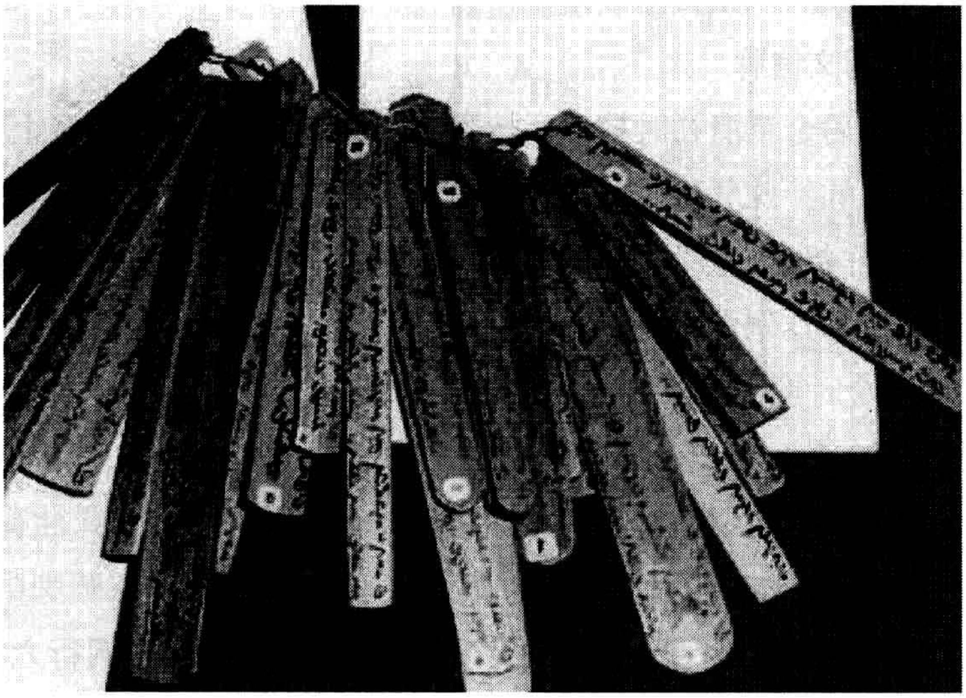
木牌的长短、宽窄各不相同,最长的 33 厘米,最短的 16.7 厘米;最宽的 4.7 厘米,最窄的 1.8 厘米。木牌用白木削制而成,不加涂饰,其下方有一小孔,可用绳或皮条穿孔拴系之。

木牌上用刀刻满文字句,或一行,或二行,或三、四行。主要内容是此次阿济格率军征明作战过程中军情、战况即战果的通报,记载十分简略,大概是用刀在短而窄的木片上刻字费时费力的缘故。

木牌上的满文,既有无圈点老满文,又有加圈点新满文,还有介于新老满文之间的过渡型的满文。它们不仅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宝贵的文物价值。它们的发现对我们研究清初历史、文书制度、满文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满文木牌遗存极少,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木牌共 28 支。其中 26 支为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 1935 年整理清内阁大库档案时所发现,另 2 支是 1979 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理内阁杂档时发现。

文献馆工作人员李德启先生应沈兼士先生之托,对这 26 支满文木牌做了考释和汉译,于 1935 年 5 月出版了专著《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才使人们对满文木牌有了一定的了解。李先生在专著中将这 26 支满文木牌按阿济格略明的时间顺序排列编号,逐一转写成罗马字并加汉字对译,然后意译成汉文,并在需要注释的地方加以注释,书前还附有 26 支木牌的影印(分正面和反面),使读者可以参看木牌阅读译文,为我们了解满文木牌及其内容提供了方便。



满文木牌

"木牌中有记载统军王行营战绩的有 7 支,其中 1 支内容译录如下:

抵涿州之日,王曾遣阿山、图尔格依、额驸达尔汉、叶臣、叶克舒、谭泰、额驸苏纳往侦涿州城。涿州出兵百万,杀我步兵樵采者四人,取其

首级前来,遇而击败之,追及于城,获马八匹。

记录步兵战况的有5支,其中1支载:

步兵永顺同马兵击败良乡县县外步兵。拜尹图、叶臣知之。

记载满洲、蒙古各旗战事的有8支,其中1支内容译录如下:

正蓝旗攻克顺义县,城内有知县一员、密云通判一员、自昌平逃来知州一员。攻城时,屯达礼牛录下塞克希先登城,赛昆牛录下道通第二登城。

反映先锋兵战况的有4支,其中1支记载:

正红旗、镶红旗先锋先合兵进略,镶红旗先锋至文安城,克之。吴山牛录下尼雅罕先登城,乌巴海牛录下色勒第二登城。

记录石廷柱旗战绩的有4支,其中1支记载:

石延柱旗同八旗兵击败卢沟桥兵,获马八匹。"①

(二)满文信牌

信牌是后金至清初时期官兵持牌执行皇帝命令、发布皇帝上谕、传递宫廷信息的特殊凭证,具有较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这种信牌藏量很大,但制作粗糙,边缘凸凹不平,有明显的斧凿痕迹,规格、轻重均不一。下面仅举几例进行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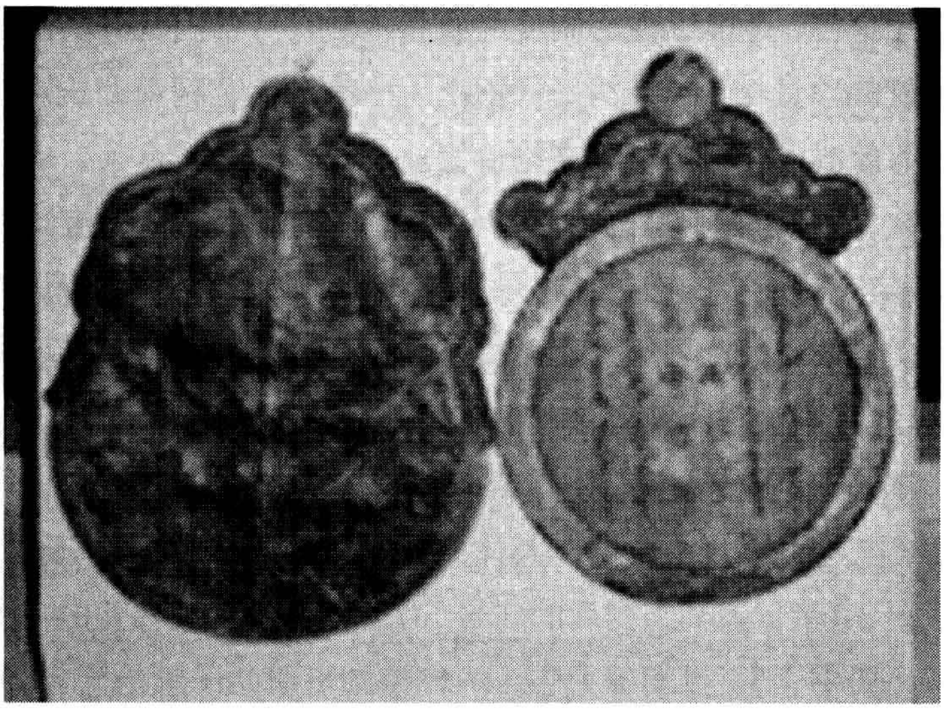
1. 后金时期满汉蒙文"皇帝之宝"信牌

牌高29.3厘米,直径22.1厘米,厚1.7厘米,方槽径10厘米。红油圆牌,首有孔,贯以皮条,在牌首穿孔与碑身之间,饰以绿油荷叶刻文。牌正面阳刻描金"皇帝之宝"满汉蒙三体文字,背面在圆牌中央刻一方形槽内,贴阳文无圈点满文白高丽纸印模。自左至右四行六字,汉译为"金国汗之宝",或译为"大金国汗之宝",是后金时期遗物。对牌的名称、时代、用途说法不一。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②

---

① 关孝廉《〈盛京满文旧档〉及其特点》,《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1985—1994)》,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6—77页。

②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96页。



满文信牌

2. 清崇德时期“宽温仁圣皇帝信牌”

牌高 31 厘米，直径 21.2 厘米，厚 2.5 厘米，圆形，木质，红油牌首，牌首有孔，顶端雕云托纹饰，头中穿贯以黄色丝绳绶带。颈雕云形漆红边，内刻一金龙衬以蓝地。下刻海水漆绿色，地漆蓝色衬。牌面凹下剔圆，边缘突起染绿色。朱红漆地阴刻填金楷书“宽温仁圣皇帝信牌”，汉满蒙三体文字各两行。信牌外罩套皮套，其上彩绘描金海水云龙纹饰。该信牌为清太宗皇太极初期的信物。历时 300 余年仍保存完整，色彩仍艳丽无损，是盛京皇宫原藏遗物。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①

四、满文玉册、玉宝

玉宝、玉册又称为谥宝、谥册，它们是“皇帝为前代帝后进谥号、庙

① 详参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 · 文物志》，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696 页。

号时制用之物，是推行谥法制度的直接产物。"[①]它们是反映清代帝后尊谥制度的珍贵档案。有清一代留下了一大批工艺精美的玉宝、玉册，它们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

玉宝，皇帝为其列祖列后上尊谥所用之宝，故又称"谥宝"，用玉石镌刻，其宝文为所上的庙号和谥号镌刻。"玉宝包括皇帝和皇后或皇妃的玉宝。玉质一般为白玉、苍玉、青玉、碧玉等。宣宗道光年间、文宗咸丰年间、穆宗同治年间及德宗光绪年间根据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对玉宝形制的规定改镌，一般使用新疆和阗贡玉，碧玉质。"[②]宝上端镌刻交龙纽，宝文为满、汉文合璧。具体又可分为皇帝玉宝、皇后玉宝。

玉册，皇帝记述列祖列后的庙号、谥号和一生功德伟业的书册。镌刻于玉质册书之上，供奉于太庙。清代镌刻玉册始于顺治元年，制成于顺治二年。后代皇帝登基后，为尊祖和弘扬列祖功德屡改前朝册文，另造新册。乾隆二十四年对玉册制作形制有过比较具体的规定。玉册每份计10页，长28.8厘米、宽约12.8厘米、厚约1厘米。选用新疆和阗上等贡玉，首、底2页各镌描金升降行龙二，字为满、汉文，俱镌阴纹描金。又附玉钱一枚，刻满、汉文"天下太平"字样。玉册与玉宝一起择吉日按制奉祀于太庙。玉宝、玉册均一式两份，一份供于北京太庙，一份供于盛京太庙。[③] 具体也可分为皇帝玉册和皇后玉册。

李治亭主编的《关东文化大辞典》(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对国内保存的玉宝、玉册进行了详细介绍，我们这里不再重复。

五、悬挂的"档案"——满文匾额

匾额，又称扁额、扁牍、牌额，简称为扁、匾或额。东汉许慎在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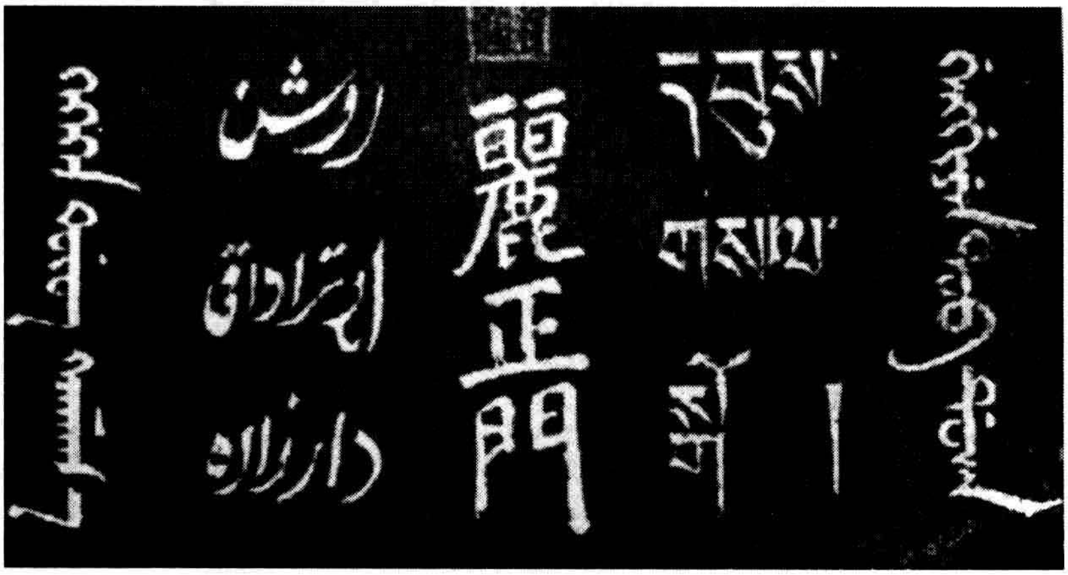
① 郭福祥《清代帝后谥法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帝后谥册谥宝》，《故宫博物院院刊》1994年第4期。
②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232页。
③ 同上书，第219页。

撰的《说文解字》中说:“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可见传统意义的匾额,即悬于门屏上的牌匾。其实广义上的匾额应该是指悬挂在厅堂或者亭榭上的题字横牌,亦包括城门门额。“匾额一般都挂在门楣与檐顶之间,可见于大门厅堂,亦可见于亭台水榭,虽功能不同,但都起到了美观和封闭门上部到檐之间的空间的作用。”①而用满文书写的匾额因为数量少,则显得更为珍贵。

目前所存的满文匾额档案,大部分都是满文和其他文字合璧的形式,有满汉合璧还有满文和其他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形式。

1. 承德避暑山庄丽正门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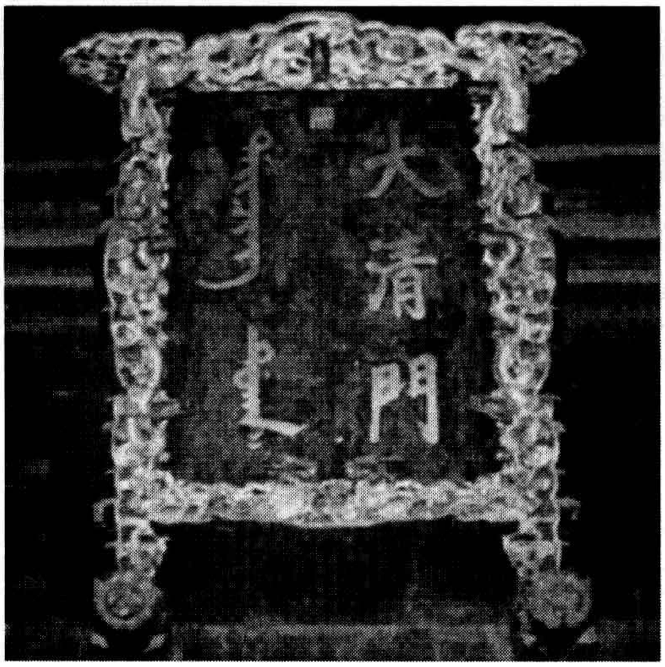
5 种民族文字篆刻的门额。丽正门为承德避暑山庄正门。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 年)。丽正门额系乾隆帝下令所修,门额高 51 厘米,长 110 厘米,用满、蒙、汉、藏、维 5 种文字刻成,体现了乾隆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气势。②



① 赵金婕《清代匾额文化研究——以江西及周边地区为例》,复旦大学 2009 年硕士毕业论文,第 3 页。
② 详参关东昇《中国民族古文字与书法宝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1 年,第 43 页。

2. 沈阳故宫文溯阁门额

3. 沈阳故宫大清门门额



六、流通的档案——满文钱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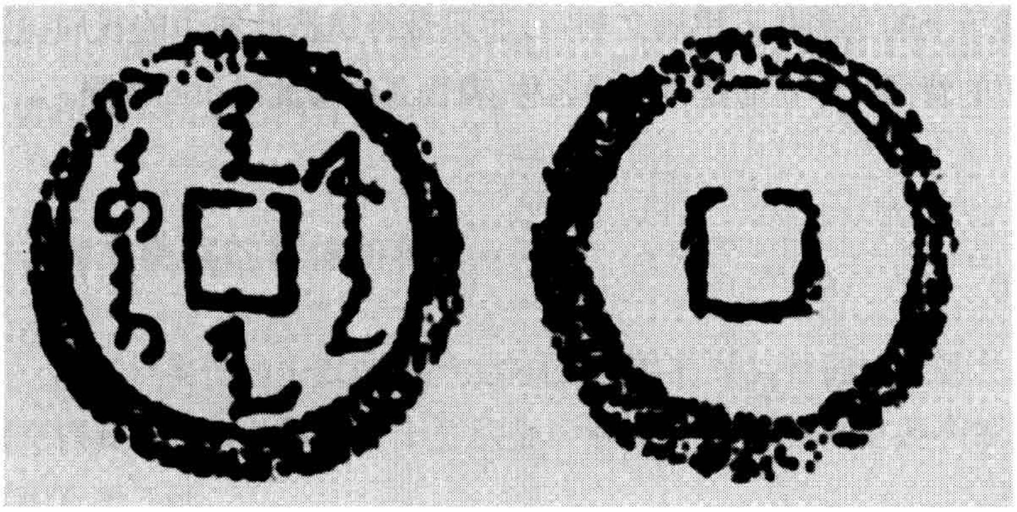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载体的档案,在古代处于流通的过程之中,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尤其是满文或者是满汉文合璧的钱币,就显得更加珍贵。

我国古代,每当皇帝继位之后,都有改元铸币的习惯。清代铸钱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钱背上铸有满文文字。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铸造了“天命通宝”、“天聪通宝”,上面都有老满文。清朝在入关之后铸造的钱币上也都有新满文。因此从钱币上的文字来看,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满文的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下面仅举几例进行说明:

1. 天命通宝

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元年(公元 1616 年)铸造,传世有满文、汉文两种文字。铸行量不大,存世较少。满文钱为小平型,汉文钱为小平钱制式,发行量不大。

满文钱面文译作“天命汗钱”,此钱外圆内方,直径约 2.8 厘米,正面为无圈点老满文。读法很奇特,先由左至右,再由上至下。汉译左行为“天的”,右行为“命”,中行上为“汗”,下为“钱”,背面无文。“天命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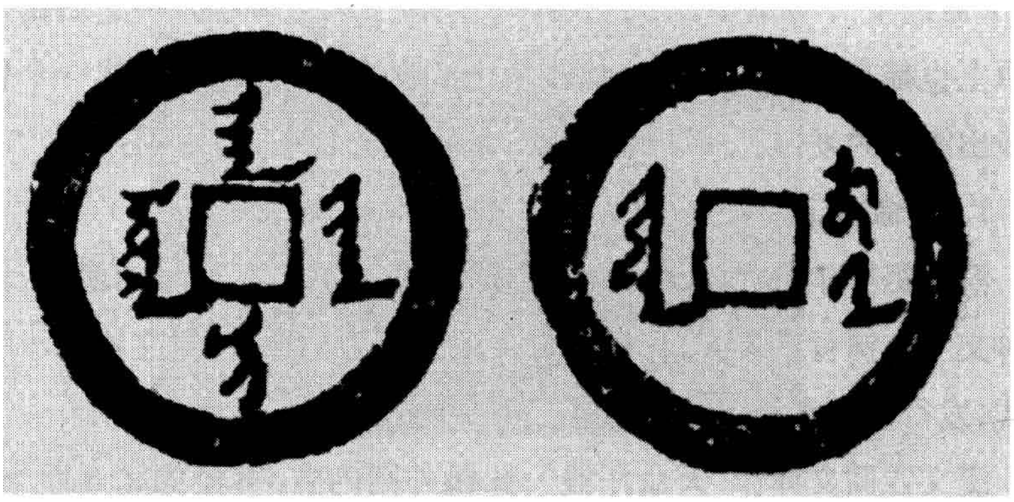


天命汗钱

钱”为铜质,制作比较精美,迄今为止,天命汗钱不是很多见,汉文天命汗钱更是少见。

2. 天聪通宝

清太宗皇太极,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铸造。满文,仿明天启通宝大钱形制,折十。面文读法依次为左上右下,也有释做“天聪汗钱”的。正面满文,左 sure 汉译为“聪明”,上 han,汉译为“汗”,下 ni 汉译为“的”,右 jiha 汉译为钱,背文左 juwan,汉译为十,右 emu yan 汉译为一两。皆满文。铸造量不大,传世不多。



天聪汗钱

清入关之后铸造的货币中,像“康熙通宝”“雍正通宝”“乾隆通宝”等钱币上的文字并不用满文刻写,而只是将铸造此钱币的钱局铸造在钱币的背面。即正面是钱币的名称,背面是铸造此钱币的钱局。

第四章　满文档案的价值及作用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价值

满族是第二个在我国历史上建立起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少数民族，统治了全中国 270 多年。所以，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对于整个中国的历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满族的兴起及统治期间形成的文书资料，特别是满文档案，是研究满族文化和清朝统治的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料。所谓满文档案就是指在满族兴起、建国及统治期间形成的大量的以满文书写的各种档案。如今，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已经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了，满文档案也已以它的独特性、原始性和完整性证明了它的价值。满文档案的价值主要分成两大部分，分别是满文档案的载体价值和满文档案的内容价值。

一、满文档案的载体价值

满文档案作为少数民族产生的档案，具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这在满文档案的载体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满文档案的载体主要有纸质、木制和石质三种。

纸质数量相对数量众多，但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腐化、破碎，保存

起来十分不易。像《满文老档》原本、抄本都十分珍贵，所以保存得很精良，而其他很多的满文档案，只能堆积在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深处，没有进行整理和系统保管。木制满文档案目前为止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的28支满文木牌，作为重要文物保管着。石质满文档案主要就是满文碑铭。“有清一代留下了数量可观的满文和满文与其他文字合璧的碑刻，仅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北京地区的满文拓片即有六百多种，这些满文及满汉合璧的石刻以墓碑为主，与此相关的还有诰封碑、谕祭杯，墓主均是清代王公贵族、文臣武将，这些墓碑拓片是研究清代人物传记的重要资料。”①这些，满文碑铭的内容价值不言而喻，但作为其载体的石碑不只作为档案而存在也是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

无论是纸质、木制还是石刻，它们的形式不同，但它们都是档案的本质却是相同的，尽管它们不是都保存在档案馆，很多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有收藏。作为历史的遗留，它们同时也具有文物的价值，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将历史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无论是内容研究还是实体的欣赏，它们都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满文档案的内容价值

满文档案的内容价值在于能够提供最原始的资料来研究历史事实。“而且，围绕某一历史事件，往往形成几件，甚至十几件或上百、上千件公文，全面反映历史事件发生的起因、发展过程以及结果。就是说，档案史料的详尽程度远远胜过其他文献，对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②

1. 满文档案对政治史的价值

满文档案中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政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书，

① 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2008年，第285页。

② 吴元丰《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满语研究》2004年第1期。

它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是研究清朝政治史最原始、最直接的材料。满文档案的大量形成是因为满族入关后定满语为国语,并在平日的政治生活中经常使用满语,很注重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违者甚至要治罪的。特别是像各地驻防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人的奏折和一些有关军机要务的机密文件更是只用满文书写。如此一来,满文档案的数量和质量自然是不可小觑的。

康熙帝智擒鳌拜是清朝重要的政治事件,对当时及以后的清朝政局的发展产生了关键的作用。但是,关于康熙帝擒拿鳌拜的具体时间,《清圣祖实录》的有关记载很模糊,仅记载了康熙八年五月戊申(十六日)下旨,"命议政王等拿问辅政公鳌拜等"①,并于其下列数条鳌拜及其同党罪状。"按照当时惯例,皇帝颁布谕旨须由内院发交科抄送交关系衙门始行颁布。即使颁谕于议政王,无须科抄,亦经反复讨论而后定稿。总计从皇帝颁旨到正式交付执行机构,所需时日,大致都在一二日之间。"②而擒拿鳌拜又是一次非常且机密的行动,必然是在擒拿鳌拜之后才行颁旨的,而不是一般颁谕之后才开始执行的上谕。因此,当年五月十六日下旨命令议政王拿问鳌拜的时候,鳌拜应已就擒。虽然如此,但是因为缺乏明确的史料证据,学界还是将康熙帝擒拿鳌拜的时间定于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

直至一批满文档案的翻译出版才解决了这个难题。特别是 1996 年出版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的第 2 条《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第 3 条《康亲王杰书等宣票签上谕从宽减免鳌拜罪行事》、第 4 条《康亲王杰书等议拟鳌拜罪时皇帝所颁票签》这三份珍贵的奏折,通过与《清圣祖实录》的互相对比和补充,不但推断出了康熙擒拿鳌拜的准确日期就在五月初十这一天,而且进一步丰富了这件重大政治事件的过程和内容。

---

① 《清实录(四)》第 29 卷,中华书局 1986 年,第 396 页。
② 白新良《康熙擒鳌拜时间考》,《满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书写时间为康熙八年五月十二日，是现在已知的康熙帝智擒鳌拜一案中时间最早的史料。其中这十二条罪状中六条与《清圣祖实录》中康熙八年五月戊申条所记载的一样，另外六条是实录中所没有的，而且末尾有“著将彼等宗族尽行监禁，从重议罪具奏。至拘捕与否之处，再行具奏请旨”①等语句是实录中没有的。由此判断，《康熙帝钦定鳌拜等十二条罪状谕》实为康熙八年五月戊申（十六日）所下谕旨的初稿。而且据此推断，鳌拜及其同党这个时候已经被擒了，不然哪来的将他们宗族监禁起来的道理呢，所以擒拿鳌拜的时间不会晚于康熙八年的五月十二日。

循此思路，发现康熙八年五月十日有一个重大且蹊跷的人事任命，一直被鳌拜一伙视为异类的王宏祚竟被任命为兵部尚书的要职，可想而知，这绝对不会是鳌拜的主张，那必然是康熙的所为了。可须知康熙智擒鳌拜靠的就是麻痹鳌拜一伙，出其不意，一举夺魁，怎么可能做出如此重大的举动，让对方警觉呢，而且当时如若鳌拜还在辅政大臣的位置，这项人事任命是需要他的同意才能执行的。所以，原因只可能是一个，就是当时鳌拜及其党羽已经被擒，考虑到这个重要职位空缺会严重影响兵部运行的情况下，发布了这道人事命令，至此，康熙帝智擒鳌拜的时间基本就能确定为五月十日这天了。

至于《康亲王杰书等宣票签上谕从宽减免鳌拜罪行事》和《康亲王杰书等议拟鳌拜罪时皇帝所颁票签》这两份奏折的核心内容是康熙帝关于处理鳌拜及其同党的决定。主要包括获罪人员刑罚的调整，其中免死人员增加了 16 人，新增处死犯人 7 人等内容。其中对鳌拜个别党羽的处理，康熙的决定也曾有变化。“其中之那摩佛（又作纳木福）原拟免死，鞭一百，康熙帝改为革职籍没圈禁。”②所有这些，又进一步丰富了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2 页。

② 白新良《康熙擒鳌拜时间考》，《满族研究》2005 年第 3 期。

康熙帝擒拿和处理鳌拜一案的具体内容。可见，满文档案不但内容丰富、独有，且原始性、真实性很强，远远胜过一般的实录。

2. 满文档案对经济史的价值

封建经济史是封建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清代作为封建最后一个统治王朝，是经济过渡的关键时期，更显其意义非凡。然而，这类经济史研究往往因为资料的匮乏和杂乱，举步维艰。如今，满文档案的开发与利用大大丰富了这部分的研究资料，扩展了经济史的研究道路。

在封建社会中，经济的发展水平主要依赖于农业，而农业又依赖于土地和人口，也就是说地契档案和户籍档案就集中体现了农业水平，也就是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基本情况。

鄂伦春族世代居住在中国东北地区，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生活风俗闻名于世。“清初，鄂伦春人属于‘索伦部’的一部分，由理藩院直属的布特哈索伦达斡尔总管负责管辖。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黑龙江将军设立，康熙三十年(1691 年)布特哈各部归黑龙江将军兼辖，鄂伦春各部的招抚和管理事务一并归属黑龙江将军。雍正年间，正式编设布特哈八旗，鄂伦春人亦被编入八旗进行管辖。”①鄂伦春各部官兵、牲丁等几乎参加了清朝全部的重要战事，在保疆卫土、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这样一个民族日益得到各界学者的重视，可是其民族内部的具体情况已经很难追述了。

幸好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有清代鄂伦春满文户籍档案，档案主要包括户口册、三代红白册、官员名册、比丁册、贡貂牲丁册、部落花名册等种类，都是原始的满文档案。户口册主要记载了一户内男女成员名字、年龄、性别及职业等项，鄂伦春户口册能够说明每户鄂伦春的家庭结构、婚姻状况、生育状况等。三代红白册记载一户内三代男丁的名字、职业等，可以勾画出一个家族的世系结构。比丁册则是对男丁的统计簿册。男丁 15 岁成丁，统计比丁是清政府掌握军队后备力量的

① 刘淑珍、苏静《浅析清代鄂伦春满文户籍档案》，《满语研究》2005 年第 2 期。

主要手段。鄂伦春满文户籍档案的珍贵之处还在于它不仅是官员的档案,还记录了很多平民的历史,为我们了解鄂伦春的普通人民提供了史料。

这些满文户籍档案集中地记载了清代鄂伦春族人口状况,不仅反映了清中晚期鄂伦春族人口数据及其变动状况,还反映了清代鄂伦春族军事和经济状况。这对于研究鄂伦春族的经济发展水平,乃至于清代边疆经济水平和东北经济发展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3. 满文档案对军事史的价值

清朝为实现大一统和强大的中央集权,一直战争不断,从入关前和明军的战争到入关后康熙时的撤藩战争,再到讨伐准噶尔及与俄国的长期对抗等,历时很长,产生大量的文书档案,其中不乏珍贵的军事部署档案。

例如,乾隆三十年(1765 年)的"乌什事件"就是新疆人民奋起反抗压迫最后被无情镇压的一件颇具影响的军事事件,但由于资料有限一直没有办法详细地弄清楚当年的一切,直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满文寄信档"公布,其中详细地记载了所有相关的情况,特别是乾隆皇帝关于此事颁发的几十道谕旨更是价值珍贵。

"清朝从康熙中叶就开始大力经营西北,到乾隆二十四年,终于重新统一了新疆,二十七年设伊犁将军,以统辖天山南北的防务,兼管全疆的行政事务,完成了安定西北边陲的大业,造就了'拓疆万里,中外一统'的空前盛况。"①清政府对南疆采取了由满族贵族和本地封建地主相结合的统治模式。任命伯克作为新疆地方的统治者,却不享受朝廷供给的俸禄,而是自取薪俸于维吾尔人民。可想为之他们自然拼命地压榨、欺凌维吾尔族的人民。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的压迫下,人民的反抗也是无法避免的了。

"乌什事件"是发生在乾隆三十年二月,是乾隆皇帝统一新疆不

① 赵玉梅《从清代满文档案看"乌什事件"始末》,《历史档案》2001 年第 4 期。

久所发生的乌什城维吾尔族人民反抗本民族的封建压迫和清朝统治的抗暴行动。一直以来我们对这个事件都不是很了解，幸好乾隆朝的满文寄信档中保留了这些方面的大量资料，其中包括整个过程中乾隆的谕旨，反映了这位皇帝在处理整件事时的态度和手腕，还有总理南疆事务大臣纳世通和伊犁将军明瑞的大量奏折，这些最原始的资料将“乌什事件”的发生、过程、处理结果全部展示于今人的眼前，很少有历史事件能如此清晰、完整地被今人所认识，满文档案的珍贵可见一斑。

通过满文寄信档帮助我们细致地复述出当年整件事的脉络。二月十四日三更时，在小伯克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240 名运送沙枣树的差役集合向驻守乌什城的清军发起进攻。由于事发突然，攻势又猛，办事大臣素诚和阿齐木伯克阿布都拉抵挡不住起事者们的进攻，结果素诚父子自杀身亡，阿布都拉被生擒。“乌什事件”由此开始到八月二十五日被清军血腥屠杀止，历经半年多时间，起事者们多次击退了清军的反扑，对清王朝的统治给予了沉重打击。这次“乌什事件”虽不是大型的军事战争，却也是清代边疆统治情况的集中体现，通过满文寄信档来细致地研究“乌什事件”对于研究清代边疆的军事部署、少数民族的统治、伊犁将军的职能设置以及其后所做的政策及军事部署调整等问题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4. 满文档案对民族史的价值

满族作为东北一支少数民族，直到后来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它的发展历史一直都被大家所重视，它的民族风俗和习惯也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而满族入关前的满文档案就是研究满族史的最佳资料，同时满族与蒙古族及其他东北的少数民族关系均十分密切，也是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优秀史料。

黑龙江省柯尔克孜族作为我国一支少数民族历史久远，在 1985 年修族志时，对该族的由来以及东迁的时间、地点、原因等问题，由于资料的匮乏，十多年间都无法作出准确的结论。终于在历经 20 年的满文档

案的开发和学者的不断努力下，柯尔克孜族东迁这一谜案已经真相大白。“根据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黑龙江省的柯尔克孜人，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四月二十八日从喀尔喀特斯河流域出发，自西向东途径蒙古大草原，于八月二日迁到齐齐哈尔，九月一日起正式编入八旗，享受旗人待遇一直到清末。现今黑龙江省的柯尔克孜人都是雍正年间来的吉尔斯人的后裔。”①“有关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地区满文档案的发现和利用，使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历史的研究更加系统完善，且可纠正以往研究中出现的差错，恢复历史的原貌，又能补充有关史籍记载之不足，使柯尔克孜族东迁黑龙江历史研究更加深入。”②

蒙古族与满族之间的关系可谓异常密切，早在满族未一统中原之前，蒙古族就已经是满族的忠实盟友，在满族入主北京后，对蒙古族亦是十分重视与恩宠，封爵、赏赐从没间断，两族更是通过联姻的方法紧紧联系在了一起，而蒙古族在抗击沙俄、平定噶尔丹叛乱、戍守边疆等方面都贡献很多。所以研究蒙古族的发展历史一直都是研究清史的重点之一。

有清一代，对蒙古族实施长期有效的管辖就是清朝少数民族政策的重点。“崇德元年(1636 年)，为办理与蒙古关系事务，设立了‘蒙古衙门’。崇德三年(1638 年)六月改为理藩院，专门管理蒙古和其他少数民族及部分邻国的事务。”③对于蒙古族的统治，清朝主要采取的盟旗制和设立总管或副都统，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权的控制力。

黑龙江衙门满文档案涉及蒙古族地区机构沿革、官员任免、边界变化、人口发展、风俗文化等内容。主要包括黑龙江将军与各蒙古札萨克的来往文件，呼伦贝尔副都统与黑龙江将军的来往文件，以及驻通肯呼

---

① 吴占柱《黑龙江柯尔克孜族由来》，《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 年第 6 期。
② 吴元丰《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满语研究》2004 年第 1 期。
③ 文淑珍《清代黑龙江满文档案与蒙古族研究》，《满语研究》2003 年第 1 期。

雨尔依克明安公承袭封赏专题档案。

这部分满文档案中有许多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的记载，如依克明安旗蒙古部落人口迁徙、发展历程等重要史实仅见于黑龙江满文档案。特别是他债、奇木奇格特、格尔萨喀三个部落，以往史料对这三个部落在黑龙江的历史活动鲜有记录。可在黑龙江满文档案就包括了这三个民族的比丁册，这些比丁簿册细致地反映了该族人口的数目、身份、民族及部落等情况。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黑龙江蒙古部落及其发展历史，有助于推进蒙古民族研究工作的深入。

5. 满文档案对文化史研究的价值

满文档案中不会专门地记载某种文化，但会从各个方面反映出社会的文化，其中包括了文化的产生、传播、影响等诸多方面。其中满族的风俗风化是很独特的部分。

满族的风俗习惯特别独有北方特色和民族风味，可由于入关后满族逐渐汉化，很多独有的民族习惯已经消失。如“抱见礼”和“请安礼”都是满族旧有的礼俗，“请安礼”在入关后仍一直用于君臣、官场和一般满族人之间，可“抱见礼” 在入关后却因不雅而被遗弃，这里的“不雅”其实就是指“抱见礼”违背了汉族的男女之别，所以在满族的逐渐汉化中就被遗弃了。然而，这些已被遗弃并遗忘的礼俗，体现着满族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习俗观念、表达情感的方式及男女之间最原始自然的关系。由于它已是满族早期的历史，在入关后的文献中也少有记录，然而在入关前的满文档案里却有不少记录能让人们一窥究竟。

“抱见礼，是满族入关前一种在礼敬程度及规格上都比较高的见面礼节。亲人久别重逢，或迎接尊贵的客人，多行此礼。”①如《盛京满文逃人档》记载，天聪元年七月初五日，后金汗皇太极和诸贝勒迎接举部投附后金的敖汉、奈曼两部的蒙古贝勒，皇太极以他们路途艰辛，不让他

① 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 年第 2 期。

们叩拜,想与他们互相抱见就好,蒙古诸贝勒坚持要叩拜,于是“趋前拜汗时,汗及诸贝勒大臣为之起,蒙古诸贝勒叩拜。汗及诸贝勒迎面抱见毕,汗复答拜,与来归蒙古为首三贝勒抱见。”①《清实录》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上御座,土谢图额驸奥巴率各部落贝勒遥拜复独近前叩首行抱见礼,上起坐答礼。”②可见此种礼节常施用于政治生活当中,抱见礼的行礼动作方式及所表达的礼意,可算是多种多样,诸多情况下,又是身份地位相当之人,同时互相抱见,相互表达亲近与敬意。“身份地位高的汗或大贝勒等允准抱他而见,这表示对被允准者的礼遇。其中又按被允准者的身份等级或允准者对对方的礼遇程度而分为允予抱大腿、抱小腿或抱膝等方式。”③而且,不计较性别之分,颇为直爽。

满文档案本身具有的原始性、客观性、群体性等特征,使它能够更直接、全面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也更加真实可靠。如今,满文档案已经越来越受重视了,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情况也在不断地进步,每年都有大量的满文档案整理出版和翻译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使历史能够被还原得更加清晰和完整,让被遗忘已久的满文档案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满文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使满文档案的利用需求会越来越巨大,这就需要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方式更加多元化,努力满足利用者的需求。除了大力发展编辑出版事业,还可以大力开展网络上的提供利用服务,可提供在线阅读和下载利用,而且不只提供汉译本的数字版,还可以提供原版的满文档案的数字版,满足利用者各种各样的利用需求。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4辑,中华书局1990年,第6页。
② 《清实录(二)》第11卷,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第158页。
③ 杜家骥《从入关前档案看满族抱见礼俗》,《历史档案》1998年第2期。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作用

一、参考作用

满文档案对我国进行生产建设和史学研究具有参考作用。

1. 对工程建设的参考作用

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过程中，广泛地利用到了满文档案。例如，在治理黄河、长江、海河、永定河、金沙江、洪泽湖的工程中，都利用过清代档案中的水文资料，这其中有不少档案是满文档案。如“黄河水利委员会在长达四年时间里，共查阅了奏折、题本及黄河河源图、河道图、工程图等大量珍贵图纸计 23 000 件 1 800 万字，这些档案经过选印、汇总、编辑和研究，已经在治理黄河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①。再如“为配合全国人大审议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需要，水利部有关专家来馆查阅了大量长江水患的档案及工程图纸，并依此举办了资料展览，特别查得清代历史上长江最大丰水量和最小枯水量资料，对长江三峡工程的审议和设计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②。

此外，在进行基本建设中，如兴修工厂、开矿、筑路、架桥，也参考了清代的路矿和地震、地质方面的材料。在这个方面满文档案也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2. 对农业发展的参考作用

在发展我国农业中，曾广泛查阅清代晴雨录和雨雪粮价单等档案材料，掌握了近二百多年气候变化规律和水旱灾害情况，为制定我国农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② 同上。

业发展规划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资料。清代的晴雨录和雨雪分寸的档案,是世界上最早的全国性观测气象的记录。在国外,法国于1778年才开始地区性有组织的气象观测,而中国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就开始了全国性观测,比法国要早93年。

3. 对史学研究的参考作用

档案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史料,能直接、系统地反映出历史的原貌。例如,清朝各地督抚报销兵马钱粮的题本及黄册,是清代经济状况的原始材料,是撰修清代经济专门史的史实基础。再如《起居注》是皇帝日常活动的原始记录。

在史学研究上,现在清史研究者经常查用的《清史稿》,它虽然经过十四年的编纂,使用了清国史馆历年来所收集的大量史料,但却没有使用清宫秘藏的满文档案,而这些满文档案大多记录着汉文档案所没有的史实,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有不少错误和挂漏之处。

二、凭证作用

满文档案主要是清代的官文书,因而具有可靠的凭证作用和行政、法律效力。

1. 满文档案对我国疆域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凭证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清朝时期是我国疆域最后巩固时期,在清代档案中,有大量文书和地图,载明我国的领土海域[①]。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分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十排图》、《十三排图》,清楚地绘出了18世纪清代的疆域范围[②]。还有大量的中外边界交涉档案,大多为满文本。这些中外边界档案和清宫舆图,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与清史修撰》,《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② 同上书,第6页。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后交涉划分中印、中缅、中俄、中越等边界中，更起了重要的凭证作用。

2. 满文档案是印证史实的可靠凭证

历史档案是印证史实的可靠凭证，是考证、校正其他史料的主证史料。用满文档案印证清代历史，用历史档案纠正现在历史著作中的错误，越来越被史学家所重视，这方面的成绩也越来越多。

例如，大连市图书馆收藏的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汉文档案，大部分是总管内务府题本，均为原件。20 世纪 80 年代，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嘉禄和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共同抢救和发掘了这批档案，整理出版了《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汉文档案选编》。这其中，对历史的史实又有了新的发现。最典型的是发现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官方档案，这些档案是记载了曹寅在总管内务府会计司任职期间一些重要活动的满文题本和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的满汉合璧题本，这些档案史料的发掘解决了一些学术争端，填补了红学和清史研究中的一些空白”①。

再如关于皇太极的嗣位问题，过去多以顺治《东华录》为据，认为皇太极的汗位是以权术从多尔衮手中夺过来的。根据《满文老档》的记载，太祖努尔哈赤生前并没有立嗣子。皇太极继承汗位，是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死后，由诸贝勒会议推选出来的。

三、文化作用

满文档案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对我国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

1. 满文档案是我国清代的人文景观恢复修缮的重要资料

清代的古迹文物遍及全国，成为现在中外游客观光游览的胜地。

① 关嘉禄《辽宁省满文档案的发掘与清史研究》，《清史论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6 年，第 649 页。

特别是北京、西安、南京、洛阳、开封、沈阳、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古迹的恢复修缮，在满文档案中有很多的记载，是重要的依据和参考材料。例如北京的故宫、天安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颐和园、圆明园、北海、中南海、景山、卧佛寺、天坛、地坛、香山、碧云寺、国子监、雍和宫等。沈阳故宫、北陵、东陵，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清东陵、西陵，以及清帝各处的行宫等。每届修缮和陈列展览，都会利用到大量的满文档案。

2. 满文档案是价值极其珍贵的文物典籍

在发展我国的博物展览事业中，满文档案不仅丰富了文物的宝库，而且也是重要博览展品之一。例如中国历史博物馆、民族展览馆及各省市博物馆，纪念曹雪芹、郑成功陈列馆，都曾利用并展出了不少重要相关的满文档案文件。

满文档案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一份宝贵的财富。这些古老档案的存在便是我们文明古国的一种象征。满文档案是当世少有的珍品。如满文舆图极为珍贵，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皇舆全图》，是我国古代最详细的全国地图。再如皇帝的家谱——玉碟，有的册长、厚各八十厘米，重达三百余斤，是我国最大的谱册。殿版的《实录》、《圣训》及各种典籍，御制诗文，臣工进单、金册、表文以及国书等，其抄写的工整，书写的楷正，装帧的精美，都是绝无仅有的。①

① 秦国经《略谈明清档案的价值和作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1986 年，第 150 页。

第五章 满文档案的内容及其分布

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虽然在清朝这些满文档案几经磨难，散佚和损毁不少，但是仍然有大量的满文档案保留了下来。“满文档案数量丰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约 200 万件，分别属于宫中、内阁、军机处、内务府和宗人府等机构。东北三省的满文档案存量也相当可观，辽宁省有满文档案约 20 万(册)件，吉林省有 15 000 件，黑龙江主要是《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起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达一万多卷。内蒙古满文档案达一万六千余件，西藏等也收藏一批数量不等的满文档案，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单位收藏的明清档案精品中，也包括有满文档案，闻名遐迩的《满文老档》原件便在其中。”①这只是不完全的统计，在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也存在大量的满文档案。除了这些文书档案外，还包括其他各种载体的满文档案，比如现存的满文石刻档案数量也不少，包括墓葬碑刻、封诰碑刻、军功碑刻、宫殿碑刻等。

---

① 史金波、黄润华《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中华书局 2008 年，第 285 页。

第一节 国内保存的满文档案的内容及其分布

我国是满族的发源地,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国内满文档案主要分布在北京、辽宁、黑龙江、吉林、西藏、内蒙古和台湾等地区,现在就对满文档案在国内的分布作以详细的介绍。

一、北京地区现存的满文档案

1644 年,清王朝入关以后定都北京,北京一直是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也是满文档案的主要形成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就藏有明清档案一千万件(册)。其中明代档案三千余件,只占万分之三。清朝的满文档案约占五分之一,约一百五十万件(册)左右。

1. 内阁满文档案①

内阁满文档案数量巨大,文种繁多,内容丰富,不便逐一细述,现将其主要档案分类介绍如下:

第一类 内阁进呈的文书

(1) 题本

题本是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的重要文书之一。题本又分部本和通本,在京各部院缮写呈进的题本,称为部本;各省将军、总督、巡抚等员缮写呈进的题本,称为通本。无论是部本,还是通本,均经内阁转呈皇帝批阅。题本到内阁后,先经阁臣阅览,缮拟批语,名为“票拟”。票笺呈皇帝核准后,批本处翰林中书和内阁学士先后照票笺上所拟文字,分别以满文、汉文,用红笔批于本面,故将题本又称“红本”。经过批

① 详参吴元丰《清代内阁满文档案述略》,《满语研究》1997 年第 1 期。

红的题本交收发红本处，六科给事中每日前来领取处理，到年终仍由六科给事中汇总交回收发红本处收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题本104万余件，其中绝大部分为残破题本，共计96万余件，完整题本只有8万余件。完整题本的起止时间为顺治元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其内容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分别介绍如下：

① 吏科题本

内容主要有各级文职官员的挑选任用，升迁调补，到任卸任，休致开缺，病故致祭，丁忧抚恤，请假销假，京察大计，奖赏议叙，纠参处分，封赠袭荫等方面。

② 户科题本

内容主要有征收地丁钱粮、官庄粮石、盐课关税，以及遭灾赈济、免征赋税；征收漕粮、漕项及题报漕船起运、回空、过境日期；各地常平仓、义仓、社仓的设置，仓积粮谷的收储、易换、借拨、平集买补和盘点；户部和地方各库金银钱文、绸缎布匹、颜料纸张等项的收存动用，以及年终盘点报销；开垦地亩，丈量土地，兴修水利，粮食收成，开采矿藏和商业贸易等方面。

③ 礼科题本

内容主要有元旦、冬至、万寿、千秋、大婚和登极等庆典；为节孝、五世同堂和高寿等人颁赏旌表；致祭陵寝、坛庙、祠堂、河神、山神及各项祭祀费用的开支报销；各级官学的教学活动，岁试、会试、殿试的举行和各种经典史书的编纂刊行，各级衙署和官员印信的制铸、颁发、更新及题报接印日期；蒙古王、公、贝子等升迁调补、年班入觐、病故致祭，以及审办蒙古各种案件；外国和各藩属国遣使进贡、庆贺并接待赏赐，派员护送；日食、月食、星异及制定历法，颁领时宪书等方面。

④ 兵科题本

内容主要有武职官员的挑选任用，升迁调补，到任卸任，休致开缺，病故致祭，丁忧抚恤，请假销假，奖赏议叙，纠参处分；武科乡试、会试、殿试的举行，驻防官兵的调遣换防、巡查会哨，行围操演和军

台、卡伦的设置裁撤;军营兵器、牲畜的清查补充,以及滋生银两、红白喜银的动支报销,驿站的设置管理及其各项费用的动支报销;各种战争的发生,委派官兵征战,战争物资的筹办起运及各项军需费用的动支报销等方面。

⑤ 刑科题本

内容主要有修定律例,秋审朝审,审理拐卖人口、打架斗殴、杀人害命、偷盗抢劫、贪污舞弊和土地、房屋、债务、婚姻纠纷等案件;徒流监禁罪犯的管理和缉捕逃人;查办赌博、娼妓、私铸钱币、私酿酒曲、偷挖矿产、私熬盐硝、偷伐林木等违禁事件等方面。

⑥ 工科题本

内容主要有建造修缮宫殿、陵寝、坛庙、祠堂、衙署、城垣、营房、塘房、仓、道路、桥梁等项工程及工料银两的估算报销;修造船只、车辆、兵器及工料银两的动支报销;工部所属工关税银的征收、报解和奏销等方面。

(2) 黄册

黄册是随题本进呈的附件之一,因以黄绫制作封面而得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满文黄册 3 500 余册,起于顺治二年,止于光绪二十九年。其内容主要有奏销官员俸银、兵丁饷银、地丁钱粮、喂马草豆价银、工程费用和祭祀费用等数目;奏销户部银库、缎库、颜料库和工部节慎库、制造库等库存银两、钱文和物品的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数目;注销在京各部院承办事宜的已完未完事件;京师和盛京官员的京察大计;秋审罪犯、绞斩罪犯、缓决罪犯的案由及口供;坛庙斋戒日期等方面。

第二类　编年体汇抄的档簿

(1) 秘书院档

秘书院档起于顺治元年四月,止于康熙二十七年十月,一般每月为一册,共计 78 册。主要抄录秘书院缮拟颁发的制、诏、诰、敕和祭文、祝文,以及本院进呈的启奏本章和王、贝勒等贺表等文书而成。其内容主

要有各级官员的封赠承袭，皇太后、皇后、妃、公主、格格等的册封；以及秘书院的各项日常活动等方面。

(2) 票签档

票签档起于顺治二年六月，止于顺治九年九月，一般一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 102 册。该档系抄录题奏本章事由及其所奉谕旨而成，其抄录的题奏本章的事由较六科史书和丝纶簿详细，往往整本抄录。

(3) 史书

史书起于顺治四年十月，止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装订成册，每月为一册，抄录题本事由及批红而成。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史书，绝大部分是满文，而且抄录的事由较为详尽。其余各朝的史书多为满汉合璧，抄录的事由也越往后期越简略。不过，史书作为编年体档簿，不仅便于查阅利用，而且在现存题本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可弥补其不足。

(4) 密本档

该档起于顺治十年一月，止于康熙十九年正月，每月或半月为一册，共计 153 册。密本档是抄录有关官员呈进的密本而成，其内容主要有清入关初期在云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的军事活动，包括镇压明末农民起义余部，征战明朝残余势力，镇压郑成功等抗清斗争，收复台湾和征讨沿海地区海盗等战争。此外，还有郑之龙投诚清朝，设官管理西南地区，有关官员的纠参处分和西洋传教士的活动等情况。

(5) 上谕档

该档起于雍正元年，止于嘉庆八年，每季为一册，共计 62 册。上谕档是抄录内阁承宣办理的上谕而成。在每道上谕档之后，均注明该上谕的处理结果。

(6) 清折档

又名别样档，该档起于乾隆元年，止于嘉庆九年。乾隆朝的清折档按季为册，每年分春、夏、秋、冬四册，嘉庆朝的则按月为册，每年分十二

册,现存清折档 102 册。该档是抄录军机处送内阁传抄与在京各部院办理的奏折及其所奉上谕而成。内容与军机处录副奏折和月折档重复。

(7) 行文档

该档起于康熙九年,止于乾隆六十年,共计 258 册,主要是靖边、安远、靖寇、扬威等大将军抄录其有关题、奏、咨、札、呈等文书后咨送内阁的档册。内容多与平定三藩之乱和西北用兵等重大军事事件有关。

第三类　纪事本末体汇抄的档簿

(1) 俄罗斯档

该档起于顺治十二年五月,止于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一般多年合为一册,共计 24 册。其内容集中反映了中俄两国互派使臣、相互贸易、查送逃犯、划定边界以及俄国侵占我国领土,清政府和有关边境地区人民抵御俄国入侵等情况。

(2) 八旗世袭谱档

该档起于康熙朝,止于光绪朝,共计 763 册。八旗世袭谱档所记内容主要是八旗世职官员的世系和家谱。

(3) 皇册

该册起于顺治朝,止于光绪朝,共计 119 册。皇册所记内容是宗室、觉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和外藩蒙古世职官员的花名、授封世职缘由及世袭等情况。

(4) 蒙古堂档

该档起于顺治十三年,止于乾隆五十一年,共计 110 册。蒙古堂档是内阁蒙古堂(即蒙古房)抄录有关文件而成的档册总称。抄录的文件主要有内外蒙古王公、达赖喇嘛等少数民族首领的奏书,以及颁给他们的诏、诰、敕等。其封面所书名称极不统一,如诏档、诰敕档、敕奏档、来文档和图档等。其内容主要反映这些少数民族首领的授封、进贡和赏赐等情况。

第四类　内阁日行公事档簿

(1) 丝纶簿

丝纶簿起于顺治十八年四月,止于嘉庆六年,共计 357 册。它是内阁满票签处抄录经批红发回题本的时间、作者、事由及批红而成的档簿。其所记的题本事由极为简单,远不如史书详细,但可以作为史书和题本的一种检索工具。

(2) 大事记

又名记事档或大记事,起于乾隆元年二月,止于宣统三年四月,共计 697 册。它是内阁满票签处的值班日记。内容有值班日期,值班者姓名,以及收发文书的时间、作者、事由、数量和处理结果。大事记可作为内阁上谕档、清折档的目录。

第五类　各修书馆档案

(1) 满文老档(老满文原档、旧满洲档)

该档是用无圈点满文记录清入关前各项活动的编年档册。起于明万历五年,止于清崇德元年。内容涉及清入关前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天文、地理等方面。满文老档的原档四十册,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是乾隆四十年、四十二年以无圈点和有圈点满文分别重抄的草本、正本各两套,每套 26 函,180 册。

(2) 国史院档

它是以满文记录清入关前后各项活动的编年体档册。起于天聪七年正月,止于顺治十八年六月。天聪、崇德朝的档案,或一年为一册,或数月为一册;顺治朝的档案,每月为一册,共计 122 册。内容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族、天文、地理等方面。

(3) 满文起居注册

简称起居注,是专门记载皇帝言行的册籍。起居注采用编年体例,逐日记载,每月分作两册。起居注分满、汉两种文本,内容完全一致。现存满文起居注始于康熙十年,止于宣统二年,共计 4 700 余册,分别保

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700余册，台湾故宫博物院4 000余册。其所记内容主要包括朝会、祭祀、典礼、日讲，以及谕旨、题、奏，官员引见、觐见、召见、请训、陛辞，官员的升迁、降革、休致、死亡，皇帝与大臣们的奏对问答等项。

(4) 满文木牌

它是清入关前以木牌为书写材料形成的一种文书档案。据杨宾著《柳边纪略》记载："边外文字多书于木，往来传递者为牌子，发削木片，若牌故也。存贮年久者，曰档案，曰档子，以积累多，贯皮条挂壁，若档故也。然今文字多书于纸者，亦呼为牌子，档子矣。"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保存至今的满文木牌极少，只有28支，均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木牌以杨、柳、松等木制成，形状各异，有的削成薄片，两面书写；有的削成长方体，四面书写。其长短宽窄也不一致，最长者33厘米，最短者16厘米，最宽者47厘米，最窄者1.8厘米。木牌的一端，一般均有一小孔，是供贯绳之用。木牌的记事十分简单，不记书写者的名称和书写时间，只简单地记事。如，"正红旗、镶红旗先锋合兵进略，镶红旗先锋先至文安城，克之。吴山牛录下尼雅罕先登城，乌巴海牛录下色勒第二登城"。再如，"石廷柱旗同八旗兵击败卢沟桥兵，获马八匹"。现存28支满文木牌，从书写的满文字体和所记之事分析考证，均系崇德元年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兵攻战明军时形成者，内容多反映战况和俘获物品。

(5) 盛京五部满文档案

清入关前，于天聪五年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于盛京。盛京六部档案，由于年代久远，保存下来的数量极少，其中工部档案一件也没有保存下来。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盛京吏、户、礼、兵、刑五部满文档案，共计109件，起于崇德元年正月，止于崇德八年九月。盛京五部满文档案用高丽纸书写，各件长短不齐，大小各异，小者一张高丽纸，长70.8厘米，宽27.5厘米；大者竟用三张高丽纸贴接，长3 547厘米，宽66厘米。在每件档案的末尾年月日处以及高丽纸接

缝处，分别加盖各该部朱印。在这些档案的上方或下方，均用满文注明“要写”、“已写”、“不要”、“已抄录”、“已写入档子”等字样，而且有的档案包皮纸上用满文写明“某年某部咨送档子”字样。由此可见现存的盛京五部满文档案是国史院为修史从各部调取者。其内容主要反映官员的升迁调补、奖赏议叙、纠参处分；出征官员俘获人口、物品及分赏数目，各地田禾长势灾情，支给天坛、太庙、堂子、福陵等处绸缎布匹数目；致祭坛庙、陵寝和授官、封爵等项活动的礼仪，蒙古王、公、台吉来朝庆贺、进献贡品和宴请赏赐；八旗官兵行围训练，巡查换防和马匹倒毙数目；偷盗抢劫、杀人害命和官员犯法等案件的审理等情况。

另外，还有满文实录、圣训、本纪、列传、大清律、会典、会典事例、各部则例、八旗通志、元史、明史、清文鉴、无圈点字书、盛京赋等书籍及其稿本，约计 15 000 件册。其中各书的稿本尤为珍贵，对研究清代官修书籍的取材标准和编撰过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 军机处满文档案①

军机处满文档案从形成上看，可分为折件和档簿两大类。满文折件约有 20 万件，主要是满文月折，另有少数上谕及咨文等；档簿约有 6 000 余册。这部分档案是满文档案中的精华，也是清代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记载的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教、宗教、民族事务、外交等各个方面。据《光绪会典》、《枢垣纪略》等书记载：“在京旗营及各省驻防西北两路补放应进单者，内外蒙古藩部及喇嘛并哈萨克、霍罕、廓尔喀朝贡应拟赏者，皆隶满洲章京；在京部院及各省文员、绿营武员补放应进单者，王公内外大臣应拟赏者，皆隶汉章京。”由此可见，军机处满文档案对于研究北方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各项问题，价值尤为重要。下面就军机处所形成的几类重要满文档案分别作一简介。

① 详参屈六生《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历史档案》1989 年第 1 期。

(1) 满文月折包与月折档

满文月折包即前面提到的满文录副奏折，约存 18 万件，文件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二年。乾隆二十五年前分军务项和寻常项，军务项文件约占百分之八十，主要是有关平定准噶尔、金川及大小和卓战事，包括调遣、防务、训练、马政、军需、驿站台站、赏罚抚恤等内容，充分反映了军机处成立初期的承办军机要务特点。寻常项则主要记载官员升迁调补、引见、外藩朝觐贡赏、外交(主要是中俄关系)、雨雪粮价、屯垦、地震等方面内容。乾隆二十二年清政府最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紧接着又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反叛，至乾隆二十五年西北地区大规模战事结束，之后满文月折内容则以日常国事、边疆庶务为主，不再分军务和寻常项，但有一些专题文件仍单独成包，如乾隆三十六年至三十七年的土尔扈特档，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的金川档等。月折档是抄录满文月折所形成的编年体档簿，共 2 400 余册，每月抄成一册，按朱批时间排列，抄写工整，每件文件后均注抄录者校对者连名，实质上是满文朱批奏折的又一副本，较月折包便于查找利用。

(2) 上谕档

系汇沙军机处撰拟、交由内阁明发的上谕所形成的档簿，共 600 余册，数月装订一册。起止时间为雍正九年至宣统二年。乾隆二十五年前分军务项上谕和寻常项上谕。

(3) 寄信档

系汇抄军机处寄给在外文武官员的上谕所形成的档簿，共 200 余册，每年装订一册。文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至光绪七年。

(4) 议复档

系汇抄军机大臣或各部院承旨议复事件之奏折而形成的档簿，共 730 册，每三个月订一册。起止时间为雍正八年至宣统二年。乾隆二十五年前分军务项和寻常项。据《枢垣记略》载："乾隆十二年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章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

转发。”①

(5) 日记档

系满军机章京每日值班收发文登记簿，所记内容主要是每日接到满文奏折之作者、事由、日期及所发上谕、寄信之事由。共400余册，数月装订一册。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三年至光绪三十四年。在满文月折基本完整并大部分仍保留清代原整理基础的情况下，该档可作为月折档、上谕档、寄信档、议复档的参考索引，便于查对文件，但有的年月档簿不全。该档与汉文随手登记档相似。

以上五种综合类档簿，共计约4 330余册，占满文档簿总数的70%，是满文档簿的主体。这类档簿较完整，系统性强，内容互相联系，彼此补充，如能对照使用，则事件来龙去脉，更为清楚。凡是月折档中奏折奉朱批另有旨或即有旨之件，可在同一时期上谕档或寄信档中查到有关谕旨。凡是月折档中奉朱批交部议复之件，均可在同一时期议复档中查到有关议复的意见。

除了这五种综合性档簿外，军机处还根据不同需要汇抄了多种满文专题档，总计有五六十种，每种专题档数量因事而异，多少不等，有的达数百册，有的仅有数册。在此仅举数量较多内容较重要的作一简介。

(1) 属于军务方面的专题档簿

① 北路军务档、准噶尔档。主要反映雍正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战事。② 金川档。反映乾隆三十四年至四十一年大小金川战事。③ 军务档。主要反映乾隆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清政府派兵征缅甸战事。

(2) 属于民族和宗教事务方面的专题档

① 土尔扈特档。主要反映乾隆三十六年、三十七年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由俄国伏尔加河下游一带返归祖国后清政府的安置情况，包括接济牛羊、粮食、皮袄数目，划分牧场、封赏大小首领、驳斥沙俄无理

① 梁章钜：《枢垣记略》卷之一，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页。

要求及握巴锡等人到承德朝觐人贡等内容。② 西藏档、巴勒布档。主要反映乾隆十五年至五十五年清政府废除藏区郡王封爵、设立噶厦制的原因及过程，西藏与廓尔喀、巴勒布的通商贸易事宜，及清政府镇压西藏、巴勒布的抗增捐税斗争。③ 班禅事件档。主要反映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六世班禅由西藏赴热河朝觐事件。④ 熬茶档。主要反映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允准准噶尔部派蒙古喇嘛入藏熬茶布施情况。⑤ 夷使档。主要反映雍正、乾隆时期准噶尔部派使臣与清政府谈判及贡赏情形。⑥ 哈萨克档。主要记载乾隆四十八年至嘉庆十九年哈萨克使臣进京朝觐、接受封赏情况及清朝皇帝敕谕并赏赐哈萨克王等事。

(3) 属于外交方面的专题档

① 俄罗斯档。主要记载乾隆至光绪年间的中俄交涉事宜，包括中俄两国来往行文、设立卡伦、巡查边界、索还逃人、边境贸易、派驻使臣和留学生、处理民事刑事案件及有关防务等内容。② 廓尔喀档。主要记载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八年廓尔喀(今尼泊尔)派兵进犯西藏，大掠扎什伦布寺及清政府调兵反击情形。

(4) 属于人事方面的专题档

① 新疆档、伊犁西宁档。主要内容是嘉庆二十四年至咸丰十一年有关补放新疆、西藏、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将军、办事大臣、都统、侍卫等官员姓名、旗籍、年龄、调任日期及携带家眷情况。② 应放副都统各项人员档。主要记载嘉庆十七年至光绪十五年各地应补放副都统人员姓名、旗籍、身体状况等。③ 引见档。主要记载嘉庆十四年至宣统元年各部衙门带领升迁调补官员向皇帝引见等事。④ 大员子弟交片档。交片是清代新创的文种。凡是军机处奉旨交在京各衙门办理的文件，即用交片行文。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军机处文件的保密工作，任用官员有严格的回避制度。嘉庆十年又明确规定“现任京官，文职三品以上，武职二品以上，外省文职道员以上，武职提镇以上各大员子弟皆令回避，不得保送挑补军机章京。”⑤ 该档即是军机处

将内外大员子弟适龄者，开列职名进呈备查。⑥ 军政卓异档。记载道光十二年至光绪二十三年各地武职考核成绩卓异者姓名、履历、补缺、引见等情形。

(5) 有关皇帝出巡方面的专题档簿

① 木兰档。主要记载了乾隆至咸丰各代皇帝出巡承德避暑山庄的各项活动。包括确定出巡路线、驻跸地点、车马物资准备、随扈名单，以及接见宴赏蒙藏回部王公伯克与外国使节、行围打猎、建庙祀佛、营造行宫、种树植花等内容。② 天津档、山东档、河南档、江南档。主要记载乾隆、嘉庆皇帝南巡途经天津、山东、河南时沿途迎送情形。包括车马船只物资供应，随扈名单、各地进贡礼品、宴赏各省官员富贾名流，及抵达江南后游览各地名胜寺观并赏赐等事。③ 盛京档。主要记载乾隆、嘉庆皇帝东巡至东陵(今遵化县马兰略)、盛京等地情形。内容包括车马物资准备、随扈名单、沿途贡赏、拜谒陵寝，及在盛京宴赏朝鲜国王和蒙古亲王郡王等事。④ 五台档。记载乾隆、嘉庆皇帝西巡至五台山举行宗教活动及赏赐等事。⑤ 留京办事档、总理事务档。主要记载乾隆元年至嘉庆八年皇帝出巡期间，留京军机处官员办理政务的情况。在日记档中，皇帝出巡途中驻跸，满文称为“音德蜜”，军机处官员留京办事满文称为“图塔蜜”。

3. 宫中满文档案①

“宫中档案”为后人清理原宫内各处保存的档案而得名。现存宫中满文档案的数量和文种较少。主要有以下几种：

(1) 朱批奏折

现存满文朱批奏折起于康熙二十八年，止于光绪末年。康熙、雍正朝的朱批奏折已按十八大类整理编目，以后各朝的朱批奏折分别按人名和朝年打包存放。军机处成立后的朱批奏折内容与军机处录副奏折、月折档相同，而军机处成立以前的朱批奏折的内容主要有：机构设

① 详参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

置,官员任免,营伍训练,兵丁调遣,治安保警,户籍人口,刑事案件,田赋关税,仓储库存,漕粮盐务,经费开支,货币金融,商业贸易,开垦屯田,兴修水利,牲畜牧场,交通运输,土木工程,矿藏开采,手工营造,陵寝管理,文化教育,医药卫生,天文地理,风俗礼仪,宗教信仰,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满族、苗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彝族、柯尔克孜族、高山族等少数民族事务,朱一贵起义,以及中俄、中日、中朝、中泰、中葡关系等。

(2) 廷寄

现存廷寄起于乾隆朝,止于嘉庆朝。内容与军机处同期的寄信档相同。

(3) 谕旨汇奏

现存满文谕旨汇奏起于雍正朝,止于宣统朝。

(4) 朱谕

现存满文朱谕多为雍正即位后下令缴存的康熙朱谕,多系康熙几次亲征准噶尔期间写给有关官员和皇子的谕旨。

(5) 杂录档

又叫和图礼档。是奏事处日行公事的登记簿。起于雍正朝,止于光绪朝。此档逐日记录奏事处所奉谕旨、具奏事件及办理事务。

(6) 值班档

又叫该班档,或紫禁城内该班档和依都档。它是宫廷内值班官员的登记簿。起于嘉庆朝,止于光绪朝。此档记录该班官员的数目、官职及姓名。

4. 内务府满文档案①

现存内务府档案文种之繁杂,数量之庞大,都接近或超过内阁和军机处。其主要档案可分为以下三类:

---

① 详参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

第一类　来往文书

(1) 事简

是内务府堂值班官员收办的各处来文。因每日收到的文书全装一纸简存放,故名事简。起于雍正朝,止于宣统朝。

(2) 呈堂稿

是内务府所属各机构呈堂核准的文稿。起于康熙朝,止于宣统朝。

第二类　编年体汇抄的档簿

(1) 奏销档

现存奏销档起于顺治十一年,止于宣统六年。内容反映了有关内务府官员的升迁调补、恩赏抚恤、发放俸饷、参劾治罪,宫女、太监、苏拉的拣选入宫、差委使唤、犯法治罪,宫廷的财物收支、庆典礼仪、稽查保卫、陈设物品、修建工程、圈养动物、培植花木,以及上三旗包衣、陵寝行宫和所属官庄的管理等情况。

(2) 红本档

起于康熙元年,止于咸丰八年。道光朝以前的档案基本上以满文书写,其后的档案多为满汉合璧。内容反映奏销库存物品、官庄年产粮石,牧场牲畜繁殖倒毙、宫廷内各项开支和官员任免等情况。

(3) 上传档

是汇抄内务府所奉谕旨和奉旨办理事件而成。起于顺治十六年,止于咸丰十一年。

(4) 堂谕档

由汇抄内务府堂颁发给下属机构的命令而成。起于乾隆五十九年,止于咸丰十一年。

(5) 行文档

是汇抄内务府咨行各部院衙门的文书而成。起于顺治十七年,止于咸丰七年。自乾隆元年始兼有汉文,而且越来越多。内容有领取公费银两物品、钦奉上谕事件移咨查核及官员升迁调补等情况。

(6) 来文档

是汇抄各处为知照、咨查、咨催等事咨行内务府的文书而成。起于顺治十五年，止于雍正十三年。

第三类　日行公事档案

这类档案包括杂录档、家丁册、钱粮册、注销档、倒马档、马名册、消费档、黄册等。杂录档是内务府堂办公记录，起于康熙十一年，止于咸丰十一年；家丁册是由上三旗按年造送内务府存查的各佐领下包衣、家奴姓名数目册，起于乾隆朝，止于宣统朝；钱粮册是上三旗为领取钱粮事造送内务府的清册，起于康熙朝，止于宣统朝；注销档是上驷院所属各牧场牲畜增减数目的登记册，起于乾隆朝，止于光绪朝；倒马档是上驷院所属牧场马匹倒毙数目清册，起于乾隆朝，止于光绪朝；马名册是上驷院圈养御马名号登记册，起于乾隆朝，止于宣统朝；消费档是广储司发放物品的登记簿，起于乾隆朝，止于光绪朝；黄册是广储司库存物品的登记册，起于乾隆朝，止于光绪朝。

5. 宗人府满文档案①

宗人府是掌管皇族事务的机关。顺治九年设立，1924 年溥仪被驱逐出宫后废止。现存宗人府满文档案的数量和文种都较少，主要有玉碟、皇册、说堂稿三种。说堂稿是内务府所属各司呈堂审批办理之文稿，起于乾隆朝，止于光绪朝。内容多为内务府的例行公事。此外，宗人府满文档案中还有一些俸饷册、宗室子女清册、行文档、来文档、奏事档等簿册。

6.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原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1985 年将其中嘉庆至光绪五朝的档案移交黑龙江省档案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档案仍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

① 详参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
② 同上书，第 126 页。

康雍乾三朝的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绝大部分以满文书写，按兵、刑、户、工四司并以年月日为序，抄录该将军的题本、奏折以及与内阁、六部、理藩院、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齐齐哈尔副都统等衙门的来往文书而成的簿册。内容主要反映了黑龙江地区的机构沿革、官员任免、赏罚抚恤、救灾赈济、人口户籍、民事案件、八旗编制、兵丁训练、驻防巡查、屯田耕作、牧放牲畜、矿产开发、林木采伐、渔猎采集、商业贸易、水陆交通、赋税钱粮、经费报销、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情况，同时还反映平定三藩、准噶尔、大小和卓、大小金川等重大历史事件和中俄关系的部分情况。

关于黑龙江衙门满文档案的详细介绍请参见本章第四节《黑龙江省现存满文档案》。

7.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①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档案，绝大多数是按时间抄录该副都统衙门与有关衙门和官员间的来往文书而成的簿册，起于康熙十四年，止于光绪二十六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档案基本上以满文书写，嘉庆至光绪五朝的档案满汉文兼有，而越往后汉文越多。内容集中反映了当时宁古塔地方的职官、民政、司法、军务、财政、农业、水利、畜牧、工程、营造、商业、交通、文化、卫生、天文、地理和人民起义等情况，并反映了一些中俄、中朝关系。

8. 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②

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曾于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被帝俄劫走，1956 年 9 月苏联政府交还我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这些档案苏联已进行简单整理，按朝代、机构和文种分类立卷装订成册，编有目录。现在馆藏珲春副都统衙门全宗档案，起于乾隆二年(1737 年)，迄于光绪二十六年，总计 572 册，约 47 500 余件。该全宗档

① 详参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历史档案》1988 年第 3 期。
② 详参郭春芳《清代珲春副都统衙门及其档案》，《历史档案》2004 年第 3 期。

案由满汉文书写，其比例为：满文约占40%，汉文约占60%。其详细情况如下：乾隆朝23册，全部满文档案；嘉庆朝18册，满文占86%，汉文占14%；道光朝32册，满文占94%，汉文占6%；咸丰朝24册，满文占68%，汉文占32%；同治朝37册，满文占65%，汉文占35%，光绪朝364册，满文占17%，汉文占83%，无朝年74册，满文占94%，汉文占6%。其内容丰富，包括有军事、旗务、军警、职官调补、农业、工业、商业、交通、祭祀以及中俄、中朝等边界事务的文件。

珲春协领及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整理基础较差，文书种类主要有来文档、行文档、堂稿（呈堂稿）、户口册、比丁册等，来文档和行文档比较零乱，呈堂稿有规定格式，每件都有满汉文摘由。此外，光绪七年珲春副都统衙门成立以前，纯满文档案比较多，满汉合璧档案也占有相当数量。

该全宗档案大致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的内容：

(1) 财政方面

① 地丁钱粮：有旗丁土地税收，佃户领取荒地或熟地地亩清册，还有使用银元流通等方面文件。② 各种捐输税：有珲春城厢及重要城镇铺户税收账本，征收山海关税、木植税、车捐房租等税务、厘捐清册、洋土药税、杂项税、土特产税，还有饬令栽种秧参人家到参税局领取执照等方面文件。③ 有珲春义仓粮米动支数目、各项经费开支报告、请求赈济的申请报告。④ 太平天国及甲午战争时期息借商款、劝富户捐输补充军饷等文件。⑤ 有关官员领取俸饷薪水、办公津贴，进京、出差、赴任各项费用，外省官员回籍探亲，以及每年官员俸饷开支报告、官员饷银花名册、报销公差银两清册等文件。⑥ 有关于赈灾事务，如劝商人捐助，还有本地及各城官员捐助灾情等文件。

(2) 军务、旗务、学务方面

① 军务：有记载珲春地方历年驻防官兵人数，新招募兵丁编营训练、演练、打围，驻防官兵旗佐花名册，还有军费开支报告，官兵体饷银清册以及严缉逃兵，出征阵亡官兵从优议恤，还有关于边防设施、检查

军械、预防入侵、剿匪等，驻防官兵互相调遣，督促地方举办团练等方面文件。② 旗务：有八旗户口名册、另户比丁数目册，抚恤、赈济旗民的清册，还有寡妇守节、节操德行、建立牌坊、承袭赡养、领取孀妇每年应得食俸银的报告，严缉旗下逃跑披甲、闲散、家奴等文件。③ 学务：有珲春添设中俄书院又称翻译俄文书院，设洋教习一员，汉教习一员，司事、书手各一员，厨夫、火夫各一员、应役二员，主要培养俄文人才，每年考试一次，成绩优秀者给予奖励。费用由省存抵饷税银内动支，年终核销。中俄书院的学生除本地外，还有三姓、宁古塔、伯都纳等城派员前来学习；还有应考文童姓名册，赴省考试翻译童生履历及旗佐花名册，挑选教职等文件。

(3) 司法方面

各项刑名案件：如命案、盗窃民宅店铺案、贪污追补案、土地田产债务纠纷案，禁剿邪教；还有派官员验尸，并附有珍贵的验尸图格，缉捕逃犯，通缉“匪首”，押解囚犯，监狱管理，大赦恤刑等方面文件。

(4) 涉外事务方面

主要是咸丰和光绪朝的文件。① 中俄关系：有俄民欲到中国开垦、居住，中国官方拒绝和进行谈判的情况；还有严禁华、俄居民偷换物资，私行贸易；拿解越境居民，交由对方审办等文件；有查勘边界情形及树立界碑，颁发护照，派员巡视边界防守情形，定期调换边防官兵等文件。② 中朝关系：有严禁中朝居民偷越边境的文件，如对当地朝鲜移民的管理，每年春秋两季调派官员严防缉查居民偷越边界、开垦和私自贸易等；其次有关中朝边界居民每年在会宁地方进行公开贸易，中国派官员赴会宁地方监督贸易的文件。

此外还有中英、中法、天津、北京条约抄件。

(5) 农、工、商、交通运输方面

① 农业：有光绪年间珲春山林围场驰禁，出现不少垦务方面的文件，如珲春招垦局查报各处旗丁、居民开垦、耕种垦地花名册；有征收、豁免赋税，因灾延期交纳粮谷等；还有佃户领取荒地及熟地地亩清册，

每年珲春地方降雨雪、物价、粮价、收成分数及报受灾赈济情况;严禁砍伐树木、私挖人参、偷猎等文件。

② 工商业:有关开矿、禁私卖硝磺等方面的文件。如珲春地方严禁旗丁和居民无照私自开矿、挖煤窑、私制枪炮、私自酿酒,使用假钱、偷运制钱出境、偷税,还有严禁偷运粮谷到边界买卖等文件。

③ 交通运输方面:有船运和驮运方面的文件。如各驿站卡伦查禁私运木料、无照私运人参及盘查来往商人;设立电报局,严令保护电杆等。

(6) 职官调补:有官员上任接任、署理、护理、任满请求陛见、赏赐谢恩、拣补官员、调京、引见、承袭世职、奉恩诏加级、开复处分、给予封典以及官员借俸银等方面的文件。

(7) 工程方面:有珲春地方工程及需用工程银两核销等方面的文件。如光绪七年改设珲春副都统衙门以后,扩建衙署及修建各类官房、各城义仓、城池围墙、增建衙内监狱、银库、军器库、听差房、左右司厨房等,并报做法长尺、需用工程银两数目。另有重要工程,如八旗军械官房、前锋营、果子楼、番役处四处,同样呈报做法长尺及所需工程银两,费用均由省拨专款。

(8) 其他方面

这部分档案较零散大多不成系统。① 有关日食、月食、天文、地理的记载报告;还有“收发登记簿”和印务处“传单号簿”等文书处理方面的文件。此外还有通信、传递文书。② 进贡:主要是每年从东北往京城进贡鹿尾、人参等药材,还有制造枪鞘、箭杆等木料雕翎羽毛等。③ 祭祀:有每年庙、坛、祠祭祀,由钦天监择选吉日,并二至三日不理刑名事件。④ 贺表:有三大节进贺表、皇帝皇后万寿庆典、请求进京祝贺、寿辰之日官员穿制服行礼,以及报销庆典银两等文件。

珲春副都统衙门成立于光绪七年,当时东北地区正处在由封闭转向逐步对外开放时期,通过这些档案可以了解清末在珲春地区实施各方面的改革制度,以及机构的变动、驻防边境、人口的增长、农工商的发

展等情况。同时反映清末重大事件对珲春地区的影响,如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以及洋务运动。这一部分档案对研究清代珲春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重要的价值。

9.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①

折件分为内政、军务、财政、法律、宗教、文化教育和外交七类。每类下再分若干项。现将各类档案分别介绍如下:

(1) 内政类

下分职官、承发公文和礼仪三项,共 39 卷,1 693 件,起于雍正十年正月,止于宣统三年四月。主要内容包括: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式和王公、台吉等员的增设裁汰,拣选补放,开缺休致,送部引见,差委效力,奖赏抚恤,封赠荫袭,军政考核,纠参处分,年班进京,请假准假;归化城副都统衙门与军机处、理藩院、兵部、山西巡抚、杀虎口主事、邻近各扎萨克旗、绥远将军、归化城同知等衙门之间来往文书,以及转递中央各部院,绥远将军衙门、定边左副将军衙门、山西巡抚衙门、乌拉特旗、喀尔喀旗、鄂尔多斯旗、四子王旗、茂明安旗、察哈尔旗之间来往文书;文武官员穿戴服饰,呈进贡品,随驾进围木兰,进京朝见,更改姓名,祭祀先农坛、文庙、关帝庙、文昌庙、鄂博,恩赏百岁老人,颁发旌表,以及冬至、元旦、万寿三大节禁杀牲畜、停审案件等。

(2) 军务类

下分训练、防务、军需、台站关口和赏罚抚恤五项,共 32 卷,1 048 件,起于雍正六年正月,止于民国元年五月。内容包括:操演检阅、巡街治保、设卡驻防、巡查牧场、驱逐流民、严防火灾、缉拿人犯、修建营房、牧放军需马驼、筹办粮饷装备、报销军费、发放路照、押解往来人犯、备驿接送因公往来之人及物品、维修官设摆渡船只、奖赏出征立功或操演成绩优异官兵以及惩办渎职官兵、抚恤出征阵亡官兵等内容。

---

① 详参吴元丰《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历史档案》1990 年第 1 期。

(3) 财政类

下分人丁户口、土地牧场、钱粮、赈济、矿务、贸易、雨雪粮价、赋税和工程九项，共 68 卷，3 517 件，起于雍正十三年三月，止于民国元年正月。内容包括：编审户口，查验旗籍，过继收养子女，订婚结亲，查禁拐卖人口，丈量地亩，开垦荒地，查禁私自典卖地亩和垦种草场，与邻近各扎萨克旗会同建立界址鄂博及定期查看维修，发放官员俸饷及官学师生、衙役饭银、工食银，查核报销银库粮库银两粮石，报销副都统衙门所属各机构公费银两，救济灾民。发放开窑卖煤执照，征收煤窑税银，征收买卖牲畜记档银两、房田租银店铺税银及官粮，发放开设店铺执照，查办不法商人，兑换银钱时价，修筑绥远城，维修官署房屋、地坛寺庙等。

(4) 法律类

下分民事案件、地产纠纷、盗马、盗牛、其他盗案、逃犯囚犯、修订法律七项，共 111 卷，2 675 件，起于雍正十年正月，止于宣统三年三月。内容包括：查办杀人、抢劫、诈骗、拐卖人口、纵火、赌博以及债务、婚姻、遗产继承等案件，审办地产、房产、地租、房租纠纷案件以及偷盗马、牛、羊、骆驼和旗人民人财物的案件，委派官兵缉拿盗窃人犯，惩罚缉盗不力官员，与理藩院、兵部、绥远将军及喀尔喀、察哈尔、鄂尔多斯、乌拉特、科尔沁、四子王、茂明安等旗互相行文通缉或约期会审逃犯，颁布执行理藩院、刑部、兵部、山西巡抚衙门关于修订律例的公文等。

(5) 宗教类

下分喇嘛事务、修缮寺庙、喇嘛犯罪和班禅事件四项，共 20 卷，462 件，起于雍正十二年八月，止于宣统三年九月。内容包括：发放寺院香火银两和喇嘛食粮，添置维修寺院陈设物品，查办擅自充当喇嘛之人，补放扎萨克大喇嘛，发放前往五台山行礼喇嘛路票，查办偷盗、逃亡、害命、娶妻等不法喇嘛，审办喇嘛与旗人民入债务、地租、房产、地产纠纷案件等。也反映了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德尼多次觐见乾隆帝途经归

化城地方情形，和杜尔伯特亲王车凌乌巴什福晋等拜见班禅以及乾隆四十六年接送班禅舍利等的一些情况。

(6) 文化教育类

共 4 卷，165 件，起于乾隆八年二月，止于宣统三年七月。文化教育类的档案反映了修缮文庙官学，支给官学师生饭银，报销祭祀文庙所用物品银两，挑选录用官学学生，给官员喇嘛等发放时宪书，使用新定清文词汇等内容。

(7) 外交类

外交类档案仅有 1 卷，共 7 件，主要反映了乾隆五十四年关闭中俄恰克图贸易后，严禁商人前往贸易；乾隆五十六年恢复中俄恰克图贸易后，晓谕商人准予俄罗斯贸易；光绪二十八年晓谕旗民缓收天主教民地租银两等内容。

(8) 档簿

主要有土默特左右两旗各甲喇各佐领下的“原拨户口地亩清册”，“原拨人口地亩草场清册”，“人丁户口数目地亩数目册”，“典地数目册”，“耕种典地人等名册”，“各村留公草场数目册”，“官兵地亩册”，“产新丁地亩草场册”，“户口姓名册”，“产人丁花名册”，“男丁妇女花名册”，“鳏寡孤独人等花名册”，“应得给草场地亩租银贫困人等花名册”；土默特境内延寿、弘庆、崇寿、无量、崇福、隆寿等寺的“香火地亩册”，“喇嘛人等地亩册”，“所典地亩多余地亩册”，以及“归化城旗康所存生息银两收支数目册”，“归化城旗仓旧管新收动支实存粮米数目册”，“山北塞尔腾等处卡伦官兵饷银数目册”，“山北克呼高勒卡伦驻防官兵恤银数目册”，“归化城旗所收哈尔津等十五沟国亩租银支出数目册”，“有户司行文号簿”，“银库号簿”，“兵户二司来文登记册”，“户司来行文档”等。

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不仅内容丰富，且较中央机关的档案更为详尽。它对清代土默特地区和归化城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交通、人口、宗教、文化、教育诸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

时它对清代蒙古八旗制度,清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政策、清代地方机构的文书档案及满语满文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辽宁省现存的满文档案

辽宁省是满族的肇兴之地,1616 年,努尔哈赤登基称"汗王",建立"大金"国,所定的都城便是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赫图阿拉。在萨尔浒战役胜利之后,于 1621 年迁都辽阳,之后又再次迁都盛京(今沈阳市)。在 1644 年清朝入关以后,盛京一直作为陪都,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盛京的经营和发展,因此辽宁地区也保存下了大量的满文档案。特别是由于清代录副制度的存在,大量的档案都有副本保存于盛京。

目前辽宁省的满文档案主要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和大连图书馆,现将馆藏情况介绍如下:

(一) 辽宁省档案馆现存满文档案①

1. 满文老档

满文老档有老满文和新满文本各一部,每部 26 函 180 册。

该馆所存满文老档系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大学士阿贵等奉旨照原本重抄而成,并于乾隆四十五年自北京送至盛京宫殿内崇谟阁收藏,由盛京内务府管理。有清内阁满本堂《堂谕档》记载为证:"奉阿(桂)、于(敏中)中堂谕,现在遵旨再办老档一分恭送盛京。"这两部满文老档同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乾隆四十年抄本相比较,形制略小,没有签注。200 多年来,虽数易其主,几经搬迁,但此满文老档保存完好。

新老满文本的满文老档各有 180 册,各自分别装于 26 函内。各函内之册数不尽相同,多者装 9 册,少者装 4 册。册面及函面均用黄绫装

①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第 19—46 页。

褾,十分精美。馆内现有按函别及其朝代、起止年月和册别及其朝代、起止年月编制的检索表,可按朝代、年月日进行检索。

满文老档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至崇德元年(1607—1636 年)间努尔哈赤、皇太极在位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诸方面的重大活动(内缺天聪七、八、九年之纪事),是研究清前史及当时满族社会的特别珍贵的材料。主要内容有:

(1) 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统一东北地区女真各部历史活动的记载

如明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七年(1607—1619 年)征服海西女真乌拉、叶赫、辉发等部。万历三十五年至崇祯九年(1636 年)征服和招服东海女真瓦尔喀、窝集、虎尔哈、萨哈连、索伦等部,均有记载。其中有些记载十分详细具体,包括派谁前往、率兵多少,征服或招服人众若干,奖赏前往官兵等情节。

(2) 反映努尔哈赤、皇太极同蒙古各部的关系

关于满蒙联姻,永结和好,召见蒙古各部王公,宴请颁赏,迎送喇嘛,厚加赏赐,尊崇喇嘛教,派大臣巡视蒙古各部,处理纠纷,划界游牧,规定礼仪法度,编组牛录;收留来投之蒙古人,设宴款待,以示招徕;与蒙古各部结盟,共同对抗明政府;约束蒙古各部,孤立打击察哈尔部等,记载颇详。

(3) 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同朝鲜的交往及交涉活动

主要有双方使节的往还,表示愿意各守疆土,永结和好,各自约束边民,禁止越界捕猎、挖参、隐匿;在朝鲜的会宁、义州互市,相互提供便利;以及努尔哈赤谴责朝鲜暗中助明及皇太极两次用兵朝鲜的经过等。

(4) 关于努尔哈赤、皇太极同明中央政府的交涉及战争之记载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后,同明政府的交涉及战争持续不断。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攻取抚顺城,降明将李永芳;四十七年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以少胜多,破明

四路大军之进攻;萨尔浒大战后,后金兵乘胜克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等地并挥师西进;天启七年(1627年)后,皇太极继承其父遗志,数次派兵越长城,直逼北京等重大军事行动,记载颇多且详细具体。

(5) 有关努尔哈赤、皇太极制定并推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及其政治、军事思想的记载

如设立国家机关及职官,规定其职责及执掌;清查户口,计丁授田,规定纳赋办法,申明主奴关系及满汉关系,缓和阶级和民族矛盾;规定行军作战禁令及屯田办法、奖惩制度、用人标准,整顿军政;准开当铺、商铺,以兴买卖;保护炼铁、制陶、纺织、造纸、熬盐各业,以利于用;皇太极改革老满文,纂修太祖实录,等等。

2. 清皇室档案

(1) 清实录圣训等稿本

清太祖实录稿本9册,其中崇德年间初修稿3本,康熙年间二修稿本6册。太祖圣训稿本5册。

清世祖实录稿本14册,其中满文稿本4册,汉文稿本10册。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南巡起居注稿本1册。康熙本纪稿本4册。

乾隆实录、圣训奏稿汇抄1册。

顺治年间兵部等题本汇抄1册。

太宗年间大臣事实编年录2册。

额亦都传稿1册,多尔衮传稿1册。

太祖福陵碑文1件。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内阁奉上谕1册。

军机处录副奏折1件。

上述档案中的实录、圣训、本纪、起居注、列传之稿本,仅存零星数册,极不完整,但作为稿本,字里行间可见其修改之处,对于考证实录、圣训、本纪、起居注、列传的形成过程,进行比较研究,深幽求隐,是有重要价值的。

(2) 清圣训

清制,皇帝死后,例由皇帝开馆编纂先帝圣训。

圣训每修两部,一部存京城,一部送盛京保存,盖盛京系留都,以示尊崇也。京城一部圣训有满、汉、蒙三种文本,盛京一部只有满、汉两种文本。该馆所存圣训即盛京宫殿内藏本。

(3) 清实录

清制,皇帝死后,例由嗣皇帝开馆编纂先帝实录。

实录每修两部,一部存京城,一部送盛京保存。京城一部圣训有满、汉、蒙三种文本,盛京一部只有满、汉两种文本。该馆所存圣训即盛京宫殿内藏本。

实录内容最为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民族、宗教各个方面,是研究清史的最基本的材料。

(4) 清玉牒

该馆保存的清代玉牒有满、汉两种文本,共计 1 070 册。玉牒各册形制极不一致,或大或小,大者竟需数人共抬。

玉牒以太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的本支为宗室,入于黄册;其叔伯兄弟旁支为觉罗,入于红册。玉牒以帝系、列祖子孙、列祖女孙三个系统记载皇族繁衍情况。

玉牒是研究皇族人物及皇族人口发展的唯一的资料,价值极高。

3. 清代设在盛京管理皇室事务机构档案

(1) 顺治年间档

顺治年间档是依据北京总管内务府给盛京镶黄、正黄二旗包衣佐领的行文原件择录而成,共 71 件。第一件前部已残缺,文件时间为顺治四年至八年(1647—1651 年)。

1644 年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在北京设立总管内务府办理皇室及宫廷事务,而在留都盛京派驻镶黄、正黄二旗包衣佐领承办盛京地区的皇室事务。盛京地区皇室事务的办理,自然要听候北京总管内务府的指示,于是有北京总管内务府的来文和盛京镶黄、正黄二旗包衣佐领的

择录留存稿簿，这就是顺治年间档。

该档的主要内容：

① 包衣人丁的调动。各种匠人，如鞍匠、铁匠、雕匠、木匠、褥匠等，被调往北京总管内务府当差，他们的家下人及某些有特技的人，如会织布的、善捕鹰的等，也一同被调往北京总管内务府。有些北京的旗下人则被调到盛京当差，而其子又被调回北京该馆佐领定补其父遗缺。还有北京采松子、采蜂蜜、挖参之人被派到盛京等地当差，有时一次就达 282 人。

② 包衣人丁的替补。包衣人丁死亡、逃跑后必须有人替补，以保证皇室差务的正常进行。如打牲乌拉各朱轩人丁有死亡和逃跑者，由熊岳托勒堡台上人往补。又如满洲人茂海夫妻住在义州胡十八家，拟调往乌拉，他们有汉人丁 2 名，妇 2 名，如有死亡和逃跑者，即由胡十八补充之。

③ 增编的皇庄。由于盛京人丁的滋生和皇室差务的增加，增编新的皇庄势在必行。如噶布拉佐领下的七个棉庄、巴图鲁工的三个棉庄、富勒赫的一个棉庄，共是一个棉庄多出 21 丁，加上由安塔木、张六等人所属旧庄拨出之 54 丁，共 75 丁，拨给巴图鲁王棉庄 5 丁，余下之 70 丁编五个棉庄。又如墨尔根王的蜜丁 115 人，以其中 10 人编成一个打牲朱轩，以另外 10 人编成两个捕獭朱轩，余下的 95 人采蜜。

④ 指定人丁的婚配。人丁的婚配同皇庄的生产直接相关，因此总管内务府对人丁的婚配采取种种限制措施，甚至指定婚配。如总管内务府命盛京包衣佐领安塔木和布塔西："着将尔等二佐领下之女及棉、靛庄之女，同其父母相商，嫁给尔等二佐领下及棉、靛庄之人。如盛京无相称者，则嫁给北京汉军旗八佐领下之人，若嫁给旗外之人，则罪之。"又如："若将杭苏家下达尔巴哈之妻赏给讷莫里为妻。"

⑤ 人丁应差服役。包衣人丁的差役，名目繁多，据该档记载，有耕种粮菜、饲养牲畜、捕打野牲、栽培果树、腌渍食品、纺线织布、烧制木炭、制作器具和军械、承修大小工程、守护陵寝、出兵打仗等项差役，均有盛京包衣人丁承担。

⑥ 包衣人丁的奖惩。包衣人丁如能超额完成任务，一般都会得到

奖赏,所得赏赐多为实物,如布匹、农具等,亦有得到赏银的。如捕狐人丁 128 人,每人应交狐皮 3 张,除共交额定 384 张外,又多交 381 张,赏给小毛青布 381 匹。未完成定额者则受到惩罚,如乌西太和纳尔泰朱轩有 10 丁,捕得獭皮 48 张;每丁按 5 张交纳,则欠交 2 张,故每丁鞭二。

⑦ 其他较为重要的内容。如守护白喇嘛坟的 10 名和尚中,为首者乞请归养老母,得到礼部允准;赏给德勒登喇嘛茶叶 100 斤;又将谭泰家下果菜园头目及其家口和人丁赏给德勒登喇嘛等。

顺治年间档可补本馆所藏盛京内务府档案之不足,是研究盛京地区皇室事务的珍贵资料。

(2) 黑图档

黑图档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六朝的档案,共计 1 149册,其中京来档 151 册,京行档 168 册、部来档 429 册、部行档 359 册、存查档 42 册。该档缺同治、光绪、宣统三朝的,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三朝盛京内务府未继续令抄录原件的缘故。

黑图档是盛京总管内务府(乾隆十七年即 1752 年前是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同北京总管内务府、北京六部等衙门及盛京将军衙门、奉天府、盛京五部等衙门来往公文的抄存稿簿。“黑图”是满文的汉文音译,意思是“横”,引申为平行,故黑图档即平行机关之间的来往公文。1644 年顺治皇帝定都北京后,盛京成为陪都,最初设镶黄、正黄旗包衣佐领,不久增设正白一旗包衣佐领。乾隆十七年正式设立盛京总管内务府,掌管理盛京宫殿并承办盛京地区皇室事务。于是,盛京总管内务府同北京总管内务府、北京六部及盛京将军衙门、奉天府、盛京五部等衙门的公文来往不断。盛京总管内务府按朝年将原件抄录成册保存起来,这就是“黑图档”,亦可称之为盛京总管内务府册档。黑图档原存盛京总管内务府,由档案房管理。辛亥革命后直到 1924 年溥仪被逐出北京皇宫,黑图档保存在沈阳故宫西七间楼内,伪满时期由奉天图书馆接管,移至该馆保存。

黑图档中康熙朝的全是满文,雍正、乾隆、嘉庆朝的大部分是满文,

道光、咸丰朝的大部分是汉文。

黑图档首先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各朝区分，然后在每朝里再按京来、京行、部来、部行、存查分出五类，每类下按行文时间先后排列。

该档的主要内容有：

① 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和盛京总管内务府的设置、沿革情形，以及所属官兵的调补、铨选、奖惩、请假、请领俸饷和养廉银、捐输等有关制度和办法。其中关于“管理盛京内务府关防”及“盛京总管内务府印”的制发的记载，是十分珍贵的史料。

② 盛京总管内务府所辖庄园(粮庄、棉庄、盐庄、靛庄、果园等)头目和人丁的更补、调查统计、安置、奖惩、婚丧嫁娶、赈济抚恤，以及庄园的生产、管理等，特别是有关粮庄的材料十分系统、完整，是研究盛京地区粮庄的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③ 各类人丁的差务活动，进贡物品的种类及数量，欠交牲物或果品折交银两，以及相关的规定、办法等。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档案文件很多，记载详细而具体。

④ 皇帝东巡、谒陵、祭祖、围猎及盛京总管内务府应办之各项差务。其中有关康熙皇帝东巡时驻跸之所的选择、修缮及乾隆皇帝东巡时增建宫阙的记载，对了解沈阳故宫的建筑颇有参考价值。

⑤ 盛京作为陪都，清代各朝皇帝均十分尊崇，特别是乾隆皇帝，凡圣容、圣训、玉牒、实录、文书档案、殿版书籍、字画墨刻、珠宝玉器等，均送一部分至盛京宫殿内保存。盛京总管内务府定期清点并上报保管情况。黑图档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为研究沈阳故宫的藏品提供了依据。著名的满文老档何时送到盛京及嘉、道两朝清点情况，黑图档中均有记载。

⑥ 盛京宫殿的日常维修和较大的改建、续建，黑图档中记载颇详，为研究沈阳故宫的建筑提供了参考。1988 年沈阳故宫博物院恢复后苑的设计和施工，就是根据黑图档中有关记载进行的。

⑦ 盛京总管内务府管理三个差马群，以备承办各项差务之用。有关差马群的管理的各项办法，黑图档中有记载。

⑧ 各种诉讼案件的审理，人犯的解送与安置，缉捕在逃人犯，籍没罪犯在盛京之家产等，黑图档中亦有记载。雍正皇帝即位后，籍没阿其纳、赛斯黑二弟在盛京家产的文件，是研究雍正在皇权斗争中所作所为的重要资料。

⑨ 还有拣选秀女、拨出和收回王庄、办理生息银两、承接普发上谕等内容。

(3) 盛京总管内务府档

盛京总管内务府档包括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及辛亥革命后直到 1925 年中华民国间盛京总管内务府形成的档案，其中既有来文又有行文，共计 45 489 卷。盛京总管内务府档与黑图档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文稿，后者是抄存档册，故前者又被称做盛京总管内务府稿档，后者又被称作盛京总管内务府册档。

盛京总管内务府档案大部分用汉文书写，只约有 15 000 卷是用满文书写。

盛京总管内务府内部机构有档案房、广储房、都虞司、掌仪司、会计司、营造司、文溯阁、三旗织造库、三旗牛录处、内管领处等，分司各项事务。

盛京总管内务府承办盛京地区皇室事务，同北京总管内务府及盛京城各部院衙门和盛京将军衙门、奉天府、盛京五部等衙署发生联系，文书往来不断，内容十分丰富，主要有：

① 关于盛京总管内务府官员的任免、调补、休致、考核、引见、奖惩，报送官员经制册，领受敕命、诰命，关领官员之俸银、养廉银等。反映这方面内容的案卷数量不少，其中记载重要官员升迁调补的档案较有参考价值。

② 关于上三旗兵丁的统计、调拨、奖惩、抚恤，造报兵丁清册及军械清册，关领兵丁银饷，处理兵丁丢失或倒毙马匹等。这是研究内务府兵

丁生活和活动的重要史料。

③ 关于盛京总管内务府所属皇庄庄头的更补,庄丁的管理;粮庄、盐庄、靛庄、棉庄的经营及生产统计,征解赋税,自然灾害及办理赈灾,等等。这方面的材料对研究清代盛京地区皇庄的生产及其在东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④ 关于盛京总管内务府所有土地的占有、典押、买卖、垦种及土地纠纷的处理等。以粮庄为例,粮庄土地本属皇室所有,由庄头具体经营,庄丁从事粮食生产,所生产的粮食除按定额上交皇室外,其余由盛京总管内务府统一支配。这是典型的农奴制的领主经济。但是,在封建制地主经济的冲击下,农奴制领主经济逐渐瓦解,具体体现便是粮庄土地典押、买卖的出现及土地纠纷案件的增多。

⑤ 关于清帝东巡、谒陵、祭祖及盛京总管内务府为此需做的各项准备,包括驻跸场所的选择、部分宫殿的修缮、帝后及其随行人员食宿的安排、崇政殿典礼及清宁宫祭祀的布置、沿途车马仪仗的筹办等。清帝的东巡带有浓厚的政治、军事色彩,记述这方面活动的档案史料是很值得分析和研究的。

⑥ 关于往京城解送皇室和宫廷生活需用的各种贡品,诸如野牲、皮张、干鲜果品、鱼尾、箭杆、槽盆、家畜、家禽、蜂蜜、蜜饯果品等,以及为此盛京总管内务府择选承办人员、咨告北京总管内务府启程日期、关领盘费银两等。这些材料对研究清代宫廷用度、满族生活习俗,揭示封建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都是很有价值的。

⑦ 关于自京城移送圣容、圣训、玉牒、实录、文书档案、殿版书籍、墨刻字画、珠宝玉器等至盛京宫殿尊藏,以及盛京总管内务府定期清点、整理宫内藏品的记录、清册和行文。其中尤以乾隆朝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为最多。这是研究清代盛京宫殿内的藏品及其来龙去脉的主要依据。

⑧ 关于皇庄壮丁及其子女和婚配嫁娶和选秀女。皇庄的壮丁被束缚在皇庄内从事生产劳动,没有人身自由,无妻或丧妻者一般均由盛京

总管内务府将孀妇或罪犯之妻配给成婚。壮丁之子女亦不准随意嫁娶,一般只能在身份相同之人中择偶成婚,否则已婚男女也将被强行分开。此外,盛京总管内务府还受命在壮丁之女中选秀女,以送宫中充宫女。这些记载是研究清代皇庄制度某一侧面的重要史料。

⑨ 关于上谕事件。盛京总管内务府档案中有一些由内阁或军机处发出的上谕,其内容多涉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并非只与盛京总管内务府有关。如"钦定新清语",是以上谕形式发布全国遵照实行的,当然同盛京总管内务府有关。盛京总管内务府档案中的"钦定新清语"有 100 余条,是研究乾隆皇帝规范满语文的珍贵史料。

4. 清代东北地区旗务机构档案

(1)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共 20 218 件,形成时间为乾隆元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736—1908 年)。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系抄存档册,按朝代、机构分抄成册。

该全宗档案内,道光朝以前的大部分文件是用满文抄写,咸丰朝以后的大部分文件用汉文抄写。

该全宗档案的主要内容:

① 三姓副都统衙门辖区内赫哲费雅喀、库页费雅喀、恰喀喇等边疆民族向清政府进贡貂皮、聘娶"萨尔罕锥"(旗人之女)及清政府赏给"乌林"之规定、办法、清册等,反映了 1860 年以前清政府对该地的有效管辖。在历年贡貂和赏乌林清册中,开列有边疆民族姓长、乡长、子弟、白人之住地、姓名、进贡和受赏物品种类、数量等情况,是研究东北边疆民族分布及其社会发展状况和清政府如何对其进行管理的宝贵资料。

② 沙俄对三姓副都统衙门辖区的入侵及该地区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许多档案文件记述了沙俄船只在黑龙江上运送军队和装备,沙俄武装人员乘船闯入松花江挑衅,庚子之乱和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该地区烧杀抢掠,以及俄国在 1860 年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

中国领土等情形,同时也记录了恰喀喇人不堪忍受沙俄的统治纷纷返回祖国,赫哲费雅喀人不顾沙俄的阻挠继续向清政府进贡貂皮等情形。

③ 三姓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三姓地区有一种农业生产组织叫官庄,有关官庄的设立、内部组织、生产活动、自然灾害等情况,案卷中有详细记载。人参是该地区的重要产品,有关参务的管理、参票的发放、参价的制定、违例挖参的查禁等情况,案卷中亦有记载。此外,还有贸易貂皮、开采金矿、开设烧锅等记载。

④ 流民的进入及三姓地区荒地的开垦。清初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禁止关内汉人进入和垦荒。但是,关内流民仍不断进入东北地区并开垦荒地,清政府不得不放宽限制。有关流民的进入,荒地的开垦以及清政府开始的查禁措施和之后的逐步开放,档案均有记载,这是研究清代东北包括三姓地区开发史的主要史料。

⑤ 赏奴的发遣和安置。清政府为稳定驻防三姓地区的八旗官兵,亦为惩罚关内各地的罪犯,每年都将一部分流犯发遣到三姓,交由副都统衙门分给八旗官兵充当家奴。有关赏奴的发遣、交接、安置、管理、赎身、反抗等情况,案卷内的记载颇详,是研究清代社会奴隶制残余的重要史料。

⑥ 台站、卡伦的设置及其作用。三姓是清代东北边疆地区的交通枢纽、军事重镇,在对广大地区实行管理时台站、卡伦是必不可少的。有关台站、卡伦的设置、调整及其所起的作用,清代前期和后期有所变化。案卷中记载了这些情况。

⑦ 三姓副都统衙门及驻防八旗官兵的设置、沿革。案卷中有关于副都统衙门的设立、沿革及驻防八旗官兵的增减、操练、考核、奖惩等,特别是追述了康熙、雍正年间的一些情况,可以补充、订正方志中的某些记载。此外,还有关于清政府调动三姓驻防八旗官兵参加评定准噶尔叛乱和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军的记载。

(2) 双城堡总管衙门

双城堡总管衙门档案共 1 555 册,形成时间是道光三十年至民国

13 年(1850—1924 年)。其中嘉庆二十年至咸丰末年的案卷,大部分于同治五年(1866 年)一月“马傻子”起义队伍攻城时被毁。民国年间的案卷,因时代的变化,形成的不多。该全宗的案卷主要是同治和光绪两朝的。

双城堡衙门档案中绝大部分文件都是汉文的,只有少量的满文文件。在原来立档时就是按照朝代、文种、问题将文件分装成册的,这同其他全宗的档案有所不同。该全宗档案正在编制文件级分类目录。

(二) 大连图书馆现存的满文档案①

大连图书馆现藏满文档案 2 000 余件,其中满文 800 余件,满汉合璧文件 1 100 余件。主要是清代顺治至光绪各朝题本,其中大部分为总管内务府题本,还有一些各库月折以及少量的部员奏本、题本底稿、官员呈文、银物清册、商人族谱、殿试试卷等。经满文专家认定为清代北京皇宫内阁大库散佚在外的档案。这部分档案是 1943 年从“满铁”奉天图书馆接收的,因其记录宫廷秘事,又皆为原件,所以价值很高。尤其康熙朝题本皆为满文,有 700 件左右,尤为珍贵。

清代总管内务府题本,整理后大致分为几类:

关于奖惩总管内务府官吏、太监、壮丁、包衣等的题本;

关于粮庄经营管理的题本;

关于打牲活动及管理的题本;

关于总管内务府所属各牧群经营管理的题本;

关于宫中需用银两及各项物品及数量的题本;

关于外番进贡马匹并赏赐的题本;

关于销算各处果园贡品折银等项的题本。

上述档案作为清代皇室和宫廷生活的真实记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清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情况,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康熙朝满文档案中有曹雪芹祖父曹寅在总管内务府任职期

① 详参阎立新《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概述》,《满语研究》2004 年第 1 期。

间的活动记录，还有曹寅署名题奏的满文题本。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件是满汉合璧档案中有关曹頫骚扰驿站获罪的题本，曾引起红学界的轰动。这些档案对研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世有重要价值。其他一些档案为清代皇庄经济、皇家园林和宫殿建筑及管理、地震、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鉴于这部分档案的珍贵性，辽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将其列为全国少数民族古籍出版"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皇庄》(上、下)，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

除了文书档案和图书外，大连图书馆还藏有许多满文碑刻拓片，数量很大，原碑大多已损毁，所以价值极高。据统计，各种碑刻及匾额门额拓片共100余张，可惜的是有的已经破损，而且有一些损坏的程度十分严重，字迹已模糊不清。这些满文拓片以存在于东北地区主要是辽宁地区的碑刻及门额匾额的拓片为主，兼有一些其他拓片，另外还有一些女真文拓片。

这些碑文拓片大致可分作人物碑记和事物碑记。人物类主要有记录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几位先祖的碑文《肇祖原皇帝碑文》、《兴祖真皇帝碑文》、《显祖宣皇帝碑文》、《景祖翼皇帝碑文》，立于朝鲜三田渡的《大清皇帝功德碑》，记录乾隆皇帝文治武功的《十全记拓本》以及《皇上万寿无疆碑》。《谥文成达海巴克什碑文》拓自《光禄大夫内阁大学士谥文成讳达海之碑》，记述了达海在太祖太宗朝的功绩，特别提到达海改革老满文之事，还有诰封达海之母《达海之母诰封碑》。记录清朝三朝元老索尼及其家族事迹的碑文有《孙男内大臣正一品伯索尼恭立碑记》、《皇清辅政大臣一等公男索尼恭立碑记》、《皇清辅政大臣二等公孙索尼恭立碑记》、《皇清辅政大臣一等公曾孙索尼恭立碑记》、《索尼曾祖父母诰命碑文》、《索尼父母诰命碑文》。此外，有《和硕显谨亲王碑文》、《直义公费英东碑文》、《镇国将军谥恪恭宗室穆尔擦碑文》、《三等镇国将军宗室聂克塞碑文》、《二等伯内大臣加一级谥忠直宜尔邓碑文》、《范楠墓

碑》、《诰封额比伦祖先碑》、《兔尔格祖父兄碑》及《大金喇嘛法师宝记》(附碑阴)等。

事物类有记录庙宇(祠堂)、陵寝(坟茔)、寺院、楼阁等各种建筑和一些重大事件的碑文。建筑类：记录各类庙宇祠堂的有《重修历代帝王庙碑文》、《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热河文庙碑》、《吉尔马泰关帝庙碑》、《浑河神庙碑》、《小西关圣王祠堂碑》(附碑额)、《喜塔腊氏祠宇碑文》;有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陵寝的碑文《大清福陵碑》和《大清昭陵碑》以及《钮钴禄氏先茔碑》和辽阳的《大喇嘛坟塔碑文》;有记录盛京四塔和皇寺的碑文《敕建护国永光寺碑记》、《敕建护国延寿寺碑记》、《敕建护国广慈寺碑记》、《敕建护国法轮寺碑记》、《莲花净土实胜寺碑记》和《奉天积善寺碑》(附碑阴);此外还有《文渊阁碑》、《千佛阁碑记》和《奉天鼓钟楼碑》。记录重大事件的碑文有《萨尔浒战事碑》、《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平定准噶尔铭伊犁碑》。除了这些金石碑刻拓片以外,大连图书馆还有一些匾额门额的拓片。嘉庆皇帝亲撰的《八旗箴》和《训谕八旗简明语》为经拆装的匾额拓片,门额的拓片有《抚顺城门额》、《牛庄城门额》、《大西门额》、《归服堡城门额》、《文忠公德颂碑楼额》等。

三、吉林省档案馆现存的满文档案

"在吉林省档案馆现存满文文书档案月三万余件(册)。"①"在吉林市档案馆也存有部分满文题奏文书,既有满汉合璧也有纯满文的,上限为雍正三年(1725 年),颇为珍贵。另外,在吉林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局、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机构都保存有数量不等的类似的满文档案。"②

① 刘厚生《吉林省满文古籍述略》,《满语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②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71 页。

“吉林省图书馆收藏的清代诰敕文书数量较多,内容丰富,尤以清崇德年间的两件,系纯满文之作,弥足珍贵。一件为崇德五年(1640 年)传谕《和硕亲王人等之诰命》,另一件是崇德六年《墨尔根郡王之诰命》,全篇满文工笔楷书,质地为绣有金龙的彩缎,至今艳丽如初,更早一点的还有一帧崇德四年五月十一日呈给朝鲜国王的信函,写在雪白的高丽纸上。除此之外,清入关后的诰敕文书,康熙朝有 11 件,均为满汉合璧,部分为满汉藏合璧。现将其摘由次第书列如下:

《谕山东按察司佥事周亮工敕》(康熙二年八月初五日);

《谕河南巡抚郎廷相敕》(康熙八年四月初三日);

《谕王屏藩归诚敕》(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初八日);

《谕松潘土司番民人等擒献吴之茂敕》(康熙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谕天下朝觐官员敕》(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谕云贵总督范承勋》(康熙二十五年五月初七日);

《敕谕湖广巡抚丁昆孔招抚兵变事》(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十日);

《收谕偏沅巡抚金玺》(康熙三十七年九月十四日);

《谕多八寺大国师赤里镇南敕》(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十日);

《敕直隶学政杨大鹤谕》(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十三日);

《谕普觉静修国师公阿扎穆苏敕》(康熙四十三年四月)。

雍正朝一件(满汉合璧):

《谕镇守阿尔泰将军巴塞敕》(雍正四年六月十七日)。

乾隆朝九件(满汉合璧):

《敕谕福建巡抚陈大受》(乾隆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谕江苏学政尹会一敕》(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

《谕直隶总督方观承》(乾隆十四年九月十四日);

《谕四川成都副都统铁宝敕》(乾隆三十五年九月初二日);

《敕谕广东巡抚李湖》(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初四日);

《敕谕提督贵州总兵宫花连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道光朝有三件(满汉合璧):

《谕安徽巡抚孙尔准敕》(道光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谕江苏学政中启贤敕》(道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谕福建学政彭蕴章敕》(道光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①

"满文的碑刻近几年吉林省的考古工作者也陆续有所发现,其中以吉林市永吉县大口钦地方的一座满文石碑引起了人们的注目,我和几位同志也曾专程去考察过。它坐落在离乌拉街东南方不足二十华里的一个山村外的土岗上,碑体并不庞大,暴露于地表的部分约五尺左右,宽三尺,弧形的碑顶没有丝毫的装饰,也未见碑座,显得十分平凡而古朴。然而正面依稀可辨的数行硕大的满文草书遒劲洒脱,尤以中间的满文格助词 be 赫然耀目,真是难得的一座碑刻。遗憾的是,碑的石料是采用易于风化的花岗岩,经年的风吹雨打,加上附近村童的嬉戏和攀援,满文字母大都难以确认,连贯成句就更为困难了,需进一步钩考方能作出恰当的破译。碑的西面有一片墓葬群颇为气派,当是清代显赫人物的坟茔,这座碑则很可能是墓碑了。碑的背面镌刻了'石碑沟'三个斗大的汉字,据说是许多年前住在本村的一位老石匠所为,这个村落就以这座碑而得名,称作'石碑沟'村。这座满文碑刻至今罕为人知,然而、一旦神秘的面纱被揭开,或许会具有难以估计的历史价值。"②

四、黑龙江省现存的满文档案

黑龙江地区的满文档案主要保存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另外齐齐哈尔、双城地区也保存有一定量的满文档案。现将馆藏情况介绍如下:

(一) 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

"黑龙江省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 2.3 万卷(其中含部分满汉

---

① 刘厚生《吉林省满文古籍述略》,《满语研究》1986 年第 2 期。

② 同上书,第 144 页。

合璧的案卷)。这部分档案文书种类繁多,其中有御旨、饬文、札文、咨文、移文、奏折、申文、呈文、簿册等。档案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1. 军事

官员升迁调补,兵丁调遣、布防、操练、剿补,兵丁名册,支发饷银,边卡设置、卫士戍边以及战况报告等。

2. 旗、民事务

旗官休致、承袭世职,旗丁户籍、挑补旗丁,户口册、屯户册、佃户册、家奴比丁册,区域划分、毗连届址,民族关系,风情民俗,灾情赈济等。

3. 经济

地丁钱粮、应抽各税,街市银价,官丁额俸,修造渡船、建衙设署所需费用,捕貂呈进,招垦放荒,田亩清丈,土地升科,矿业开发,兴办交通等。

4. 外务

外事往来,边界交涉,俄人违约越界、开荒、采金、狩猎、掠夺;签约、外人游历、传教、办理教案,开埠通商、水陆贸易,交涉路权等。"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现存 12 858 册,起自康熙二十三年,止于光绪二十六年。其中绝大部分是按兵、刑、户、工四司分类,并以时间为序,抄录黑龙江将军的题本、奏折,与京城各部院、邻近地方将军、副都统、总管等衙门的来往文书,以及下属各官员呈文等文件而成的档簿。另外,还有一部分所属地方驻防八旗官兵户口册、八旗各佐领比丁册和各官庄民户人口册等。所有这些档案大部分以满文书写,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档案基本上都以满文缮写,从嘉庆朝开始兼有汉文。"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全宗,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俄兵侵入黑

① 详参关维《略论黑龙江省馆藏满文档案的特点及其价值》,节选自《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研讨会论文选集》,档案出版社 1988 年,第 228—229 页。

② 详参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六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第 177—178 页。

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时,被沙俄劫走。1956 年 9 月由苏联政府归还我国,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1985 年 1 月陆续交移黑龙江档案馆。这批档案收入馆后,与原来的将军衙门光绪二十七年以后的档案衔接合为一个全宗,共有档案 43 723 卷,其中满文(含部分满汉合璧)21 764 卷,还有少量的蒙古文卷,共计 366.37 延长米。文件所属年代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至宣统三年(1911 年),除缺少康熙二十二、二十六、二十八年的档案外(原因不详),基本上是完整的。

本全宗档案对于考察与研究清朝初以及中晚期黑龙江的历史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是真实的第一手史料。它不仅反映了黑龙江地区的军事、交通、邮电、中外交涉及社会风情民俗等方面情况,而且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有影响的一些重大事件,如雅克萨战争、实行和取消封禁政策、黑龙江的发展、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等大事。"①

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文章繁多,内容丰富,现将主要内容分类介绍如下:②

1. 综合类

① 皇族、八旗事务方面:有康熙帝关于致治之道、崇尚德教谕旨,雍正帝关于治平之道、群臣之礼、颁行《朋党论》、追缴康熙帝谕旨朱批奏折及处罚其兄弟、流放太监谕令,嘉庆帝赐令和珅自尽、禁呈古玩谕旨,光绪帝、慈禧皇太后遗诏,各朝皇帝登极通行改元满蒙字体诏书等;有将军、副都统等官员呈进庆贺表签,职官封爵承袭、叩恩谢裳、颁发诰命敕书等项事宜奏折和咨呈文件;有黑龙江旗佐设置、旗丁人口的分拨,查报牛录源流及变通旗制、常入消除旗籍等咨呈文件。② 机构设置方面:有将军衙署几次迁移,各司、局、处及黑龙江各副都统、总管、城守尉、府、厅、州、县等衙署设置裁改的文件;有各衙署启用关防钤记日期

① 黑龙江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第10 页。
② 详参吴雪娟《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述评》,《满文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第 428—433 页。

和衙署设置图表等文件。③ 职官使役方面：有历任将军、各城副都统、总管、协佐领、理事同知、主事、仓站委官、满蒙笔帖式等文武官员的升迁调补、奖惩抚恤、开复引见等文件；有将军陈泰、德英、知府李鸿佳、主事英文等官员履历呈册，文武官员衔名、军政考选登项呈册。④ 档案印信方面：有明令各机关设立档案房，定期清理档案的规定文件，光绪朝印务处主事武英接理印务清查收存各朝档案书目的呈文，将军衙门收发文件号簿，堂呈堂单清册；有规定公文格式、用语和行文关系，请领、刊发关防、图记、条记，各属报送印模及汤旺河垦务局报送拾得金章明昌四年(1194 年)九月刊发的辽东路转运副使铜印等文件；有庚子(1900 年)乱后各属查报衙署档案及财物被俄兵劫情况的呈文。

2. 军事类

① 军政方面：有康熙帝关于派兵征巢盘踞雅克萨等地之罗刹、平定噶尔丹、移驻八旗兵丁屯戍黑龙江等谕旨，有各朝遣调黑龙江兵丁入关“助剿”谕令，有雍正朝户部给事中条陈严整军政、教习军民、晓谕法律折，和硕醇亲王奕譞等译奏东三省边务折和慈禧关于东三省防务事宜的密谕；有各朝循例查报所属官兵额设书目及添裁情况的文件；有变通武备章程、会试武举章程和黑龙江齐字营、精锐营、火器营、镇边军等设置裁改文件。② 军事活动方面：有将军等奏报水陆并进收复雅克萨，驱逐招抚入侵罗刹，分兵防堵流窜噶尔丹，出派官兵巡边人数、日期及路线等文件；有添设卡伦派兵驻守及兵丁围操演练，查报征调和遣撤江省官兵书目，派兵镇压“迁奴”起义、“义和拳”、“太平洋”“打五城”等农民运动的文件；还有缴存的兵部火票、路引、吉林将军核发的勘票、路票、吉林靖边军功牌、宁夏将军传牌等原件。③ 军需方面：有请领发送攻取雅克萨所用火矢、火炮及防守操演用械火药，铅刃等项文件；有各年请领核发官兵俸饷名衔书目册，查报库存火枪械书目及各式船只添裁与届限补修数目等项呈册、存册；还有绘制的旗营标旗、官兵服式章记、各式兵器船只式样图册。

3. 民政类

① 疆域方面：有将军奏报黑龙江全境舆图告成折和黑龙江通省舆图及所属各城、旗营、驿站、官庄报送的沿边四至、山川河流、村屯名称、人丁地亩清册；有齐齐哈尔与扎赉特、杜尔伯特、巴尔虎与喀尔喀，郭尔罗斯与杜尔伯特等划分牧场届址、堪设敖包届桩等文件。② 户籍人口方面：有统计旗丁人口、迁移旗户等文件；有黑龙江所属各城八旗、官庄、驿站统计查报的户口册、三代红白册、家奴册、养子册、消除旗档户口册、另户及比丁册，由盛京金州、熊岳、岫岩等处迁移至黑龙江的人丁户口册等。③ 赏恤赈济方面：有奏报建成已故将军穆图善、富明阿、恩泽等专祠折及报请优抚恩赏孤寡、褒奖旌表节妇，核发建坊银两等文件；有查报江省遭灾歉收、蠲免地丁积欠，减免税赋，赈济灾民，收抚难户等项文件。

4. 中外关系类

① 中俄关系：有反映康熙年间招抚遣送罗刹，将军奕山会同俄将岳福议定瑷珲合约，李金镛、成庆等与俄交涉索还被侵占江东旗屯，收回观音山、漠河等处金矿文件；有因俄人非法越界、盖房、开荒、挖矿、淘金、猎捕及抢劫、偷盗等项事件引起的中俄两国争端和交涉文件；有签订、修改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和改顶征收关税，设置商埠等项条约章程；有反映帝俄在华兴修铁路、开办矿山、采伐木石、通商贸易等文件；还有将军衙门查报办理中俄交涉未结事件咨呈文册，俄官出巡，军队布防等情况报告及中俄官员礼节性往来文件。② 中法关系：有法国在呼兰登处租买基地建立教堂，周冕等呈报办理因教堂庇护教民抗拒官府引起的教案议结赔恤情况和禁止法国传教士入境的命令等文件。③ 中朝关系：有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和反映甲午中日时清政府派兵入朝，盛京将军奏请在中朝国境丈量地亩及调拨官兵驻扎防守等文件。④ 中日关系：有查禁日商私卖枪械并转行照会日本公使，日人宫本政呈请省城开设妓馆、拟定暂行管理章程，将军衙门核准开办及发布告示等件。⑤ 其他各国：主要有美、英、意等国官员游历、商人贸易、换发护照、保护侨民

等文件。

5. 司法类

有将军衙门设置刑司、理刑员等并专理地方刑讼事宜，请领律例，审理盗抢、凶杀、奸拐、争控等民刑案件，接受安置流徙及查报监禁、斩绞人犯、缉拿逃人、释放为奴宗师、太监等流徙以及刑讼案件的审讯记录、口供、验尸报告，有省城设立法政肄习所、巡警学堂及请领经费、招收学员、商会与巡警局等筹办省城消防队等文件。

6. 财政类

① 经费方面：有官员恩赏、支借及红白事赏发银两统计簿册、地丁钱粮征解数目清册，请领核销办公、心红等项银两呈册，各城衙署公产房屋、公备各仓数目统计及修建营造工程料估、变价、核销呈存清册等件。② 税课方面：有黑龙江厘税局开办，设立呼兰等处税契居，哈尔滨烟酒木税总局等处启用关防，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起季报各城街市粮价，自咸丰五年(1855 年)起季报街市银价呈册，有征收木石秧草车马牲畜等项税捐章程以及所属各地呈缴、核销税捐数目清册等。

7. 文教类

① 有将军萨布素奏请墨尔根两翼各设官学、拣选补放学官折及将军、副都统等官员因荐举流徙充当学官而受罚的文件；有将军奏报江省筹办各学堂情形、招选学生、咨送江省学生和直隶师范、警察学堂等学习以及出洋游学各员履历名册、借闱会试文童三代名册等。② 民族类：有康熙帝招抚奇勒尔、鄂伦春人等谕旨；有迁移安置锡伯、达斡尔、巴尔虎、厄鲁特等部落，禁止蒙古使用汉文，知照各年贡貂盟会日期、各蒙古札萨克王公赴年班日期等文件；有札赉特、郭尔罗斯为靖地方举办蒙古练会，查办扎萨克图郡王鄂泰私行抵押旗地山林向俄铁路公司借款，呼雨尔厄鲁特头等泰吉鄂其尔等封赏袭替档册，以及理藩院致祭依克明安辅国公巴克莫特多尔济文件等。

8. 农业殖类

有将军衙门初建时期，钦派户部大臣督理黑龙江兵丁耕种机设置

官庄、选址建屯、移驻兵丁屯田、安置迁移家口、拨发各处捐助马牛、赏发粮米银两、购置农具、查报屯田亩数、田禾收获等情况的文件；有设置招垦行局、蒙荒行居、全省垦务总局，奏请开放蒙荒并酌拟开办章程及出放蒙古尔山、通肯、札赉特、郭尔罗斯等处荒地的文件；有出放荒地、清丈田亩、发放执照、押租升科等项统计表册及存根，如勘丈地亩总数簿，格荒地押金存根等；还有地亩清丈册，佃户补发失取条付存根、承领荒地押金存根等；还有各地查报的雨水霜雪、田禾长势、收成分数级粜籴仓粮数目等项文件。

9. 商贸工矿类

① 商贸方面：有齐齐哈尔商埠总局、哈尔滨商埠公司等启用关防，哈埠设立吉江两省总商会，呼兰公议会改称商会的文件及商埠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和破产律例等；有查报晋、鲁、豫等地来江商人姓名、随行人数、经费项目种类的文件及发放执照底册等件。② 工矿方面：有设立矿务局、矿政调查局，派员经办漠河、吉拉林、观音山等处金矿，核发勘采金、煤等矿执照，以及各金矿把头花名册及缴金发价数目清册等。

10. 交通邮政类

有反映黑龙江驿站初设、丈量各站相距里程、设置补放战官、分拨站丁、配置车马、界定管辖权限、查报驿传公文收转日期分数、请领核销银两及裁撤驿站设文报居等项文件；有江省设置齐齐哈尔、海兰泡、瑷珲、墨尔根、呼兰等处电报局、房，架设电线筹办电话及发领经费等方面文件；有兴建东清铁路、重设黑龙江、哈尔滨铁路交涉总分各局、华俄刀胜银行办东省铁路合同，增改章程等件。

(二) 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保存的满文档案

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是全国馆藏清代历史档案卷宗较多的县级档案馆之一。目前，该馆馆藏明清档案 50 495 卷，其中满文档案 2 467 卷。[1]

① http://www.fzda.gov.cn/wjzxshow.asp?id=3619(检索日期 2010 年 5 月 10 日)。

(三) 齐齐哈尔地区保存的满文档案[①]

齐齐哈尔地区保存有大量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档案,其中满文档案数量不多,主要在依克明安旗档案中有一部分。

依克明安旗档案是1972年7月从黑龙江档案馆转入富裕县档案馆的,档案接收时为1 312卷,他们根据黑龙江省对旧政权档案保管的要求及规定,先后两次进行了整理分类,并通过鉴定重新编制了全引目录。现共有档案1 420卷,其中清代档案82卷,民国档案卷为1 338卷。全部档案根据其重要程度分为重要卷和一般卷两种,重要卷为544卷,一般卷为876卷,所属年代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民国二十年(1931年)。

依克明安旗设立于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七月,额鲁特蒙古伊克铭(明)安辅国公爵巴仓带领一部分牧民由新疆移往呼伦贝尔,九月改移黑龙江通肯呼西(乌裕)尔河流域游牧,后移住并定居在现在的富裕县富海乡大泉子村,同时将依克明安旗公府设于此地。清朝依克明安旗直属于朝廷,蒙古王宫职衔直接由朝廷任命,其旗务有黑龙江将军兼督。民国时,依克明安旗隶属民国政府,旗内事务由省、县、旗会商解决。清末民初时的依克明安旗为“属人行政”,王公待遇,领取俸银。其主要职能是:“赴京直班,进贡御马,总理与掌管本旗行政,设立地方机构,分理民刑,经营与发展畜牧业,开放蒙荒,处理旗务等项事宜。”

依克明安旗档案现共分十大类,政务、机构设置与人事任免、军事、民政、政法、民族关系与宗教、涉外关系、财政金融、文教、农垦。在这十大类档案中用满文行文的三十多件,大多都为翻译。

五、内蒙古自治区现存的满文档案

内蒙古地区满文档案主要集中在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呼和浩特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及一些大学图书馆,有些散存在私人手

①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73—74页。

中。现将馆藏情况介绍如下：

（一）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

“内蒙古档案馆是收藏蒙古近代史档案资料最多的档案馆。该馆共有 283 个全宗，317 750 卷，其中清代档案 20 个全宗，63 258 卷(册)，而且大部分为近代的档案；民国时期档案(包括日伪政权档案)71 个全宗，45 968 卷；革命历史档案 6 个全宗，1 513 卷，其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档案。内蒙古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清代后期、民国时期(包括日伪政权)及革命历史档案与蒙古近代史有关。这部分档案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涉及的文种很多，有蒙文、汉文、满文、藏文，还有日文、俄文、英文档案，涉及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的内容，是研究蒙古近代史的史料宝库。”①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其得名，盖因此地有池二，一曰‘呼伦’，一曰‘贝尔’。此地水草丰茂，适放牧，多为蒙古喀尔喀部人移驻。初设五名总管，分管索伦、陈巴尔虎、新巴尔虎、厄鲁特、鄂伦春五路。雍正十年(1732 年)奏准，编成五十个佐领，分为左右两翼，总管关防由博尔本察掌管，加副都统衔。光绪七年(1881 年)，升副都统衔总管为副都统，遂设副都统衙门。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东三省改制，裁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次年，设呼伦厅。1920 年改厅为县。此地居民中以蒙古人为绝大多数，故不通行汉文，政府公文或用满文或用蒙文。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直至‘民国年间’，此地公文仍使用满文，这是一个特殊现象，颇有研究价值。”②

“内蒙古档案馆保存的典型的满文档案为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辽宁省档案馆也藏一部分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册，但是数量并不多。

内蒙古档案馆馆藏的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共 3 161 卷(排架长度 13.69 米)，其中清代档案 719 卷，民国时期档案 2 442 卷，档案所属年代为 1644—1938 年，95% 为满文档案，涉及近代呼伦贝尔地区的旗

① 详参金海《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② 佟永功《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满族研究》2003 年第 3 期。

佐设置、官员任免、设立道府厅县、兵丁调遣、人口、民刑案件、建立学校、选送学生、市场贸易、盐务、寺庙、敖包祭祀、水陆交通以及布里亚特、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人迁居、调查材料等。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档案还有 6 271 卷(排架长度 12.35 米) 收藏在呼伦贝尔盟档案馆。这部分档案所属年代是 1913—1932 年, 以蒙文档案为主,内容涉及人事任免调动、行政区划、边防驻军、民刑案件、户口及出入境管理、对外关系、农牧及税收、交通运输、文教、卫生防疫以及喇嘛寺庙等方面。”①

(二) 呼和浩特市档案馆②

呼和浩特市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文献不多, 仅有 14 幅完整如新的满汉合璧诰命书。诰命,亦称诰封,是清廷皇帝赐予官员本身及妻室、父母或先世的荣典。14 幅诰命中,道光朝 3 件,咸丰朝 1 件,同治朝 8 件,光绪朝 2 件。

现将这 14 幅诰命摘由开列于后,供读者参考。

道光叁拾年年正月贰拾陆日诰封右卫防御奇勒坦之父为武德骑尉,其母为宜人。

道光叁拾年年正月贰拾陆日诰封奇勒坦之祖父为武德骑尉,祖母为宜人。

道光叁拾年年叁月初贰日,诰封奇勒坦为武德骑尉,其妻为宜人。

咸丰五年年拾月贰拾日,诰封绥远城佐领佟琳为武德骑尉,其妻为宜人。

同治元年年玖月初贰日,诰封绥远城佐领佟琳之父为昭武都尉,其母为恭人。

同治元年年玖月初贰日,诰封绥远城佐领佟琳之祖父为昭武都尉,祖母为恭人。

---

① 金海《蒙古近代历史档案资料述略》,《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② 详参佟鸿举《呼和浩特满文古籍文献述略》,《满语研究》1995 年第 2 期。

同治肆年年玖月贰拾捌日，诰封绥远城佐领昌祥之父为昭武都尉，其母为恭人。

同治肆年年玖月拾捌日，诰封绥远城佐领昌祥为昭武都尉，其妻为恭人。

同治拾壹年年拾月初九日，诰封绥远城佐领昌祥之祖父为武功将军，祖母为夫人。

同治拾壹年年拾月初九日，诰封绥远城佐领昌祥叔父为武功将军，叔母为夫人。

同治拾壹年年拾月初九日，诰封人。

同治拾贰年年贰月初拾日，诰封绥远城佐领昌祥为武功将军，其妻为夫人，继妻为夫人。

光绪拾陆年年叁月贰拾日，诰封绥远城八品阴监生恩荣为奋武校尉，其妻为孺人。

光绪叁拾年年正月拾伍日，诰封绥远城补用晓骑校八品阴监生恩荣为武略佐骑尉，其妻为安人。

呼和浩特市是一个满族人口较多的地区，自乾隆二年(1737 年)满洲八旗兵驻防绥远城开始，多年间，满族与当地蒙古族、汉族、回族等民族和平相安，共同开发了这座北方古城，并保留了大量的满文古籍文献。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亟待我们去开发利用，使其为学术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六、台湾现存的满文档案①

台湾地区现存价值最高的满文文献当属《满文老档》原本，1969 年 8 月，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所珍藏的这部分老满文档册影印出版，分装十册，题为《旧满洲档》。此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还藏有

① 详参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82—83 页。

若干老满文散页，1973 年 11 月，李光涛、李学智编著《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二辑，检出老满文史料，影印出版。该部分史料共分五大类：第一至第三类为清入关前的老满文档册，第四类是康熙年间(1662—1722年)为了纂修清初开国功臣传时根据清太祖、清太宗两朝老满文原档所选抄的史料，第五类为清高宗乾隆十三年(1748 年)礼部文册，内含满文玺印篆书等原始档册，为外界所罕见的珍贵资料。

此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宫中档案中还有清代历朝满文奏折及满汉合璧奏折，在已出版的《宫中档案奏折》第八、九辑(1977 年)，《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八至三十二辑(1980 年)，《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七十五辑(1988 年)，就是满文奏折专辑。《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一至二十六辑则含有满汉合璧奏折。台北"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定数量的满文起居注册、实录，以及数量可观的清代国史馆满汉文纪、志、表、传各种稿本。台湾地区，不仅有相当数量的满文档案和颇为珍贵的著译文献，还有满文石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下马碑；一类是乾隆年间(1736—1795 年)林爽文事件以后在台湾府城和嘉义两地建造的石碑，一共造了九块，其中刻有满文的有五块。

第二节　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的内容及其分布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满文档案有一部分流失到了海外，在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都保存有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但是这些档案与我国保存的满文档案相比较，数量是十分有限的①。

---

① 赵彦昌、王红娟《中国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及其追索》，《山西档案》2010 年第 6 期。

一、日本现存的满文档案

"日本自古代奈良、平安朝(710—1185年)就开始从中国输入大量书籍,这一传统一直保留下来。到江户时代(1603—1607年)通过长崎港口,流入大量的书籍。这一时期正是满语文在中国最盛行的时期。而在此后的多年时间里,日本的一些学者和机构从未间断过对满文文献的搜集,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还不断有满文文献入藏。"①

目前在日本,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东洋文库和天理图书馆。

"东京的东洋文库,是广泛地收集和收藏着有关亚洲各地区的人文科学的专门图书馆,同时也是这个领域的研究机构。在这个东洋文库里,藏有日本最大规模的满文书籍。这些满文书籍,几乎全部都是在1920年到1930年收集起来的。

东洋文库的满文书籍目录,是在1964年发行的。这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波普(N. Poppe)教授等人用英文写的,题名为《东洋文库满蒙文书籍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系有满文书籍部分和蒙文书籍部分所组成。

在东洋文库所藏的满文书籍的特征之一是,档案的类目比较多。根据《目录》来看,作为被分在'档案'的类目中的有三十三件,在'谕旨和奏议'的类目中,有上谕和奏折的档案九件,在'传记和家谱'的类目中,也有可以说是属于档案类目的家谱十六件。而且这些家谱的大部分,是把一家的关系图记载在一张大型的纸上,大致这样的纸到数十张归纳为一帙。在《目录》中,是把一帙作为一件来处理的,为对各帙查找方便起见,对记载于各帙上的题签,可作为标题来看待。所以,若是把一张家系图作为一件来处理的话,那么它的数量便可达

①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84—85页。

到数百件以上了。"①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东洋文库的汉籍分类里,有Ⅰ经,Ⅱ史,Ⅲ子,Ⅳ集,Ⅴ丛书,Ⅵ普通别置,……Ⅺ特别别置等类,在Ⅵ普通别置和Ⅺ特别别置本的罕觏书中,也含有满蒙语的文献。在包贝氏的调查和所编的蒙古文、满文文献目录中,这一部分漏掉了。这部分满文文献从形式上说,多是些册子、卷子和箱装品等。是十分宝贵的。例如,《满汉合璧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二种)、《嘉庆元年贵妃册封皇后档》、《乾隆四十一年册封诚殡顺妃档》、《县君格格下嫁新档》、《乾隆二十六年正月至六月掌仪司堂抄》、《乾隆五十年郡主格格下嫁初定成婚》、《满洲旗勋旧世管世袭佐领家谱》(二种)、《正红满洲旗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九年分世管佐领家谱》、《正黄旗满洲佐领家谱》、《大清皇帝功德碑》(朝鲜三田渡碑)等。

还有,东洋文库原来汉籍门类中的'Ⅷ满洲本'的一部分,同'Ⅵ普通别置本'是一同放置在旧馆三楼的一个屋子里,包贝氏调查及编目时也给遗漏了。这部分满文文献为:《热河考》、《奉天诰命》(正黄旗蒙古前锋校加一级花沙布之本身妻氏)、《黑龙江佐领索其那承袭世管佐领执照》、《黑龙江镶蓝旗达呼尔佐领古鲁莫宝承袭世管佐领执照》、《盛京镶蓝旗新满洲佐领雅尔球承袭世管佐领执照》、《盛京正黄旗新满洲佐领阿西特乌承袭世管佐领执照》、《诰命》(苏尔休,惠彦),以及被编入'特别别置本'的《御制避暑山庄记》。"②

"东洋文库满文文献的突出特色是,档案类占了很大数量。前述包贝氏编制的满文书目录的7文书类、8圣训与奏折类,几乎都是档案。而最大宗的档案要数《镶红旗档》,这是镶红旗满洲都统衙门的档案,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民国十四年(1925年),达2 400余件。

---

① 神田信夫《东洋文库收藏的满文档案》,《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第187—188页。

② 何溥滢《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满族研究》1996年第4期。

天理图书馆的满文文献，于 1955 年 5 月，经天理大学教授河合忠信、山崎忠整理，形成《满文书籍集》的书影式目录，内分哲学、礼制、宗教、法律、军事、自然科学、语学、文学等八类，共收录 138 件满文文献。由于它是书影，未能包括全部馆藏。至 1984 年，中国中央民族学院赵展先生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资助的访问学者，与京都大学教授河内良弘先生一起，再度编纂《天理图书馆藏满文书籍目录》。这个新目录，除收录该馆满文部藏书外，还收录了该馆其他部门、天理大学人文研究室、天理大学古代研究所收藏的满文书籍，总数达 314 部。该书目共分 10 大门类：1. 政治，2. 军事，3. 哲学，4. 宗教，5. 语言，又分为 4 个子目：① 辞书，② 单语与解释，③ 音韵，④ 语法读本，6. 文学，7. 历史，8. 地理，9. 天文历法，10. 书目。该书目的编纂体例为：每部书都要按下列顺序标记 11 项内容：1. 罗马注音的满语书名；2. 汉文书名；3. 注明是满文或是满汉合璧；4. 著者、译者、编者；5. 注明版本性质，即殿版、版本、抄本、影印本的区分；6. 出版者；7. 刊年；8. 匣册数；9. 本的长宽尺寸；10. 备注；11. 分类号码。此外，该书目还附有满文索引、汉字索引、洋书索引三种。所以，该目录是编纂最科学、最详备、查找最方便的一本目录书。

天理图书馆所藏满文图书内容丰富不必细说，唯有关西北疆域的几部书，颇应引起重视。这就是：1. 嘉庆二年(1797 年)满汉合璧抄本《塔尔巴哈台事宜上谕》，1 帙 3 册。(按：该书目所标记的‘嘉庆二年’可能有误，笔者由河内先生引导，于 1994 年 12 月间，曾匆匆浏览该馆满文藏书，注意到该书内贴有‘塔尔巴哈台事宜上谕，嘉庆二年至十年’字样，且‘十年’旁又有铅笔注为‘二十四年’字样。未及细审内容，仅存疑。)2.《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一帙 12 册。3.《钦定续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传》，1 帙 12 册。4. 嘉庆元年至二十五年(1796—1820 年)松和等撰《塔尔巴哈台奏稿》，满汉合璧，写本，1 帙 6 册。5.《吐鲁番事宜清汉奏档》满汉合璧，写本，1 帙 5 册。6.《奏折稿》，满汉合璧，写本，1 帙 4 册。这是道光十九至二十三年(1836—1843 年)固庆任科

布多参赞大臣时的奏折。7.《塔尔巴哈台奏折》,满汉合璧,写本,1帙2册,咸丰二年(1852年)札伊撰。8. 咸丰四至五年(1854—1855年)《伊犁奏折稿》,满汉合璧,写本,6册。9. 咸丰七至十年(1857—1860年)《伊犁奏折》,满汉合璧,写本,2帙18册。令人惊奇的是,有关塔尔巴哈台的三部极为珍贵的抄本和写本,该馆在内页上所注明的收藏时间,竟然都是近在1985年4月的事。我们虽然不知道从何处购得,但不能不感叹日本学界搜购图书的能力和毅力,从1905年内藤湖南在盛京晒制档册至今,是毫无松懈。"①

"除了东洋文库、天理图书馆,日本的一些大学和图书馆,也都有零星收藏。在恭仁山庄书库中,特别令人注目的是,还保存有不少档案类的满文资料,如满汉合璧的道光、咸丰年间的奏折档,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满文题本等。其他如广岛大学,设有浦文库,是浦廉一教授所捐,其中'满洲语、蒙古语'分类有52分资料,满汉合璧的《凉州镶红旗满洲造送光绪三十二年官兵闲散等三代数目册籍》、《驻防青州正红旗晋祥荣芳佐领下点检另户男丁数目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也藏有一部分自雍正朝至嘉庆朝的卖契、典房契、执照等满文文书及一些满文书籍,如《巫人诵念全录》等。"②

二、俄罗斯现存的满文档案

俄罗斯收藏的满文档案主要保存在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国立公共档案馆和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一)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国立公共档案馆

以萨尔特科夫—谢德林(M. E.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命名的国立公共图书馆收藏着一批清代的满文写本和刻本、达斡尔和满—达斡尔

① 何溥滢《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满族研究》1996年第4期。
②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90—91页。

写本,以及一些双语和多语种文献。① 其中《清文五朝圣训》、《清文明洪武要训》、《皇清开国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理藩院则例》、《三合吏治辑要》、《八旗通志初集》、《上谕八旗》等都具有档案的性质。

(二)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是中国境外满文抄本珍藏最丰富的场所。这批珍贵的文物分别保管在研究所的抄本室和档案资料室里。圣彼得堡收藏的满文抄本和满文木刻本达六百多件。随着俄中两国睦邻关系的发展,从 17 世纪起,俄国的学者们就开始研究满洲语新疆一带的中国民族人民的文化。俄国学者在对这些地区人民生活的长期考察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满文资料,并在他们的满族助手帮助下记录了许多民歌、民间故事、民谣和满族风俗、传统方面的资料。"② 其中有很多的文献具有档案的性质。如圣彼得堡分所珍藏的《emu ordai gisun sarkiyan》(《百二老人语录》),为松筠在 1789 年记录的。值得一提的是研究所中还有收藏着一部分满文报纸,主要是 1925 年在海拉尔出版的《ice donjin afaha》满文报纸,共 13 份,对东北地区 20 世纪初满族历史研究很有意义。

三、美国现存的满文档案

"美国是收藏中国古籍文献较多的国家之一。清同治八年(1869 年),清廷将明清刻本十种,共计 993 册赠送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些典籍成为美国东方文库的原始藏书。其后,美国驻华公使及清廷陆续赠书,使该馆中国古籍文献日渐充实,其所藏中文书籍约 65 万册,其中线装古籍 30 万册,其中满文文献资料 400 多种。在美国先后有八十多家图

① 聂鸿音《谢德林图书馆收藏的满文写本和刻本》,节选自《满语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4 年,第 77 页。

② 庞晓梅《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珍藏的满文抄本》,《满学研究(第 2 辑)》,民族出版社 1994 年,第 295 页。

书馆收藏有中文文献，部分收藏有包括满文文献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语文文献，如哈佛燕京图书馆、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等。"①

现在主要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档案为例进行介绍如下：②

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中，保存着以汉文古籍为核心的众多中国问题资料。其中的满文文献，包括刊本、抄本、文书3类，共计近400件。这是美国满文资料收藏品种最大的部分，也可与伦敦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法国国民图书馆(Bibliotheque Nationale)、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等机构的收藏相媲美。近年来，以这些图书馆为首的世界各国文献机构，正陆续将其所收藏的满文文献目录发表于世。

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清代文书，被称为《巴软德搜集品》(Barrett Collection)。是美国人巴软德氏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之间在北京收集的。至1931年为该馆收藏。此后直到进行调查的1997年为止的60年间，因为丝毫没有对其进行整理和分类，所以仍以当时(有可能是巴软德氏自己整理的)的状态保存着。文书上还标记有《Manchu—Chinese Documents 2(Insert)4th year》CHIEN LUNG(in 1740 AD)》的记注和贴着印有巴软德氏汉名橡皮章的黄色标签(第2号档案，此序号依据巴软氏记录，下同)。

事实上，这批文书为该馆收藏之前，其来历存在着很多不明之处。但是，最近该馆负责中国部门(Chinese Section)的居密博士根据该馆保存的旧记录查明，《巴软德搜集品》在当时是因芝加哥斐尔特自然史博物馆(the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ahicago)拉斐尔

①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96页。
② 详参加藤直人《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档案》，《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新华出版社2008年，第121—125页。

(Barthold Laufer)博士的推荐而购入的。拉斐尔博士是当时美国为数不多的几位亚洲研究者之一,不否认他的推荐对这份资料的购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是,对巴软德氏与拉斐尔博士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拉斐尔博士要推荐购入这批文书等问题,至今尚未搞清楚。

拉斐尔博士在向国会图书馆推荐这批文书时,曾做过详细的目录。但其记录长时间没有人知晓,后来还是被居密博士所发现。只是,这一目录存在许多没有根据实际数据而记录的、值得怀疑的内容,例如将文书总数记作 114 件等。

拉斐尔博士没有掌握实际数据,是因为这批文书里有许多文件将本来毫无关系的满、汉文档册合缀在一起,还有一些文件甚至是为了制成满汉合璧而将不同的满文题本和汉文题本随便粘贴在一处的“伪装”的东西。拉斐尔博士的数字没有将其统计进去。例如,第 8 号档案虽是雍正五年(1727 年)满文《ilan gusan niru, hontohoi urse juwen gaiha, edelehe talaha boigon iursei menggun i dangse 慎刑司上三旗佐领管领缺银两记录册》(8a),但其中夹杂着被认为是内务府银库的乾隆五十年(1785 年)十二月份汉文《黄册实存》(8b)。即,巴软德氏(还有拉斐尔博士)所分类的第 8 号档案里存在迥异的两类档册,而档案实际数量也因之增大。

最差的是题本类“伪装”:发件机关和日期迥异的满文题本、汉文题本,表里相反的粘贴在一起。想来是有毫无档案基础知识的人所为。这些档册、题本中“伪装”的部分有将近 50 件。如前所述,据我们调查结果,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清代文书总数目已升至 163 件。

这些欲做成满合璧的合缀,虽不清楚在什么地方,由什么人物制成的,但其中第 5 号档案:嘉庆十四年(1809 年)满文《银库黄册》被篡改成《康熙二十四年黄册》(由汉字文化圈外受教育的人物,可能是欧美人执笔所作汉文题签)等。有试图使其编纂年代古老化的意图。从这种重视文书“古董价值”来分析,可能是为了贩卖好价钱而进行的加工。松村润教授与笔者二人在制作新目录时,充分重视这些被“加工”过的

部分,并将其记录成新的档册、档案。

《巴软德搜集品》,是有关内务府事务的文书,可能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时期,由巴软德氏从散落在北京街巷的物件中搜集到。其中,74件有八旗衙门向内务府提交的各类关于红白事件的档册,占了这批文书的相当数量。细目为:

正黄旗汉军 12 件(满文,乾隆三年—乾隆十三年);

镶黄旗满洲蒙古 25 件(满文,雍正七年—乾隆九年,含无年月部分);

镶黄旗汉军 4 件(汉文,乾隆三年—乾隆九年,含无年月部分);

镶白旗汉军 1 件(满文,乾隆二年);

正红旗汉军 12 件(满文,乾隆二年—乾隆十五年,含无年月部分);

镶红旗满洲蒙古 1 件(满文,乾隆十四年);

正蓝旗满洲蒙古 6 件(满文,雍正是年—乾隆十五年);

镶蓝旗满洲蒙古 5 件(满文,雍正三年—雍正十一年);

镶蓝旗汉军 7 件(汉文,乾隆四年—乾隆五年)。

所谓《红白事件档》的文书形式,不但各衙门之间有所不同,有意思的事就连同样的八旗"汉军"也分成使用满文文书衙门(正黄旗、镶白旗)和使用汉文文书衙门(镶黄旗、镶蓝旗)两类。以镶黄旗为例,在镶黄旗满洲衙门把从镶黄旗蒙古来的文书(这一过程中已经被制作成文书状)与本衙门文书一道(骑缝处有"镶黄旗满洲都统之印")提交到内务府。众所周知,《红白事件档》虽是面对旗人庆吊而赏赐银两的记录,但却依然不失为了解 18 世纪前半期清初旗人生活的珍贵史料。

除了从雍正末年到嘉庆年间的银库黄册类,康熙二十年(1681 年)到光绪年间的武备院黄册等各官署的档册也非常重要。还有,有关宫廷修造诸费用的支出记录(年代最久远的是康熙十二年),可以说是了解当时宫廷修造实际情况的珍贵史料。另外,有关道光年间圆明园包衣三旗护军营教养兵的档案 11 件,作为已搜集的史料也颇有意思。

《巴软德搜集品》的目录,于 1998 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巴软

德搜集品〉目录》为题发表在了东洋文库杂志《东洋学报》上。第二年，它与满文刊本、抄本目录合编在一起，以《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满洲语文献目录》为题出版。

四、德国现存的满文档案①

尽管德国的满文图书文献还没有像英、法国家那样系统整理出版的书目，但笔者从山东大学关德栋教授处得知，仅在柏林城市图书馆中，关先生就查找到了五十余种现已出版的各种满文书目中所未见的满文图书。据关先生介绍说，这还是很不全面的。因为受时间、经费等诸方面因素的制约，很有可能还会漏掉一些罕见书籍。此外，私人藏书也是不可忽视的。据德国科隆大学嵇穆(Matin Gimm)教授介绍，他自己就藏有包括满文《大藏经》、康熙《起居注》在内的很多珍贵满文文献，还有很多满文文物和民间文学书籍。

① 详参江桥《德国的满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1995 年第 1 期。

第六章　满文档案的管理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征集

满文档案的征集工作就是按照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和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通过各种有效手段和方式，将保存在各级文化事业机构和散存民间的满文档案有组织、有计划地征集到国家各级档案馆保存，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以维护满文档案的完整和安全。

一、满文档案征集工作的意义

满文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珍贵的历史研究和现实利用价值，是不可再生性的文化资源。现存的满文档案，虽然绝大部分已经集中起来，得到妥善的保管，但是由于历史原因，至今散存在社会上和国外的明清档案还为数不少。因此对满文档案进行征集具有重要意义。

1. 有利于保护和抢救满文档案这一民族历史文化遗产

满文档案历史悠久，本身就遭受着自然损毁的威胁，加之人为因素的影响，保管条件恶劣，许多满文纸质档案发霉、受潮、粘连、虫蛀和结砖破碎现象极为普遍；大量的石刻满文档案风化剥蚀，有的则被人们打

碎作为建筑材料，如不进行及时的保护抢救，随时都有毁坏丧失的危险。开展满文档案征集工作，有利于将散存民间的满文档案收集到保管条件较好的档案室、档案馆保存，维护满文档案的齐全、完整与安全。

2. 便于满文档案的科学管理、信息资源共享

满文档案分布广泛，保存机构众多，各部门对满文档案的分类整理方法各不相同，极不利于满文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满文档案的征集工作可以将分散的满文档案集中到档案管理部门保存，并进行统一的分类、立卷、排列、编目、上架和检索，以高效便利的手段向社会提供利用服务，实现满文档案管理的科学化。

二、满文档案征集的方式

满文档案征集要熟悉满文档案的变迁历史，调查满文档案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有计划地进行征集，并且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和方式：

1. 鼓励捐献移交

档案部门在征集满文档案时利用各种宣传工具进行动员，如发布通告，召开会议或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鼓励民众捐献满文档案。对捐赠和移交满文档案的单位和个人颁发奖状和证书及适当的奖金或奖品。

2. 适当赎买

满文档案的分布状况了解清楚后，对那些珍贵的满文档案可以采用赎买的方式，将其收集到档案管理部门珍藏并做出一定承诺，如不改变所有权，保留所有者查阅、利用等权利。

3. 复制副本

档案部门对满文档案的征集力求齐全、完整、准确和系统。对那些征集不到的满文档案原件可以采用复印、拍摄、拓印等方式进行收集，以保证满文档案的整体性和全面性。

满文档案征集后，要经过鉴定，辨别真伪，评定价值，经有关领导批准后，方可接收。满文档案征集入馆后，要登记满文档案的来源、种类、数量、价值、征集费用等情况，然后按全宗统一保管。对“需要整理、翻译的要整理、翻译，并提供利用，为科学研究服务”①。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整理

现存的满文档案数量庞大，对其进行整理编目极为艰巨。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经过几代满文档案工作者的艰苦不懈努力，到目前为止，满文档案经过初步整理，基本上做到了“有目可查，有规可循”。

一、满文档案整理的沿革②

自20世纪初始，档案工作者就开始整理满文档案，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到目前为止，所有清代满文档案，经过初步整理。”③满文档案的整理是随着明清档案的整理而逐渐完成的。

1. 民国时期对满文档案的整理

教育部对满文档案的整理。最早对满文档案进行整理应该追溯到民国建立以后，当时的教育部(原为学部)所属的历史博物馆对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这次整理极为简单，只区分“有用”和“无用”。邓之诚氏《古董琐记》曾载此事说：“盛朝红本清厘时，贮麻袋凡千余，移午门博物图书馆理之，司其事者部曹数十人，倾于地上，各执一杖，拨取其稍整齐

① 佟永功《应当注意满文文献的收集》，《辽宁档案》1986年第2期。
② 秦国经《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六十年》，《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中华书局1988年，第34—58页。
③ 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年第1期。

者,余仍入麻袋,极可笑。”①

罗振玉先生对满文档案的整理。罗振玉赎回内阁大库八千麻袋档案后,对其进行了较细致的整理,“先区分时代,再按文种分类。各文种之下,依朝、年、月、日顺序排列,逐件标题,编号登目。1934 年编印有《大库史料目录》甲、乙、丙、丁四编,共七册”②,现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满文档案的整理。史语所在民国十八年(1929 年)得到了部分内阁大库档案,组织人员进行整理。因档案比较散乱破碎,“当时整理程序是:一、去灰;二、铺平;三、分类;四、捆扎;五、剩余碎档之处理;六、裱褙;七、抄录副本,以便编纂付印。对档案的分类,仍以文书种类为标准”③,其类目有:内阁收有的各项档案、内阁本身的各项档案、修书各馆档案、试题、试卷及其相关的档案、沈阳旧档。这段整理工作的代表人物是徐中舒和李光涛先生。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满文档案的整理。民国十一年,历史博物馆留存的档案,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沈兼士、马叔平、陈援庵等先生主持,并与职员学生组织了一个明清史料整理会,专门负责整理工作。他们制订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历史档案整理方法④:第一是分类整理,先按文件的名称区分,再按朝代先后区分,最后按省区分类;第二是编号摘由,摘录要点,登记编号、上架;第三是纂修、汇编、公布,编辑研究考证各项重要事件及分别编制统计表。

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对满文档案的整理。1925 年 10 月故宫博物院成立,设置了文献部,开始了大规模的满文档案整理工作。整理步骤:

① 徐中舒《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明清档案论文选》,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第 8 页。
② 秦国经《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六十年》,《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中华书局 1988 年,第36 页。
③ 同上书,第 37 页。
④ 张娜《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流散与北京大学对档案的整理》,《北京高校档案学术论文汇编》,2006 年,第 274—275 页。

“一拂去尘垢整齐形式;二依据机关及名目分别部类;三排比朝代年月;四标写号签及登记卡片。”①分类的方法按衙门、程式、来源、名称、时间、地点、人物等分类。

禹贡学会对满文档案的整理。在顾颉刚先生主持下,采用文献馆和北大的整理方法。档案目录采用卡片式,“首先将文件编号摘由,登记于卡片上,每件一卡。卡片编竣后,以部、类相从,再印书本式目录,并作索引一套”②。可惜这部分档案和目录至今下落不明。

清华大学对满文档案的整理。在吴晗教授的主持下整理,以档案的形式区分为本子式、折子式、零纸式三种。本子式分省、类别后,再按时间排列。折子式、零纸式,按机关分类,按年、月、日排列。编目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十进式的,第二种是机械式的”③。本子式是采用十进式。折子和零纸式的采用机械式。

2. 新中国成立后对满文档案的整理④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满文档案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 年至 1956 年,接收清理时期。

这一时期对明清档案进行大规模的接收,并在接收过程中进行了点检和清理,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满文档案。如录副奏折,在原月折包的体系下,逐件摘由,填写卡片,然后编制目录索引。

第二阶段,1957 年至 1959 年,大规模整理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为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在录副奏折试点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整理工作。

---

① 沈兼士《文献馆整理档案报告》,《明清档案论文选》,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第 473 页。

② 秦国经《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六十年》,《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下)》,中华书局 1988 年,第42 页。

③ 吴晗《清华大学所藏档案的分析》,《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第 68 页。

④ 赵彦昌、黄娜《论建国后满文档案的管理》,《满族研究》2011 年第 4 期。

第三阶段，1960 年至 1978 年(其中 1966 年 5 月至 1969 年因“文革”整理工作暂停)，系统整理时期。

这一时期整理方法：一区分全宗；二进行全宗档案的分类；三组卷，拟制案卷标题，标题由作者、事由和文件名称三部分组成；四进行卷内文件的排列和填写备考表；五进行案卷排列、编号、填写案卷封面，案卷封面要著录文件所属全宗、类别、标题、年代、数量以及档案号；六编制案卷目录；七撰写档案内容介绍。

第四阶段，1980 年至今，新技术手段整理时期。

所谓新的技术手段，主要是指缩微摄影技术、光盘技术和计算机技术。近些年来，这些技术已经紧密地结合起来，档案的整理就是进一步完善和固定档案实体的秩序，加强揭示档案内容和特征的著录工作，著录的项目有卡片号、标题、作者、全宗名称、文种、类别、时间、存址以及主题词。“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进行著录后存贮到计算机中，并与先行扫描存贮到计算机中的档案图像进行挂接，组成档案数据库。”①

最典型的例子是：2009 年 9 月 12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军机处上谕档全文数字化项目在京通过验收。这是继该馆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部会典》之后的又一全文数字化成果，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历史档案全文数字化成果。

清代军机处上谕档包含了满文上谕档，在数字化过程中对满文档案进行了处置。

上谕条目编目：在制作“朝—年—月—日—条”目录时，以每条上谕为基本编目单位，保证上谕条目的完整性。由于同一天的上谕条目可能来自不同的盒册版本，需要仔细翻阅每条上谕所在的“朝—年—月—日”。②

① 唐益年《纂修清史工程与清代档案的整理》，《历史档案》2004 年第 2 期。
② 王光越、栗维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军机处上谕档全文数字化概述》，《历史档案》2010 年第 1 期。

版面还原：满文档案的满文文字部分，不做文字识别处理，以图来表示。

二、满文档案整理的意义

1. 满文档案的整理地位十分重要

满文档案的整理是满文档案管理的基础，而满文档案管理工作又是满文档案利用工作的基础，所以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满文档案数量众多，而且并没有单独分出来管理，如不进行整理编目，不利于保管，也无法查找利用。所以满文档案的整理是满文档案利用、开发、发挥满文档案的作用的一项前提条件，也是满文档案管理中的基础工作。

2. 满文档案的整理的优化，可以促进整个满文档案管理工作的协调发展

满文档案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基本编目，为建立多元性的检索体系奠定了科学基础。做好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能为满文档案的保护、统计、检索提供基本的单位和完整的体系，便于维护满文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所以，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是满文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重要基础，满文档案整理的科学化和标准化水平的提高，对于满文档案管理工作的总体优化具有直接和广泛的影响。①

三、满文档案整理的原则②

1. 保持满文档案的原貌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满文档案是清入关前和清朝历史的真实记录，

① 陈兆祦、和宝荣、王英玮《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94 页。

② 秦国经《清代档案的特点和整理原则》，《档案学通讯》1982 年第 5 期。

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材料。要维护这段历史的真实性,必须维护满文档案的真实性。要维护满文档案的真实性,就必须保持满文档案的原貌。我们整理满文档案原则之一,就是要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

满文档案主要是清王朝的官文书,它是清王朝各国家机关在政务活动中形成的,因而满文档案首先应按原来行政系统分类,保持满文档案之间的自然联系,以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

分类后全宗内文件的整理,也应保持原来的次序和面貌。例如录副奏折,原来军机处按年月日排列,每半月一包,形成编年的卷包,并逐件登记于《随手档》上,我们按照原来的次序进行整理。又如朱批奏折,因雍正时定有缴回朱批的制度,因而形成大批的臣工缴回的朱批奏折,原按人名分类保管的,整理时应维持其缴回朱批奏折的原貌。再如内务府的事筒,是每日值班官员将所办的文书,装成一筒,应按其在办文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案卷进行整理。

2. 要充分利用原有满文档案整理的基础

清朝统治者对档案的整理、保存和利用是十分重视的,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制度和方法。这些也是当今进行整理工作必须要注意的。

满文档案的整理从 20 世纪初开始到现在已将近一个世纪了,"到目前为止,所有清代满文档案,经过初步整理"①,现在满文档案的整理主要是向着数字化利用的方向进行,而数字化的整理在原有的整理基础上才能实现。

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整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前的整理,奠定了管理满文档案的基础。那时的整理思想和方法,基本上是合理的、适用的。如当时文献馆的《整理档案规则》中曾规定"整理档案,应保持其原件之形式","各种档案应保持原来之机关面目,即以原来之行政系统为编目系统","档案原有包扎或标识

① 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

者,不可拆散废弃","片纸只字不得废弃"。在清理文件时,还提出"秤不离砣"的口号,这就是要保持文件的历史联系,维持历史的面貌。当时经过各位档案专家和工作人员 20 多年的努力,把所藏的档案进行了整理编目,像陈垣、沈兼士、方甦生、单士魁、单士元、张德泽、徐中舒、郑天挺等老一辈的档案工作者和专家,都为整理满文档案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明清档案的整理和建设。首先将流散各地各机关的清代档案收集起来,实行统一的管理,然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理档案工作。到目前为止,各个全宗的档案都进行了整理编目,其中少部分还进行了详细的加工整理。整理档案时,严格遵循了全宗原则。《明清档案部档案整理规则》规定:"整理明清档案,必须以全宗为单位进行。"根据各个全宗档案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整理方法。文件在进行分类之后,一般按问题、名称、机构、地区等不同的特征,进行了组卷。重要的文件,采用"详细立卷"的方法,一般文件采用"简单立卷",或以类代卷。也有一部分重要档案,不适宜组卷,如制、诏、诰、敕、谕旨等文件,宜采取逐件登记编目的方法。

3. 满文档案整理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

要做好满文档案的整理工作,必须具有档案学、历史学和满语语言学三方面的基本知识。要不断提高整理满文档案的水平,就必须加强研究工作。

整理满文档案的研究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满文档案整理业务的研究,诸如研究清代文书档案制度、满文档案整理编目的方法等;二是结合所整满文档案的内容,进行印证历史、编译满文档案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满文档案的整理就是要保持满文档案的本来面貌,充分利用原有的整理基础,对那些已整理过的重要档案,如不便利用的话,可在原基础上进行加工整理,在整理的过程中还要将满文档案的整理与满文档案的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另外要加强编目和各种索引工作,把它提到

重要地位，组织人力，认真做好；同时，根据现代科学的发展，考虑到今后电子检索的要求，应把手工检索与电子检索结合起来。要统一编定档案主题词表，填制文件主题词卡。

四、满文档案的分类

分类是管理满文档案必要手段，也是满文档案整理工作的主要内容，分类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满文档案的组卷、排列、编目和上架工作的质量，因此，是满文档案整理的一项核心工作。

满文档案的分类就是要根据满文档案的内容性质和形式特征，把档案文件材料分成不同的类别层次，从而使零散的档案文件形成一个具有一定从属关系和平行关系的不同等级的满文档案分类系统。

1. 对满文档案区分全宗

满文档案种类众多，卷帙浩繁，为了保持满文档案内在的联系和原貌，便于保管和利用，首先按全宗原则进行划分档案。

"全宗是一个机关或著名人物在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将各个全宗视为相对独立的整体，依此作为划分档案的标准，力求各个整体内的档案完整性和整体间的档案不容混杂，这便是全宗原则。"①

按照全宗原则，并根据原来的行政系统，现存的满文档案划分了内阁、内务府、宗人府、宫中各处、盛京内务府、黑龙江将军衙门、宁古塔副都统衙门、三姓副都统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双城堡协领衙门、归化城副都统衙门、阿拉善旗扎萨克衙门、呼伦贝尔总管衙门等全宗。

2. 全宗内满文档案的分类

① 按文种分类。文件名称分类法就是按满文档案的文件名称将其划分为诏、诰、谕、题、奏、疏、移、咨、信、账簿、契约、家谱、碑文、印章、照片等种类。

---

①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② 按组织机构分类。这一分类法就是按产生形成满文档案的历史组织机构分类。按组织机构分类可较好地保持档案文件材料的完整性。

③ 按问题分类。就是把满文档案按主题性质划分为政治、历史、经济、军事、科技、文艺、哲学、伦理、宗教、民俗、译著和语言文字等类别。

④ 按时间分类。时间分类就是按档案产生形成的时间或收集的年度顺序将满文档案划分为不同的类别,如按产生时间来划分的满文档案有崇德三年满文档案、崇德七年满文档案等;年度分类法则将满文档案按档案收集年度划分为不同的年度类别。

全宗内满文档案的分类方法很多,在进行档案分类时,档案管理部门要根据满文档案的数量、种类、内容等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分类方法进行综合分类。

五、满文档案的组卷和排列

满文档案的组卷主要是依据档案文件材料的构成特点,将具有某方面共同特点和联系密切的满文档案综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案卷;一些满文档案具有不同特点、联系不紧密的,可以分别组成案卷。满文档案的特点,一般反映在满文档案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上,即每份满文档案一般都有一定的形式、形成者、名称、日期以及档案内容反映的特定问题等等。根据满文档案这些不同方面的特点,适应不同检索途径和日常管理的需要,形成了满文档案的组卷。

现存的满文档案已经有了一定的整理基础,在划分全宗进行分类后,主要是确立满文档案的保管单位,这一工作环节称为组卷或立卷。组卷的内容包括组成案卷单位、拟定案卷标题、卷内文件的排列与编号、填写卷内文件目录和备考表、案卷封面的处理等。

我国对满文档案的整理分为两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前和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前整理的满文档案,"重要的文件都是按件登记,如制、

诏、诰、敕、朱批奏折、题本等，在分类之后均逐件编号登目。一般文件多采用包或盒”①。

新中国成立后整理的满文档案，分类之后，多数都已根据不同的文件，采用问题、文种、作者、地区、时间等特征立卷。其中分“详细立卷”和“简单立卷”两种。“详细立卷”是卷内文件须逐渐摘由、排列编号，并制有“卷内文件目录”和“备考表”。“简单立卷”，是卷内文件仅排列顺序和附一个“备考表”。②

六、满文档案的编目与著录

满文档案经过系统分类、组卷排列之后，就要编制案卷目录，将案卷逐个登记在案卷目录上，以固定全宗内满文档案的分类体系和排列顺序，最后完成档案文件材料的整理工作。

编制满文档案案卷目录，不仅可以概括地介绍全宗内满文档案案卷的内容与成分，成为查找利用档案文件材料的基本检索工具；还可为编制其他满文档案检索工具和统计、检查满文档案的数量与质量提供重要依据，是满文档案整理工作的重要环节。

全宗内满文档案的编目，又按其不同的种类，采取不同的方法。“一般来讲，档簿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册登记编目。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档册名称、时间和册数。折件类的档案，采用文种——朝年，或文种——问题——朝年的原则整理，逐卷逐件登记编目。逐件登记编写的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包括卷号和件号）、文件作者、时间和件数，而逐卷登记编写的目录填注之项有档号（即卷号）、案卷名称、卷内文件起止时间和件数。”③这主要是对满文档案实体顺序

① 陈兆祦、和宝荣、王英玮《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377 页。

② 同上。

③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进行登记，虽然便于保管和按时间查找利用，但不便于按问题、人物、地区查找利用，要查找利用某一专题档案文件，则需要将有关档案逐件逐册从头到尾翻阅一遍，既费时耗力，也不利于保护档案原件。

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选择利用率较高的档案，在满文档案实体顺序整理和档案信息计算机管理的基础上，根据《档案著录规则》和《明清档案著录细则》，采用文件级卡片式著录格式，对档案进行著录工作。

著录是“在编制档案目录时，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①满文档案规定的著录项目有分类号、档号（即由档案全宗、目录、案卷和文件诸号组成，各号之间，以“一”号相隔）、胶片号（包括卷号和拍号）、题名（即文件摘由）、责任者（即文件作者）、文种、文件形成时间、附注（包括语种、件数、档案实体状况）、主题词等十项。

现已完成了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宫中上谕和部分内阁题本的著录工作，共计著录卡片 20 余万张。从 1999 年下半年起，将这些著录卡片开始录入计算机，准备建立满文档案数据库，以期向社会各界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另外，又利用著录卡片编制了两部专题目录，一为《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共收录档案条目 12 万余条，共计 900 万字，精装 12 册，1999 年 4 月由广西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二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民存西藏与藏事档案目录》（满文部分），共收录档案条目 12 000 余条，共计 100 万字，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②。

第三节　满文档案的鉴定

满文档案的鉴定就是指档案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原则、标准和方

① 《档案著录规则》第 1 页。
②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 2000 年。

法，判定档案文件材料的价值。主要任务是对满文档案的来源、作者、时间、印章、格式、载体及官职、职掌、典章制度等进行鉴定、考证，鉴别文献的真伪和来龙去脉，给予准确定位。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满文档案作为明清档案的一部分，曾经由历史学家和文献工作者进行过整理和初步的鉴定，如陈垣、沈兼士、许宝蘅、沈士远等，他们为满文档案的抢救、整理与编辑出版费尽心力。这其中有突出贡献的是陈垣先生。他提出了“分类、分年、分部、分省、分人、分事、摘由、编目”的《档案整理八法》和保持档案历史原貌的“秤不离砣”原则，建立了满文档案鉴定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对明清档案进行过两次大的清理鉴定工作。第一次是1958年，对1 700麻袋清内阁大库残碎清理鉴定，历史学家吴晗、翦伯赞、吕振羽等参加了研究，并提出了鉴别意见。第二次是1964年至1965年和1971年，对全部明清档案划分了战备等级，根据重要程度，把明清档案分为四类，第一类又分为甲、乙、丙三种，这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满文档案，也奠定了满文档案鉴定的格局。

第四节　满文档案的保护

满文档案的保护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满文档案的库房保管，二是满文档案本身的防护。

一、满文档案的库房保管

满文档案主要是纸质文件材料，库房作为存放档案文件材料的场所，是保护满文档案的首要条件，库房保管的基本要求是防火、防光、防尘、防虫鼠、防污染和温湿度适宜。同时还要建立严密的防火制度，配备报警和灭火设备，切实维护满文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1. 重视库房的建造质量

“库房建筑要牢固，库房最好是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地基不能选在低洼排水困难或容易下陷的地方，以防止倒塌或因潮湿滋生对文献有害的微生物、害虫等。与此同时，要求每个库房都有比较宽而且防尘、防盗的门。”①

2. 采取多种方法防治虫鼠和霉菌

“防治害虫霉菌的方法有物理杀虫法和化学杀虫法两种。这些方法各有利弊，结合起来使用效果会更好。我们应该做到预防和除治两手抓，平时注意预防，保持库房干净整洁，阻断害虫霉菌进入库房的渠道；一旦发现虫害，就要及时除治，有针对性地用物理方法或化学方法来杀灭害虫和霉菌，防止它们繁殖，同时又不能破坏珍贵的古籍文献。”②

3. 控制库房的湿度和温度，改善典藏环境，防止光照、有害气体和灰尘侵蚀

保护和管理满文档案，必须做到库房内恒温，温度和湿度波动不大。一般来说温度在14℃～24℃，湿度在55％～65％有利于档案的保管。同时，还要尽量减少库房内的光照量，窗户尽量小而少，窗户上应该有永久性的防光设施。

二、满文档案的防护

1. 对满文档案进行鉴定、分类和登记

这是对满文档案进一步保护的前提，只有如此，才能更有计划、规整地进行保护收藏。鉴定可以有效地确定满文档案的价值、年代、版

① 朱崇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298—299页。
② 邵永初《论图书馆古籍文献的破坏因素及保护措施》，《老区建设》2008年第8期。

本、主要内容等情况，是对满文档案的定位，十分必要。对满文档案的编目分类和登记也是保护满文档案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这样就为以后的查找、利用、统计提供了极大方便。

2. 培养此方面的专业人才

由于这一切活动的进行都必须有专业人才的参与和指导，目前，国内此方面人才还是十分匮乏的，一些图书馆和大学成立了相关的专业或者培训机构，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当务之需，国家需要加大对这方面的投入力度，鼓励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同时，本人认为对这些图书馆人才，不仅仅只给其讲述图书馆知识，还要向他们讲授相关学科的知识。比如对满文文献的鉴定、保护、修复，必须先要了解满族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情况，否则难以给出正确服人的结论或意见。①

3. 对满文档案修补装帧及修复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满文档案破损厉害，必须进行修补装帧，得以延长档案的寿命。保护措施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延缓型保护，二是再生型保护"②。满文档案再生主要有三种方法"缩微复制、影印出版和全文数字化"③。

① 刘金德、刘荣《满文文献的保护和利用》，《兰台世界》2010 年第 5 期。

② 宝音《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 年第 4 期。

③ 王海辉《浅谈图书馆古籍文献的保护》，《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7 年第 26 期。

第七章　满文档案的编纂

从清代至今,国内外满文档案编纂的成果众多,仅民国至今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据统计就有100多种,其作用和价值显而易见,很有必要对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展开研究。本章对满文档案编纂工作主要从其历史沿革、主体、客体、方法上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内容为:分析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分为草创和发展两个阶段,在每个阶段中按其演变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满文档案编纂的机构与人员,按性质分为主要的和合作的编纂机构及其编纂人员,分别对档案馆系统、图书馆系统、博物院系统、科研院所系统、高校系统的满文档案编纂机构及编纂人员进行研究;对满文档案编纂的类型按内容、编纂方式、档案来源来划分,并对各个类型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进行分析;对满文档案编纂的体例与加工方法进行探析,满文档案编纂的体例分满文档案编译体例和满汉合璧档案编纂体例两个方面,满文档案的编纂加工方法包括满文档案材料的考证说明、文件标题的拟定、行款格式的处理、档案内容的校勘、编排顺序及文种来源注明方式。最后对满文档案编纂的特点和规律进行述评,并提出建议。

第一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

对清代所存留下来的满文档案的编纂起步于20世纪初,金梁所主

持的满文老档的编纂。而第一部满文档案编纂的成果是金梁在 1929 年(一说为 1924 年)[①]出版的《满洲老档秘录》[②],从此拉开了满文档案编纂的序幕。

一、满文档案编纂的草创

满文档案编纂的草创期为民国时期,是随着满文档案的发现、整理而开始的。

1. 金梁的满文档案编纂

1916 年,清末进士金梁在沈阳故宫崇谟阁发现了乾隆朝重抄的《满文老档》,而他本人并不懂满文,于是组织了 10 余名满汉文学士进行翻译,到 1918 年下半年完成《满文老档》的全部翻译工作,根据翻译的内容形成了《满洲老档秘录》[③],分上下两册,于 1929 年出版。《满洲老档秘录》自序对这个过程有详细的记载:

"盛京故宫旧藏《满洲老档》179 册,分纪天命、天聪、崇德朝事,多三朝实录、开国方略、东华录所不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诚三百年来之秘史也。原本为无圈点体满文,其字近蒙古与通用满洲文字不同,翻译至难,经满汉文学士十余人之手费时二载今始脱稿。当分编百卷,以卷帙过多,校刊非易,遂择要摘录名曰《满洲老档秘录》,分上下两篇先付缮印。此不及全书二十分之一,以索观者多聊快先睹云尔。戊午中秋瓜圃老人金梁。"[④]

1933 年又重印,改名为《满洲秘档》[⑤],对译文稍作增减,不再分册。另外,金梁组织翻译的全部译稿辗转被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张

---

① 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满族研究》2008 年第 1 期。
② 金梁《满洲老档秘录》,铅印自刊,1929 年。
③ 同上。
④ 金梁《满洲老档秘录》序,民族出版社 1998 年,第 181 页。
⑤ 金梁《满洲秘档》,铅印本,1933 年。

溥泉先生收购,在《故宫周刊》以《汉译满洲老档拾零》①为题,"连载金梁先生主持汉译《加圈点字档》的部分译文。"②

这一时期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列表如下:

表 1-1 金梁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字(万)
1	满洲老档秘录	2	金梁等	铅印自刊	1929	5.445
2	满洲秘档	1	金梁等	铅印自刊	1933	5
3	汉译满洲老档拾零	215	金梁等译	《故宫周刊》	1933.5—1935.6	60

金梁是满文档案编纂的第一人,他主持汉译形成《满洲老档秘录》和《满洲秘档》及《汉译满洲老档拾零》,开创了对清代所存留下来的满文档案编纂的先河。但同时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表现为仅注重《满文老档》内容的翻译,且"翻译中遇到难点就借助于汉文文献"③,"遇有开国方略、东华录诸书类似者,则依诸书少变其文辞以为译稿"④,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档的学术价值。

2. 文献馆的满文档案编纂

"1925 年 10 月故宫文献部成立(1929 年 2 月正式定名为文献馆)"⑤,开始了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1931 年,文献馆工作人员在清理内阁大库档案时发现了《满文老档》原本 37 册及其抄本,于是计划编译《选译满文老档》⑥,然而时局动荡未能编成。1934 年 11 月,文献

① 金梁《汉译满洲老档拾零》,《故宫周刊》1933 年第 245 期—1935 年 459 期。
② 刘耿生《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279 页。
③ 佟永功《功在史册——满语满文及文献》,辽海出版社 1997 年,第 95 页。
④ 金毓黻《满文老档考》,《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委会汇刊》1947 年第 1 期。
⑤ 关嘉禄《20 世纪中国满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 年第 12 期。
⑥ 吴元丰《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译出版综述——以中国大陆为中心》,《满语研究》2011 年第 2 期。

馆工作人员发现了用高丽纸包着的26支满文木牌，当时通晓满文的李德启对这些满文木牌进行了整理研究，1935年5月编译出版了《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①，“此书收录了当时发现的26枚用新旧满文混合书写的木牌照片，对满文木牌逐一音译和意译，并作注。”②

此外，1936年10月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又出版了《故宫俄文史料》③，附录康熙时转译满文本。它是清康乾年间俄国来文原档，这里有10件满译俄国来文原档附件。1942年，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出版的《东北文献丛书》中有文某译述，金毓黻移录的《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④；1944年，又出版了《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石印本。

这一时期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列表如下：

表1-2　文献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字(万)
1	选译满文老档	1931年计划，未出版				
2	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	1	李德启编译	故宫印刷所	1935	1
3	故宫俄文史料	1	翻译王之相、刘泽荣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36.8	1
4	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	1	文口译述，金毓黻移录	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	1942	1
5	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	1	金毓黻	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	1944	

① 李德启《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5年。

② 刘耿生《档案开发与利用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9页。

③ 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故宫俄文史料》，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1936年。

④ 文口、金毓黻《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国立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1942年。

草创时期的满文档案编纂是在满文档案的发现和整理中逐渐开始的，虽然成果零星分布，断续出品，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编纂体系，但却是满文档案编纂的一个拓荒性的成果，为满文档案编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满文档案编纂的发展

满文档案编纂主要是在满文档案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满文档案编纂无外乎两个条件——物质和人才。物质条件就是满文档案史料，满文档案自民国以后，颠沛流离，而后随着社会环境的稳定主要分布在中国内地、中国台湾和日本，因而在这些地方涌现了一大批满文档案编纂人员，满文档案编纂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 满文档案编纂在中国大陆的发展

中国内地的满文档案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等。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发展，大陆满文档案编纂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建国后至“文革”结束，二是 1978 年至今。

由于这一时期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众多，按出版时间统计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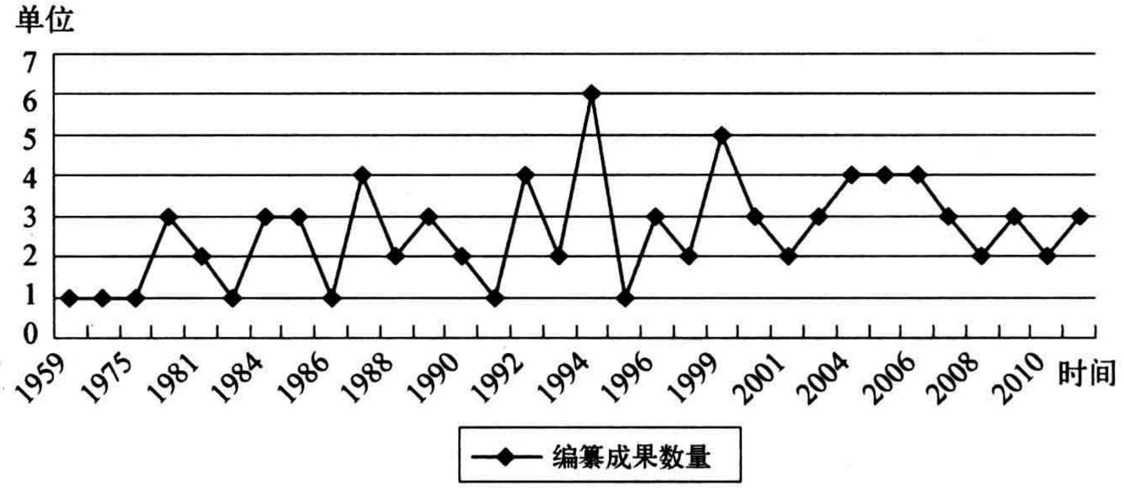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编纂出版时间分布情况

第一阶段由于国家刚刚建成和后期的“文革”动乱，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发展缓慢，“文革”时期甚至停滞，满文档案的编纂成果仅有三件——《清代地震档案史料》①、《中俄边界条约集》②和《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③。其中满文档案的编纂仅占一小部分，主要是为了服从档案史料的编纂而编入其中的，并没有形成系统和规模的满文档案编纂活动。但这一时期为满文档案编纂的发展做了物质和人才上的准备。在物质上，上世纪50年代苏联归还了1900年沙俄入侵我国东北时掠走的东北地方档案，其中满文档案占有相当数量；国家档案局接收了南京史料征集处保存的清代档案3 000多箱及北京大学、大连等处保存的部分满文散佚档案④。在人才培养上，党和政府十分重视，陆续在学部历史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和明清档案部等机构开办满文专业班，充实满文专业人才队伍，为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培养专业人才。

第二阶段自1978年至今，是满文档案编纂的大发展时期。第一阶段的物质和人才准备发挥了重要作用，满文专业人员的培养继续进行。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整理组和翻译组、辽宁省档案馆及有关科研院所、大学的满文专家和学者为代表的满文档案编纂主体编纂出版了大量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数量多、涉及内容广泛、出版形式多元化。从内容上来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外交和科技等方面。

这一时期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列表如下：

①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
② 商务印书馆《中俄边界条约集》，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③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
④ 关嘉禄《20世纪中国满文文献的整理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2期。

表 1-3　中国大陆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 著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时间	字(万)
1	清代地震档案史料	1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	中华书局	1959	15
2	中俄边界条约集	1	商务印书馆编	商务印书馆(北京)	1973	15
3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	1975	14
4	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	3	辽宁大学历史系	辽宁大学历史系刊印	1978—1979	38
5	汉译《满文旧档》	1	李林译	辽宁大学历史系刊印	1979	11
6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	3	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	中华书局	1979	94
7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81	47.6
8	清史资料(第二辑、第五辑)	2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中华书局	1981、1984	
9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第十四辑)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华书局	1984、1990	
10	历史档案	20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史档案》杂志社	1981—1997	
11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	1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26

① 指在《历史档案》上发表的满文档案编译史料为 20 个。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字(万)
12	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	1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译编	辽沈书社	1984	34.5
13	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	1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34.5
14	清雍正朝镶红旗档	1	刘厚生译，薛虹、栗振复校	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5	9.2
15	盛京刑部原档	1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	群众出版社	1985	15.5
16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光绪朝八年—十五年)、(光绪朝元年—七年)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合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55
17	天聪九年档	1	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18
18	雍乾两朝镶红旗档	1	关嘉禄译，佟永功校，王钟翰审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17.3
19	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7	40
20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1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19.1
21	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	1	季永海、刘景宪译编	辽沈书社	1988	15.5
22	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	民族出版社	1988	21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 著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时间	字(万)
23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上、下)	2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68.5
24	锡伯族档案史料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60
25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100
26	满文老档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	中华书局	1990	80
27	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	3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234.1
28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铨选奖惩宫廷用度宫苑进贡	1	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32.5
29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奖惩宫廷用度外藩进贡	1	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社科院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30.2
30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贡品	1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30
31	满学研究(第一辑、第四辑)	2	安双成,张凤良、屈六生	吉林文史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1992、1998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 著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时间	字(万)
32	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上、下)	2	辽宁省档案馆编译	辽沈书社	1993	82
33	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军事	1	王普文、潘景睦、李贵忠主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50
34	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4	40
35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7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合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278.3
36	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	1	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	中华书局	1994	33.7
37	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丙编 第二册)·盛京满文档案中的律令及少数民族法律	1	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张锐智,徐立志册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94	
38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俞炳坤,张书才主编	中华书局	1994	
39	顺治元年清字记事档(十一月)满文翻译	1	罗丽达	满族研究	1994(04)	
40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1	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30
41	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	1	辽宁省档案馆	辽宁古籍出版社	1996	35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字(万)
42	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37.4
43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270
44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黄山书社	1998	469.4
45	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900
46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人民出版社	1999	380
4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80
48	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	10	北京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	学苑出版社	1999	
49	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	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浙江富阳华宝斋古籍书社	1999	22
50	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2000	24
51	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1.65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 著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时间	字(万)
52	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四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书局	2000	65
53	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编	民族出版社	2001	140 影印
54	兴京旗人档案史料	1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1	44
55	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79
56	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	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28.224
57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	8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5063
58	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	1	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北京市民委古籍办编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31
59	盛京参务档案史料	1	辽宁省档案馆编译	辽海出版社	2003	34
60	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	1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沈阳市"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93
61	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85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 著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时间	字(万)
62	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史志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90
63	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扫描
64	盛京将军奏折档	2	清奕庆等撰	缩微中心	2004	
65	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卷)	2	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地震出版社	2005	242
66	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	5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	人民出版社	2005	影印
67	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	3	安双成、屈六生主编	九州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68	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六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无翻译
69	中琉历史关系档案 乾隆朝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2009	影印
70	中琉历史关系档案 顺治康熙雍正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影印
71	珲春副都统衙门档	238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9 764.4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字(万)
72	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	1	辽宁省档案馆编	辽海出版社	2006	31
73	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灰度扫描
74	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一—五)	5	程大鲲、孙建冰	满语研究	2006(1)—2008(2)	
75	清内阁蒙古堂档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大学蒙古学院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	
76	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	10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影印
77	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下卷)	2	北京市地震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	地震出版社	2007	211.8
78	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二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编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影印
79	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61.5
80	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418.7
81	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	23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等编	九州出版社	2009	影印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 著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时间	字(万)
82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20
83	清朝前期理藩院满蒙文题本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10	
84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0	
85	清宫珍藏杀虎口右卫右玉县御批奏折汇编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右玉县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	中华书局	2010	100
86	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选编	22	大连图书馆编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1	20
87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案译编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1	200
88	〈闲窗录梦〉译编	2	松筠(穆齐赞)记,赵令志、关康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237

2. 满文档案编纂在台湾的发展

1949 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时,“将原保存在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大部分清代档案,拣选 304 箱共计 71 万余件运往台湾”①,这其中包含了不少的满文档案,主要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因而中国台湾的满文档案编纂活动大多集中于这两个科研机构。

① 马明霞、路保安《台湾现存清代档案文献史料述略》,《山西档案》2010 年第 1 期。

台北故宫博物院十分重视满文档案的编纂。1969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所珍藏 40 册的无圈点老满文原本影印出版,分装十巨册,题为《旧满洲档》①。1971 年,影印出版了《年羹尧奏折专辑》②。1973 年开始,台北故宫博物院陆续影印出版了现藏宫中档,其中的清代历朝满文奏折及满汉合璧奏折,编纂在已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九辑(1977),《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十八至三十二辑(1980),《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七十五辑(1988),《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一至二十六辑中。1977 年,庄吉发译注的《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③出版,其译注奏折为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九两辑有关清朝征讨准噶尔的文书④。1978 年,庄吉发译注的《孙文成奏折》⑤出版。1984 年,庄吉发校注的《雍正朝满汉合辟奏折校注(第一辑)》⑥出版,其编纂的奏折是国立故宫典藏宫中档⑦的雍正朝的满汉合辟奏折。1977 年和 1980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张葳、潘淑碧译注的《旧满洲档译注・太宗朝》(一、二)⑧。2001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了洪安全主编的《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⑨,其中有 12 件满文档案。2005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了冯明珠主编的《满文原档》⑩。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期刊,随时刊载满文史料的译注。主要有《故宫文献》季刊,《故宫季刊》和《台湾人文》。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满文档案编纂也占有重要地位。1970—1971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广禄、李学智

① 台湾故宫博物院《旧满洲档》,台湾故宫博物院 1969 年。
②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年羹尧奏折专辑》,"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1 年。
③ 庄吉发《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文史哲出版社 1977 年。
④ 同上,序第 2 页。
⑤ 庄吉发《孙文成奏折》,文史哲出版社 1978 年。
⑥ 庄吉发《雍正朝满汉合辟奏折校注(第一辑)》,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
⑦ 同上,序第 1 页。
⑧ 张葳、潘淑碧《旧满洲档译注・太宗朝(一、二)》,"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7,1980 年。
⑨ 洪安全《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国立"故宫博物院 2001 年。
⑩ 冯明珠《满文原档》,沉香亭企业社 2006 年。

合译《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①。1971 年,李学智又结集《老满文原档论辑》②出版。1973 年,李光涛、李学智编著《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二辑)③,检出若干老满文史料,影印出版。

此外,还有 1968 年台湾银行出版金梁的《满洲秘档选辑》④和 2004 到 2009 年,“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的《明清台湾档案汇编》⑤。

这一时期台湾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列表如下:

表 1-4　台湾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 著 者	出 版 者	出版时间	字(万)
1	满洲秘档选辑	1	金梁	台湾银行	1968	
2	旧满洲档	10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故宫博物院	1969	影印
3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	2	广禄、李学智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一 1970 二 1971	20 36
4	老满文原档论辑	10	李学智	文友印刷纸业公司印行	1971	31.8
5	年羹尧奏折专辑	3	“国立”故宫博物院 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1	影印
6	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二辑)	1	李光涛、李学智合编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3	影印

①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70,1971 年专刊。
② 李学智《老满文原档论辑》,文友印刷纸业公司 1971 年。
③ 李光涛、李学智《明清档案存真选辑(第二辑)》,台北商务印书馆 1973 年。
④ 金梁《满洲秘档选辑》,台湾银行 1968 年。
⑤ 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明清台湾档案汇编》,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2009 年。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字(万)
7	宫中档		"国立"故宫博物院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3—1986	影印
8	旧满洲档译注·太宗朝(一、二)	2	张葳、潘淑碧译注	"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7、1980	
9	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	1	庄吉发译注	文史哲出版社	1977，1983再版	
10	孙文成奏折	1	庄吉发译注	文史哲出版社	1978	
11	雍正朝满汉合辟奏折校注(第一辑)	1	庄吉发校注	文史哲出版社	1984	
12	清宫宫中档奏折台湾史料	12	洪安全主编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01	影印
13	满文原档	10	冯明珠主编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05	扫描
14	明清台湾档案汇编	110	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2009	

据不完全统计，台湾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14种，其编纂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影印出版，在于大规模公布满文档案史料并最大程度地向读者展示满文档案的原始状态，如《旧满洲档》和《宫中档》系列；二是译注出版，如《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采取直译法译注，首先逐页逐行逐字地将老满文单字注出读音，再将每一单字的字义，以汉文单字排放于译音之下，然后在每一页下半部，附以此页的汉文释义"①，

① 庄吉发《中国台湾的满学研究》，《满学研究》(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最大程度地公布满文档案史料和方便利用。

3. 满文档案编纂在日本的发展

日本重视满文档案是从内藤湖南开始的。1905 年,内藤湖南在沈阳故宫崇谟阁发现了《满文老档》,他敏锐地感到其珍贵的价值,于是 1912 年,“内藤湖南与京都大学总长羽田亨博士一起,再赴沈阳”①,将《满文老档》全部拍照,带回日本。

于是日本国内掀起了研究满文古籍文献及利用相关史料研究清史的热潮②,对《满文老档》的编译也相继开始,最先着手的便是东京帝国大学的语言学家藤冈胜二编译的《满文老档译稿》③,但是还没有定稿藤冈就病逝,遗稿由他的学生服部四郎负责编辑,并由岩波书店于 1939 年进行出版。1937 年,鸳渊一和户田茂喜编译了《满文老档邦文译稿(太祖第一册)》④,发表在《史学研究》第九卷第一号。1938 年,今西春秋开始翻译《满文老档》,其成果《满和对照满文老档(太祖朝)》⑤从 1944 年开始在《书香》杂志连载。三田村泰助也对《满文老档》进行了翻译,负责太祖朝前半部分的工作,其成果在 1957 年至 1962 年间分数次发表。1955 年到 1964 年,羽田亨的《太祖老档译注》⑥在《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分期刊载。

1917 年,日本东洋文库成立,开始大规模收藏亚洲的史料,更加推动了日本满文档案编纂的发展。1955 年到 1963 年东洋文库陆续出版了由日本顶尖的满学家神田信夫、冈本敬二、本田实信、松村润、冈田英

---

① 何溥滢《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满族研究》1996 年第 4 期。
② 黄金东《日本满文古籍文献及其整理研究概况》,《满族研究》2010 年第 3 期。
③ [日] 藤冈胜二《满文老档译稿(未定稿)》,岩波书店 1939 年。
④ [日] 鸳渊一、户田茂喜《满文老档邦文译稿(太祖第一册)》,《史学研究》1937 年第 1 期。
⑤ [日] 今西春秋《满和对照满文老档(太祖朝)》,《书香》1943 年第 11 期—1944 年第 2 期。
⑥ [日] 羽田亨.《太祖老档》译注[J]. 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1955—1964。

弘、石桥秀雄等译注的《满文老档译注》①,这是当时日本满学界的顶级研究成果。1936年东洋文库从上海的书店购进了《镶红旗档》,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对其进行编译。1972年到2001年,东洋文库陆续出版了《镶红旗档·雍正朝》②、《镶红旗档·乾隆朝1、2》③和英文版的《镶红旗档》④。由于满文档案资料的匮乏,东洋文库将注意力转到了中国台湾台北市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根据1969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的《旧满洲档》,编译了《旧满洲档·天聪九年》⑤,由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译注,东洋文库1975年出版;2003年和2009年,东洋文库分别出版了《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⑥和《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⑦。

这一时期日本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列表如下:

表1-5　日本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1	满文老档邦文译稿(太祖第一册)	1	鸳渊一、户田茂喜译	《史学研究》	1937年(昭和十二年)第9卷第1号
2	满文老档译稿(未定稿)	3	藤冈胜二	岩波书店胶印	1939(昭和十四年)
3	满和对照满文老档(太祖朝)	6	今西春秋译	《书香》	1943年11月第15卷第11号—1944年12月第16卷第2号
4	满文老档译注	7	神田信夫等译	东洋文库出版	1955—1963

① ［日］神田信夫《满文老档译注》,东洋文库1955—1963年。
② ［日］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镶红旗档·雍正朝》,东洋文库1972年。
③ ［日］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镶红旗档·乾隆朝1、2》,东洋文库1983年。
④ ［日］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The Bordered Red Banner Archives in the Toyo Bunko: Introduction and Catalogue》,东洋文库2001年。
⑤ ［日］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旧满洲档·天聪九年》,东洋文库1972—1975年。
⑥ ［日］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东洋文库2003年。
⑦ ［日］东洋文库东北亚研究小组《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东洋文库2009年。

续 表

序号	出版物名称	册数	编著者	出版者	出版时间
5	《〈太祖老档〉译注》		羽田亨	《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	1955—1964
6	镶红旗档	4	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	东京东洋文库	1972—2001
7	旧满洲档·天聪九年1、2	2	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译注	东洋文库	1972—1975
8	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		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神田信夫等	东洋文库	2003
9	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	2	东洋文库东北アジア研究班编	东洋文库	2009

第二节 满文档案的编纂机构及编纂人员

满文档案的编纂机构和编纂人员承载着满文档案编纂项目的策划,满文档案编纂项目的具体实施,进行满文档案编纂和翻译等工作。每一个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问世,都是满文档案编纂机构及其人员的辛勤汗水浇灌而成。根据满文档案编纂项目及成果的数量,将满文档案编纂机构及人员分成两种类型,一是满文档案编纂的主流机构及其人员,二是满文档案合作编纂机构及其人员。

一、满文档案主流编纂机构及其人员

满文档案编纂的主流机构及其人员,这些主流机构大多为满文档

案的保藏机构,主要是“三馆”——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其编纂人员主要是懂满文的档案工作者,他们负责着满文档案的开发整理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开始满文档案的编纂工作。

1. 档案馆系统

在档案馆系统中进行满文档案编纂活动最多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次是辽宁省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我国保藏满文档案最多的机构,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最早是 1925 年故宫博物院为明清历史档案专设的一个管理机构,称为文献部。1929 年改为文献馆,其机构设置按档案来源进行分组管理,这一时期李德启在整理中发现了满洲木牌,编译了《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①。此外,故宫俄文史料的满译俄国来文原档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翻译编纂。1955 年,改为第一历史档案馆由国家档案局直接领导。1958 年,改为明清档案馆,其下的编辑研究组编纂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②,翻译了其中的满文档案部分。1959 年 10 月,第一历史档案馆并入中央档案馆,改称明清档案部。1969 年底,明清档案部重归故宫博物院领导,开始设置满文组、编辑组编纂满文档案。“1980 年 4 月,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再次划归国家档案局领导,正式筹建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③,设置满文部、编辑部编纂满文档案。满文部主要负责满文档案史料的翻译、编辑、整理和编目工作;编辑部主要负责档案史料的编辑、公布工作。在 80 多年来的满文档案编纂历史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涌现了很多优秀的满文档案编纂工作者,如朱金甫、任世铎、关孝廉、安双成、屈六生、吴元丰、赵志强、郭美兰等。

其次是辽宁省档案馆,是在 1969 年由原辽宁省档案馆(成立于

---

① 李德启《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 1935 年。
②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59 年。
③ 单士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历史档案》1981 年第 1 期。

1958 年 10 月 1 日)和原东北档案馆(成立于 1960 年 7 月)合并而成,是辽宁省集中统一保管档案史料的基地①。其保藏的满文档案有满文老档、清代设在盛京管理皇室事务机构档案(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和盛京总管内务府档)和清代东北地区旗务机构档案中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等。1980 年,设置了历史部,1985 年设置了历史一部,来进行满文档案的编纂。其第一个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是《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②,由辽宁省档案馆关克笑、沈微,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嘉禄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王佩环选译,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总校统编。在 30 多年的满文档案编纂工作中,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满文档案编纂工作者,主要有佟永功、何荣伟、程大鲲、沈微、张虹等,其中佟永功是辽宁省抚顺市人,辽宁省档案馆研究馆员,1966 年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参加大型清代满文档案史料的翻译工作。合译著有《满文老档》、《天聪九年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等。

2. 图书馆系统

图书馆系统进行满文档案编纂工作的机构主要有日本东洋文库和大连图书馆。

首先,最著名的是日本东洋文库,日本收藏东方学图书资料的研究图书馆③。东洋文库是 1917 年由岩崎弥氏在收购了当时担任中华民国总统顾问的莫利逊氏的藏书而设立的东洋文库学专业图书馆,主要收集保存来自亚洲各国的文献。其所收藏的满文档案主要有内藤湖南在盛京拍照的《满文老档》和 1936 年从上海的一家书店购买的《镶红旗档》,此外还对台湾 1969 年影印出版的《旧满洲档》中的部分满文档案进行编译。东洋文库中对满文档案进行编纂的机构是其所属的清代史

---

①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指南》,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4 年,第 1 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 1984 年。

③ 东洋文库,http: //baike. baidu. com/view/378489. htm(检索日期 2012 年 4 月 27 日)。

研究室，研究成员是来自各大学著名学者，如神田信夫、松村润等。神田信夫是明治大学名誉教授，在满文档案的整理、翻译方面成绩突出，“早在50年代中叶就发起组织了‘满文老档研究会’”①，东洋文库的多数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是由其主持翻译的。松村润是日本大学名誉教授，是东洋文库满文档案编纂的主力之一。

其次，就是大连图书馆，其前身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是日本侵略机构的图书情报中心，其所收藏的满文档案是清代北京皇宫内阁大库散佚的档案，大部分为清代总管内务府题本。1984年9月，大连市图书馆设立了文献研究室，与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作，对其所保存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编纂，文献研究室主任王多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嘉禄担任该项目的负责人。

3. 博物院系统

博物院系统中进行大量满文档案编纂的机构主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1966年启用，原名中山博物院，后改为“国立故宫博物院”，保藏着1949年运台的原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保存的一批精品档案，其满文档案主要有内阁档中的《满文老档》原档、宫中档中的满文档案和军机处满文档案。其下组成的“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对这些满文档案进行编辑影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陆续编纂出版。图书文献处编辑张葳对《旧满洲档》中的太宗朝部分进行了汉译。

二、满文档案合作编纂机构及其人员

满文档案合作编纂机构及其人员，主要是与清史、满学、少数民族史有关的科研院所、高校等，其编纂人员主要是这些机构的满文专家及学者等，他们大多与主流的满文档案编纂机构因满文档案编纂项目而

---

① 刘小萌《近年来日本的清代史研究》，《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

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对满文档案进行编纂；或是利用主流机构所保藏或影印的满文档案策划满文档案编纂项目，形成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1. 科研院所系统

科研院所系统的满文档案编纂机构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藏学研究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内蒙古鄂伦春族研究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北京市民委古籍办、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这些科研院所的满文档案编纂机构或与满文档案保藏机构合作，或各科研院所之间进行合作，来进行满文档案的编纂活动。与满文档案保藏机构合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内蒙古鄂伦春族研究会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经常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编纂有关民族边疆的满文档案史料；各科研院所之间合作，如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沈阳故宫博物院和辽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经常进行合作编纂辽宁省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这其中进行大量满文档案编纂工作的人员主要有：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关嘉禄，北京人，满族，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满学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1966 年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长期在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满学。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李学智，有《老满文原档论辑》、《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广禄合著，1970—1971)第一、第二册。

2. 高校系统

高校系统的满文档案编纂机构主要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辽宁大学历史系，台湾大学历史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等。这些

高校的满文档案编纂机构及满文档案编纂人员或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满文档案保藏机构合作,或为了学术科研也对一些满文档案进行选择性的编译或译注。进行满文档案编纂工作比较多的机构及人员有: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清朝历史。满文档案译著有《盛京刑部原档》;刘景宪,辽宁省本溪县人,语言学副研究员,1978 年 11 月至 1984 年 6 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工作,1984 年 6 月调入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任所长、副研究员,《满语研究》杂志主编。译著有《盛京刑部原档》、《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

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刘厚生,1961 年 9 月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满文班,1980 年 10 月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所任教至今。主要科研成果主要著作《清雍正朝镶红旗档》、《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合编)。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赵令志,内蒙古赤峰市人,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史、满族史的教学与研究。满文文献整理翻译成果《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与郭美兰等合译)、《〈闲窗录梦〉译编》(与关康合译)。

辽宁大学历史系,李林,编译《重译满文老档》三册和《汉译满文旧档》。

台湾大学,孔古尔·广禄(1900—1973),察布查尔锡伯营正蓝旗人(纳达齐牛录),号季高,清末锡伯营最后一位领队大臣富勒怙伦(字春圃,1852—1923)长子。1948 年被选为立宪后第一届立法委员。1949 年四月二十五日迁居台湾,从事满洲民族史研究,且在台湾大学讲授满文,1973 年病逝于台北市邮电医院。广禄著作《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第二册(李学智合著,1970—1971)。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庄吉发(1936—),台湾苗栗人。现任台湾师

范大学历史学系兼任教授。译注《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孙文成奏折》、《雍正朝满汉合辟奏折校注(第一辑)》等。

第三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类型

近代以来,第一部满文档案编纂的成果是金梁在 1929 年出版的《满洲老档秘录》,从此拉开了满文档案编纂的序幕。80 多年来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丰硕,其编纂类型也多种多样,按照满文档案编纂的内容、方式及满文档案的形成者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编纂类型。

一、从满文档案编纂的内容划分

满文档案的内容繁多,涉及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因而具体到每一个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其编纂的类型可以划分为清代编年史类、清代内务府庄园经济类、清代地方军政机构类、清代民族边疆问题类、清代中外关系问题类、清代有关国家统一问题类、清代科技类等。

1. 清代编年史类满文档案编纂

对清代编年史类满文档案的编纂。主要有:辽宁大学历史系编译的《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①]和《汉译〈满文旧档〉》[②];郭美兰编译,发表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中的《崇德七年奏事档》[③];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合译的《天聪九年档》[④];季永海、刘景宪译编的《崇德

---

①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8—1979 年。
② 李林《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9 年。
③ 郭美兰《崇德七年奏事档》,中华书局 1984 年。
④ 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天聪九年档》,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三年满文档案译编》[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译的《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译注的《满文老档》[③]；关孝廉编译，发表在《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上的《盛京满文旧档》[④]；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内阁藏本满文老档》[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⑦]、《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⑧]和《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⑨]等。

2. 清代内务府庄园经济满文档案编纂

对清代内务府庄园经济满文档案的编纂。主要有：季永海、何溥滢合译的《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⑩]；关嘉禄、王佩环译、佟永功校订的《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⑪]；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合作编纂的《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⑫]、《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 铨选 奖惩 宫廷用度 宫苑 进贡》[⑬]、《清代内阁大库

① 季永海、刘景宪《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 1988 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④ 关孝廉《盛京满文旧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辽宁民族出版社 2010 年。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1998 年。
⑧ 邢永福《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⑨ 冯伯群《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⑩ 季永海、何溥滢《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中华书局 1981 年。
⑪ 关嘉禄、王佩环、佟永功《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中华书局 1984 年。
⑫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年。
⑬ 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 铨选 奖惩 宫廷用度 宫苑 进贡》，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奖惩 宫廷用度 外藩进贡》①;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的《盛京参务档案史料》②、《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③、《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④;大连图书馆编的《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选编》⑤;程大鲲、孙建冰的《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一——五)》⑥等。

3. 清代地方军政机构满文档案编纂

对清代地方军政机构满文档案的编纂。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译编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翻译的《盛京刑部原档》⑧;刘厚生译、薛虹、栗振复校的《清雍正朝镶红旗档》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合编的《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⑩;关嘉禄译、佟永功校、王钟翰审的《雍乾两朝镶红旗档》⑪;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合编的《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⑫;张璇如、潘量隆主编的《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

① 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社科院《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奖惩 宫廷用度 外藩进贡》,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② 赵焕林《盛京参务档案史料》,辽海出版社 2003 年。
③ 辽宁省档案馆《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辽沈书社 1993 年。
④ 辽宁省档案馆《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辽海出版社 2006 年。
⑤ 大连图书馆《大连图书馆藏清代内务府档案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年。
⑥ 程大鲲、孙建冰《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一——五)》,《满语研究》2006 年第 1 期—2008 年第 2 期。
⑦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 1984 年。
⑧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 1985 年版。
⑨ 刘厚生、薛虹、栗振复《清雍正朝镶红旗档》,东北师大出版社 1985 年。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1988 年。
⑪ 关嘉禄、佟永功、王钟翰《雍乾两朝镶红旗档》,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⑫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贡品》[1]；王普文、潘景睦、李贵忠主编的《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军事》[2]；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的《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3]；辽宁省档案馆编纂的《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4]；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合编的《珲春副都统衙门档》[5]；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合编的《兴京旗人档案史料》[6]；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北京市民委古籍办编译的《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7]；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盛京将军奏折档》[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编译的《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9]等。

4. 清代民族边疆问题的满文档案编纂

对清代民族边疆问题的满文档案的编纂。大多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或独立编纂或与其他科研院所、高校合作进行的满文档案编纂活动，其成果有《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10]、《锡伯族档案史料》[11]、《清

---

① 张璇如、潘量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贡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王普文、潘景睦、李贵忠《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军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③ 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

④ 关嘉禄《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⑤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珲春副都统衙门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⑥ 赵焕林、杨丰陌《兴京旗人档案史料》，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

⑦ 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北京市民委古籍办《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⑧ [清]奕庆《盛京将军奏折档》，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

⑩ 吴元丰、赵志强《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锡伯族档案史料》，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

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①、《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②、《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③、《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④、《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⑤、《乾隆朝满文寄信档案译编》⑥；与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编译的《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⑦，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作编纂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⑧、《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⑩、《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⑪、《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⑫，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的《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⑬，与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编的《清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4 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史志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⑧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年。

⑨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年。

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年。

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年。

⑬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合编的《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②]等。

5. 清代中外关系问题的满文档案编纂

对清代中外关系问题的满文档案的编纂。主要有：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纂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④]、《中琉历史关系档案·乾隆朝》[⑤]、《中琉历史关系档案·顺治康熙雍正朝》[⑥]；邢永福、徐艺圃主编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四编》[⑦]；刑永福、谢必震主编的《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六编》[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邢永福、M. K. 阿布赛依托娃(M. K. Абусеитова)主编的《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合编，邹爱莲、M. K. 阿布赛依托娃(M. K. Абусеитова)主编的《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二)》[⑩]。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民族出版社 2001 年。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历史与地理研究中心《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③ 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华书局 1979 年。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 1981 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琉历史关系档案·乾隆朝》，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2009 年。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琉历史关系档案·顺治康熙雍正朝》，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年。

⑦ 邢永福、徐艺圃《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四编》，中华书局 2000 年。

⑧ 邢永福、谢必震《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六编》，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年。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年。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哈萨克斯坦东方学研究所《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二)》，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7 年。

6. 清代有关国家统一问题的满文档案编纂

对有关国家统一问题的清代满文档案编纂。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①、《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②、《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台湾文献汇刊 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莉的《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上、中、下)》⑤及《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⑥;北京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编的《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等编,邹爱莲主编的《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杨继波主编、汤开建等卷主编的《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⑨;浙江华宝斋书社的《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⑩;澳门基金会的《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⑪。

7. 清代科技类的满文档案编纂

对清代科技类的满文档案的编纂。郭美兰翻译的《乾隆初年修建

①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②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湾文献汇刊清初郑成功家族满文档案译编》,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⑤ 张莉《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上)、(中)、(下)》,《历史档案》1988 年第 2—4 期。

⑥ 张莉《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历史档案》1989 年第 4 期。

⑦ 北京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学苑出版社 1999 年。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 2009 年。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华宝斋古籍书社 1999 年。

⑪ 澳门基金会《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澳门基金会 2000 年。

沈阳故宫史料选译(上、中、下)》①;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沈阳市"一宫两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领导小组办公室,杨丰陌、赵焕林、佟悦主编的《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邹爱莲主编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③;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蒋克训、齐书勤、郭美兰主编的《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⑤;北京市地震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蒋克训、齐书勤、刘铮芸主编《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下》⑥。

二、从满文档案编纂方式划分

按照近代以来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公布形式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书籍的形式对满文档案进行编纂;二是在期刊上发表满文档案的翻译成果。

1. 书籍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书籍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是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最多的部分。由于满文档案记录符号的特殊性,因此满文档案的翻译在满文档案编纂中尤为重要。从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来看,主要是根据利用者的需求和

---

① 郭美兰《乾隆初年修建沈阳故宫史料选译(上)、(中)、(下)》,《历史档案》1997年第2—4期。

② 杨丰陌、赵焕林、佟悦《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2011年。

④ 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地震出版社2005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⑥ 北京地震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下)》,地震出版社2007年。

编纂者的编纂能力对满文档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翻译编纂，有译注、译编、汇编、影印。

(1) 满文档案的译注

满文档案的译注是对满文档案进行深层次翻译的成果，通过三种或两种文字将满文档案的原文、译文进行对照，充分表现满文档案翻译的过程，为利用者对满文档案进行深层研究提供方便。从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来看，满文档案译注成果有 14 种，主要是：①《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故宫文献馆李德启编译，1935 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出版，故宫印刷所印刷，1 册，译文 1 万字，对入关前军士杀敌、俘敌、掠获战利品的满文木牌和纸文书的考证、研究，共四十余件(其中木牌 26 件)。②《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广禄、李学智译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70 年出版，2 册，56 万字；本书译注体例首为满文之罗马字母转写，罗马字下对应译出汉字，即所谓"对译"，其下为汉语之译文。③《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第一辑)，庄吉发，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出版，1 册；该书选录了四十四件满汉合璧奏折，其中康熙六十一年(1722)一件，雍正元年(1723)四十三件。④《满文老档译注》，由神田信夫等译，东洋文库 1955—1963 年出版，共七卷，第一至三册为太祖卷，第四至七册为太宗卷，其中第四、五册属天聪朝，第六、七册属崇德朝。包括全文的罗马字转写和日译，称得上是日本满学界顶级的研究成果。

从满文档案译注的成果来看，主要进行满文档案译注编纂的是台湾和日本的学者，由于其所藏满文档案的数量相对较少，其更注重于满文档案编纂的过程，为学者研究满文档案提供深层次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2) 满文档案的译编

满文档案的译编成果，其所编纂的档案均为满文档案，编纂者先将满文档案翻译成汉文或日文再进行编纂，主要目的在于公布满文档案内容，为研究者提供满文档案史料。这种程度的满文档案编纂可以加

快满文档案编纂的节奏,同时为利用者提供了可以看得懂的满文档案,这种方式成本低,见效快,所以这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颇多。这一类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 39 种,主要有:①《满洲老档秘录》,金梁,1929 年版,铅印自刊,共 2 册,总字数为 54 450 字。②《汉译满文旧档》,李林译,辽宁大学历史系刊印,1979 年版,1 册,11 万字;该书系《清初史料丛刊》第二种。该书实系《天聪九年档》汉译本。据日本东洋文库丛刊第十八《旧满洲档》罗马拼音本,并参考日文译文,译补天聪九年的老档,该书转译自东洋文库本,其祖本仍是《旧满洲档》第九册。③《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院译编,辽沈书社 1984 年版,1 册,34.5 万字,收录乾隆六年至光绪三十二年的档案文件(主要是满文文件) 共 178 件。④《满文老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中华书局,1990 年出版,2 册,80 万字;满文老档原有 180 册,编年体记事,上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下至崇德元年(1636 年)。本书是以乾隆朝重抄本共二十六函,一百八十册为蓝本进行编译而成。⑤《盛京移驻伊犁锡伯营镶红旗官兵三代丁册》,新疆少数民族古籍办、北京市民委古籍办编译,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出版,共 1 册,31 万字。这是一部典型的旗人三代丁档,登记以户为单位,一丁一户,同时记录其父、祖。先记其名,次叙职衔或记功受封情况,再注陈、新锡伯或已故或阵亡情况。⑥《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作,吴元丰等编译而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本书的编译重点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月折包,时间起自雍正八年(1730),止于宣统三年(1911),所有条目先按地区分卷,然后在各卷内以档案形成时间的先后排序,共 12 册,900 万字,共收录 12 万余条目。

从满文档案译编的成果来看,主要进行满文档案译编主要是中国大陆的学者,由于其所藏满文档案的数量多,其更注重于为学者

提供满文档案史料而对满文档案进行翻译编纂，快速公布满文档案史料。

(3) 满文档案的汇编

满文档案的汇编成果，主要是其所编纂的满文档案在整个档案史料编纂内容中所占比例不多，满文档案编纂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涉及编纂的满文档案因选题的关系而被纳入档案史料编纂中来，使档案史料汇编内容更加完整丰富。这一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 35 种，主要有：①《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中华书局 1959 年出版，共 1 册，15 万字，其中满文译件 5 件。②《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李鹏年等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 年出版，共 1 册，37.4 万字，辑录清代满文档案 297 件。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部分)，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1 册，80 万字；该书辑录满文档案条目 13 040 条，时间起自天命七年(1622 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 年)。

这一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主要是由于清代档案在不同历史时期反映同类事件的档案语言文字不同，有汉文、满文、藏文、蒙文等。这样选题所涉及的档案史料就会包含一部分满文档案，这里满文档案的编纂使得档案史料编纂的内容更加丰富。

(4) 满文档案的影印

对满文档案进行影印是为了保持满文档案的原貌，方便读者的利用，但将原档进行影印出版，费用高。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以影印形式出版的有 27 种，主要有：①《年羹尧奏折》(专辑)，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编辑委员会编，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印行，1971 年出版；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所藏年羹尧汉文原折九十件，满文原折一九四件，满文函牍九件，满汉文上谕四十件并同以前所刊年羹尧奏折汇集成编影印出版。②《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央民族出版社 2001 年版。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中挑选出有关鄂伦春族的档案 311 件，按编年体编辑成册，所辑档案均按

档案原样影印，满文档案均逐件译成汉文附于书后。③《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索文清等编，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版；该书共汇总各种档案 154 件，汉满蒙藏文均有，影印出版，凡硃批、批红、印章均套红印刷。④《清代雍和宫档案史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和宫管理处合编，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该书辑录满文档案一千余件，虽未译成汉文，但逐件拟有汉文标题，完全照档案原件扫描出版。

影印出版满文档案虽然成本高，但可生动真切地把满文档案原貌传递给读者，不仅可增强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说服力，还可增强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艺术价值。

2. 期刊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期刊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是对满文档案进行翻译，然后在期刊上发表，以达到对满文档案内容公布的效果。虽然其公布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只占期刊内容的一部分，但其形式灵活，可以刊布随时发现编纂的满文档案，尽快地满足学者的研究需要。从期刊出版的连续性角度分为定期出版物和不定期出版物两种。

(1) 定期刊物公布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在中国大陆，公布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期刊有《故宫周刊》、《满族研究》、《满语研究》、《历史档案》。《故宫周刊》(1929—1936 年)是由故宫博物院创办的，其公布的满文档案史料是《汉译满洲老档拾零》，金梁等译，1933—1935 年连载，共刊出 215 期。《满族研究》由辽宁省民族研究所 1985 年创办，是满学研究的重要刊物，其公布的满文档案史料是《顺治元年清字记事档(十一月)满文翻译》，罗丽达译，1994 年第 4 期，共 1 期，满文档案 1 册 6 件。《满语研究》是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 1985 年创办，其公布的满文档案史料是《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共五册，程大鲲、孙建冰译，分别发表在《满语研究》2006 年第 1、2 期，2007 年第 1 期，2008 年第 1、2 期上，共 5 期，翻译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八十九粮庄比丁档 1 册 90 页。《历史档案》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在1981年创办,主要用于公布明清时期的档案史料,其公布的满文档案史料有20种,从1981年到1997年,共有25期,其名称发表时间列表如下:

表3-1 1981—1997年历史档案发表满文档案史料表

序号	史料名称	译者	发表时间
1	新发现的查抄李煦家产折单	任世铎、张书才	1981(2)
2	康熙年间吉林至爱珲间的驿站	孟宪振、任世铎	1982(3)
3	满文国史档选译	关孝廉、郭美兰	1982(4)
4	新译噶尔丹属下口供	徐凯、刘景宪	1982(4)
5	会考府准驳黄河海塘工程钱粮档案选	高振田、张莉、陈锵仪	1984(3)
6	顺治年间甘肃回民起义史料	张莉、高振田	1986(4)
7	乾隆五十四年中俄贸易史料选译	张莉	1987(3)
8	有关多尔衮史料选译	江桥	1987(3)
9	查访土尔扈特回归奏折选译	安双成	1988(2)
10	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上)	张莉	1988(2)
	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中)		1988(3)
	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下)		1988(4)
11	清初编审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	安双成	1988(4)
12	朱一贵余部抗清斗争史料	张莉	1989(4)
13	顺治十七年招抚赫哲等部族之人史料	安双成	1995(2)
14	康熙朝山西巡抚噶礼满文奏折选译	关孝廉、王小红	1995(4)
15	两江总督傅拉塔密陈于成龙等劣迹满文奏折	王小虹	1996(3)
16	两江总督阿山参劾张鹏翮满文奏折	关孝廉、沈原	1996(3)
17	山东巡抚佛伦密陈徐乾学等劣迹满文奏折	沈原	1996(3)

续　表

序号	史料名称	译者	发表时间
18	宗札布案满文译稿	安双成	1997(1)
	宗札布案满文译稿(续)		1997(2)
19	清初划一升斗史料	安双成	1997(2)
20	乾隆初年修建沈阳故宫史料选译(上)	郭美兰	1997(2)
	乾隆初年修建沈阳故宫史料选译(中)		1997(3)
	乾隆初年修建沈阳故宫史料选译(下)		1997(4)

在台湾,公布满文档案史料的期刊有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的《故宫文献》季刊,《故宫季刊》和《台湾人文》等。《故宫文献》第四卷第三期(1973 年 6 月)张葳译注雍正朝满文上谕九件。第四卷第四期(1973 年 9 月)刊载庄吉发译注康熙朝孙文成满文奏折十六件,张葳译注雍正朝满文上谕七件。第五卷第一期(1973 年 12 月)刊载潘淑碧译注康熙三十五年(1696)三月皇太子满文奏折一件,张葳译注雍正朝年羹尧满文奏折七件。《故宫季刊》第十一卷第二期(1976)刊载张葳译注雍正朝满文谕折及书稿十四件。《台湾人文》第二期(1978 年 1 月)刊载张葳译介康熙末年福建巡抚觉罗满保满文奏折十四件。

在日本,公布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期刊有《史学研究》、《书香》、《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其公布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①《满文老档邦文译稿》(太祖第一册)。鸳渊一、户田茂喜译,发表在 1937 年(昭和十二年)第 9 卷第 1 号的《史学研究》,共 1 期。②《满和对照满文老档》(太祖朝)。今西春秋译,自 1943 年 11 月第 15 卷第 11 号至 1944 年 12 月第 16 卷第 2 号,分 6 期在《书香》杂志连载,只连载到太祖第十册,共 6 期。③《〈太祖老档〉译注》。羽田亨译,1955—1964 年在《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分期刊载,期数不详。

(2) 不定期刊物公布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主要有《清史资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满学研究》。

《清史资料》,其中包含满文档案编译的有两辑:①《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出自《清史资料》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 年版;由季永海编译辽宁省档案馆馆藏《顺治年间档》中的满文档案 71 件,主要是顺治四年至八年北京总管内务府下达给盛京正黄、镶黄二旗包衣佐领的满文文书,其内容为清代宫廷与王公庄园的一些人丁和事务办理的具体情况。②《黑图档中有关庄园问题的满文档案文件汇编》,出自《清史资料》第五辑,中华书局,1984 年版;由关嘉禄编译,"《黑图档》是盛京内务府与北京总管内务府、盛京五部等部门来往公文的抄存稿"①,其中康、雍、乾三朝的抄存稿大部分是满文文件。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其中包含满文档案编译的有两辑:①《崇德七年奏事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一辑),中华书局,1984 年出版。《崇德七年奏事档》,1 册,满文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杂档》,郭美兰译。此外本辑中还有《使交纪事》,刘景宪翻译、关嘉禄校订,满文手抄本,由康熙二十二年出使安南使臣邬黑、明图、周灿所撰,包括正文、杂记、补遗三部分。②《盛京满文旧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四辑),关孝廉翻译,中华书局,1990 年版。其中盛京满文逃人档一册,共 148 件满文档案;盛京满文清军战报中有满文木牌 28 件,纸写档案 104 件;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共 38 件。

《满学研究》,其中包含满文档案编译成果的有两辑:①《顺治朝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安双成译,《满学研究》(第一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年 7 月。翻译满文档案 6 件,先对满文进行转写注音,再译成汉文。②《胤祯奏折选译》。张凤良、屈六生,《满学研究》(第四辑),民族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翻译满文档案 18 件,先对满文进行转写注音,再译成汉文。

① 关嘉禄《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辑刊》1998 年第 6 期。

三、从满文档案编纂的档案来源划分

满文档案来源主要是指满文档案的形成者，主要有清代的贵族、政府机构、边疆地域等，清代贵族满文档案主要是在处理国家军政大事的过程中形成满文档案；清代政府机构满文档案主要是清代中前期东北地方军政、内务府，清宫内务府、内阁、国史院等机构形成的满文档案；清代边疆地域满文档案主要是清代吉林、黑龙江、西藏、新疆、台湾、澳门等地区形成的满文档案。

1. 清代贵族满文档案编纂

清代的贵族如王公大臣、军事将领、宗教领袖在处理国家事务的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等，对这些人物的满文档案进行编纂的成果中，反映清代王公大臣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①、《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②、《康熙朝山西巡抚噶礼满文奏折选译》③、《两江总督傅拉塔密陈于成龙等劣迹满文奏折》④、《两江总督阿山参劾张鹏翮满文奏折》⑤、《胤祯奏折选译》⑥等；反映军事将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年羹尧奏折专辑》⑦、《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⑧、

---

① 李德启《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5年。
②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
③ 关孝廉、王小红《康熙朝山西巡抚噶礼满文奏折选译》，《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
④ 王小虹《两江总督傅拉塔密陈于成龙等劣迹满文奏折》，《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⑤ 关孝廉、沈原《两江总督阿山参劾张鹏翮满文奏折》，《历史档案》1996年第3期。
⑥ 张凤良、屈六生《胤祯奏折选译》，民族出版社1998年。
⑦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年羹尧奏折专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71年。
⑧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①、《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②、《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③;反映清代宗教领袖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④、《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⑤、《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⑥、《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⑦、《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⑧等。

2. 清代政府机构满文档案编纂

清代政府机构如清代中央机构、盛京各部、地方军政机构等国家机构在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满文档案,这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中,反映清代中央机构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⑨、《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⑩、《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 铨选 奖惩 宫廷用度 宫苑 进贡》⑪、《清代内阁大库

①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② 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清宫珍藏海兰察满汉文奏折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年。

④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0 年。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 年。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2002 年。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珍藏历世班禅额尔德尼档案荟萃》,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 年。

⑨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年。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9 年。

⑪ 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 铨选 奖惩 宫廷用度 宫苑 进贡》,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散佚档案选编·奖惩 宫廷用度 外藩进贡》①、《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②、《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③、《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④;反映清代盛京各部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盛京刑部原档》⑤、《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⑥、《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⑦、《盛京参务档案史料》⑧、《盛京将军奏折档》⑨、《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⑩、《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⑪;反映清代地方军政机构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⑫、《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⑬、《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⑭、《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⑮、《珲春副都统衙门档》⑯。

3. 清代边疆地域满文档案编纂

清代边疆地域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清代东北边

---

① 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社科院《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奖惩 宫廷用度 外藩进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邢永福《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吏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 冯伯群《雍正朝内阁六科史书·户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1985年。
⑥ 季永海《盛京内务府顺治年间档》,中华书局1981年。
⑦ 辽宁省档案馆《盛京内务府粮庄档案汇编》,辽沈书社1993年。
⑧ 赵焕林《盛京参务档案史料》,辽海出版社2003年。
⑨ [清]奕庆《盛京将军奏折档》,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年。
⑩ 辽宁省档案馆《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辽海出版社2006年。
⑪ 程大鲲、孙建冰《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一—五)》,《满语研究》2006年第1期—2008年第2期。
⑫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1984年。
⑬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⑭ 东北师大明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东北阿城汉文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
⑮ 关嘉禄《清代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汉文档案选编》,辽宁古籍出版社1995年。
⑯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珲春副都统衙门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疆为清朝的发源地而形成满文档案，西北边疆、西南边疆由于迁徙和建设地方而形成满文档案，东南边疆由于清初国家统一而形成满文档案。这些满文档案的编纂成果中，反映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①、《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贡品》②、《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军事》③；反映清代西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④、《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⑤；反映清代西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⑦、《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⑧；反映清代东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有《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⑨、《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⑩、《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⑪、《明清宫藏台湾档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1988年。
② 张璇如、潘量隆《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贡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③ 王普文、潘景睦、李贵忠《清代吉林档案史料选编·吉林军事》，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史志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⑦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⑪ 北京天龙长城文化艺术公司《清代台湾档案史料全编》，学苑出版社1999年。

案汇编》①、《明清台湾档案汇编》②。

第四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体例与加工方法

一、满文档案编纂的体例

满文档案的编纂由于时间及编纂人员各不相同，其体例的形成是一个从不规范到规范划一、逐步完善的过程。

1. 满文档案编译的体例

满文档案编纂与其他类档案编纂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对满文档案进行翻译，也就是对满文档案进行编译。对满文档案编译要有一定的体例，根据满文档案编纂的成果来看，满文档案编译的体例按所记录的文字分为三种，一为三种文字对照，包括转写注音并译注翻译、抄录原文和转写并译注翻译；二为两种文字对照，包括影印原文并附录汉文翻译、影印原文并书后集中附录汉文翻译、转写满文原件并翻译；三为单一文字翻译，有汉译和日译。

(1) 三种文字对照

第一，转写注音并译注翻译。就是对满文档案原文进行罗马字母转写，其实也是对满文档案原文进行注音，注音的方式绝大多数使用的是罗马字母转写，然后在罗马字之下逐字汉译，即所谓的“对译”，其下为汉文意译。此种满文档案翻译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厦门大学《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九州出版社 2009 年。

② 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明清台湾档案汇编》，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2009 年。

《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一、二),广禄、李学智译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专刊。其译注采用直译法,以"信"字为首要,从忠实的译注中,表达原有满洲人的纯朴。译注的方法是,将老满文原档中,逐页、逐行、逐字地将每一老满文单字,以罗马字拼写的方法,注出每一老满文的读音,再将每一老满文单字的字义,酌以适当的汉文单字排于每一老满文单字注音之下。注音采用的是满文罗马音注,原则上以 P. G. von Mollendorff, A Manchu Grammar 所用的新满文注音法。关于译注的文法结构,本书的一些满文成语,以及一些特殊的文句,汉译时倒换次序①。

这种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以页为编纂单位,先是满文档案原文的罗马字母转写,每行罗马字母之下是逐字汉译,这之下是这段满文档案的汉文意译。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译文的作用相当于本书的注解,而由于有了全文转写,读者可以直接根据原文进行研考②。

第二,抄录原文和转写注音并译注翻译。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式与满文档案三行对照编译大体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抄录原文和转写并译注翻译的方式将满文档案原文进行了抄录,并放在满文档案注音之前。这种编译体例多用于满文档案史料的摘译。此种满文档案翻译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

《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庄吉发译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出版,1983年6月再版;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八、第九两辑,是康熙年间的满文谕旨、奏折、咨文、供词及清单等,其中有关清朝征讨准噶尔的文书,件数很多,史料价值非常高。清初纂修《圣祖实录》、《平定朔漠方略》及《起居注册》等,根据当时的满文谕折等文书摘译而成,但润饰删略甚多,其中的一些谕折,实录

①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专刊,第15—18页。
② 阎崇年《20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47页。

馆、方略馆等也没有译成汉文。此书选译了有关清代准噶尔史料的部分谕折,并参考《起居注册》,略作补充。为便于查阅,特据谕折原文辑录重抄,逐件注出罗马拼音,标明单字意义,然后译成汉文,满汉对照①。

这种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每两页为一个编纂单位,左手页为满文档案抄录文,右手页为满文档案原文的罗马字母转写,每行罗马字母之下是逐字翻译的汉文,这之下是这段满文档案的汉文意译。

(2) 两种文字对照

第一,影印原文并附汉文翻译。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法的体例是将收录的满文档案原件影印,在其后附有汉译文,并在标题上加括号注明原件的文字种类。这种方式既可以看到原件,又可以看懂满文档案,方便读者对满文档案的利用。使用这种方式对满文档案进行编纂的成果如《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下卷)。

《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北京地震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北京地震出版社 2005 年出版。《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下》,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北京地震出版社 2007 年出版。其对收集的满文档案影印出版,注明出处,附以汉译文,并在标题注明"(原件系满文)",对其标题、注释内容、朱批等,配英译文,以方便国内外读者阅览。

第二,影印原文并书后集中附录汉文翻译。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法是将收录的满文档案原件按照时间或专题影印,保持满文档案的原貌,逐件译成汉文,集中编排,附录于书后,便于不懂满文的读者查阅利用。此种满文档案翻译方式最典型的例子是《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汇编》。

《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对其所辑的满文档案

① 庄吉发《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文史哲出版社 1977 年,序Ⅱ。

原则上按行文或具折时间的先后顺序在整本书中编排，无行文或具折时间者，按收文或朱批时间编排，并加标※号；凡考证的时间，均加标[ ]号，以示区别。对其所辑的满文档案按档案原样影印，但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缩小，然后逐件译成汉文，依次附于书后。在满文档案的汉译过程中，所遇人名和地名，凡能在工具书里查到者，一般都照用；无法查到者，则依据《满文档案著录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内附录 A《著录用满汉对音字》译写。其他一些专用名词，若有对应的汉名，则沿用；若无对应的汉名，或在工具书中查不到者，均采用音译。凡遇到的缺字加标□号，漏字加标[ ]号，错字加标( )号。所辑的满文档案由编译者拟出标题，编制目录。由于满文档案占大多数，对所辑的满文无任何标注。

第三，转写满文原件并翻译。这种满文档案编译方法是将满文档案原件进行转写注音，然后进行翻译。使用这种方式多见于以期刊形式发表的满文档案编译成果，如《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

《康熙二十九年盛京包衣粮庄比丁册》，程大鲲、孙建冰译编，共五册，2006—2008 年发表在《满语研究》上。以罗马字母转写原文，汉文译文附后。每段末尾页号为译者所注，文件中的残缺之处，倘字数可知者用□，未知者注用……。

(3) 单一文字翻译

单一文字翻译，就是直接出版满文档案的译文部分。从所译的文字来看有两种，一种是日译，另一种是汉译。对满文档案进行汉译或日译出版，可以加快满文档案编纂的节奏，同时为利用者提供了可以看得懂的满文档案，这种方式成本低，见效快，所以这类满文档案编纂成果颇多。

2. 满汉合璧档案编纂的体例

满汉合璧档案由满文和汉文两部分内容构成，汉文部分在右，其书写方式是由上而下，由右而左；满文部分在左，其书写方式则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在一件文书中对大致相同内容使用满汉两种文字来书写。因而，满汉合璧档案的编纂也是满文档案编纂特色之一，与纯满文档案

编纂相比，更有自己的特色。根据满文档案编纂的成果来看，可以根据文字的种类分为三种方式，一是编纂汉文内容，仅对其汉文部分进行编纂出版；二是影印满汉合璧原件；三是编纂三种文字对照，将满文部分进行译注，形成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注音、汉文原文三段式对照。

(1) 编纂汉文内容

只编纂汉文内容，主要是由于满汉合璧档案原件由满文和汉文构成，为同一事件两种文字叙述，故仅对其汉文部分进行编纂，并对汉文内容进行标点出版。这一类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清代内阁大库散件档案选编・皇庄(下)》、《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奖惩 宫廷用度 外藩进贡》、《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盛京参务档案史料》等。

《清代内阁大库散件档案选编・皇庄(下)》，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共 34 万字；所收档案均选自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中有关皇庄部分自雍正至道光四朝的满汉合璧文本，共 168 件。剔除残本档、内容相似档；对其汉文部分点校，对错字在()内改正，漏字在[]内酌补；对每件档案加标题，将原件文尾所署朝年月日移至每件标题之下；在每件正文之后均注明“原件满汉合璧”及其类别排号。

《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编，吴元丰、白英主编，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年出版，共 140 万字，满汉文档案 311 件，其中满汉合璧档案 24 件。所辑档案均按原样影印，满汉合璧档案在其标题后，注明“满汉”。

《盛京皇庄档案史料选编》，辽宁省档案馆编，辽海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共 1 册，档案 544 件，其中一部分是满文档案，其余为满汉合璧及汉文文件。该选编是按档案文件形成时间顺序编辑，由清嘉庆元年始至“中华民国”四年止。整理者对档案文件进行翻译点校后自拟文件标题，并集于书前形成目录。

《盛京参务档案史料》，辽宁省档案馆编译，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3

年出版,34 万字,547 件档案,按时间顺序排列,只对整份文件均为满文的文件标注“满文”,满汉合璧文件不再另行标明文种。

(2) 影印满汉合璧原件

影印满文档案,主要是为了将满文档案的原貌呈现给利用者,展现满文档案的原始记录,而满汉合璧档案由满文和汉文两部分组成,满文和汉文相互参照,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档案记录形式。

如《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合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年影印出版。收录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档案馆所藏的珲春协领和副都统衙门的档案。其中绝大部分是簿册类档案,少部分是折件类档案,其中满汉合写的档案占三分之一。

(3) 三种文字对照

采用三种文字对照对满汉合璧档案编纂,是将满文部分进行译注,形成满文原文、罗马字母转写注音、汉文原文三段式对照。最典型的例子是《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

《雍正朝满汉合璧奏折校注》,庄吉发校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4 年出版。庄吉发先生认为,满汉合璧奏折的内容,可以满汉文字互相对照,从满文部分的叙述,有助于理解满文的词义,从汉文部分可以补充满文的疏漏。对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和雍正元年二月初二日至九月二十日的满汉合璧档案进行了校注。校注为三段文字对照,第一段是手写满文部分,从上到下,从左至右;第二段是罗马字母注音;第三段是汉文部分,最后在书后还列出其对内容的注释。

二、满文档案的编纂加工方法

满文档案是档案类的一个特殊种类,其编纂方法要符合其特殊性,满文档案的特殊性在于其文字不能被多数的利用者所应用,对其进行编纂就要以方便利用者为前提进行编纂。满文档案编纂所进行的加工

处理，使得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利于读者研究学习。

1. 满文档案材料的考证说明

满文档案是满文档案编纂的支撑材料，对满文档案的考证和说明最能表现出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质量。满文档案的考证和说明包括：对满文档案所涉及的史实内容，满文档案的来源、版本，所编纂满文档案的件数或册数，满文档案编纂的起因、主旨，史料的价值等等。满文档案的考证说明主要表现在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序言、前言、编辑说明或凡例中。

序言多为名家所写，如《年羹尧奏折专辑》的序言由蒋復璁所作，由于《年羹尧奏折专辑》是以人物为专题的档案汇编，序言首先介绍年羹尧生平，然后对年羹尧奏折来源、件数进行说明，具体内容如下：

> 年羹尧，清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九年进士，累官至内阁大学士、四川总督兼巡抚。……
>
> 本院自成立以来，即庋藏原在懋勤殿之年羹尧折档至夥。民国二十三年间，本院先后在掌故丛编及文献丛编等刊物中刊布其部分奏折，至为学界重视。近以《故宫文献》季刊发行第二周年，且欣逢我建国周甲之庆，特将院藏年羹尧汉文原折九十件，满文原折一九四件，满文函牍九件，满汉文上谕四十件并前已刊诸折，汇集成编，并附录其传记资料，继袁世凯原折专辑之后，续印故宫文献特刊第二集，俾此珍贵史料，得广其传，庶几治史者有资考订，而于清史研究，或不无涓埃之助也。
>
> 中华民国六十年十二月海宁蒋復璁谨序①

再如《雍乾两朝镶红旗档》②的序言由王钟翰所作，其对《雍乾两朝

①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年羹尧奏折专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 1971 年，序言。

② 关嘉禄、佟永功、王钟翰《雍乾两朝镶红旗档》，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镶红旗档》编纂的起因、价值及来源进行了考证和说明。

前言大部分都是由编者所写,满文档案所涉及的史实内容、满文档案编纂的起因、主旨,史料的价值等等。如《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①]的前言主要是对所编纂的满文档案的内容进行了说明,将整个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再如《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②]的前言首先对珲春副都统衙门的建置进行了说明,也就是对满文档案内容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其次对其机构的满文档案数量进行了统计,约占十分之一;最后对本编的编纂情况和内容划分进行了说明,收录档案 1 700 件,分成上、中、下三卷。

编辑说明或凡例也有对满文档案进行考证和说明。如《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③]的"本书序例"首先说明定名原因是为了纪念康熙统一台湾三百周年。然后对所选档案的内容范围、件数、来源进行了说明。再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的《满文老档》的凡例中所编纂的满文档案的册数版本进行了说明,说明如下:

> 《满文老档》乾隆朝重抄本共二十六函,一百八十册,其中天命朝十函,八十一册;天聪朝十函,六十一册;崇德朝六函,三十八册。本书就以该版本为蓝本译注的。[④]

2. 满文档案文件标题的拟定

编纂满文档案时,所选的满文档案原件上没有标题,或者原有标题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 1988 年。

② 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

③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满文老档》,中华书局 1990 年。

不符合编纂的要求，编者通常根据内容拟定标题，进行文件目录的编制。总的说来，标题的组成部分为责任者职称、姓名、事由、文件种类，但这并不是统一的格式，各个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拟定标题方法参差不齐，如《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的编辑体例对拟定标题是这样规定的：

二、本书所辑各档均由编者据内容拟定标题，并编有文件目录。文件目录包括：文件序号、作者、事由、档案名称、在本书中所处位置等项。附件亦编有相应页码。凡文件作者两人以上者，只列领衔具文者。具文者不详的，以□□□表示。经本书编辑证出的具文者加【】标注。①

再如《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其档案卷编辑说明如下：

四、本书所辑档案，编者逐件撰拟标题。标题一般由如下几部分组成：官衔、作者、事由、收文者、文种。各文种情况不一，故略有变通。标题力求客观、准确、规范，如国名直称“英国”，而不写作“英吉利”；澳门的多种写法与称谓，标题中统一写作“澳门”；文内“番”、“夷”字样照。历届澳门总督，译名不一，均照录各件原文字样；原件上没有明确姓名的，标题中统称“澳门总督”。同一官员，同一官职，其官衔不论文内如何开具，在目录标题中均作划一。②

此外，还有书内的满文档案文件所拟定的标题与目录中的标题并不同，一般目录中的标题要比书内的更详细。如《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哈关系档案汇编(一)》，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年，编辑体例部分。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档案卷编辑说明第 1 页。

料选编》(第三编)的编例中说明如下:

> 九、本书所辑之各件档案,均由编者拟加标题,并标点,分段。每件具文者之官衔职称及姓名等等,具详于目录中,书内各件之标题概从简略,或略去具文者之官衔职称,或略去具文者之姓名。①

3. 满文档案行款格式的处理

从上文对满文档案成果出版形式的分析来看,对满文档案原有的行款格式有变动处理的有两种类型:一是只进行汉译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二是对满文原文进行罗马转写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汉译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不再按照满文档案文件原文的格式排印,从开头到落款,按文字顺序或横排或竖排为一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编纂的满文档案成果采用竖排的如《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②,其文字采用竖排,而辽宁省档案编纂的满文档案成果主要采用横排。此外对诸如题本、奏本、奏折等则去除抬头。

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凡例中规定:

> 十二、原奏折中因封建礼仪等原因而采取的抬头等格式,经翻译后不予保留译者视译文之长短进行分段。③

再如《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铨选 奖惩 宫廷用度宫苑 进贡》凡例中规定:

---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中华书局1979年,编例第1页。

②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5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凡例第1页。

11. 凡谕旨及有关庙堂寺院等处，一律不抬头。①

4. 满文档案内容的校勘

满文档案内容的校勘主要是对满文档案中的错别字、缺字、原文增改的痕迹、删节等处用符号进行标注。

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凡例对校勘的说明，包括原作者对内容的行批、增改的校勘和原文因年久残缺的校勘：

四、凡奏折内皇帝的亲笔批语，均标明“朱批”二字，分别排于简端、尾幅，其行批以及增写、改写的字句，则用（）号，有些满文字则用罗马字转写，排于相应的文句之下，以供读者参考。折子内被皇帝删去的文句，用[ ]号表示。

五、奏折内凡残缺、脱落、污损，不能辨认为何字者，均用【】号表示，内写“原档残缺”等字样。②

此处的原档残缺是在校勘符号中标注，还有的是在标题后用“（原档残缺）”来说明。

再如《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中对删节处、大段残缺者的标注进行了说明：

七、本书所辑档案，一般均全文发表，个别与主题无关者，则酌加删节，并用〈上略〉、〈中略〉、〈下略〉字样注明。凡补漏文字，以[]号标明；勘误之处，以（）号标明；疑系错别字，在该字之后加注?，并

①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职司铨选 奖惩 宫廷用度 宫苑进贡》，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年，凡例。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凡例第 1 页。

处加()号标明;原件个别残缺或无法辨认的文字,以□号标明;大段残缺者,以〈上缺〉、〈中缺〉、〈下缺〉字样表示。①

5. 满文档案的编排顺序

在满文档案的编排体例上,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时间;二是按专题。

按时间顺序编排满文档案,就是按时间顺序单层编排各文种档案文件,既简便又实用,一般做法是按照档案文件的成文时间为序,如折片是以原奏日期为准。原档未标志时间的档案文件则放在每个专题之后。如《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其档案卷编辑说明对按时间编排满文档案有详细的原则:

三、本书所辑档案,采用编年体,按具文时间依次编排。没有具奏、发文时间者,则按朱批或收文时间编排,其前一律标明“※”。有年月无日期者,编在该月之后;有年无月日者,编在该年之后;有朝代无年月日者,编在该朝之后。没有明确时间者,根据考证推定的时间,附于有关朝年月日之后,加注说明。同日有数件文件者,依次按谕旨、题奏、官衙往来文书三类排列;同日数件同种文书,按作者官阶大小排列。有主附件关系的文件,主件在前,附件在后。每件文件之时间,均标清代纪年和与之相对应的公元纪年,原件日期以干支记载或以韵目代日者,均经编者覆查中西纪年标出。②

这其中以主附件关系排列档案,既符合了按时间排列顺序,又突出了档案文件的价值和编排的思想倾向性,考虑到所编纂档案的重要

①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 年,序例第 1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人民出版社 1999 年,档案卷编辑说明第 1 页。

程度。

又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凡例对编排顺序的说明，这里更具体了对正件、附件的编排体例：

> 一、本书为编年体例，按具折（发文）的年月日为序，统一编定顺序号。正件带附件，则其附件不编顺序号，仍附于该正件之后，并注明“附”字；无正件者，则编写顺序号。原折只写明年月而没有日期者或只有年代而无月日者，则分别编排于该月或该年之后。只能考定其为康熙朝而无年月日者，均编排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之后。①

再如《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的编例中说明，对来往的不同文种档案的排列方式，如下：

> 三、本书所辑档案之编排体例，概以清方文件为主，作为正件。凡俄方来文，均作为附件或附录，附于清方有关文件之后。附件与附录的区别是：凡属正件内指明要附之件，称为附件。凡不属正件指明要附之件，而其内容与正件有关者，则作附录。其中个别俄方来文，因无相应之清方文件，则根据其内容和时间，适当附于相近之清方文书之后，并加注说明。凡正件均按时间先后编列顺序号；凡附件和附录，不编顺序号，也不严格以时间为序。②

这里对来往的对外关系档案进行了保持其内在联系的排列方式，对其中有特殊情况的档案进行了附录处理，同样是在时间顺序下的巧妙编排。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凡例第 1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 1981 年，编例第 7 页。

按专题编排满文档案，就是采取专题和时间相结合编排满文档案。在每一专题内再按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

如《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和《年羹尧原折专辑》就是以专题形式进行编排的。在《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代前言中对编排体例进行了如下说明：

> 将这些奏折分为满文奏折和汉文奏折、奏片两部分，均按时间顺序排列，无年月奏片依台湾故宫博物院《年羹尧奏折》中原来的顺序排列，其中一部分考证了时间，附注页下。①

这是对编纂材料进行文种—时间两层进行编排。再如《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②也是两层编排，按档簿类和折件类两大系列推出，系列内采用编年体例。第一期档簿类，辑录造办处档簿五千余部，总计出版一百十一册；第二期折件类，辑录造办处折件类档案七万余件出版九十册，年代自康熙至宣统。

此外，还有进行三层编排的例子——《锡伯族档案史料》，其凡例中的说明如下：

> 三、本书按地区—问题—时间的原则编辑。每一问题的文件，原则上按具文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具文、收文或朱批时间皆有者，将具文时间置于文前，收文或朱批时间置于文后；无具文时间者，以收文或朱批时间编排，置于文前，并加以注明；具文、收文或朱批时间俱无者，推定大致时间，并加注说明。③

---

① 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年，代前言第 3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锡伯族档案史料》，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年，凡例第 9 页。

6. 满文档案的文种来源注明方式

从满文档案编纂情况来看，满文档案大多出自不同的全宗所属，而同一汇编内并不只有满文一种文字的档案，还有可能包括满汉合璧档案或汉文档案，所以满文档案工作者在编纂的过程中对所编纂的档案的种类、来源进行了标注。对满文档案文件较多的成果中，主要标注的汉文文件或满汉合璧文件；对汉文档案文件较多的成果中，主要标注的满文文件或满汉合璧文件。其主要标注方法是在编纂成果的目录或文件的标题后或文件的结尾在括号()内注明其文种，或注明其出处来源，如“选自满文密本档”等语。对来源的注明也是以“选自某某档”为主。

对于文种的注明，如《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中的凡例对档案文种注明方式说明如下：

> 十、本书所辑档案共计 311 件(不包括附件)，其中满文档案 259 件、满汉文合璧档案 24 件、汉文档案 28 件。凡满汉文合璧和汉文档案，在其标题后，分别注明“满汉”、“汉”等字，并加()号。标注为“满汉”者，即指满汉文合璧档案；标注为“汉”者，即指汉文档案；无任何标注者，即指满文档案。①

再如《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凡例的说明：

> 十一、凡在译文中所遇遍查无考的专名等用圆括号，内用罗马字转写满文字原音，以资读者参考；凡系汉文原件也用此圆括号，内写明“原件系汉文”等字样，以与译文相区分；有些原折和折片看不出文件作者，是以在文件标题中，用圆括号内注出“佚名”二字。②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蒙古鄂伦春民族研究会《清代鄂伦春族满汉文档案汇编》，民族出版社 2001 年，凡例部分。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黄山书社 1998 年，凡例第 2 页。

对于来源的注明,如《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的序例:

六、凡选译自满文票签档、六科史书、满文题本等档案者,均在该件末尾注明出处。凡未注明出处者,均选译自满文密本档。①

从其第一页的译文来看,在译文的末尾注明的是"(译自满文票签档)"。还有以"×卷×页"的形式来注明出处,如《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说明如下:

5 文件末尾注明出处,即×卷×页,系指所在《三姓副都统衙门档》之卷、页。②

再如《中琉历史关系档案》③(乾隆朝一)对档案要求注明原辑录某编、某页及所属全宗及文种。

第五节 满文档案编纂的特点和规律

以上对满文档案的主体、客体和编纂方法进行了例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满文档案编纂的特点和规律进行总结和概括。

---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序例第 1 页。

②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院《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 1984 年,译编说明第 3 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琉历史关系档案·乾隆朝》,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2009 年。

一、满文档案编纂的特点

满文档案编纂从金梁汉译《满文老档秘录》起，至今已近 100 年的历史，从满文档案史料编纂的实践活动中，可以总结出许多具体的满文档案编纂的特点。

1. 满文档案编纂参与力量的社会性和国际性

纵观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满文档案编纂的参与力量，从近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从中央、地方专门机构，社会专业机构到民间专业学者，是一个社会性和国际性的大参与。

早期的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就是由民间的学者发起的，金梁组织的满文档案编纂，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对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的编译，日本的鸳渊一、户田茂喜、藤冈胜二、今西春秋等对满文老档的译注，都是非官方的满文档案编纂。虽然分布零散，满文档案文献发现稀少，编纂方法粗略，但是他们开启了满文档案编纂的大门，为后辈奠定了基础。早期的官方满文档案编纂主要有故宫博物馆文献馆李德启进行的满文档案编纂，是对文献馆在整理中发现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所进行的编译。

建国后由于大量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满文档案编纂参与力量更加多样化，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院其下的满文档案编纂机构在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其前身如故宫博物馆文献馆等）的满文部整理组和翻译组、日本东洋文库的清代史研究室、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专门机构，积极开展了满文档案编纂工作。辽宁省档案馆的历史一部、大连图书馆的文献研究室等地方性的专门机构，也普遍开展了满文档案编纂工作。而科研院所、高校的满文专家、学者等，由于学术研究或开展学术项目，也进行大量的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如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关嘉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刘景宪、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赵令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

的庄吉发等。此外,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院联合社会专门研究力量参与满文档案编纂成为一种新的合作形式。

可以说在满文档案编纂运作方面,以小众单一运作向大众合作化运作发展,包括机构之间、馆藏档案内容的合作。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例,该馆先后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鄂伦春民族研究会等进行联合编纂满文档案,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专业力量的参与,既充分利用了满文档案编纂的社会资源,又提高了编纂水平,也扩大了编纂成果的社会影响。

2. 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类型的广泛性

近百年来,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编纂成果的类型也具有广泛性。

(1) 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内容广泛

从内容上讲,满文档案编纂主要是为史学研究服务的,公布满文档案史料。

从时间上来看,近代的满文档案编纂内容比较单一,编纂的对象主要是发现的《满文老档》。金梁、东北大学文科研究所、日本的今西春秋等所编纂的满文档案都是沈阳故宫崇谟阁的满文老档,此外就是故宫博物馆文献馆在整理中发现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满译俄国来文原档。建国后由于满文档案的大量整理,为满文档案的编纂提供的良好的内容条件,其所编纂的满文档案有清代编年史类满文档案、清代内务府庄园经济满文档案、清代地方军政机构满文档案、清代民族边疆问题的满文档案、清代中外关系问题的满文档案、有关国家统一问题的清代满文档案、清代科技类的满文档案等。

从地域上来看,大陆编纂的满文档案主要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内阁满文档案、军机处满文档案、宫中满文档案、内务府满文档案、宗人府满文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满

文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满文老档、清代设在盛京管理皇室事务机构档案(顺治年间档、黑图档和盛京总管内务府档)、清代东北地区旗务机构档案中的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等，大连市图书馆所藏的清代北京皇宫内阁大库散佚的档案。从内容上来看，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宗教、外交和科技等方面。台湾编纂的满文档案主要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宫中档中的满文档案、军机处满文档案和内阁档中的《满文老档》原档，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老满文散页等。

(2) 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方式广泛

从编纂方式上讲，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分为书籍类和期刊类两种。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大多以书籍的形式进行编纂，按照对满文档案的翻译程度分为译注、译编、汇编、影印等种类，这其中以译编和汇编的成果最多，这两种方式成本低，编纂节奏快，大陆的满文档案编纂大多采用这两种方式。译注充分表现满文档案翻译的过程，为利用者对满文档案进行深层研究提供方便，中国台湾和日本所收藏的满文档案较少，其对满文档案进行了深入性的编纂，大多采用了这种方式编纂出版满文档案。而满文档案的影印出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满文档案的原貌，但成本高，以这种方式编纂出版满文档案的成果并不多。以期刊方式公布满文档案的起源也比较早，在 1933 年，金梁等编纂的《汉译满洲老档拾零》就是以期刊的方式在《故宫周刊》上公布满文档案。此后，中国内地的《历史档案》、《满族研究》、《满语研究》，中国台湾的《故宫文献》季刊、《故宫季刊》和《台湾人文》等，日本的《史学研究》、《书香》、《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等，都是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公布的定期刊物。此外还有《清史资料》、《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满学研究》等不定期刊物同样也公布满文档案编纂成果。

(3) 满文档案编纂成果档案来源广泛

满文档案来源主要有清代的贵族、政府机构、边疆地域等。形成满文档案的清代贵族有王公大臣、军事将领、宗教领袖，反映清代王公大

臣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①；反映军事将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年羹尧奏折专辑》②；反映清代宗教领袖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③；形成满文档案的清代政府机构有清代中央机构、盛京各部、地方军政机构，反映清代中央机构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④；反映清代盛京各部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盛京刑部原档》⑤；反映清代地方军政机构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⑥。形成满文档案的清代边疆地域有清代东北边疆、西北边疆、西南边疆和东南边疆，反映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⑦；反映清代西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⑧；反映清代西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⑨；反映清代东南边疆的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如《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⑩。

---

①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中华书局 1975 年。
② 国立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年羹尧奏折专辑》，国立故宫博物院 1971 年。
③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六世班禅朝觐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6 年。
④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连市图书馆文献研究室、辽宁民族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皇庄》，辽宁民族出版社 1989 年。
⑤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京刑部原档》，群众出版社 1985 年。
⑥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故宫博物馆《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辽沈书社 1984 年。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部《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1988 年。
⑧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4 年。
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9 年。
⑩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3. 满文档案编纂方法的多样性

从时间上看,民国时期的满文档案的编纂方法粗糙,从编纂体例上来看,主要是将满文档案进行汉译或日译,只注重满文档案编纂的结果,对其编纂过程并没有很好的体现,没有从利用者的角度去考虑编纂成果的方便利用,更有甚者在编译的过程中将与编纂内容相似的汉文内容稍做改变就作为译稿,无视满文档案的内容价值。在对满文档案编纂的加工过程中,缺少对满文档案编纂加工的说明,以至于现今对其当时的满文档案编纂过程无从得知。建国后满文档案编纂方法多样且细致。从满文档案编纂体例上来看,主要是从利用者对满文档案的利用需求来确定满文档案的编纂体例,对满文档案编译的体例按所记录的文字分为四种——三种文字对照、两种文字对照、单一文字翻译和影印;对满汉合璧档案编纂的体例可以根据文字的种类分为三种方式——编纂汉文内容、影印满汉合璧原件、编纂三种文字对照。三种或两种文字对照的体例可以全面的为利用者展现满文档案的原貌,呈现出满文档案编译的过程,而单一文字翻译、影印、编纂汉文内容可以快速地出版满文档案并同时为利用者提供比较全面的满文档案内容。此外,在编纂形式上,采用了影印、扫描、发行缩微品等手段编纂公布满文档案资料。从满文档案编纂的加工来看,对满文档案编纂加工的说明比较详细,大部分的满文档案编纂都对其满文档案材料的考证、满文档案文件标题的拟定、满文档案行款格式的处理、满文档案内容的校勘、满文档案的编排顺序、满文档案的文种来源注明方式进行说明,可以看出其满文档案编纂的过程。

从地域上看,大陆满文档案编纂体例相对单一,多以影印或单一文字翻译的形式进行编纂,主要是因为满文档案数量众多,满文档案编纂任务重,且为尽快给利用者提供满文档案史料,加快满文档案编纂的速度,影印或单一文字翻译可以快速对满文档案史料进行出版公布。台湾的满文档案编纂体例比较有深度,主要是指对部分的满文档案进行了深入性的编纂,大多采取直译法译注,或三种文字对照或两种文字对

照，将满文档案的原文、满文档案译注的过程、满文档案翻译的结果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日本满文档案编纂方法既深入又具有扩张性。深入性主要是指其满文档案编纂进行了详细的三种或两种文字的对照译注，扩张性是指其不仅对所收藏的满文老档和镶红旗档进行了详细的编纂译注，而且还对台湾影印出版的《旧满洲档》的部分满文档案进行了编译出版。

二、满文档案编纂的规律

满文档案编纂历经百年，在这个过程中，总有它发展存在的规律，研究报告从满文档案编纂的目的、核心因素出发，来总结满文档案编纂的规律。

1. 满文档案信息共享是满文档案编纂最终目的

满文档案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具有原始记录性，真实地记录了清朝统治的历史过程、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情况，而清朝中央和地方各级衙门在文书档案的管理方面，“特别注意为行政管理和编修历史提供便利条件，按年代时序排列和收藏，或者按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分别汇抄(或记录)成档册”①，这就使满文档案比较有系统性。满文档案的原始记录性、真实性和系统性决定了满文档案对于古今社会诸学科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是研究清史、民族史、边疆史与地方史的重要资料，是同时期汉文档案的补充和凭证。总之，编纂满文档案，为我们全面、系统、深入地了解清朝入关前和入关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事宜，为研究清史、满学、中国边疆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清代文化等共享了十分重要的史料信息。

历史不可能重演，但满文档案再现了历史，而满文档案的唯一性、

① 鞠德源《清代的编年体档册与官修史书》，《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281页。

语言障碍及满文档案管理上的原因使得对满文档案信息内容的利用存在障碍，而对满文档案进行编纂，编译满文档案，使得满文档案信息得到开发，编纂成为满文档案文献出版物，将满文档案信息共享到全社会，实现满文档案编纂的最终目的。

2. 满文档案编纂参与力量是满文档案编纂的核心因素

满文档案编纂工作的开启与发展最关键的因素是满文档案编纂的参与力量，从近代到现代，从国内到国外，各类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科研院所、高校系统的机构广泛参与，满文档案编纂工作不断深入，满文档案编纂成果不断增多。以下是对满文档案编纂参与力量按系统分布进行了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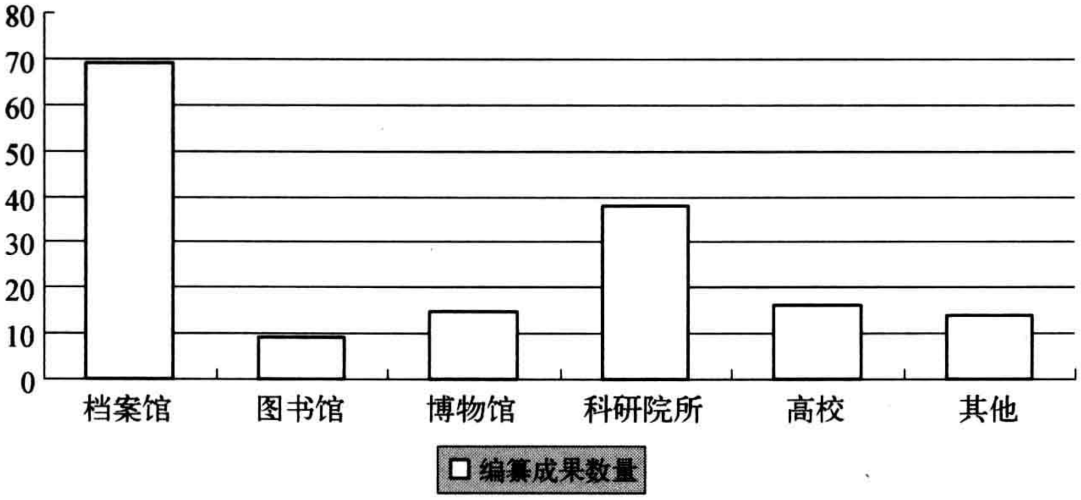


图 5-1　满文档案编纂参与力量分布情况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档案馆和科研院所在满文档案编纂参与力量中占主力地位，而图书馆、博物馆、高校和其他机构及人员所占比例比较均等。通过条状图可以看出满文档案编纂已经从最初民间学者组成的编纂团队，到中央、地方专门机构、社会专业机构和民间专业学者组成的社会性和国际性的大参与，可以说满文档案编纂参与力量具有广泛性。有了这样的广泛的编纂人员结构，满文档案编纂队伍会不断优化和更新发展，推动满文档案编纂工作的开展。

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兴衰。回顾满文档案编纂工作走过的道路，满

文档案编纂主体从最初金梁所召集的满汉学士十余人，到今天覆盖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文化研究机构、高校等机构比较全方位的文化事业人才；编纂成果从单一的《满文老档》到今天涉及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内容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编纂内容，可以说满文档案编纂工作一直在拓展。

近年来，满文档案编纂工作已显现致力于社会、公众服务的方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对有关台湾的清代满文档案编纂，如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郑成功史料、台湾朱一贵抗清史料的编纂，内地和中国台湾都对清代台湾档案史料进行整合全编；为迎接澳门回归，编纂了《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明清澳门问题皇宫珍档》、《澳门问题明清珍档荟萃》；为配合地方和行业科技文化建设，对沈阳故宫乾隆初年修建史料、盛京皇宫和关外三陵档案、雍和宫档案史料、明清宫藏地震档案、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进行整理出版等；在民族边疆方面，编辑出版历世达赖、班禅档案，整理编译有关新疆、蒙古、珲春、准噶尔等方面的满文档案；在地方军政方面，对清代的一些都统衙门、八旗、盛京各部的满文档案也进行了编纂；在中外关系问题上，出版了有关中俄、中琉、中哈关系的专题档案汇编。

在成果的形式上，以多种出版、加工、宣传形式开发满文档案。在出版形式上，排印、影印多层次结合，可以通过光盘或网络等途径获取和存储满文档案编纂成果；在满文档案编纂加工程序和方法上，可以借助网络先进的存贮、检索、传输技术，借助于诸如《满汉文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①等计算机翻译满文的新方法，使满文档案编译加工更加快捷。如果满文档案信息加工有难题，还可在互联网上及时沟通，多方面互动寻求解决方案。在宣传方面，满文档案编纂成果的宣传度，可通过学术交流、新闻发布、系列报告、媒体专访。如《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的出版

① 佟福贵《〈满汉文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研制成功》，《中国档案报》2000 年 11 月 16 日。

就在各大报刊、网络媒体上进行宣传，加大满文档案编纂成果面向公众的宣传度。

以此为鉴，未来满文档案编纂的工作，要拓展工作理念，不仅要为史学研究服务，还要全方位以社会、以公众为导向。在编纂方法上，在兼顾传统的同时，将加强现代信息技术和方法在满文档案编纂中的应用，利用互联网在满文档案信息的采集、编例、加工上进行突破；编纂出版物的载体类型、开发层次、传播途径实现信息化出版，以满足社会各类不同的信息需求。

第八章　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

第一节　满文档案的利用方式

随着满语和满文研究的加强和社会对满文档案的重视，档案馆目前正在逐步地探索和加强满文档案的利用工作，其利用方式也在不断的多样化并且走向规范化。总的来说，满文档案提供利用的方式有以下几种：其一、以档案原件提供利用；其二、以档案复制件提供利用；其三、综合档案内容编写书面资料提供利用；其四、通过互联网提供在线服务。在以下的内容里将对满文档案的利用方式进行详细的介绍。

一、一般查询

一般查询是档案馆向利用者提供的一种最普遍的服务，属于被动式服务。其特点是利用者到馆自查所需档案，档案馆的接待人员义务为其介绍馆藏概况与检索工具的应用方法，并按利用者提出的档号提调档案外，不介入利用者的检索方案设计，不对利用者提出的信息需求是否反映其真正的、全部的信息需要进行特意地分析。① 通过这种方式

① 王光越《浅议明清档案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1994—2004)》，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第 318 页。

进行查询的多为特定的中外学术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他们一般没有语言障碍，能够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和方向来馆查找利用满文档案。以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查询为例，“这类研究者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满语研究所、辽宁省档案馆等单位，以及日本、美国、德国等国家从事清史、清代档案及语言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他们借助《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和馆藏目录等工具，或多或少总能找到所需要的满文档案”。①

二、参考咨询

“咨询是档案馆为个人和机构的特别信息需求所提供的特别服务，亦称做定题服务。它分为被动和主动两种方式。被动的定题信息服务，是利用者委托档案馆代为满足自己全部或主要的信息需求。档案馆要站在利用者的角度上，代其设计文献检索方案和编辑方案，在利用者认同的前提下，代利用者实现预期目的。主动式的定题信息服务是档案馆在对社会潜在需求进行复分析的基础上，向主观认定的利用者发送有关研究课题的文献预订单和服务简介，在接到利用者表示愿意接受服务的意见后，再根据文献预订单和利用者的反馈意见，为其提供的特别信息服务。”②通过这种方式利用馆藏档案的多为不懂满文的专家学者，他们在利用汉文档案之后并不能完全满足研究的需求，所以希望获取更多的满文资料，以使所从事的研究更加得深入和全面，但是因为语言的障碍，他们只能求助于馆内的满文档案工作者替他们查找相关档案，并将其翻译出来以提供利用。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每年都会接待一部分这样的利用者和文化研究机构，他们包括“清东陵、清西陵、汤

① 张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利用工作初探》，《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36—37 页。

② 王光越《浅议明清档案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1994—2004)》，新华出版社 2005 年，第 319 页。

泉行宫等管理处，以及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等。”①

三、外借

满文档案一般是不能借出档案馆外使用的，但是在个别的情况下，为照顾编史修志和历史研究的需要，也可以将满文档案借出馆外利用，但是这些情况是十分罕见的。尤其对于特别珍贵、残破和容易脆化的满文档案，一般是不能借出馆外使用的。

四、制发复制件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档案利用需求的不断增长，通过档案馆已有的技术和设备为利用者制发各种档案复制件，已经成为档案部门特别是档案馆提供满文档案利用的主要形式。“档案复制本，可根据利用单位的不同，分为副本和摘录两种方式。副本，反映档案原件的所有组成部分；摘录，只选取文件某些部分。”②从目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看，主要的复制技术有：手抄、打字、摄影、复印、制作缩微胶片或者以光盘的形式。笔者认为制发档案复制件应该成为以后档案利用的主导方式，因为我们知道满文档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部分满文档案都是单份、孤本或稀本，如果长时间、高频率地使用必然会对档案原件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制发档案复制件应该是一种重要方式。这样能更好地保护档案原件，使我们的珍贵的满文档案能够永久有效地保存下去，满足人们长久的利用需求。

① 张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利用工作初探》，《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37 页。

② 陈兆祦、和宝荣、王英玮《档案管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300 页。

五、翻译出版

随着满语和满学研究的加强，人们对满文文献的利用需要也越来越大。满文档案作为满文文献的重要部分，是满族社会历史的最真实、可靠的原始记录，人们对满文档案的重视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他的满文文献，但是由于语言的障碍，给人们利用满文档案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有计划地编译出版满文档案就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满文档案提供利用的方式。从目前来看，满文档案的编译出版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笔者在《近八十年来满文档案出版书录》中统计已经编译出版的书籍就有66部，其编译出版的满文档案图书有满文本，有满汉文合璧本，有汉译本，有日文本，这些统计中还不包括其他形式的小型专题资料的汇编，并且这些已经公布的满文档案也只是现存满文档案中极少的一部分，只是冰山之一角、九牛之一毛，但是目前我国满文档案的公布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尤其是纂修新清史工程的启动，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加快开发公布满文档案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保障，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将会掀起一个全新的公布高潮。可见在一定的时期内，由于满语人才的缺乏，这种方式将会是满文档案提供利用的一种主要的方式。

六、展览

满文档案展览是指根据某种需要，按照一定的主题，系统地陈列满文档案或者配合一定的汉文档案进行展览的利用形式。这是通过展示和介绍有关满文档案的内容和成分而提供利用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满文档案利用的一种很受欢迎、很直观的方式。因为档案展览本身就是提供档案信息的场所，利用者可以从中得到较为集中和系统的满文档案材料，甚至看到以前从未看到的珍贵的满文档案原件，能以档案的原

始性、真实性和形象鲜明见长，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生动的宣传作用。并且展览这种方式能在一定范围内组织较多的观众参观、服务面比较广泛，更能够引起人们对档案的注意和利用的兴趣，从而也起到了让人们了解满文档案、满族的历史、生活、文化等的作用，其宣传满文档案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展览再能够配合一定的解说，并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展览视觉技术的话，其效果则会更加凸显。

七、专题网站

专题网站就是将数字化之后的满文档案经过一定的加工整理，通过网络进行公布并提供利用的一种方式。从目前来看没有这方面的实践，但是笔者觉得随着人们社会对满文档案利用需求的增加和满文档案数字化技术的发展，这种方式一定会成为未来满文档案提供利用的主要方式。笔者觉得档案网站可以在这个方面逐渐地进行探索，首先可以在网站上实现满文目录级别的检索，再在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基础上逐渐地建立满文档案数据库，提供满文档案的在线利用。

第二节　满文档案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在满文档案保存量最大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993 年度馆藏档案利用总提调次数 2 062 次，其中汉文档案 1 971 次，满文档案 91 次。提调总量 18 817(卷、包)，其中汉文档案 18 515(卷、包)，满文档案 302(卷、包)。汉文档案提调量占档案总提调量的 98.4%，满文档案提调量仅占 1.6%。1994 年度，馆藏档案利用总提调次数 1 731 次，其中汉文档案 1 658 次，满文档案 73 次。提调总量 14 688(卷、包)，其中汉文档案 14 191(卷、包)，满文档案 497(卷、包)。汉文档案提调量占总提调量

的 96.62％，满文档案提调量占总提调量的 3.38％。然后，在有限的提调量中，又有 90％以上是本馆工作人员为工作和研究而提调的档案。”①可见在满文档案的利用群体中，大部分是本机构为了进行工作和研究，而国外和其他地区到第一历史档案馆利用满文档案的人所占比例很小。再以辽宁省档案馆为例，辽宁省满文档案的利用率还要远远低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年只是有来自美国、日本和我国北京中科院等机构的研究者到档案馆来利用满文档案，利用次数和利用量都非常少。

满文档案在开发利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职责划分的局限

由于档案馆管理体制和部门设置的问题，给档案利用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以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例，“本馆（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利用工作由保管利用部主管。满文部除在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及咨询服务上介入利用工作外，并无考虑馆藏满文档案利用工作的职责。因此，一方面利用部门的业务人员由于不懂满文，不了解馆藏满文档案的情况，无法给利用者以准确的指导。另一方面熟悉馆藏满文档案概况的满文专业人员又难与利用者进行直接的信息交流。而这均无从全面系统地考虑馆藏满文档案利用服务工作。因而满文档案利用者也无从得到较高水平的服务。”②

在辽宁省档案馆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辽宁省档案馆并没有专门设立满文部，而是在历史一部有从事满文档案编译和提供利用的人员。在辽宁省档案馆也存在着职责划分局限的问题，使得满文档案

① 张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利用工作初探》，《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38 页。

② 同上书，第 38—39 页。

利用工作不能够很好地开展，制约了档案利用水平的提高。

二、检索手段落后

目前满文档案的检索手段较为落后，主要的原因是满文档案的著录工作还没有全面展开，满文档案著录是实现满文档案检索的基础和前提。辽宁省档案馆由于满文档案工作专业人才的缺乏，现在的满文档案著录工作已经停滞下来，现在只能实现很小一部分满文档案的计算机检索，另外也并没有专门针对满文档案编制的目录、索引或指南等检索工具。《辽宁省档案馆指南》虽然对全宗内的满文档案进行了适当的介绍，但是并不是很详细，根本无法实现案卷和文件级的检索功能。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 8 年时间里，完成雍正、乾隆两朝汉文录副奏折目录条目 9 万条、满文录副奏折目录条目 16 万条，其中汉文录副奏折建立了目录数据库，但是满文档案并没有建立专门的目录数据库。自 1994 年起又陆续开始了 8 万件完整的满文题本及 4 万余件宫中满文朱批的著录工作，但是这些著录条目才刚刚开始计算机管理工作，要实现编制多种形式的检索目录和索引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即使这些档案建立了专门的目录数据库，能够实现基本的检索功能，但是它所能够覆盖的也只有这些档案，而它们只是一史馆所保管的满文档案中很小的一部分。

满文档案检索工具的不完善，给满文档案检索和利用工作带来了很多的不便，进行满文档案的著录和检索工具的编制仍然是完善满文档案利用工作的首要任务。

三、满文档案翻译出版困难，经费不足

目前能够直接阅读满文档案的利用者很少，大部分利用者都是通过利用编译出版的满文档案进行相关研究，但是由于满文档案工作者

数量的不足，严重制约了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的开展，辽宁省档案馆虽然有能够从事满文档案翻译的档案工作者 3 人，但是这些人往往还要进行其他方面的工作，因此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大量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并且满文档案的翻译周期较长，远远不能满足满文档案利用者当前的利用需求。

满汉合璧满文档案的影印出版是档案馆主动提供满文档案利用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由于满文档案的专业性，出版单位往往会考虑经济效益的问题，需要提供出版经费的补贴。由于经费的不足，已经使档案馆大量的满文档案积压下来无法出版。

四、满文档案专业人员不足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从 70 年代恢复满文档案工作起，通过调入专业人员和开办满文干部培训班自行培训专业人员等措施，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满文专业人才队伍。人员最多时达 29 名。后来由于工作调动、退休、病故等原因，现在仅剩有 16 名专业人员从事满文档案的翻译、整理编目和编研工作。随着专业人员陆续退休，加之近年满文专业人员极难招聘进馆，不仅数年后专业人员匮乏的局面令人担忧，而且现在已深感人力不足，因而更难顾及满文档案的利用工作。”①

再以辽宁省档案馆为例，本馆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满文部，满文档案的工作人员隶属于历史一部，共有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 5 人，其中经验较为丰富的有 3 人，另外的 2 人是刚刚从黑龙江大学毕业的满语专业的学生，目前还没有接触满文档案工作，所以实际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仅有 3 人，并且这 3 人还要负责馆内其他的一些工作。满文档案专业人员的缺乏严重制约了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的开展。

---

① 张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利用工作初探》，《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41 页。

第三节 加强满文档案开发与利用的措施

满文档案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满语、满学以及清史等研究的重要史料,满文档案因为是社会实践活动最原始的记录,所以其价值就更为珍贵。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地开发满文档案信息,不断地完善满文档案的利用方式,更好地为利用者服务。

一、完善满文档案利用方式

针对利用部门不了解满文档案,而满文档案编译工作人员不提供满文档案利用造成的满文档案提供利用过程中的问题,应该在人员足够的情况下,在利用部安排一名或者几名懂满文档案的人员专门提供满文档案的利用工作。

总之,满文档案工作人员应该和利用部通力合作,共同开展满文档案的利用和接待工作,并了解和掌握利用者的利用目的、利用需求和研究方向等,主动提供帮助,介绍馆藏满文档案概况,目前已有的检索工具和使用方法,以及现已经翻译出版的满文档案史料情况,以帮助利用者正确地选择检索途径,快速地找到自己需要的满文档案,节省利用者的时间,提高满文档案的利用效率。另外,在帮助利用者检索到有关档案之后,我们还应该主动地提供档案复制件,通过打印、缩微复制件或光盘等形式向读者提供档案利用服务。

二、完善档案检索方式

完善满文档案检索方式的前提是进行满文档案的著录工作,因此

我们必须继续进行满文档案的著录工作，并且在著录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满文档案著录的有关规范，实现满文档案著录的标准化，这样可以避免重复劳动，便于以后满文档案目录数据库的建立，并在标准化著录的基础之上从不同的角度编制利于档案检索的目录、索引等。

“由于编制目录是一项长期工作，不易快速见效，因而在编制目录的同时还应安排撰写馆藏满文档案简介。这样不仅便于利用者了解馆藏满文档案分布，翻译出版、整理编目状况及内容概况，也有利于满文档案工作者了解满文档案工作状况，科学制定工作计划，方便利用接待工作。

通过编制多种目录检索，撰写满文档案简介，逐步完善馆藏满文档案的检索工具，使利用者从不同层次来了解、认识馆藏满文档案。”①

三、加强满文专业人才培养，提高满文专业人才素质

满语专业人才的缺乏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满文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开展。因此必须加强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并不断提高满文专业人才的素质和能力，使之更好地胜任满文档案的翻译、研究和利用工作。目前中央民族大学、黑龙江大学、辽宁大学等高校都开设了全日制本科满语专业，这些学生一旦顺利毕业将会为满文档案工作注入新的力量，档案部门可以通过招聘等方式将其吸收到档案部门。另外档案机构还可以通过举办专门的满语培训班，培养未来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建立档案机构自己的满文档案人才储备库。再者，针对现在正在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人员，应该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职业培训，更新他们的知识，提高他们运用现代技术的水平和能力，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更好地开展满文档案的利用工作。

---

① 张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利用工作初探》，《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43 页。

四、加强满文档案开发利用方面的合作

满文档案卷帙浩繁，数量巨大，特别是随着人们档案意识的加强以及满语、满文文献研究的热潮，单纯地依靠档案馆本身开发利用满文档案是难以满足利用者的需求的。因此档案馆要想深入开发馆藏满文档案信息资源，就要加强和外界有关机构的合作，联合社会力量共同开发满文档案信息资源。例如：为保护黑龙江省珍贵的满文文献资料，黑龙江大学与黑龙江省档案局开始合作对黑龙江省满文档案进行整理。2007 年，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所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优势和省档案局的文献资料优势，共同成立了“满文与历史文化专业实习基地”，双方携手对这批包含黑龙江省地方史、东北边疆历史和清代历史在内的重要资料进行整理，并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度研究。2008 年，在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增补项目论证会上，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满文档案整理集成”入选，该系列丛书的入选彰显黑龙江省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并对推动黑龙江省的理论与文化建设、振兴黑龙江、建设边疆文化大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例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西藏地区合作共同编译出版有关边疆档案史料。为了积极落实中央批准实施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项目”，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合作整理编译《清代珲春衙门档案》。双方还编译出版了《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清代西迁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清代西迁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等，目前正在研究申报的《清代边疆满文档案汇编》，仍是中央批准实施的“新疆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项目”之一。因此不难看出加大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方面的合作更有利于满文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开展。

五、制定切实可行的开发利用计划

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约

有200万件,辽宁省有满文档案20万件,吉林省约15 000件,黑龙江达约10 000多卷,内蒙古约1.6万余件,另外,西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等也收藏一批数量不等的满文档案。

满文档案数量如此巨大,所以对于满文档案的开发和提供利用应该循序渐进,不能盲目开展,应该制定切实的开发计划,分步实施。不能盲目地追求高速度,忽略质量和效益。因此在开发利用满文档案之前,应该在调查和论证的基础之上制定具体的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并配合清史工程对满文档案整理和利用的需求,逐步推进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满文档案的作用,避免重复劳动,充分实现满文档案的价值。

同时满文档案的开发和利用也应该打破地域的局限,各个保存有满文档案的单位应该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共同商讨和制定满文档案的开发计划,以更好地挖掘满文档案的价值,为人们所用。

六、加大宣传报道的力度

从现在满文档案的利用状况来看,大部分的利用者都是科研机构或者从事某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而作为独立的个人来档案馆利用满文档案的人却非常的少。究其主要原因是语言的障碍,再就是档案馆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大家对满文档案缺乏了解,不了解满文档案的内容和价值。因此要提高社会对满文档案的利用率,必须要加强满文档案宣传工作,使人们了解满文档案,因为只有了解了,人们才会到档案馆利用自己需要的那部满文档案。因此笔者觉得应该通过展览或者在档案馆开设与满文档案有关的讲座,以加深人们对满文档案的了解和认识。

七、树立信息意识和服务意识

信息意识和服务意识是满文档案提供利用者的重要素质,在满文

档案的开发和利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满文档案提供利用者应该具有强烈的信息意识，对馆藏满文档案有深入和清楚的了解，这是满文档案提供利用的前提，如果提供利用者对馆藏满文档案都不了解，那就更谈不上提供利用了。因此，强烈的信息意识是满文档案提供利用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和能力，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充分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敏锐地捕捉到利用者潜在的信息需求，为主动开展满文档案利用服务创造条件。另外，提供利用者还应该了解社会对满文档案的信息需求，能够根据社会的需要，联合其他有关的部门，针对社会上的热点或者需求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满文档案信息资源。

除了信息意识外，馆员还应该具有强烈的信息服务意识，要把用户的需求奉为头等大事。要认真、热情地对待每一位利用者，细心地了解他们的利用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再借助有关的档案检索工具，帮助利用者查找需要的满文档案，并且可以针对自己的了解和认识，对利用者提出合理的建议和意见，主动、热情地为其服务。

第九章　满文档案的数字化

第一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含义

满文档案数字化是指通过各种录入手段和技术，将各类满文档案信息输入电子计算机，并对满文档案信息进行整合和加工，开发并建立专门的满文档案数据库。满文档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遗产，满文档案种类丰富，价值巨大，满文档案的数字化不仅有利于满文档案开发利用，同时也可以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得以更好地传承。

“满学是正在兴起的国际性学科。满学不仅是民族之学，而且是科学之学。科学没有民族的藩篱，科学也没有国家的经界。世界在研究满学，满学已走向世界。满学正在冲破民族的藩篱与国家的经界，而成为国际人文学科中一门正在独立的学科。”①满学研究离不开具有原始记录性特点的满文档案史料。

清代档案数量巨大，保管也比较完好。这些档案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资料，对大清史的编纂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清史工程已经做出利用清代档案的总体规划，已经立项整理档案项目 23 个，涉及档案 140

---

①　阎崇年《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第 7 页。

万件。其中满文档案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将会更有利于大清史的修纂。

满学的兴起和大清史的编纂都需要我们对满文档案进行数字化,如今满学的研究和清史的修纂已为世界所关注,满学也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限,逐渐地走向世界,所以我们有必要加强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工作,以方便全世界的满文档案利用者通过满文档案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满文档案进行全文数字化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在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历史档案数字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成果,另外一些满文档案目录的编辑和出版也为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奠定了基础。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全文数字化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第一期建设成果——《大清历朝实录》、《大清五部会典》已于 2007 年 11 月通过验收并得到一致好评。2009 年 9 月 12 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清代军机处上谕档全文数字化项目在京通过验收。这是该馆继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部会典》之后的又一全文数字化成果,也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历史档案全文数字化成果。这些清代档案全文数字化的经验将为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2. 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为满文档案数字化提供了技术支持。"我国民族文字信息处理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发展于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几乎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字完全和汉字同步实现了电脑化处理。1991 年,中央民族大学语言研究和计算机系联合研究编著的《中国各民族文字与电脑信息处理》一书,从理论上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微机处理的种种问题做了全面彻底的研究,并将所取得的成果做了详尽介绍。"①在国家的扶持下,许多科研机构开发了多种民族文字的

① 包和平《我国民族文字文献工作的现代化》,《图书与情报》2000 年第 3 期。

字处理技术及应用系统，完成了包括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柯尔克孜文、彝文、藏文等在内的编码字符集标准、键盘标准、字模标准，使少数民族编码字符不断地走向标准化和国际化。

“国家在‘七五’期间就已设立了重点科技公关项目‘少数民族文字处理技术’(75－67－02)课题。内蒙古自治区电子计算中心承担了其中的一个子课题《蒙、藏、维、哈、朝、满、汉操作系统》。该课题经过3年多时间于1991年完成，并通过内蒙古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鉴定。该系统是国内第一个具备英文和蒙、藏、维、哈、朝、满、汉等我国几大民族的文字在同一平台上处理能力的软件。《蒙、藏、维、哈、朝、满、汉操作系统》是在当时流行的DOS操作系统基础上改造研制的。”①

“同时内蒙古自治区电子计算中心的满族研究员常国权联合蒙古族、汉族等研究人员共同努力完成了《满、汉文操作系统》。这是国内研制的第一个满文操作系统，并赠送给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部等单位。该操作系统共收集满文字符102个，字符的输入采用两个键盘来完成。在第一键盘上主要排列满文的常用字符，在第二键盘上排列满文的不常用字符。同样，《满、汉文操作系统》也是在当时流行的DOS操作系统的BIOS级上改造研制的，因此西文软件，如：BASIC，DBASE等高级语言都能正常运行，从而使满文和其他各国文字一样可以在计算机高级语言中进行处理。《满、汉文操作系统》是满文信息处理现代化最为基础的工作。”②

“在锡伯文、满文字处理软件的研制工作中，锡伯族研究员佟加·庆夫先生功不可没。佟加·庆夫先生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就为锡伯文、满文字处理软件的研制课题筹措经费，组织人员并亲

① 嘎日迪、赛音、张主《关于我国满文信息处理现代化技术方面的进展》，《满语研究》2002年第2期。

② 同上。

自参加了研究工作。他同其他民族的科技工作者合作,做了大量的开创性、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例如:锡伯文、满文的输入技术的研究,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锡伯文编码图形字符集》(GB36044)、《信息交换用锡伯文字母区键盘布局》(GB 36045)、《信息交换用锡伯文点阵字模集及数据集》(GB 36046)的制订,并在1994年获批了《计算机锡伯文、满文字处理软件和轻印刷系统》的研制课题,经过三年的努力于1996年完成了符合锡伯文、满文排版印刷要求的相关三套软件和轻印刷系统,并通过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组织鉴定,从根本上改变了锡伯文、满文铅与火的传统印刷术,使锡伯文、满文的编辑与排版技术跨进了世界印刷术的先进行列。"①

以上所取得的这些成绩都为满文档案的数字化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意义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意义应在原有对满文档案的编辑、出版、开发和利用的基础之上,赋予新的时代意义。

一、有利于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档案

满文档案是伟大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文化遗产,这些档案详细记录了清代几百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以及皇族宫廷生活等各个方面,是研究清代历史的重要而珍贵的史料,并且随着满学和满语研究的加强,满文档案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现在到档案馆利用满文档案的利用者多以卷为单位进行查找,满文档案每年的提调量正

① 嘎日迪、赛音、张主《关于我国满文信息处理现代化技术方面的进展》,《满语研究》2002年第2期。

逐渐加大，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军机处满文奏折、内阁题本等档案每年的利用频率都很高。而长期以档案原件提供利用，会使一些易脆的满文档案出现破损。长此以往，满文档案的破损程度将会更加严重。如果能够实现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就可以通过缩微复制件、光盘等方式提供利用，避免使用档案原件，使档案原件能够长久地保存下去。因此，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对于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档案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满文档案是满汉人民在社会活动中形成的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性信息，是满族历史的真实记录。满文档案内容广泛，其内容既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还包括风土人情，自然景观，它记录了满汉人民思想和活动的成果，是几百年来满汉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这些满文档案对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满文档案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世界和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满文档案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促进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学术交流，推进人类社会的繁荣和发展都有巨大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满文档案数字化建设，通过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建立满文档案目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让中华优秀的民族文化在未来时代，在世界文化的领域中有自己的位置。

三、有利于少数民族档案的开发利用

满文档案是满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性特点而备受人们重视。传统的档案利用方式只能是亲自到档案馆查阅，而如果满文档案实现了数字化，我们就可以通过远程方式获取满文档案的复制件，进行科学研究，这将会大大方便广大的满文档案利

用者。另外,如果满文档案实现了数字化,通过网络我们就可以浏览满文档案原貌,这对于了解满族人民的生活、习俗等方面也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宣传档案,提高人们的档案意识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满文档案的数字化更有利于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发挥满文档案的作用和价值,完善满文档案的利用方式,为广大研究者提供文献资源保障。同时还可以扩大满文档案的利用范围,使更多人能够更方便地接触和利用满文档案。

四、有利于相互交流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外文化交流进一步扩大,来档案馆查阅满文档案文献的外国学者与日俱增,他们分别来自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他们研究的领域十分广泛,涉及满族政治、经济、法律、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传统的利用方式就是手抄,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容易出现错误,如果能够实现满文档案数字化,就可以通过缩微复制件或者光盘等方式提供档案利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可以在网上建立满文档案目录数据库和全文数据库,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远程检索和传递,方便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满文档案利用者。

第三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主要原则

满文档案数字化是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一般文献信息数字化建设的普遍原则同样适用于满文档案信息的数字化,如实用性原则、系统性原则、整体性原则、便利性原则、安全性原则等。但是由于满文档案的特殊性,除了这些基本的、共同的文献信息数字化原则之外,

满文档案信息化建设还应该遵循以下的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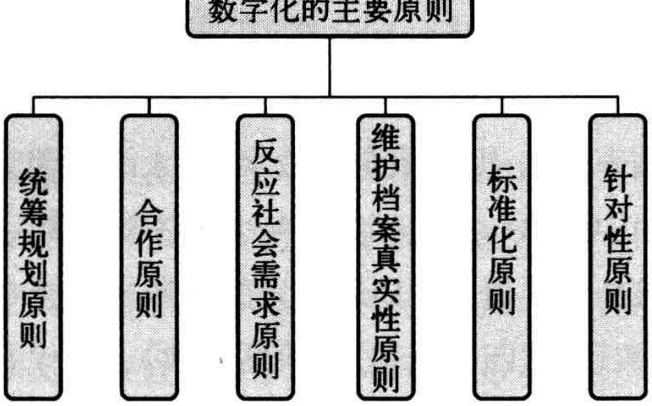


图 1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主要原则

一、统筹规划原则

满文档案数量巨大，种类丰富，保管分散，其数字化工作涉及面广，工作也较为复杂，这些给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满文档案数字化建设将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作。为了保证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必须制定总体规划和详细的分步实施方案。首先，需要确定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先后顺序，哪些档案先进行数字化，哪些稍后进行数字化；其次，在确定了数字化的对象之后，要对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整个流程进行严密而细致的控制。同时还应该加强各个单位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齐心协力，相互支持，保证工作的联系性和协调性，处理好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之间的关系，节约资料，避免重复劳动，提高满文档案数字化建设的质量和效益。

二、合作原则

满文档案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这一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配合，如果仅仅依靠档案馆一方的力量很难实现，因此满文

档案的数字化必须坚持合作原则。

合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档案馆要和数字化公司合作,在选择数字化出版公司时一定要选择有丰富的数字化经验,进行过大型数字化项目的公司。例如《清代档案文献数据库》第一期成果全文数字化《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部会典》,就是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合作完成。该公司凭借自主研制开发的经典古籍善本全文数字化产品和工具,成功实现了《四部丛刊》、《康熙字典》、《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大明会典》、《光绪朝新法令》、《数码翰林》等一系列大规模古今文献典籍的全文数字化。而《大清历朝实录》和《大清五部会典》的数字化也于2007年通过了阶段性验收。在进行满文档案数字化时也应该选择有经验的数字化公司进行合作,为满文档案的数字化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和质量保障。

二是指档案馆要加强与保存有满文档案的各个机构合作。满文档案目前主要保管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等单位,而保存在图书馆、博物馆和一些文化事业机构以及个人手中的满文档案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进行满文档案数字化之前必须取得有关单位的配合和支持,并通过多种方式开展满文档案的收集工作,将需要的满文档案尽量收集齐全,这样才能够为广大利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满文档案资源,同时也避免了重复劳动。由于历史原因,有些满文档案还保存在国外的文化机构内,我们还应该尽力争取和国外有关机构的合作,做好满文档案的海外追索,获得需要满文档案的复制件,以弥补满文档案内容的缺失。

三、反映社会需要原则

保存至今的清代满文档案数量十分巨大,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保存的满文档案就有20万件(册)。另外在辽宁省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黑龙江省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黑龙江省双城市档案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档案馆、土默特左旗档案馆和阿拉善旗档案馆、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单位,也都保存着一定数量的满文档案。如此数量巨大的满文档案不可能一次进行数字化,因此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应该遵循反映社会需求的原则,根据人们对满文档案的需求和当前的一些社会热点或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有选择地对满文档案进行数字化。在进行数字化之前要根据以往满文档案的利用统计,选择利用率较高、价值较大的满文档案优先进行数字化。这样可以尽量满足人们当前的利用需求,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有计划地进行其余部分满文档案的数字化,满足各方的利用需求。

四、标准化原则

“标准化是组织社会生产的重要手段,是科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标准化,就没有现代化。档案工作实现标准化,可以提高档案文献信息系统的有序化程度,是实现档案文献信息资源共享、促进档案工作现代化的重要条件。”①满文档案数字化必须要坚持标准化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为数字化之后满文档案信息的交换和共享奠定坚实的基础,但是我国档案数字化标准制定工作远远滞后于档案数字化的工作实践,尤其是少数民族档案的数字化一般只能参照纸质档案数字化的标准,这给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展开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应该尽快制定少数民族档案信息标准化体系。标准化应该主要包括数据通信格式的标准化,著录规则的标准化,标引语言的标准化,通信协议的标准化,数据管理软件、硬件的标准化,安全保障技术的

① 赵熊《军机处录副奏折目录数据库—分析与应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第143页。

标准化等。

目前开展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可以参照的标准有：明清档案著录细则、明清档案档号编制规则、档案分类标引规则、明清档案目录中心数据采集标准/明清档案机读目录数据交换格式、满文档案著录所用名词与术语汉译规则、明清档案著录文字使用规则、明清档案整理规则、清代档案分类表、清代档案主题词表等。

五、维护档案真实性原则

对满文档案进行数字化是为了最大限度方便人们的利用，更广泛地实现满文档案信息的共享，但是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前提是能够维护档案的真实性和原始记录性，只有数字化之后的信息和档案原件相一致，才能够保证档案信息的真实性，但是维护档案的真实性不代表对数字化之后的图像不进行任何处理。为了便于阅读和利用，还应该对图像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调整，比如去除图像中的黑边、杂点；对图像进行适当的剪裁；对图像进行一些纠斜和旋转，调整图像的亮度和对比度等。对图像进行的这些调整不仅不会影响档案的真实性，而且会增加档案信息的可读性。

保真原则是档案文献数字化产品的根基。为此，满文档案数字化应该进行以原文图像与全文数字化文本相挂接作为基本模式，两种页面可相互切换，使读者能够即时将全文检索的结果与原文相对照，避免全文数字化难以完全克服的人为错误。另外在进行满文档案数字化的过程中，还要注意保持元数据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再现性。

六、针对性原则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针对性原则是指要根据满文档案不同的形制和特点来选择不同的数字化方式。现存的满文档案字体和形制复杂多

样,有折件式的,比如奏折、题本;有簿册式的,比如实录、上谕等;还有卷轴式的。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满文档案,比如满文玉牒、满文舆图等。这些档案的数字化如果采用同一种模式进行,将会影响满文档案数字化的质量,因此不同形制的满文档案采取的数字化方式也不相同。对于折件式档案,主要有奏折、题本等的数字化一般要采用平板扫描或对其缩微胶片进行快速扫描;簿册式档案,主要有实录、上谕档等各类档册的数字化,一般要采用平板扫描或数码拍照;卷轴式档案,例如诏书、诰命等以及特型档案的数字化,一般要采取数码拍照或对其彩色底片进行扫描。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必须坚持针对性原则,这样才能够清晰和真实地再现满文档案的原始形态。

第四节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措施及其方法

满文档案数字化与汉文档案数字化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是满文档案由于语言的特殊性,其数字化的难度要远远高于汉文档案。另外满文档案属于历史档案,其载体和形制与当前形成的档案也有很大区别,因此满文档案数字化必须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确保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有效开展。

一、满文档案数字化的主要障碍

1. 保管分散,管理机构多

我国是满族的发源地,有清一代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这些满文档案主要保管在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台湾、内蒙古和西藏等地区。以北京地区为例,现存的满文档案主要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但是其他单位如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

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也收藏有一定量的满文档案。其他地区也是如此，满文档案分布较为分散，除了档案馆集中收藏有满文档案外，一些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内也收藏有相当数量的满文档案。另外在民间也散落着一些满文家谱、奏折和药方等。并且由于历史原因，一些满文档案还流失到了海外，在日本、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都保存有一定量的满文档案，虽然这些档案与我国保存的满文档案相比较，数量十分有限，但是其在满文档案全宗中的地位确是不可替代的。满文档案保管的分散性，给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为了保证满文档案全宗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需要进行跨机构甚至是跨国界的合作。

2. 满文档案自身特点制约数字化进程

一方面，满文档案尺寸形制大小不一，为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现存的满文档案有的是折件式，主要有奏折、题本等；有簿册式，主要有实录、上谕档等各类档册；还有卷轴式档案，例如诏书、诰命等；还有很多特型档案，主要有玉牒、舆图等。不同形制的满文档案需要采取不同的形式进行数字化，而且不同形制的满文档案对于数字化仪器的要求也不相同。

另一方面，有的满文档案是纯满文，有的则是满汉合璧，满汉合璧的满文档案数字化比较容易，而纯满文的满文档案还需要对其进行翻译，但是现在我国满语人才十分稀缺，大量的满文档案需要翻译，所以满文档案的翻译工作是也是影响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开展的一大难点。

3. 技术问题

现存的这些满文档案大小、颜色、字迹等规格非常不统一，这些都为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和问题。首先，目前部分满文档案虽然已经进行了缩微拍摄，但是缩微技术更适合于满文档案的保存，而不方便利用，所以需要对缩微胶片进行数字化转换。目前来说，实现模拟信号向数字信号转换已经不是难题，但是要想能够更好地再现档

案原始真实面貌，还需要一定技术作为支持。其次，关于数字化方式的选择，有些满文档案通过缩微技术并不能更好地再现档案原貌，例如，有的诰命，“以丝织品为载体，每一诰命都使用五种不同的颜色，内容分别用墨、(红)两色，分满、汉两种文字填写，并押有不同时期的‘制诰之宝’”，①这些满文档案的数字化需要通过数码拍摄等手段才能实现，而拍摄过程中有关参数的设置及其拍摄后期的处理等都对满文档案数字化的质量有重要影响。再有，就目前数字化水平而言，已研制出的OCR光字符识别技术，其平均识别率是95%，这也给满文档案数字化真实性的保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4. 资金问题

满文档案数字化需要一定的资金作为支持，而资金的短缺也是满文档案数字化的难题之一。首先，满文档案的尺寸大小不一，尤其是还存在着很多大幅面的满文档案，例如满文舆图、玉牒等。这些大幅面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对设备和仪器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大幅扫描仪、绘图仪以及较高配置的计算机、服务器及大容量的存储设备等，而这些设备的价格都比较昂贵。其次，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投入不是一劳永逸的，数字化之后满文档案数据库的维护、日常使用、软硬件的更新、数据的迁移等都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支持。

5. 人员问题

从目前来看，满文档案专业人才的缺乏也是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开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第一历史档案馆从七十年代恢复满文档案工作起，通过专业人员的调入和开办满文培训班等措施，逐步培养了一批满文专业人才队伍，但是后来由于工作调动、退休等原因，现在能够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专业人员数量极少。再以辽宁省档案馆为例，本馆并没有设立专门的满文部，满文档案的工作人员隶属于历史一部，共

① 王海欧《历史档案数字化建设面临问题及解决方案》，《数字与缩微影像》2007年第2期。

有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五人,其中经验较为丰富的有三人,另外两人是刚刚从黑龙江大学毕业的满语专业的学生,目前还没有接触满文档案工作,所以实际从事满文档案工作的仅有三人,并且这三人还要负责馆内其他的一些工作。

目前来看满文档案专业人才十分稀缺,并且从事满文档案工作人员的素质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从事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应该熟练掌握满语,还需要懂得档案学、历史学、版本学、文献学以及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知识,但是目前这类专业技术人员极其缺乏,人才的短缺是目前满文档案数字化建设面临的一大难题。因此必须加强满文档案数字化专业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为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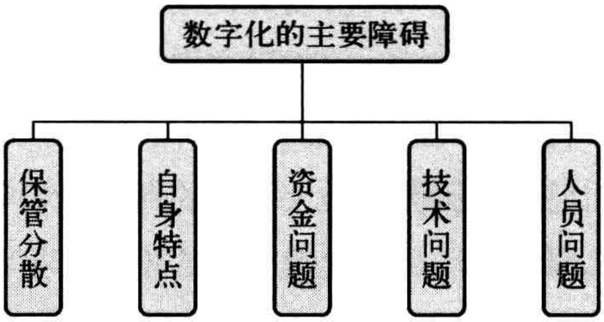


图 2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主要障碍

二、满文档案数字化应注意的问题

1. 满文档案鉴选

“档案数字化鉴定工作是对数字化后的档案将来的可利用性及其价值的评价和预测,是档案数字化的核心内容。”①满文档案数量巨大,不可能全部一次性地开展数字化工作,并且由于古代档案副本制度的

① 吕榜珍《云南省少数民族档案的数字化管理策略》,《档案学通讯》2010 年第 2 期。

存在,一些重要的档案,例如军机处的满文奏折、内阁的题本等都有副本存在。因此在数字化之前应该进行满文档案鉴选,根据档案自身特点及档案自身价值及其潜在价值进行鉴别和判断,以此来确定满文档案数字化的版本和顺序。满文档案数字化之前的鉴选工作,必须坚持四个基本原则:一是需求大、利用率高的满文档案优先进行数字化;二是保存和使用价值大的满文档案优先进行数字化;三是特色满文档案优先进行数字化;四是版本众多的满文档案应该尽量选择内容齐全的版本优先进行数字化。

2.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标准化问题

按照一定的标准开展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工作是满文档案长期存取和资源共享和传递的基础,满文档案数字化标准的制定也是满文档案数字化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但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档案数字化标准制定工作远远滞后于档案数字化的工作实践,尤其是少数民族档案的数字化一般只能参照纸质档案数字化的标准。这给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开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应该尽快制定少数民族档案信息标准化体系。标准化主要包括数据通信格式的标准化,著录规则的标准化,标引语言的标准化,通信协议的标准化,数据管理软件、硬件的标准化,安全保障技术的标准化等。只有按照标准进行数字化的满文档案才能更广泛地实现资源共享和传播。因此有关方面必须抓紧制定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有关标准,确保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顺利开展。

3. 根据满文档案自身的特点设置扫描参数

"扫描系统参数的选择和确定对扫描数字影像质量有着较大影响,其中扫描分辨率直接关系到扫描文件的清晰度和还原效果。我们在选择分辨率时应根据实际需要综合考虑,包括扫描文件的可阅读性、存储空间、输出打印质量等。根据档案纸质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分辨率。否则,有的幅面清晰度好,有的幅面则清晰度差。对大幅面的表册和地图等档案资料进行分块扫描,形成的多幅图像,要即时合并为一个完整的

图像，避免遗忘，以保证档案资料数字化图像的整体性。”①满文档案载体的颜色、大小、字迹、保存规格等都不统一，所以要根据满文档案自身的特点进行扫描参数的设置，以保证扫描之后满文档案的质量。

4. 档案数字化与数据库、网站建设和提供利用同步

满文档案数字化建设还应该与数据库和网站建设同步，数据库能够方便满文档案的检索，是开展档案利用工作的基础。而网站则是信息时代开展档案利用的新平台和新方式，也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远距离共享、充分发挥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通过网站提供满文档案的利用可以扩展满文档案的利用范围，同时也是让档案走进民众、进行档案宣传的新思路。进行满文档案数字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满文档案的利用工作，实现满文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和共享。因此，必须在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同时开展满文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及时公布数字化之后的满文档案信息资源，并通过各种方式开提供利用服务。

5. 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安全问题

在进行满文档案数字化的过程中还必须要高度重视安全问题，这是满文档案是否能够成长久保存和提供利用的基础。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满文档案的安全工作：一是选择适当的存储格式，为了提高满文档案的可利用性和安全性，可以采取非破坏性的 TIF 格式或者支持全文检索的双层 PDF 格式；二是做好满文档案的异地异质备份。满文档案异地异质备份是指为了避免满文档案遭受火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因素的破坏而利用不同的介质在不同的地方对数字化的满文档案进行备份，是确保满文档案安全的一种防护性措施；三是建立健全安全规章制度，为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展开提供制度保障。除此之外，还应该运用先进的数字签名技术、防火墙技术、访问控制技术、入侵检测技术、信息加密技术、身份认证技术、防病毒技术等，从多个方面加强满文档案的安全工作。

---

① 朱琪《民国档案数字化研究与思考》，《北京档案》2010 年第 2 期。

三、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具体措施

满文档案的数字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在开展数字化工作之前需要详细的规划和部署。因此，在进行满文档案数字化之前，一定要着手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 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专门保存明清两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及皇室档案的中央级档案馆，现保管的明清历史档案约1 000余万件(册)，并设有"全国明清档案资料目录中心"，根据国家档案局授权，承担指导县级以上国家档案馆所藏明清档案资料的标准化著录和建立全国明清档案资料目录数据库的职能。笔者认为，开展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应该在国家档案局授权的基础之上，在一史馆成立满文档案数字化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满文档案的著录、数字化扫描及满文档案数据库的建设；通过系统的组织和规划统筹解决满文档案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档案收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问题，并对研究成果的实用性、通用性等方面进行组织协调。

2. 制定总体规划和分步实施方案

满文档案数字化是一项比较宏大的工程，需要在实施之前制定出总体规划和详细、具体的分步实施方案。首先，应该在满文档案数字化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对现存满文档案状况进行调查，并组织有关专家和熟悉满文档案的工作人员共同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实事求是的满文档案数字化总体规划，这是指导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展开的总方案。其次，在满文档案著录的基础之上逐步开展满文档案目录数据库和满文档案全文数据库的建设。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应该分步进行，在原有的纸质卡片目录的基础之上进行满文档案目录数据库的建设，再通过目录数据库与原文数字化图像相挂接的模式实现满文档案数字化。最后，在满文档案全文数字化技术逐步成熟的基础之上，利用OCR汉字

识别技术，配以人机交互式辅助校对系统，实现满文档案全文的数字化，做到字字可检、句句可查。

3. 加快少数民族档案数字化的软硬件建设

为了配合明清档案数据库和数字化的建设，从2001年开始，第一历史档案馆建立了档案管理系统以及数字化平台。伴随着清史工程的开展，一史馆对馆内软硬件设备和技术平台的投入也逐渐加大。到2007年年初，第一历史档案馆局域网络配置已经拥有服务器10台、路由器2台、交换机12台、终端计算机216台、各式扫描仪22台、数码相机12台，并设有NAS磁盘阵列、磁带机、移动硬盘和光盘等多种备份存储设备，以保障每年不断增加的数据存储量。满文档案数字化的难度要远远高于汉文档案，因此对满文档案数字化需要的软件和硬件设备要求也较高。因此国家应该加大对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投入，购进先进的满文档案数字化软硬件处理设备，为实现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奠定基础。

4. 重视人才培养

满文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开展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满文档案专业人才的素质也直接影响着满文档案的翻译以及数字化工作的质量，满文档案专业人才的缺乏已成为满文档案工作顺利开展的最大制约因素。

满文档案工作者的培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培养满语文专业人才，档案机构可以通过和高校合作，建立满语专业，聘请专兼职老师进行满语文的强化训练。除了满语文之外，还要让这些学员加强档案学、历史学、版本学、文献情报学和数字技术知识的学习，为今后满文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人才保障；二是档案馆要引进一些计算机方面的人才，他们应该具有敏锐的现代信息意识及多媒体知识、熟练掌握和运用多媒体技术、通信网络技术，了解档案数字化工作的流程以及档案利用者的需求；三是要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在职工作人员的计算机水平和应用能力。

5. 统一标准规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根据国家标准《档案著录规则》，编制了行业标准《明清档案著录细则》，并补充编制了《明清档案档号编制规则》、《著录文字使用规范》、《满文档案著录名词术语使用规则》等，初步建立了明清档案的一系列标准，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标准针对的基本都是比较广泛的明清档案，而专门针对满文档案的非常少，因此如果要想更好地开展满文档案数字化工作，必须标准先行，在现有这些标准规范的基础之上，制定满文档案数字化标准体系，以保证满文档案数据格式的标准化、著录的标准化、标引语言的标准化、通信协议的标准化、安全保障技术的标准化以及数据管理软件、硬件的标准化等。

四、满文档案数字化的步骤和方法

满文档案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因此满文档案的数字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的实施需要进行系统规划。因此必须建立专门机构对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工作进行规划和部署，并在此基础之上，有计划地开展满文档案的数字化工作。

1. 在满文档案标准化著录的基础之上，逐步确定满文档案目录体系，建立满文档案目录数据库。满文档案的标准化著录是建立满文档案目录数据库的和开展满文档案数字化的基础，是建立科学的满文档案揭示和检索系统的前提，是实现满文档案检索自动化、网络化的基础。以前人们对满文档案的著录采取卡片形式，随着数字化工作的开展，应该逐步将卡片目录转换成机读目录，这一过程一定要严格遵循《明清档案著录细则》、《明清档案档号编制规则》、《著录文字使用规范》、《满文档案著录名词术语使用规则》等有关规范，实现满文档案的标准化著录。

目前全国明清档案资料目录中心的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设计完成全国明清档案三级目录体系，包括全宗目录数据库、案卷级目

录数据库和文件级目录数据库。笔者认为满文档案作为明清档案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目录体系的建设完全可以参考全国明清档案三级目录体系的建设。首先应该建立满文档案全宗目录数据库，对全国各地的满文档案进行标准化著录，然后通过各个保存有满文档案的机构的密切配合，逐步建立满文档案案卷级目录数据库和文件级目录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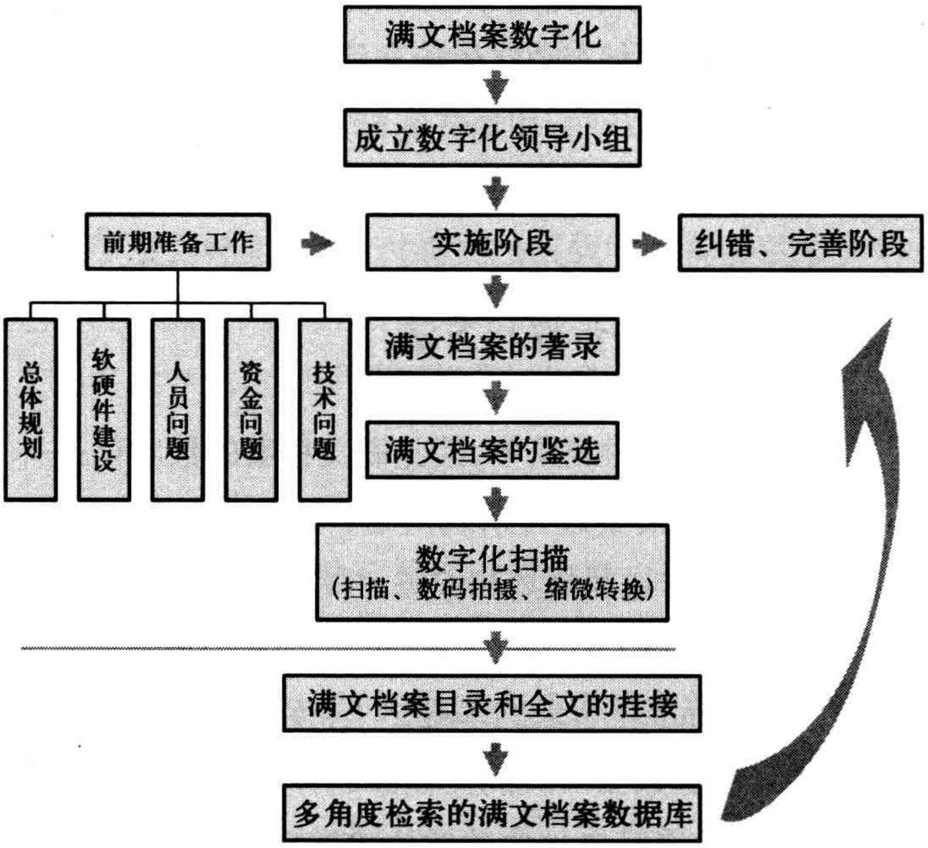


图 3　满文档案数字化流程图

2. 满文档案标准化著录和原文图像扫描（或数码拍照、缩微转换）并举，以目录数据库与原文数字化图像相挂接的模式实现档案数字化。从目前来看，大部分满文档案都已经进行了缩微拍摄，并且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通过缩微转化技术，将缩微胶片用缩微转换机器转换成数字化的图像。对于已经进行缩微拍摄的满文档案来说，完全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实现数字化。针对还没有进行缩微拍摄的满文档案来说，扫描和数码摄像技术已经很成熟并且在档案工作中的

运用已经十分普及，这部分档案可以采取扫描或者数码拍摄的方式实现数字化，然后再将数字化之后的满文档案图像和目录数据库相互挂接。这样就可以实现数字图像的阅览和全文的计算机检索，不仅有利于满文档案原件的保护，还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利用者。

3. 利用 OCR 识别技术，实现满文档案全文的数字化，做到字字可检、句句可查。相对于图像版来讲，全文版的满文档案具有更大的优点，可以更有效地满足学术研究和快速检索利用的需要。《蒙、藏、维、哈、朝、满、汉操作系统》、《满、汉文操作系统》、《计算机锡伯文、满文字处理软件和轻印刷系统》等的研制和使用以及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都为满文档案的全文数字化创造了一定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知道利用 OCR 汉字识别技术进行古代汉文历史档案的数字化尚处在逐渐地探索和实践的阶段，目前已经实现全文数字化的有《大清历朝实录》、《大清五部会典》和清代军机处的上谕档等，它们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历史档案全文数字化成果，但是满文档案的全文数字化要比汉文历史档案困难得多，要想实现满文档案的全文数字化还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几代甚至十几代档案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但是我们可以在满文档案翻译的基础之上，通过 OCR 识别技术实现满文档案中汉文部分的全文检索，做到汉文部分的字字可检、句句可查，待技术成熟和必要的情况下，逐步实现档案中满文部分的全文数字化及其检索。

第十章　满文档案研究的前景展望和建议

第一节　满文档案研究的前景展望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以及满语、满学及清史研究的加强，满文档案作为满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最真实的原始记录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回顾几十年来满文档案的研究的历史，总结满文档案研究的现状和经验，我们可以大致推断构想出未来满文档案研究的基本前景和特征。

一、满文档案研究的范围进一步扩展

狭义的满文档案是指文书档案，而广义的满文档案还包括满文石刻、满文印章、满文钱币、满文木牌等各种载体的档案。从目前满文档案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的重点基本上还是停留在满文文书档案的阶段，而满文石刻、印章等作为特殊载体的满文档案，不仅具有雕饰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而且对于研究满族的历史和文化也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相信随着满文档案研究的加强，各种载体的满文档案都会吸引相关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时这些特殊载体的满文档案也将会弥

补满文文书档案的不足，在满学、满语乃至清史的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前对特殊载体满文档案的研究成果很少，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1979年，黄润华、屈六生编辑了《北京地区满文石刻拓片目录》，但是这只是简单的记录，并没有从档案的角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释。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郭孟秀的两篇文章《东北三省满文官印研究》《满文玉宝、玉册研究》对满文的官印和玉宝、玉册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特殊载体满文档案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仍然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研究，进一步拓展满文档案的研究范围。

二、满文档案研究的内容逐步深入

以往满文档案的研究大都只是停留在对全宗内满文档案基本情况和内容的介绍之上，较为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元丰的《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清代内阁满文档案述略》、《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屈六生的《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任丽杰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及其价值》；王晓红的《清代珲春衙门档案概述》等。这些文章对于了解满文档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研究还只是停留在满文档案本身的研究之上，还未能深入挖掘满文档案内容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和技术的发展，以及满语、满学和清史研究的加强，人们对满文档案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一些满文档案工作者编译出版了大量的满文档案，如《满文老档》、《郑成功满文档案选译》、《清雍正朝〈镶红旗档〉》、《天聪九年档》、《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等。这些满文档案涉及满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各个方面，相信随着大量满文档案的相继编译和出版，将会为人们从事满族社会各个方面的研究提供十分丰富和翔实的资料，满文档

案研究也将逐渐向专题化的趋势发展。

三、满文档案研究的国际化趋势

“满学是近年来国际上新兴的学科。藏学、蒙古学在国际上早已成为显学,研究者众多,成果丰硕。而满学却姗姗来迟,经过最近一、二十年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终于争得了应有的地位。”①随着满学和清史研究的国际化,满文档案的研究也将走向国际化。

众所周知,我国虽然是满文档案的主要保存国家,但是在世界的其他国家,例如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英国等国家也保存有一定量的满文档案,他们的有关专家学者也一直进行着满文档案的利用和研究工作。特别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也充满了热情,尤其是对清朝历史的研究。因此满文档案的研究也将逐步地走向国际化。各个国家之间通过考察、学术会议等方式进行满文档案的交流和合作将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加强满文档案研究的建议

一、加强满文档案的保护工作

加强满文档案的保护是进行满文档案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深入开展满文档案研究的必然要求。满文档案保护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要加强满文档案库房保护工作;其次,要重视满文档案利用过程中的档案保护。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满文档案工作十年回顾》,《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0 年,第 1421 页。

满文档案的保护工作要贯彻一条重要的思想，即“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因此，理想的档案库房不仅应该具备防盗、防火、防水、防光、防尘等功能，还应该具有良好的温湿度调控和防空气污染等能力。总之应该增强防范意识，时刻不能放松档案的库房安全管理和保护。

满文档案详细地记录了清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以及皇族宫廷生活的历史状况，是进行满学和清史研究的十分珍贵的原始资料，满文档案已经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重视。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满文档案在利用过程中的保护，以保证满文档案能够为我们长久地保存和使用下去。具体的做法就是要通过满文档案的复制件来提供利用。目前，绝大部分的利用者都是利用满文档案进行专题研究，因此，他们多是成批地利用满文档案，而且一些重要的比如军机处、内阁或者宫中等档案的利用频率非常之高，如果长时间地向利用者提供满文档案的原件，必然会造成满文档案的破损，长此以往，必然会对满文档案的载体产生一定的破坏，不利于满文档案的长久利用。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地将满文档案进行缩微拍摄，通过缩微复制件代替原件的方式提供利用，这样就能够很好地保护好档案原件。同时在整理拍摄过程中还可以随时对残破档案进行修复，有利于延长档案的寿命，便于长久提供利用。

二、重视满文档案专业队伍和人才的培养

“进入 21 世纪，满学研究向着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领域延伸，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即满学研究专门人才匮乏，尤其是满文专业人才奇缺，出现了严重的断档现象。”①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影响满文档案乃至满学研究的进程。满文档案专业队伍和人才的培养，是深入发掘满文档案价值，进行满学、满语乃至清史研究的必然要求。

① 关嘉禄《抓紧培养高素质满语文专业人才》，《满族研究》2003 年第 1 期。

首先,从事满文档案研究的专业人才要具备一定的思想修养,他们应该热爱我们的祖国,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其次,从事满文档案研究的专业人才需要具有一定的文献和历史知识、档案学的专业基础,还有运用多种语言的能力,满文档案的翻译和进行专题研究的能力,这些都是由满学和满文档案研究的特点决定的。

在满文档案研究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早在 1955 至 1957 年,中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满文研习班,招生 20 人。至今仅有王庆丰和汪玉明二位先生,从事满文专业工作。1961 年,由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语言二系开设一期满文班,学制 5 年,招收 21 名学生。他们毕业后主要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档案馆、东北师范大学和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等单位从事专业满文翻译、教学和研究工作。1975 年,经周建人先生建议,周恩来总理批示,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原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再开设满文专修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待业青年 21 名,学制 3 年,结业后多数留馆在满文部工作,少数在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等单位工作。以上三批几种培训的满文专门人才,成为三个不同年龄梯次的满学研究之骨干"。①

要想更加深入地进行满文档案研究,我们必须加强对满文档案专业人才和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加强对他们的培训。我们的满学工作者与国外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满族文化和历史的了解以及一些文献学方面的知识,但是我们与国外的研究者相比,也有一定的缺点和不足,如语言能力方面较差,要想深入进行满文档案的研究,使满学真正地走向国际化,我们除了掌握汉语和满语之外,还应该尽量掌握一门外语,以能够更加方便地与国外的研究者进行交流和合作。

---

① 阎崇年《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第 32—33 页。

三、加强满文档案研究的国际化合作

随着国际满学研究的热潮和清史研究的加强，满文档案作为满族社会实践活动最原始的记录，日益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的耶稣会士或学者名流，对中国满洲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日渐重视。到本世纪初期，虽然中国发生鼎革之变，但是国外学者对满洲历史和语言的研究情趣并未因中国政权更迭而随之淡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外的满学研究日趋繁兴。日本、韩国、蒙古、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波兰、芬兰、瑞典、丹麦和澳大利亚等国，都有一批满学专家教授，并取得不少研究成果。”①而所有的关于满学的研究成果都离不开满文档案的利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与国外满学专家学者的合作和交流，来深入发掘满文档案的价值，为满学乃至清史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加强满文档案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合作是深入满文档案研究的必然要求。因为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满文档案分散保存在世界各地，虽然满文档案绝大部分都保存在中国的各个档案馆和文化事业机构内，但是我们知道国外的一些科研机构也保存有一定量的满文档案，而且这些档案多为孤本，对于我们进行满文档案乃至满学和清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必须加强满文档案研究的国际化合作。

加强满文档案国家交流的方式和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互通有无，提供满文档案的复制件

我们知道要想对满文档案进行深入的研究，就必须要充分占有满文资料。因此各个国家之间交换满文档案的复制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样各个机构和学者之间可以通过缩微复制件、光盘等方式提供满文档案资料，以供研究之用。特别是我国作为满学研究的中心，更应该将

① 阎崇年《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 1999 年，第 9 页。

我国珍贵的满文档案搜集齐全,这样才能够进行更为深入和彻底的研究。

2. 通过学术性机构进行交流和合作

我们的邻国日本很早就很注重满文档案的搜集和研究活动。早在50年代中叶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就发起组织了"满文老档研究会",先后主持翻译《满文老档》、《旧满洲档—天聪九年》、《镶红旗档—雍正朝》、《镶红旗档—乾隆朝》,对利用满文档案研究清朝史和满族史作出了卓越贡献。再有日本的满族史研究会,是在东洋文库清代史研究室名下的有组织的民间性学术团体。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与这些学术性机构的交流和合作,来共同进行满文档案的编译和研究工作,交流满文档案研究的经验,深入挖掘满文档案的价值。

3. 通过国际性会议进行交流

通过国际性会议进行满文档案研究的交流和合作是使满文档案研究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我们应该通过这种国际性的交流使世界上的学者充分地认识到满文档案作为满族历史最真实和原始的记录的重要价值,使人们在进行满语、满学乃至清史研究时能够更加重视满文档案的利用,以更好发挥满文档案的作用。

参考文献

图书：

1. 陈捷先. 满文清实录研究[M]. 台北：大化书局，1978.
2. 庄吉发. 清代史料论述(一、二)[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9.
3. 金启孮. 满族的历史与生活——三家子屯调查报告[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 陈捷先. 满文清本纪研究[M]. 台北：明文书局，1981.
5.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中国民族古文字[M]. 北京：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2.
6. 庄吉发. 故宫档案述要[M]. 台北：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
7.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8.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辽宁省编委会. 满族社会历史调查[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概述[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1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明清档案论文选编[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
1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12. 中国档案学会. 少数民族档案史料评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13. 滕绍箴. 满族发展史初编[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0.
14. 沈阳市民委民族志编纂办公室. 沈阳满族志[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1.
15.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吉林省志・文物志[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16.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三辑)[M]. 天津: 古籍出版社, 1991.
17. 金启孮. 满族历史与文化简编[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
18. 丹东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志编纂办公室. 丹东满族志[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2.
19. 阎崇年. 满学研究(第1辑)[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20. 杨中一. 中国少数民族档案及其管理[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93.
21. 傅波. 清前史论丛[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
22. 阎崇年. 满学研究(第2辑)[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1994.
23. 刘厚生. 旧满洲档研究[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4.
24. 乌谷. 民族古籍学[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4.
25. 秦国经. 中华明清珍档指南[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26.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黑龙江省志・文物志[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27. 王钟翰. 满学朝鲜学论集[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5.
28. 吴肃民.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概论[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5.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1985—1994)[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5.
30. 金启孮. 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M].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

社,1996.
31.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四辑)[M].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32. 王钟翰.满族历史与文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
33.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黑龙江省志·档案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34. 阎崇年.满学研究(第3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
35. 佟永功.功在史册——满语满文及文献[M].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
36. 张公瑾.民族古文献概览[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37. 李晋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7.
38. 李凤飞.东北边疆史料学[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
39. 阎崇年.满学研究(第4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40. 李晋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2)[M].成都:巴蜀书社,1998.
41. 戴庆厦.二十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M].上海:书海出版社,1998.
42. 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
43.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黑龙江省志·民族志[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4. 李晋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3)[M].成都:巴蜀书社,1999.
45. 张佳生.满族文化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46. 阎崇年.满学论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47. 抚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抚顺市社会科学院.抚顺清前史暨满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
48.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志·档案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49.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少数民族志[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

5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51.《明清档案通览》编委会.明清档案通览[M].北京：档案出版社,2000.
52. 宝音德力根.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一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
53. 阎崇年.满学研究(第5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4. 阎崇年.满学研究(第6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55. 李晋有.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论(4)[M].成都：巴蜀书社,2001.
56.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文物志[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57. 弘昼.八旗满洲氏族通谱[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
58. 宝音德力根.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二辑)[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
59. 阎崇年.满学研究(第7辑)[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
60. 卢秀丽,阎向东.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综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2.
61. 阎崇年.二十世纪世界满学著作提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62.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吉林省志·民族志[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63. 郭孟秀.满文文献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4. 包和平.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5. 魏忠.中国的多种民族文字及文献[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6.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67. 沈阳市政协学习宣传文史委员会,沈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沈阳少数民族[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4.
68.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辽宁省志·档案志[M].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
69. 秦国经.明清档案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70. 朱崇先.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71. 穆鸿利.海青集[M].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2005.
72. 张佳生.中国满族通论[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73. 张杰,张丹卉.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7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1994—2004)[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75. 傅波.赫图阿拉与满族姓氏家谱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
76. 赵阿平.满族语言与历史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77. 吴雪娟.满文文献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78. 杨丰陌,张本义.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6.
79. 包和平.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80. 张海惠.二十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分布及学术研究成果——国际性书目之书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81. 吴雪娟.满文翻译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82. 德力格尔.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开发利用与数字化管理[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才出版社,2007.
83. 史金波.中国历代民族古文字文献探幽[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85. 傅波.从兴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86. 包和平. 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研究[M]. 北京: 图书馆出版社,2009.
87. 佟永功.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88. 陈子丹. 民族档案史料编纂学概要[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8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1—14)[M]. 北京: 中华书局,1978.
90. 屈六生. 六十年来的满文档案工作概述[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1988.
91. 关孝廉. 论《满文老档》[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1988.
92. 神田信夫. 东洋文库收藏的满文档案[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1988.
93. 周远廉.《满文老档》与清朝开国史研究[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1988.
94. 阎崇年. 满学研究刍言[M]//满学研究(第1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95. 阎崇年. 中国满学研究评述(1949—1991)[M]//满学研究(第1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96. 庄吉发. 中国台湾的满学研究[M]//满学研究(第1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97. 吴元丰. 清代内阁满文档案述略[M]//满学研究(第2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98. 加藤直人. 关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逃人档》[M]//满学研究(第2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99. 庞晓梅.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所珍藏的满文抄本[M]//满学研究(第2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100. 屈六生. 简论我国满文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M]//满学研究(第 2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101. 松村润. 日本满学研究近况[M]//满学研究(第 2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102. 戴逸. 开展满学研究的意义[M]//满学研究(第 2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103. 陈捷先. 北京满学学术讨论会祝辞[M]//满学研究(第 2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104. 李洵. 应当重视满学的发展[M]//满学研究(第 2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4.

105. 神田信夫,陈晖. 从《满文老档》到《旧满洲档》[M]//满学研究(第 3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6.

106. 松村润,陈晖. 关于无圈点老档[M]//满学研究(第 3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6.

107. 胡增益. 满文的历史贡献[M]//满学研究(第 3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6.

108. 阎崇年. 论《满洲老档》[M]//满学研究(第 4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8.

109. 庄吉发. 文献足征——《满文原档》与清史研究[M]//满学研究(第 4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8.

110. 佟永功. 述崇谟阁《满文老档》[M]//满学研究(第 4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8.

111. 赵志强,江桥.《无圈点档》及乾隆抄本补絮[M]//满学研究(第 4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8.

112. 白洪希. 崇谟阁与《满文老档》[M]//满学研究(第 4 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8.

113. 张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案利用工作初探[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114. 赵熊. 军机处录副奏折目录数据库——分析与应用[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115. 王卫. 浅谈馆藏内阁满文题本特点及内容[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116. 张莉. 满文档案著录标引简论[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117. 朱金甫.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七十年的档案史料编辑工作论概[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118. 张健民. 在第二届满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19. 朱诚如. 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开幕词[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0. 戴逸. 在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1. 陈捷先. 在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2. 松村润. 在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致辞[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3. 阎崇年. 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闭幕词[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4. 阎崇年. 中国满学研究五十年(1949—1999年)[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5. 穆鸿利. 跨世纪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6. 神田信夫. 内藤湖南的满学研究[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7. 任万平. 清代官印制度综论[M]//满学研究(第5辑). 北京：民族

出版社,2000.
128. 胡增益.中国的满学研究[M]//满学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29. 甘德星.满文罗马字拼写法刍议[M]//满学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30. 李学智.《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的再研究[M]//满学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31. 庄吉发.清代起居注册与满学研究[M]//满学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32. 吴元丰.清代满文档案述论[M]//满学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33. 陈捷先.论《满文老档》用字看满族汉化[M]//满学研究(第6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134. 关嘉禄.辽宁省满文档案的发掘与清史研究[M]//清史论丛(2007年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135. 吴雪娟.新发现的《黑龙江、松花江、嫩江流域图》概述[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36. 加藤直人.关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代档案[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37. 苏文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网络系统工程建设及应用效果评价[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38. 钱进.论仿真复制档案的意义[M]//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139. 吴元丰.清代珲春协领副都统衙门及其满汉文档案[M]//明清论丛(第8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140. 赵彦昌.满文档案与清代满族史研究[M]//傅波.从兴京到盛京——努尔哈赤崛起轨迹探源.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141. 赵志强.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概述[M]//清史论丛(2010年号).北

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9.
142. 赵彦昌.八十年来满文档案出版书录[M]//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一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
143. 关嘉禄.清史满学暨京剧艺术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2.

期刊：

1. 关孝廉，张凤良.关于《满文老档》[J].故宫博物院院刊，1979(3).
2. 任世铎，关嘉禄.满文在清代东北史研究中的价值及当前应用概况[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6).
3. 周远廉，刘景宪，季永海.关于《满文崇德三年档》的几个问题[J].社会科学战线，1982(4).
4. 任世铎.满文与满文档案[J].档案学通讯，1982(5).
5. 帕什科夫，胡增益.俄国学者对满语文研究的贡献[J].民族译丛，1983(6).
6. 富丽.满文文献整理纵横谈[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3).
7. 松浦章，孙世春.满文档案和清代日中贸易[J].日本研究，1985(1).
8. 佟永功，季永海.从满文文献看满语的形动词[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3).
9. 康尔平.辽宁省图书馆藏满文书述略[J].满语研究，1986(1).
10. 从佩远.略论满文产生的历史条件[J].北方文物，1986(1).
11. 从佩远.论满族语言文字的演变[J].北方文物，1986(1).
12. 朱金甫.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概述[J].历史档案，1986(1) .
13. 季永海，赵杰.满语研究中的一些问题[J].满语研究，1986(2).
14. 佟永功.应当注意满文文献的收集[J].辽宁档案，1986(2).
15. 王多闻，关嘉禄.大连市图书馆藏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发掘和整理

[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7(1).
16. 佟永功,关嘉禄.论满文的使用及其历史作用[J].满族研究,1987(3).
17. 吴元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J].历史档案,1988(3).
18. 屈六生.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J].历史档案,1989(1).
19. 肖可.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介绍[J].满语研究,1989(1).
20. 玛娜.满文古籍文献述略[J].满族研究,1989(1).
21. 屈六生.清代军机处满文档案综述[J].历史档案,1989(1).
22. 屈六生.试论清代满文档案汉译文的风格和特点[J].民族译坛,1989(1—2).
23. 肖可.培养满文档案翻译人材之管见[J].满语研究,1989(2).
24. 佟永功,关嘉禄.辽宁的满文档案及其他[J].兰台世界,1989(4).
25.《满语研究》编辑部.培养满语人才弘扬民族文化[J].满语研究,1990(1).
26. 吴元丰.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J].历史档案,1990(1).
27. 关孝廉.《满文老档》原本与重抄本比较研究[J].历史档案,1990(1).
28. 吴元丰.归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J].历史档案,1990(1).
29. 关孝廉.《盛京满文旧档》及其特点[J].民族古籍,1990(2).
30. 石桥崇雄,肖可.近年来刊行的关于满语文论著[J].满语研究,1990(2).
31.《满语研究》编辑部.美国哈佛大学博士研究生来访[J].满语研究,1990(2).
32. 屈六生.试析清代满文档案汉译中的管界问题[J].满语研究,1990(2).
33. 金宝森.为培养满文人才—促进满学研究而建立的北京满文书院[J].满族研究,1990(4).
34. 吴元丰.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整理编目[J].清史研究,1991(2).

35. 任丽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及其价值[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3).
36. 关嘉禄,佟永功.中国满文及其文献整理研究[J].清史研究,1991(4).
37. 屈六生,王熹.献身满文档案事业的“巴克什”——记全国档案系统先进工作者关孝廉[J].档案学研究,1991(4).
38. 关嘉禄,佟永功.中国满文及其文献整理研究[J].清史研究,1991(4).
39. 吴雪娟.谈清代满文档案中的公文套语[J].满语研究,1992(1).
40. 阿列克山德洛夫娜,黄定天.阿·瓦·格列别西科夫关于萨满教的满文档案资料[J].满语研究,1992(2).
41. 刘子扬,张莉.《满文老档》综析[J].满语研究,1992(2),1993(1).
42. 赵志忠.论满语文在满学研究中的地位[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4).
43. 关孝廉.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J].历史档案,1994(1).
44. 周庆生.中国满通古斯诸语社会语言学研究六十年[J].满语研究,1994(1).
45. 关孝廉.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J].历史档案,1994(1).
46. 刘景宪,赵阿平.中国当代满语文研究的内容及成果[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1).
47. 乔治忠.《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档”关系考析[J].历史档案,1994(1).
48. 刘景宪,赵阿平.中国当代满语文研究的内容及成果[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4(1).
49. 关孝廉.清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刍议[J].历史档案,1994(1).
50. 乔治忠.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J].社会科学战线,1994(3).
51. 赵志忠.十年来我国满学研究发展综述[J].满族研究,1994(3).

52. 江桥. 德国的满学研究[J]. 北京社会科学,1995(1).
53. 吴雪娟. 馆藏《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的价值分析[J]. 黑龙江档案,1995(1).
54. 余梓东. 提高满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参与程度[J]. 满族研究,1995(4).
55. 黎青. 再现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的珍贵史料——《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评介[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4).
56. 葛仁军. 镶红旗档[J]. 兰台世界,1995(6).
57. 邓天红. 谈满族语言文字的主要社会功能[J]. 满语研究,1996(2).
58. 佟永功,关嘉禄. 关于满文档案整理翻译的几个问题[J]. 满族研究,1996(4).
59. 何溥滢. 日本收藏满文文献概述[J]. 满族研究,1996(4).
60. 吴元丰. 清代内阁满文档案述略[J]. 满语研究,1997(1).
61. 关克笑. 老满文改革时间考[J]. 满语研究,1997(2).
62. 赵阿平. 满文档案的重要价值与翻译人才的培养[J]. 黑龙江社会科学,1997(3).
63. 张莉. 简论满文的创制与改进[J]. 满语研究,1998(1).
64. 吴元丰. 新近发现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文档案及其价值[J]. 清史研究,1998(1) .
65. 吴雪娟. 从满文档案看五大连池火山[J]. 满语研究,1998(2).
66. 吴雪娟. 有关五大连池火山爆发历史的满文档案[J]. 北方文物,1998(2).
67. 庆夫. 锡伯文、满文、信息处理[J]. 语言与翻译,1998(4).
68. 庆夫. 锡伯文与满文信息技术应用研究[J]. 语言与翻译,1998(4).
69. 关嘉禄. 中国大陆满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社会科学辑刊,1998(6).
70. 邢永福.《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序[J]. 历史档案,1999(1).
71. 蒋理. 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纪要[J]. 满语研

究,1999(2).
72. 张俐,李晶皎,赵欣,等. 开放式满汉辅助翻译系统的研究和实现[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6).
73. 程大鲲.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简介[J]. 满族研究,2000(1).
74. 吴元丰. 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新疆史料及其研究价值[J]. 西域研究,2000(1).
75. 黄定天. 苏联的满学研究[J]. 满语研究,2000(2).
76. 佟永功. 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J]. 满族研究,2000(3).
77. 阮兴,朱姗姗.《满文老档》及其价值[J]. 档案,2000(5).
78. 张虹. 简述乾隆帝对完善满语文的贡献[J]. 满语研究,2002(1).
79. 郭孟秀. 试论早期满文文献分类[J]. 满语研究,2002(1).
80. 佟永功,季永海. 试论满文文献的著录[J]. 满语研究,2002(2).
81. 郭孟秀. 试论满文文献的著录[J]. 满语研究,2002(2).
82. 吴雪娟,陈洪洲. 满文档案与五大连池火山研究[J]. 满语研究,2002(2).
83. 张俐,胡明函,李晶皎,等. 满汉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的满文字符编码[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
84. 王钟翰. 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2002(3).
85. 包和平,王学艳. 国外对中国少数民族文献的收藏与研究概述[J]. 情报杂志,2002(6).
86. 郭美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及藏族历史档案概述[J]. 历史档案,2003(1) .
87. 李云霞. 满文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J]. 满语研究,2003(1).
88. 刘淑珍. 清代黑龙江满文档案与蒙古族研究[J]. 满语研究,2003(1).
89. 徐小慧. 齐齐哈尔满文文献_档案调查报告[J]. 满语研究,2003(1).
90. 吴雪娟. 论满文翻译的可译性限度[J]. 满语研究,2003(2).

91. 赵志强. 老满文研究[J]. 满语研究,2003(2).
92. 郭孟秀. 试论满文文献特征[J]. 满语研究,2003(4).
93. 华林. 论藏文历史档案的发掘利用[J]. 中国藏学,2003(4).
94. 阎立新. 满语文综论[J]. 满族研究,2003(4).
95. 张广渊. 李晶皎. 张俐. 满文矢量字库和罗马转写满文输入法的实现[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1).
96. 张广渊,李晶皎,张俐. 满文罗马转写与圈点满文转换算法的实现[J]. 东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2).
97. 聂鸿音. 谢德林图书馆收藏的满文写本和刻本[J]. 满语研究,2004(1).
98. 阎立新. 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概述[J]. 满语研究,2004(1).
99. 吴元丰. 黑龙江地区柯尔克孜族历史满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J]. 满语研究,2004(1).
100. 郭美兰.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J]. 满语研究,2004(2).
101. 郭孟秀. 满文玉宝、玉册研究[J]. 满语研究,2004(2).
102. 巴根. 清代满蒙翻译考略[J]. 满语研究,2004(1).
103. 李国荣. 编纂清代档案服务清史工程[J]. 历史档案,2004(1).
104. 阎立新. 大连图书馆馆藏满文文献概述[J]. 满语研究,2004(1).
105. 贺灵. 清代满文文献概论[J]. 西域研究,2004(1).
106. 郭春芳. 清代珲春副都统衙门及其档案[J]. 历史档案,2004(3) .
107. 郭美兰.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J]. 满语研究,2004(2).
108. 吴雪娟. 论满文翻译的历史与现状[J]. 满语研究,2005(1).
109. 刘淑珍,苏静. 浅析清代鄂伦春满文户籍档案[J]. 满语研究,2005(2).
110. 张木森. 满文文献语言形式及其著录国家[J]. 图书馆学刊,2005(2).

111. 吴雪娟. 论满文翻译观[J]. 满语研究,2005(2).
112. 刘淑珍,苏静. 浅析清代鄂伦春满文户籍档案[J]. 满语研究,2005(2).
113. 吴雪娟. 论满文翻译的历史与现状[J]. 满语研究,2005(1).
114. 华林,谭莉莉. 西南少数民族石刻历史档案保护技术研究[J]. 广西民族研究,2005(3).
115. 刘凡.《黑图档》与沈阳故宫建筑[J]. 兰台世界,2005(5).
116. 赵骥,王丽君,李晶皎. 基于统计的满文识别后处理的研究和实现[J]. 鞍山科技大学学报,2005(6).
117. 张木森. 满文文献语言形式及其著录[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06(1).
118. 邓天红. 满语文与清史教学[J]. 满语研究,2006(1).
119. 邹爱莲,李国荣. 上林春讯人间满剪出红梅花万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10年明清档案开发利用综述[J]. 历史档案,2006(1).
120. 孙宏开. 重视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的记录和保护[J]. 满语研究,2006(1).
121. 张虹. 老满文改革的初始时间[J]. 满语研究,2006(2).
122. 吴雪娟. 清代满文舆图概述[J]. 满语研究,2006(2).
123. 王小虹. 清代珲春衙门档案概述[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3).
124. 邹爱. 莲档案整理利用在清史纂修中的地位和作用[J]. 社会科学战线,2006(3).
125. 萨如拉. 满文档案《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研究[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6(3).
126. 赵骥,李晶皎,王丽君,等. 基于HMM的满文文本识别后处理的研究[J]. 中文信息学报,2006(4).
127. 陈子丹,解菲. 对少数民族档案编研的几点思考[J]. 档案学通讯,2006(5).
128. 赵骥,李晶皎,张广渊,等. 脱机手写体满文文本识别系统的设计与

实现[J].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2006(6).
129. 吴元丰.清代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及其史料价值[J].满语研究,2007(1).
130. 陈子丹.民族档案学形成与发展刍议[J].档案学研究,2007(4).
131. 张玉.满文档案的前身今世——清王朝早期的记忆遗产[J].中国档案,2007(9).
132. 朱桂凤.东北地区满族民俗旅游开发浅析[J].满语研究,2008(1).
133. 郭美兰.清代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满文题奏研究[J].满语研究,2008(1).
134. 吴元丰.满文与满文古籍文献综述[J].满族研究,2008(1).
135. 吴雪娟.五大连池满语地名考释[J].满语研究,2008(1).
136. 李健民,李洪伟,张丽娜,等.清代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满文题奏研究[J].满语研究,2008(2).
137. 吴春娟,刘淑珍.东北边疆满文档案研究[J].满语研究,2008(2).
138. 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J].史学集刊,2008(2).
139. 卢秀丽.辽宁省图书馆满文古籍图书藏书状况的统计与辨析[J].满族研究,2008(2).
140. 薛莲.大连图书馆藏"满铁资料"中珍稀本满语、满学图书撮要[J].文献,2008(2).
141. 王光越.中国满文及其文献整理研究[J].历史档案,2008(3).
142. 关嘉禄.立足辽宁繁荣满学[J].满族研究,2008(4).
143. 赵阿平.满语文献保护开发与历史文化综合研究[J].满族研究,2008(4).
144. 白晓清.从满文档案记载看清代"贡貂与赏乌林"制度[J].黑龙江档案,2008(8).
145. 曾小吾.世界显学30年—改革开放以来满学研究析略[J].满语研究,2009(1).

146. 佟颖. 皇清职贡图及其研究[J]. 满语研究,2009(1).
147. 郭美兰. 沈阳故宫满汉文档案综析[J]. 满语研究,2009(2).
148. 王兰,于静. 论少数民族档案的类型与作用[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9(2).
149. 韩娜. 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满文档案研究[J]. 文化学刊,2009(3).
150. 赵彦昌,王红娟. 满文档案开发利用研究[J]. 满族研究,2010(4).
151. 赵彦昌,王红娟. 中国流失海外的满文档案文献及其追索[J]. 山西档案,2010(6).
152. 赵彦昌. 论满文档案的价值[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1(3).
153. 赵彦昌,黄娜. 论建国后满文档案的管理[J]. 满族研究,2011(4).
154. 吴元丰. 百年来满文档案出版研究综述[J]. 满语研究,2011(2).
155. 赵彦昌,黄娜. 近代以来满文档案编译研究[J]. 满族研究,2012(2).
156. 赵彦昌,黄娜. 论满文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J]. 东北史地,2012(5).

报纸:

1. 关嘉禄. 突出地方特色繁荣满学研究[N].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05-13.

后记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不少档案，而以满文档案为最多。据国家档案局统计，目前仅保存在全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的满文档案有300多万卷。满文档案是研究清史的第一手最可靠的文献资料，比《实录》、《起居注》的价值还要高，满文档案对于研究档案学、满族史、东北史，尤其是清前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可以说，满文档案是满学研究乃至整个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课题。它反映了满族自清代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和其他各种原因，目前我国很多满文档案或者散落民间，或者在各级各类档案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有的已处于濒危状态，并且长期以来对满文档案开发力度也不够。自我国开放历史档案以来，已经公布的满文档案也不多，利用这些档案只能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等有限的几个地方去查询，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制约了对满文档案的开发和利用。而且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文献的研究，满文档案的研究已经严重落伍。

我是从2005年参加"第五届中国暨国际满学研讨会"开始关注并研究满文档案的。近年来，先后在《满族研究》、《山西档案》、《东北史地》、《辽金历史与考古》、《兰台世界》、《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有关满文档案的学术论文十余篇，并主持与满文档案研究相关的科研

项目3项。《满文档案研究》一书就是我和我的3位学生共同致力于满文档案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成果，其中第七章《满文档案的编纂》缘自黄娜的硕士毕业论文（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第九章《满文档案的数字化》源自王红娟的硕士毕业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第一章的第三节、第四节，第三章的第一节由张惠萍（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完成，其余各章由我和黄娜、王红娟共同完成。

《满文档案研究》一书在设定大纲的过程中曾得到云南大学陈子丹老师、华林老师，辽宁省档案馆何荣伟老师、程大鲲老师的指正；书稿完成后，陈子丹老师在百忙中给本书作序，对晚学勉励有加；辽宁省档案馆佟永功老师审校了本书书稿，指出本书存在的很多问题并提出很多建设性建议，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不足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朋友们批评指正，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国内外同行的大量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并在书末列举了满文档案研究的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

赵彦昌

2012年11月8日

ISBN 978-7-5100-5429-7
WS/5429 定价：45.00元